

神的地下教會

理查·魏恩波

Richard Wurmbrand

IN GOD' S UNDERGROUND (Chinese-traditional)

第一章

我人生的前半，在 1948 年 2 月 29 日結束。當我從家步行到附近的教堂時，一輛黑色福特汽車在我旁邊急剎車，兩個男人跳下車，抓住我的手臂，把我推到後座上。第三人在司機旁邊，用一支手槍對准我。汽車飛馳穿過布加勒斯特寒冷、灰色的街道，拐進一條橫路，稱為卡利街（Calea Rahova）。然後汽車駕入一道鋼門。我聽見鐵門呼然關閉。

綁架我的是共產黨秘密警察，這裏是他們的總部。在裏面，我的文件、我的物品、我的領帶和鞋帶，最後連我的名字都被拿走了。“現在開始，”值班官員說道，“你就是瓦西裏·喬治斯庫。”這是一個很常見的名字，很容易忘記。當局甚至不希望看守的獄警知道囚犯的身份，以防泄露國外，因為我在國外也相當出名。和其他許多人一樣，我也將消失得無影無蹤。

卡利街牢房是一所新監獄，我是它的第一個囚犯。但監獄對我來說並不是什麼新鮮經歷。戰爭期間，我曾被希特勒時代統治的法西斯分子逮捕，共產黨剛上臺後，我又曾經再次被捕。這牢房的牆上高處有一扇小窗戶，兩張木板床，角落裏放著常用的馬桶。我坐著等待審訊。我知道他們會問什麼問題，我又必須給出什麼答案。

我很清楚什麼是恐懼，但此刻我沒有任何感覺。這次被捕，以及接下來發生的一切，都是我祈禱的答案，我希望它能給我的生活帶來新的意義。我不知道有什麼奇異的發現正等待著我。

2

我爸爸在家裏藏了一本書，建議年輕人如何準備當一名律師、醫生、軍官等職業。一天，當我五歲左右的時候，爸爸從書架上把這書取下，問我的兄弟們想從事甚麼職業。當哥哥們做出選擇後，父親轉向我這個最小的孩子。“那麼你會做什麼，理查？”我看著書名《各行各業總向導》，想了想，然後回答說：“我想成為一名總向導。”

從那時起，已經過去了近五十年，其中十四年在獄中度過，我還經常想起這些話。據說我們在生命的早期就做出了選擇。對於我目前的工作，我不知道有什麼比“總向導”更貼合了。

然而，成為一名基督教牧師，遠非我當初的念頭，也不是我猶太父母的意願。我九歲時父親去世了，我們家總是缺錢，而且常常缺面包。曾經有一個男人願意為我買一套衣服，但當我們走進服裝店，裁縫拿出了他最好的衣服時，這位好心人卻說：“對一個這樣的男孩，這套衣服太好了。”我仍然記得他的聲音。我的學業不穩定且乏味，但我們家裏有很多書。在我十歲之前，我就讀完了所有這些書，並成為了一個像我所崇拜的伏爾泰一樣，對萬事充滿了懷疑。然而宗教總是吸引我。我留心觀察東正教和羅馬天主教堂的儀式，有一次在猶太教堂裏，我看到一個相識的人正在為他生病的女兒祈禱。第二天那女兒就去世了，我問拉比說：“上帝怎麼能拒絕如此迫切的祈禱呢？”他沒有答案。看到這麼多人挨餓受苦，我無法相信有一個全能者的存在，更不相信祂曾經差派一個像耶穌基督這樣善良和智慧的人到世上來。

隨著我的成長，我盡可能地享受快樂。我決心彌補童年错过的快樂。我進入布加勒的商業世界。在我二十五歲時，就已經在一家進出口公司，晉升為

管理層。該公司有很大的机会可以中飽私囊。於是我就有錢可以在“小巴黎”（當時羅馬尼亞首都的外號）的妓院和夜總會裏燒了。我只要滿足自己的胃口，其他一概不理。這是一種許多人羨慕的生活，但它卻不能滿足我內心的空洞。我知道這些娛樂都是假的，我正在糟蹋我裏面一些好的東西。雖然我確信沒有上帝，但我內心還是希望事實不是如此。我希望在這宇宙中，有一些值得為之生存的事物。

一天晚上，我漫步走進一座教堂，加入了一群在聖母雕像前做禮拜的人，跟他們念誦“萬歲瑪利亞”，但我感到很空虛。我對那尊聖像說：“真的，你就像石頭。這麼多人懇求你，你卻無能為力。”

結婚後我繼續追求其他女人。我也不自問是否誠實。我想傷害所有人。欺騙、撒謊和享樂就是我的生活。當我二十七歲的時候，早期的匱乏和後來的過度放蕩，令我患上結核病（肺癆），這在當時是一種危險的疾病。醫生把我送到了郊外的一家療養院。我生平第一次的休息。望著窗外寧靜的樹林，我開始回顧自己混亂的過去。我害我的母親哭泣，還有我的妻子，和那麼多無辜的女孩。我引誘、誹謗、譏笑，欺騙，盡是為了玩樂。我躺在那裏流淚了。

在那間療養院裏，我第一次祈禱，這是無神論者的祈禱。我這樣說：“神啊，我知道你不存在。但如果你果然存在（我否認這一點），那麼你就有責任向我顯現。我却沒有責任尋求你。”

那時我的哲學完全是唯物主義。但我的內心卻無法滿足。我相信人只是物質，當人死了，就分解成鹽和礦物質。然而我失去父親後，卻不能想象爸爸只成了一堆礦物質。留在我心中的永遠是活生生的爸爸。難道我們的感覺錯了？

我心裏充滿了矛盾。我在喧鬧的夜總會裏度過了很長時間，但我也喜歡在墓地裏孤獨地散步——有時是在冬日，墳墓上積著厚厚的雪。我告訴自己：“有一天，我也會死，我的墳墓上會下雪，而活著的人會繼續歡笑、擁抱和享受生活。我却無法再參與他們的歡樂，我甚至不曉得他們。我將不再存在。不久之後，沒有人會記得我了。那麼人生有何意義？”

我記得讀到過，克虜伯（Krupp）憑著制造犀利的殺人武器致富，但他本人却最是怕死。任何人都不可在他面前提及死亡。他與妻子離婚，因為妻子告訴他有關侄子去世的消息。他擁有了一切，但卻毫不快樂，因為他知道他的幸福不能持久，他終得放手，任由身體腐爛。

雖然我為文學的興趣，讀過《聖經》，但每當我讀到敵人挑戰基督，“如果你是神的兒子，就從十字架上下來吧”；我的思想就關閉了。耶穌並沒有下來，倒真的死了在十架上。這似乎證明祂的敵人說的沒錯。然而，我的思念依然轉向基督，我對自己說：“我希望我能見到他，與他交談。”每天我的默想都是這樣結束。

療養院裏有一位女病人，病得很重，無法離開自己的房間，她不知何故聽到有關於我，就托人交了一本關於拉蒂斯邦兄弟的書。這位弟兄創立了一個信主的猶太人之組織。這令我很感動。因為看到有人這麼關心我，而我卻任意浪費了自己的生命。

在療養院幾個月後，我病情稍有好轉，就去一個山村療養，在那裏我認識一位老木匠。有一天，他給了我一本聖經。後來我才發現這不是普通的聖經：他和他的妻子每天花幾個小時為我祈禱。我躺在小屋的沙發上讀《新約》，在這些日子，基督對我就像給我送飯的那婦人一樣真實。但並不是所有承認基督的人都得救了；撒旦也相信，但它卻不是基督徒。我對耶穌說：“你永遠不能叫我作你的門徒。我想要的是金錢、旅行、快樂。我已經受夠苦了。你的道路是艱難的十字架之路，即使它也是真理之路，我也不要它。”

耶穌的回答就像一個懇求：“跟我來。不要怕十字架。你會發現這是最大的快樂。”

我繼續讀下去，開始流淚。基督的生活與我相比，祂是如此純潔，我却如此肮髒；他那麼無私，我却貪婪；他充滿愛，我充滿恨。面對這種智慧和誠實，我的自信開始崩潰。我就像中國古代的一個故事，一個人在烈日下疲憊不堪地跋涉，終於來到一棵大橡樹的蔭下。“我找到你真是太幸運了，”那疲乏的人說。但橡樹却回答：“這不是幸運。我已經等你四百年了。”基督一生都在等待我。現在我們見面了。

3

我的歸信基督是在我與薩賓娜結婚六個月

後。薩賓娜是一個漂亮的少女，從未考慮過靈魂的問題。我的信主對她來說是一個可怕的打擊。她的童年缺乏太多幸福，如今正要開始補償她所失去的幸福。當她所愛的男人，她的快樂伴侶，從療養院回來時，卻成了虔誠的信徒，甚至要當牧師。後來她對我說，那時她一度想自殺。

儘管薩賓娜也願意跟我去教堂，但她仍然渴望紅燈綠酒的生活。於是當她想去某些歡樂場所時，我就陪她去。一天晚上，我們被邀請參加一個聚會。空氣中瀰漫著煙霧，情侶們互相擁抱著跳舞。眾人喝酒多了，談話也充滿暗示。薩賓娜突然對這一切感到厭惡，要求立即回家。我回答說：“我們才來，為什麼這麼快走？”

於是我們就一直呆到半夜。她再次建議回家，我再次拒絕。只有當我確信她對這整件事感到徹底惡心時，我才同意離開。我們來到寒冷的空氣中。“理查，我要直接去牧師家請他為我施洗。這就像在經歷了這些汙穢之後洗個澡一樣。”

我笑著說：“你已經等了這麼久了，薩賓娜，那麼就等到早上吧。讓可憐的牧師也睡多一點。”

4

第二天，我的生活大變。以前，我們只追求快樂。如果薩賓娜妨礙了我的享受，我會毫不猶豫地和她離婚。現在我們發現了生活的秘密，不久之

後，我們就有了一個孩子，一個名叫米海的兒子。他是上帝賜的禮物。如果他來的早一些，我們很可能把他墮胎了，免得擾亂我們的快樂生活。但現在我們有了新的人生目標，薩賓娜變得和我一樣積極地為基督贏得靈魂。事實上，她贏得了更多。

第二天，在我所知道的商界，誠實是例外而不是規則，當布加勒的英國聖公會傳教士喬治·史蒂文邀請我擔任秘書時，我們都很高興接受了。我盡力使用商業的本能。但當我說服一名保險代理人接受賄賂，放棄對教會索賠時，麻煩就出現。令我驚訝的是，史蒂文先生似乎不理解我的安排。

他問，“但是，哪一方正確呢？是保險公司還是我們？”

我說是保險公司。

“那麼我們就必須賠，”他說，於是就結束在我看來是有利的交易。

在1940年，希特勒入侵波蘭，羅馬尼亞和英國斷交，英國神職人員全部必須回國。教會無人料理，我便試圖繼續維持。

薩賓娜和我已經放棄了大部分以前的朋友，我們的許多新朋友都是我們帶領信主的人：他們已經是教會成員。我自學傳教，並在仔細考慮羅馬尼亞各

個敵對的教派後，選擇了信義派（路德派）。後來我也被任命為信義會牧師。

我國五分之四的人屬於東正教。這派過於儀式化。天主教也是。在一個復活節周日，我參加一間天主教的禮拜。他們使用拉丁話，進行一切儀式。直到主教的政治演講後，我便離開了。直到那時，他們還沒有用我們的通用語言（羅馬尼亞語）提到基督的復活。

於是我便選擇儀式簡單的新教（復原宗，或更正派）之一，信義派。因為更正派把講道作為崇拜聚會的中心。人們可以在聽道中獲得心靈的糧食。還有，儘管沒有他的偉大，我也感到自己與馬丁·路德相似。他是一個脾氣暴躁、好爭吵的人，但他那麼愛耶穌，以至他相信，人的得救不是靠自己的善行，而是靠信心。（路德的性格有缺陷，於是不可能行為上有什麼好的表現。）於是我成了一名信義教徒。

在羅馬尼亞，成為一名信義會成員，意味受國家管制，有時還會與其他宗教少數群體一起受迫害。（在共產黨接管之前，東正教和天主教等主流教會沒有受到迫害。）

過去我對牧師神父，常存異心，保持警惕，尤其是那些問我是否“得救”的神職人員。如今正好相

反。我最留意的就是眾人是否得救。雖然我沒有牧師的服裝，但整個世界都是我的教區。我總是感到信主的人太少。我的口袋裏總是放著一份我的會眾名單，我在公共汽車和候車室裏拿出它，問自己每個人在那個特定時刻在做什麼。如果其中一個跌倒了，我就會陷入沮喪幾個小時。信徒的冷淡可以給我帶來痛苦，就如身上的痛苦一樣真實，我不得不求神移開這種負擔，不然就活不下去。

5

在 戰爭期間，斯大林（Stalin, = 史達林）向希特勒提供經濟援助的條件下，東歐出現了新的瓜分。我國三分之一的領土被俄羅斯、保加利亞和匈牙利瓜分。納粹的影響，助長了我國的鐵衛隊，其成員試圖利用東正教進行政治恐怖主義。

在暗殺他們的主要對手卡利總理（Calinescu）的前一天晚上，九名狂熱分子在教堂守夜。他們躺在教堂的地板上，身體形成一個十字架。此後，鐵衛隊就幫助希特勒的傀儡安東尼將軍（Ion Antonescu）奪取了政權。卡羅爾國王（Carol）被迫

退位，讓位給他年幼的兒子米迦勒(Michael)，安東尼就押天子而令諸侯，進行他的獨裁統治。

現在鐵衛隊可以任意對付猶太人、共產黨和新教徒。隨處都有人被謀殺。我們的宣道會被指控為叛國機構（當時英國與德國是敵對國），我每天都收到恐嚇。一個周日，當我在講壇上講道時，我看到一群身穿綠色軍服的鐵衛隊手持左輪手槍悄悄地進入教堂。面對祭壇的會眾沒有意識到這批人。我想，如果這是最後一次講道，那麼必須講的好。因此，我選擇談及耶穌的手。這雙聖手曾擦幹人的眼淚，扶起孩子，喂飽饑餓的人。祂又醫治病人，被釘在十字架上，並在祂升天之前祝福了門徒。然後我高聲音喊道：

“但是你們！你們的手做了什麼？”

會眾都驚訝。他們的手正在拿著祈禱書。

我怒吼道：“你們在殺害、毆打、折磨無辜的人。你們還稱自己是基督徒嗎？你們這些罪人，洗淨你們的手！”

鐵衛們很生氣，但並沒有中斷我們的禮拜。當我為會眾作散會的祝福時，士兵們都拿著槍站在後面。當大多數會友們安全離開後，我走到窗簾後面。我聽到有人奔跑和喊叫：“魏恩波在哪裏？抓

捕他！”我就打開了講壇後面的暗門，進入秘密的通道，把門在身後鎖了，就穿過蜿蜒的走廊，到了一條小街，安全逃脫。這密門是多年前建立的。

隨著戰爭的進展，我國許多基督教小宗派——列如安息日會、浸信會、五旬節派——也被屠殺或與猶太人一起被趕到集中營去。我妻子的全家都被帶走了；她再也沒有見過他們。我曾三次被法西斯（鐵衛隊）逮捕——審訊、毆打和監禁。因此，我對共產黨也有了充分的準備。

6

從卡利街牢房的鐵條小窗，我可以看到院子的一角。當我觀看時，一位神父被帶進了大門。他迅速穿過柏油路，穿過一扇門。這一個告密者，來報告他的會眾的情況。

我知道我面臨著無休止的問話、虐待，可能監禁多年，死亡，我不曉得我的信仰是否足夠堅強。我當時記得聖經裏寫了366次“不要怕！”這天正是2月29日。

當局並不急于見我，因為共產監獄就如信息的

档案室，在需要某種資訊時，便押出一名相關的囚徒，進行拷問。在我被監禁的十四年半里，我被拷問了無數次。共黨認為我与西方教會宣教機構和《世界基督教協進會》的聯系是叛國行為，但還有其他重要的事情是他們未曾曉得的，必須從我索取。

正如一名和平時期的士兵為戰爭的艰辛做好準備一樣，我也為自己做好了入獄和酷刑的準備。我的文本是過去基督徒的生活，他們曾面臨着類似的磨難。我正在思想如何善用他們的經驗。許多忽視這樣做的人最終被痛苦压垮，或者被欺騙而背叛了同胞。

問話官總是告訴牧師：“作為一名基督徒，你必須告訴我們全部真相。”就我而言，我知道無論我說甚麼，我都會被定罪，我就決定在酷刑下我可能會自認有罪，但決不會透露幫助我傳播福音的朋友的身份。所以我打算讓審訊者在調查結束時比開始時更加困惑；我會完全誤導他們。

我的首要任務是警告我的同事，並讓妻子知道我在哪里。我說服了一位獄警作為中間人，因為當時我家還有些錢。在接下來的幾周里，他因傳遞信息而收到了大約 1500 美元。然後我們的一切都被當局充公了。

這位獄警也帶來消息說，瑞典大使對我的失蹤提出抗議，說我在瑞典，挪威和英國有很多支持者。我國的女強人，外交部長安娜（Ana Pauker）回

答說，她只曉得我不久前已經秘密離開羅馬尼亞，以後就沒有我的消息了。

7

作為一個中立國的大使很難進一步追究此事，尤其是對這位帶有猶太血緣的安娜。連男子漢在她面前也感到畏懼。我見過她，也認識她的父親，一位名叫拉比諾維奇的牧師，他悲傷地告訴我，“安娜心里對猶太人完全沒有感情。”她曾學醫，後來在英國教會傳教團任教，以後就投身共產主義，並嫁給了一位名叫馬塞爾·鮑克(Marcel Pauker)的工程師。馬塞爾與她觀點相同。兩人都因圖謀反政府而下獄。但安娜比丈夫更狂熱。三十年代，她去了莫斯科，馬塞爾也跟着去了，但沒有那麼熱烈。在斯大林的一次戰前的清黨中，馬塞爾被處決了——有傳言說，是被他的妻子親手槍殺的——很少人懷疑這個故事。安娜作為蘇聯公民在莫斯科渡過了大部分戰爭時光，並在紅軍中擔任軍官。戰後，她在1947年返國擔任外交部長。

她對俄羅斯極為忠誠。有一天，有人問她為甚麼撐着雨傘走過布城時，她回答道：“你沒有聽到天氣預報嗎？莫斯科正在下大雨。”

在年輕的米迦勒國王與的一羣政治領導人，勇敢地癱黜了獨裁者安東尼將軍，並結束了與德國的同盟關係後，莫斯科召開了一次會議來決定戰後世界的形態。丘吉爾對斯大林說：“如果我們在希臘擁有九成的發言權，你也在羅馬尼亞有九成主導權，如何？”他把這些話寫在一張紙上。斯大林停了一下，然後就用藍色鉛筆在紙上畫了一個大勾，就傳了回去。

一百萬蘇俄軍隊涌入羅馬尼亞。這就是我們的新“盟友”。

“俄羅斯人來了！”對於東歐人民，這不是笑話。俄羅斯人在四十年共產統治下，已經變成野獸一般。他們的人生目標只有兩個：酗酒和蹂躪“資本主義剝削者”。數以千計的婦女，不計年齡，都被蘇軍強暴。男人們在街上被搶走自行車和手表等新奇物品。當紅軍秩序被整肅（槍殺整肅），商店重新開門時，這些占領軍對陳列的商品感到驚訝，尤其是當他們得知顧客大部分是農民和工廠工人時。

羅馬尼亞於 1944 年 8 月 23 日宣布向俄羅斯投降，至今仍每年慶祝該國獲得“解放”的日子。事實上，這是我國被剝奪的開始。我國的全部海軍、大部分商船隊、一半的機械和每輛汽車都被俄羅斯奪去。我們的農產品、馬、牛、礦產，所有的石油和汽油庫存也被運往俄羅斯。曾經被譽為“歐

洲糧倉”的羅馬尼亞很快就變成飢荒地區。

8

我信主的那一天，我曾祈禱：“上帝，我曾是一個無神論者。現在讓我去俄羅斯，在無神論者中間做傳教士。即使我會因此被捕，死在監獄中，也不抱怨。”但上帝並不必我遠道前往俄羅斯，倒是打發俄羅斯人到我這裏來。

戰爭期間，盡管遭受迫害，我們宣道會的成員却大大增加，在過去欺負猶太人或新教徒的人，如今有多人悔改，與我們猶太基督徒一同敬拜主。

戰後，我繼續為西方宣道會工作。我有一間辦公室、設備、秘書——這些是我秘密傳道活動的“門面”。

我能說一口流利的俄語，在街上、商店和火車上與蘇聯士兵交談很容易。由於我沒有戴牧師的項圈，他們把我當作一個普通公民。許多紅軍，尤其是年輕的一輩，都很想家。他們很高興獲得一個友好家庭的接納，或帶他們去參觀布加勒（Bucharest, 首都）的景點。我得到了許多懂俄語的基督徒幫助。我們利用地下出版社，用俄語出版

了福音書。三年內，我們分發了超過十萬本書籍到咖啡館、酒吧、公園、火車站——只要是有俄羅斯人的地方。其中許多本已經被傳閱多次，以致破爛。雖然我們的很多幫手最終被捕，但沒有人出賣我。

我們不僅對獲救的人數感到驚訝，而且稀奇它們的自然性。俄羅斯人對宗教一無所知，但他們的潛意識似乎正在尋求真理，並歡喜發現。這些紅軍大多數是年輕的農民，他們曾在陽光下和雨中工作，播種和收穫。他們從骨子里知道，自然界必然有一個主宰。但由於他們是在無神論中長大的，所以他們確信自己是無神論者，就像許多人相信自己是基督徒，實際上却不是。

我在火車旅行中遇到了一位來自外西伯利亞的年輕畫家。就向他講述了基督。“現在我明白了，”他說。“在這之前，我只知道老師們在學校教給我們的東西——宗教是帝國主義的工具。但我曾經在我家附近的一個古老墓地散步，有一天，我在坟墓中發現了一棟廢棄的小房子（我知道這是墓地的東正教小教堂。）牆上有一幅畫，畫的是一個人被釘在十字架上。這是一份畫工精美的成品。起初我想，‘這人肯定是一個可怕的罪犯，所以受到這種懲罰。’但如果他是一個罪犯，為甚麼他的圖片會放在尊榮的位置——仿佛馬克思或列寧？我想他們肯定是首先以為他是罪犯，但後來發現他是無辜的

，所以深自後悔，就貼出了他的圖片。”

我告訴這畫家，他已經了解了一半真相，幾個小時後，當我們到達目的地時，他已經知道了我能告訴他的關於耶穌的一切。當我們分開時，他說：

“我今晚打算偷點東西，人人都這樣做。現在我怎麼能呢？我已經相信基督。”

9

我們也在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工作。每一本我們打算出版的書都必須經過他們的審查。因此，我們就在封面展示馬克思的照片，開頭的幾頁也重復了馬克思和列寧反對宗教的論點。審查員馬上就通過了這本書，沒有意識到它的其余部分都是基督教的思想。審查員也還喜歡我們的另一本書《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聽起來很符合馬克思的真理。面對成堆的新舊書籍需要檢查，他只選擇了令人安心的書名。有時，審查員會通過任何書，只要能換取一瓶白蘭地。

現在，一張黨卡可能意味着吃飯和挨餓的差別，羅馬尼亞共產黨員馬上從幾千人增加到幾百萬。為了再欺騙西方一段時間，斯大林在羅馬尼亞建立了他的“統一戰線”政府，並以“農民陣線”領導

人格羅扎（Groza）為領袖。據說安娜就是格羅扎的“發明者”。俄羅斯人通過三名羅馬尼亞共黨老同志操控我國：帕特拉（Lucretiu Patrascanu），被任命為正義部長；喬治斯庫（Teohari Georgescu）擔任內政部長，接管了警察和“安全”部門；德伊（Gheorghe Gheorghiu-Dej）是一位強硬的鐵路工人，擔任黨的第一書記。

在共產掌權後不久，我以觀察員的身份參加了一次東正教神父會議，德伊在會上發表了講話。他身材矮胖，性格開朗。他向大家保證，他準備好“寬恕並忘記”。盡管教會在過去與鐵衛隊和其他右翼組織有許多聯系，但如今的共產政府將繼續支付教職人員的工資。他總結說，基督教和共產主義的理念其實相似。眾人都熱烈喝彩。

在非正式場合，德伊坦率地表達了他的無神論和他相信共產主義有一天會主宰世界。但他也可以寬容地談論他的老母親，她把家里充滿了聖像，並將德伊的女兒們都撫養成東正教信徒。在舊政權的監獄里度過的十一年期間，德吉有機會學習聖經，並與許多坐牢的基督徒討論宗教，他對他們表示同情。在俄羅斯人到達之前，他從監獄里逃出來，如果沒有一位友好的神父的庇護，他可能已經被獨裁者安東尼抓捕並殺害。但如果說宗教在德伊奮鬥的日子里曾給他影響，如今他輝煌鵬達，無暇理會宗教了。他拋棄了久候他的髮妻，取了一位金髮女明

星。屋子里挤满了仆人和请愿者。喬治富有又出名，没有心情聽任何人的意見了。

在神父的會議上，有人把談話引向神時，喬治用标准的黨論來回答。他向我們保證，在新的羅馬尼亞，我們所有人都將擁有完全的良心自由。作為回報，衆牧者承諾不會給國家帶來任何麻煩。我聽了，便知道這意味甚麼。許多神父在那次會議上力挺共產黨，擁護黨的生活方式，但他們遲早會觸犯了一些黨章，於是就銀鐺入獄。

破壞宗教的運動迅速發展。所有教會資金和財產都被國有化。共產黨的異端派部門完全控制了神職人員。他們支付薪水並任命牧師。共黨安排年邁的東正教牧長尼科丁（Nicodim）為東正教牧長，作為黨方的傀儡。但他們需要一個更能幹，可以跑上跑下的工具。德吉曉得何人適合這個位置：就是一年前保護他免受法西斯分子傷害的神父。于是，查士丁（Justinian Marina）神父，一位來自黎明神學院（Rimincul-Vilcea）無聞教師，就被任命為主教，很快的，羅馬尼亞所有一千四百萬東正教信徒都知道查士丁就是他們的實權牧首，雖然名分在尼科丁之下。

共黨的下一個任務就是挑撥羅馬天主教徒和希臘天主教徒之間的關係，這兩派總人數有二百五十萬。希臘天主教徒，通常稱為統一派（Uniates，）在保留許多自己的傳統（包括牧師結婚的權利）的

同時，也接受教皇的至高無上。現在他們被接管並強行與順服共產黨的東正教“合並”。大多數反對這種強行合併的神父和主教都被逮捕，他們的教區被廢除，財產充公。黨方又命令羅馬天主教徒與梵蒂岡決裂，但天主教徒們斷然拒絕，於是就為自己的抵抗付出了高昂的代價。隨着神父們擠滿監獄，他們所受待遇的可怕故事在全國各地傳播，各小派系的信徒只能無奈地等待着自己的命運。

10

他們不必等太久。那一天的到來，也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1945年，羅馬尼亞議會大廈召開了一次異端大會。有四千名神職人員代表出席。當斯大林同志（他的巨大肖像掛在牆上）被宣布為代表大會的贊助人時，主教、神父、牧師、拉比和阿訇（回教師）們大聲鼓掌——他們寧願忘記斯大林同時也是世界無神論聯會的主席。年老體弱的牧首尼科丁祝福大會，格羅扎總理宣布大會開幕。格羅扎告訴我們，他本人就是一位牧師的兒子，他慷慨的承諾獲得大眾的歡呼。

一位最有權勢的東正教主教隨後宣稱，過去許多政治小溪——綠色、藍色、三色——已流入他教

會的大河，他也歡迎紅色小溪加入其中。加爾文派、路德派、首席拉比等依次起身發言。大家都表示愿意与共產黨合作，直到我身邊的妻子再也無法忍受為止。她說：“去洗去基督臉上的耻辱吧！”

“如果我這樣做，你就會失去你的丈夫。”我回答道。

“我不需要一個胆小鬼丈夫，”薩賓娜說。

我就請求允許發言。當局立即邀請我上台：他們期待第二天發表一篇來自瑞典宣道會和《世界基督教協進會》的魏恩波牧師的賀詞。

我首先簡要介紹了共產主義。我說，作為牧者，我們的責任是榮耀上帝和基督，而不是短暫的世上權力。我們支持基督永恆的愛之國，不是今世的權貴。當我繼續講下去時，那些坐了幾個小時，不斷聽到謊言的神父們，似乎從一場噩夢中醒來。有人開始鼓掌。緊張而約束的氣氛瞬間破滅，大廳里响起一波又一波的掌聲，代表們起立歡呼。異端部長，一位名叫布爾杜（Burducea）的前東正教神父，曾是一名活躍的法西斯分子，他在講台上大喊，撤銷我的發言權。我回答說我有來自上帝的權利。最終，有人切斷麥克風，但此時大廳里已經是一片喧鬧，沒有人能聽到甚麼了。

當天的大會就這樣結束。我得知異端部打算取消我的牧師執照。有人建議我尋求有影響力的當選主教（查士丁 Justini）的幫助。經過幾次嘗試，

我终于會見到他。那時他剛剛光榮地訪問了莫斯科歸來。黑胡子，微笑，充滿了他新的尊嚴，但不是一個傻瓜。他掌握羅馬尼亞五分之四的上教堂人口，我突然意識到，我不如更好地利用和他在一起的時間，談及他的靈魂，而不是談論我個人的問題。所以我說，自從他升職以來，我一直在為他祈禱。管轄 1400 萬靈魂確實是一項可怕的重擔。他一定像聖伊利紐（St Ireneus）一樣，當人們違背他的意願任命他為主教時，他却哭着說：“孩子們，你們正在做甚麼——我怎能背這種担子？經上說，主教必須是義人。”

我說話時，他很少說話，但我走後，他却在朋友中打聽我的情況。於是在那時，就不再有人談及吊銷我的執照了。後來，當我被警方扣押六周受拷問時，查士丁是幫助我獲釋的人之一。後來，他又邀請我去他主教轄區的雅西，在那里我們變得友好。他對聖經的無知令人驚訝，但當我提醒他浪子的比喻時，他聚精會神地聽着。我握住他的手，說上帝歡迎所有迷失的人回來，包括主教。除了我之外，其他基督徒也盡其所能的影響查士丁。當共黨不顧他的感受，全面反宗教時，他已經開始了祈禱和愛神。如今我好幾年沒有見到他了。

反神的運動與消滅反對黨的行動，齊頭並進。當斯大林從戰時盟友那里，獲得一切他想要的好處後，就脫去友好與民主的面具。在 1947 年 10 月

30 日，羅馬尼亞偉大的農民領袖馬紐（Iuliu Maniu）与另外 18 人因莫須有的罪名受審。馬紐在 75 歲時被判處十年監禁——他在四年後死在獄中。在隨後的恐怖統治中，估計約有六千名“國家敵人”被處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主持這次大規模清洗的正義部長、四十七歲的帕特拉（Lucretiu Patrascanu）。他曾在戰前得到了馬紐的大力幫助。當時馬紐也知道帕特拉是共產黨。當時這二人還与米迦勒國王一起制定了停戰協定。帕特拉隨後以羅馬尼亞的名義在莫斯科簽署了停戰協定。馬紐被監禁後，帕特拉和其他共黨領導人就迫使我們敬愛的年輕國王退位。

然後就是人民共和國（共產國）的成立。但誰來領導呢？當然不是木偶格羅扎。安娜（Ana Pauker）甚至在共黨內也遭到憎惡。其他人意見不一。帕特拉的許多崇拜者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位民族主義共產黨人，他將帶領國家擺脫斯大林主義的極端。他是一位出身于地主家庭的“西方”式共產黨員，他說自己先是羅馬尼亞人，後才是紅色分子，所以人人都看好他。誰當老大，成為黨中央熱議的話題。

到目前為止，我作為牧師的生活一直很滿足。我得到會友們的信任和愛，又有我家人所需的一切。但我心里並不平靜。為甚麼我還可以正常作息，

其他人却為信仰受苦？在很多個夜晚，薩賓娜和我一起祈禱，求上帝讓我們也背負十字架。

11

當時正在進行的廣範圍捕中，我的被捕可以看為神垂聽了我的祈禱，但我萬萬沒想到，與我一同坐牢的，就是帕特拉同志。

我被關在達卡利監獄幾天後，我的房間的門就被打開，這位高大、鷹眼的正義部長就進來。我心中詫異，以為他是親自來審問我。為甚麼我如此榮幸？然後門在他身後鎖上了。更奇怪的是，他的襯衫領口敞開着，而且沒有系領帶。我低頭看他擦得锃亮的鞋子——沒有鞋帶！我的全新牢房里的第二名囚犯正是在我國實現共產主義的人。

帕特拉在另一張木板床上坐下，把腳抬起來。作為一個堅強的知識分子，他不會讓這種忽然從部長變成囚犯的小事影響他的心境。我們裹着大衣抵禦三月的寒冷，開始交談。儘管我知道帕特拉的政權已經粉碎了羅馬尼亞的司法公正，但我還是可以喜歡他的個人，並相信他的誠意。他聳聳肩，輕輕帶過自己的被捕。這遠不是他第一次入獄，他曾多次被羅馬尼亞前政府逮捕。這次的下牢，似乎是因為他日益高漲的聲望，令他黨內的各領袖聯合起來

反對他。在幾天前的一次代表大會上，他被同事、內政部長喬治指責為資產階級。第二項指控是說帕特拉“可能受到帝國主義列強的資助”，這一指控得到了財政部長盧卡（Vasile Luca）的支持，他在舊政權下曾與帕特拉一起入獄。安娜（Ana Pauker）就總結這些指控。

帕特拉說，他們密謀反對他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但有一個特別的事件令他飽受攻擊。他曾詢問喬治的一位官員，有關囚犯遭受酷刑的傳言是否屬實。那位官員回答，當然是呀！那些是反革命分子！不值得憐憫！特別是當他們隱瞞信息時！帕特拉深感不安。他問道，他們這些年來一直在努力叫共產黨得權，就是為了這個？有人就把他的抗議報告給喬治。

“當我離開大廳時，”他說，“我看到一位新司機在車旁等候。這司機說我的司機病了。我剛上車，兩名秘密警察跟着我進來，送我到這裡。”

他確信他很快就會恢復自由，當晚飯到來時，我開始想這可能是真的。因為他的晚餐不是通常的一碗水煮大麥，而是雞肉、奶酪、水果和一瓶霍克啤酒。帕特拉拿起一杯酒，就把托盤推到我面前，說他沒有胃口。

當我盡量不吃得太狼吞虎咽時，他講了一些有趣的軼事。其中一個提到一位瑞士參議員想擔任海軍部長。

“但我們沒有海軍呀？”總理說。

“這有甚麼關係？”那位參議員回答說，“如果羅馬尼亞可以有一位正義部長，為甚麼瑞士不能有一位海軍部長呢？”

帕特拉說了就大笑，盡管他笑的就是自己創造的“正義”，而他自己如今也成了這種正義的受害人。

第二天早上，帕特拉被護送出牢房，我想應該是接受審訊。晚上他脾氣暴躁地回來說，他不是出去回答問題，而是去發表演講，就是在他過去教授法律的大學。黨方希望暫時對他的逮捕保密，而他，雖然有三十年的共產黨紀律，還是必須服從他們。他甚至不能向妻子透露他正在“接受檢查”，或者詢問任何人的建議（就如請一位律師，）因為在共產黨，這些行為都是該死的罪。這種孤立的目的是為了使他精神不寧。他只能向我訴說。因為他有理由相信我再也見不到外面的世界了。

當帕特拉向我透露了一些關於他早年的生活時，我很感興趣地了解到，他成為一名共產黨員並不是由於客觀的判斷，而是因為早期的困境。如今是他對過去困苦光景的反擊。他富有的羅馬尼亞父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熱烈支持德國，以至于在盟軍勝利後，全家人都遭到本國人的排斥。年輕的帕特拉不得不出國，到德國接受大學教育。當他回國後，只能加入唯一歡迎他的政黨（共產黨）。他

的第一任妻子是一名共產黨員，死于上世紀末的斯大林清洗中。他再婚另一名女共產黨，這女士恰好是薩賓娜的同學。

我試圖向帕特拉展示他信念的真正來源。“你也像馬克思和列寧，”我說，“他們的思想 and 行動也是早期苦難的結果。馬克思感到自己有天才，但作為德國的猶太人，反猶太主義猖獗，除了成為一名革命者之外，他找不到任何出路。列寧的兄弟因企圖刺殺皇帝而被絞死——憤怒和沮喪使他想要推翻當權者。你的情況也相似。”

帕特拉駁回了這個想法。他的神經在與我爭論和對教會邪惡的長篇大論中找到了發泄的出口。博吉亞教皇（Borgia Popes）的邪惡日子、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十字軍東征的野蠻行徑、伽利略的迫害，都逐個提及。

“但正是教會的罪行和錯誤讓我們更加欽佩教會，”我說。

帕特拉不解。“你是甚麼意思？”

我說：“醫院可能散發着膿血的臭味；這就是它的美麗之處，因為它接收患有潰爛瘡和可怕疾病的病人。教會是基督的醫院。數以百萬計的病人在教會中得到愛的治療。教會接納罪人；當這些罪人繼續犯罪時，教會就因他們的過犯而受指責。另一方面，教會也像一位母親，即使在孩子們犯罪時，也站在他們身邊。教會的牧職人員玩弄政治和個人

的偏見，扭曲了神的道。但這只加倍令人欽佩教會。”

帕特拉微笑回答：“我也可以對共產主義做出相同的辯護。它的實踐者並不完美——其中有無賴——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們的理論有任何問題。”

“那麼就根據結果來判斷，”我說，“就像耶穌建議的。可悲的行為玷污了教會的歷史，但教會依然培養了無數的聖徒。教會又有至聖的基督為首。你們的首領是誰？馬克思的傳記作者利亞沙稱他為酒徒。列寧的妻子說她丈夫是一個無節制的賭徒。他們的作品充滿了惡毒。從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共產主義殺害了百萬名的無辜的人，叫國家破產，把恐懼與謊言充滿社會。它的好處在哪裏？”

帕特拉捍衛“共黨學說的邏輯”。

我說過這樣的論調毫無意義。“你可以用禮貌的名義幹一些壞事。希特勒談到了為生存空間而奮鬥，於是就進行種族滅絕。斯大林說，“我們必須像照顧花朵一樣照顧人，”然後他殺了他的妻子，還有你的妻子。”

帕特拉看起來很不舒服。但他坦言，“我們的長遠目標是共產世界，願意和我們一路走下去的人很少，但我們總能找到一些因為自己的原因，暫時願意與我們合作的人。首先我們有羅馬尼亞統治階級和國王，他們支持盟軍對抗納粹。當納粹倒台後

，我們就摧毀他們。我們用承諾贏得了東正教教會的支持，然後利用較小的教派來破壞它。我們讓農民反對地主，後來利用是貧農反對富農，再後把他們都將集體化。這些是列寧的策略，而且有效。”

我說：“大家都知道，與你們的同行的人，最後都被你們監禁、處決或摧毀。你們怎麼能希望可以繼續利用他人，然後又拋棄他們呢？”

帕特拉笑道：“因為人們很愚蠢。舉個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十年，偉大的布爾甚（Bolshevist，共產黨前身）思想家布哈林（Bukharin）反對托洛斯基（Trotsky）用武力進行世界革命的計劃。他認為最好等資本主義國家自相殘殺；然後俄羅斯就可以加入獲勝的一方，分享戰果。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預言，只是無人理會。如果西方知道一半的歐洲和三分之二的亞洲將成為共產國，上一場戰爭就永遠不會發生了。幸運的是，我們的敵人不曾聽過我們的論點，也未曾讀過我們的書。”

我指出了他的論點的缺口。“難道你看不到，正如你利用了別人，然後又把別人拋棄；你的同志們照樣對待你。你真的看不到列寧學說的邪惡嗎？”

這次，帕特拉內心的苦毒湧現了。他說：“當丹東（Danton）被送上斷頭台，看到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在台上觀看時，他喊道，‘你要

跟我走。’我向你保證，他們也會跟着我——安娜、喬治和盧卡。”

三年後，這話果然應驗。

12

那天晚上我們沒有再說話，但晚上十時，我們上床睡覺後，門開了，守衛叫我的新名。外面站着三個男人。其中一位，我後來知道他叫阿佩爾（Appel），命令我穿好衣服。這時帕特拉低聲叫我穿上他的大衣，說可以減輕打擊。他們給我戴上黑眼罩，然後帶我走過廊道，來到一個房間，就把我推到一張椅子上，取去眼罩。

我發現自己坐在一張桌前，刺眼的光線照著我。起初我只看到對面有一個模糊的人影，但當我習慣了眩光後，我認出了這人影，就是莫拉維茨（Moravetz）。在前朝的反共政府，他曾是當局的一名警長（inspector），因為向共產黨泄露秘密而陷入麻煩。如今共產黨報答他，給他成為共產政府的審訊員。

“啊，”他說，“瓦西里·喬治斯庫。那張桌子上有紙筆。坐下來寫下你的活動和生活。”

我問他對哪一些活動特別感到興趣。莫拉維茲挑

起眉毛，諷刺道：“作為一名神父，你聽過許多人的忏悔。我們把你帶到這裡來，就是叫你向我們忏悔。寫你的忏悔！”

我就寫下了我信主之前的生活大綱。然後，我想這句話可能會引起黨的領導的注意並產生一些影響。於是我就詳細介紹自己：起初就如他們，是一個無神論者。然後如何看見真實事。我寫了一個多小時。莫拉維茨接過這些報告說：“今晚夠了。”我被帶回牢房，發現帕特拉正在睡覺。

過後的幾天，我並沒有受到干擾。共產黨人扭轉了正常的警察方法，即依靠逮捕的震驚來讓囚犯說話。共產黨寧願讓被逮捕的人“成熟”。審訊者從不說出他想要甚麼；他只是圍着他的獵物打轉，製造焦慮和內疚。當這個人為被捕的原因天天疑慮時，當局又使用其他伎倆營造緊張：不斷的推遲審判，給你聽到行刑隊的槍殺聲（其實是錄音聲），其他囚犯的尖叫聲。被囚的人就會開始做出錯誤的判斷。一次失誤導致另一次失誤，直到精疲力竭，願意承認自己有罪。審訊者就開始表示同情。他建議囚犯只需承認自己有罪，該受處罰，並說出一切，就可以結束痛苦。幾天後，阿佩爾又來，開始一連串的審訊。

這次，阿佩爾把我帶到了距離牢房外的地下室，他給了我一把椅子，從公文包里掏出一塊焦糖給我，然後在沙發上坐下。他的一位同事做了筆記。阿

佩爾嚼著焦糖，檢查了我的自我陳述。他評論說一個人的思想是由他的階級決定的。由於我不是無產階級出身，他說我必然有反動（就是反共）的觀點。我確信阿佩爾也不是無產階級，因此我指出，偉大的共產黨思想家們，都不是道地的“工人”階級。馬克思是律師的兒子，恩格斯的父親是有產者，列寧出身於貴族。單是階級不能決定一個人的信念。

阿佩爾突然打斷說，“你和特奧多先生（Teodorescu）有甚麼關係？”

“特奧多？”我說。“這是一個相當常見的名字。你指的是哪一個？”

但阿佩爾卻不回答。相反的，他轉向聖經並討論以賽亞關於彌賽亞到來的預言。他時不時地在沒有警告的情況下提到一些人的名字，這些人曾幫助我向蘇聯士兵分發我的書，或幫助《世界基督教協進會》處理救援事宜。這些問題顯然是預先設定的。阿佩爾總是彬彬有禮，從不固執。他似乎正在留意我對突然問題的反應。我的答案如何，他其實不那麼看重。過了一個小時，我就被帶回牢房，思考這可能意味着甚麼。

帕

特拉躺在床上，抽着特權囚犯的香烟，談論黨在羅馬尼亞根除基督教的計劃，引以為樂。安娜、喬治和其他中央委員會成員已經秘密會見了查士丁，並認為他正是實行他們計劃的適當人選。

他說：“查士丁與上帝的‘密切’關係就像我與日本天皇一樣‘密切’。至於老主教尼科丁，他已經是老年懵懂了。你能對這樣一個人有甚麼尊重嗎？他在戰爭開始時發布通諭，呼吁每個人與布爾甚（共產黨前身）這七頭龍作戰；然後，當我國羅馬尼亞與希特勒決裂時，他又敦促他的羊羣與光榮的紅軍一起前進，反對納粹惡魔。這就是尼科丁教首所做的，全國都知道。這些都是教會的頂尖首領，其餘的也好不了多少。他們不會帶你走多遠的。”

我回答說，如果他没有如他所想的那麼快出獄，他可能會遇到更多模範的基督徒。

“尼科丁主教是個好人，”我說，“只是年老疲憊了。至於查士丁，我也不能譴責。他是被你們利用了。這太像利用了一個少女，然後就稱她為妓女。”

我認為這個挖苦更能給帕特拉明白我的觀點，因為他常直言不諱地談論性問題。我也試圖告訴他基督教之愛的含義。起初，他太專注于自己的煩惱，沒有聽太多。但他是個書呆子，如今無書可讀，不知所措，於是為了打發時間而爭論。對於宗教，

他說：“我在學校已經曉得那一切。我曾經祈禱過，但後來放棄了。你們的耶穌要求太多了。尤其是當一個人還年輕的時候。”

我說：“我未曾想過耶穌有向誰要求甚麼。當我兒子米海還小的時候，我給他錢，好給我買生日禮物。耶穌也給我們聖經的美德，就是祂似乎向我們要求的美德，叫我們成為更好的人。但也许你没有好的宗教老師。”

“大概是吧。這樣的老師不太常見。此外，基督教中有很多東西我無法接受——謙卑，尤其是對暴政的屈服。以聖保羅寫給羅馬人的書信為例。它說所有的權力都來自上帝，所以我們必須遵守規矩，及時納稅並維護和平——在這個世界的統治者是尼祿的時代！”

我說：“再讀一遍聖經，你會發現它充滿了革命的火焰。聖經故事始于猶太奴隸反抗法老。然後是其他反抗暴政的撒母耳、雅億、耶戶等人。在進一步討論之前，先問問自己，神所認可的權柄是如何掌權的。這通常是推翻腐敗政權的結果；因此，服從權威就意味着服從那些革命成功的人。華盛頓因推翻英國人而出名。”

“也如列寧推翻了沙皇，”帕特拉插話道。

“那不同。列寧的革命，只帶來更嚴重的恐怖。必需有人推翻共產主義暴政，帶來自由政府，然後他的政權才是神的權柄，成為我們應該服從的政

府。聖經這一部分的教導，不是屈服暴君，而是避免在無用的革命中白白流血。”

帕特拉說：“‘凱撒的物歸凱撒，’你又怎樣解釋？耶穌在這裡肯定是在敦促猶太人屈服于羅馬暴君？”

“第一位凱撒就是一個篡位者，”我說，“即使在羅馬，朱利亞凱撒也不是合法的皇帝。他是一位將軍，却自詡為獨裁者。他的繼任者在巴勒斯坦（羅馬帝國通過武力占領巴勒斯坦）應得的權利並不比俄羅斯人在羅馬尼亞多。所以很明顯的，耶穌的意思是，‘把我們欠凱撒的東西還給他，就是給他的屁股加上一腳，把他踢出去。’”我把沒系鞋帶的鞋子射了出去。

帕特拉拾起鞋子，哈哈大笑。“如果每個牧師都像你一樣解釋聖經，我們就更能理解，”他說。

我不太確定。

一天晚上，他請我概括基督教的信仰。我背誦《尼西亞信經》並說：“那麼你該告訴我共產信的到底是甚麼。”

帕特拉想了一會兒。“我們共產黨人相信我們將統治世界，”他說罷，就平躺在肮脏的墊子上了。

第二天早上，他被帶出了牢房。我再也沒見過他。在我們一起度過的一周里，我們變得非常接近。我覺得他被我所說的很多話所感動，但承認這一點並不符合他當前的利益。連對自己承認也難。多年後，我才聽到他的情況。

我的下一位審判官是一個名叫瓦西魯（Vasilu）的小個子男人，他喜歡用嘴角說話，他讀着打印出來的問題清單。第一條也是最難的：“寫下你認識的每個人的名字、你在哪里遇見他們以及你與他們的關係。”我想保護的朋友很多，但如果我不提他們，而警察知道我認識這些人，就會加倍懷疑他們。當我猶豫時，瓦西魯厲聲說道：“別挑挑揀揀。我說的是‘所有人。’”

首先，我寫下了我的教會助理們和教友們的名字。這份清單占了一兩頁。然後就是共產黨議員以及我能想到的每一位同行者和線人。

“第二個問題，”瓦西魯說，“你對國家犯下的罪行。”

“我被指控甚麼？”我問。

瓦西魯拍了拍桌子。“你知道你做了甚麼！都說出來！首先，你與東正教同事格里戈神父（Grigoriu）的接觸，以及你對他的看法。寫吧，繼續寫。”

共產黨總是問神職人員彼此的情況——他們問新教徒有關於東正教神父，又問天主教徒有關於安息日會員等，從而引發宗派仇恨。無論你寫甚麼，以後都可能被用來陷害你。他們會對一個囚犯說：“用你的外號簽名；這就是我們這裡做事的方式。”當這囚犯以不同的名，發表多次言論後，他們就要求

他舉報一位朋友，並警告說，如果他拒絕，他的各篇報告就會公開，人人都看到他曾使用假名，證實他是一個變色龍，值得懷疑。這種威脅就足以嚇倒許多基督徒，於是就向當局投降，成為當局的真走狗，真細作。

在審訊之間漫長而孤獨的等待中，黨方就想出新的問題，你試圖記住你從前說過的話，以及你隱瞞的內容。問話官通常是二人同時拷問，並有印好的問題。如果其中一人出去了，另一個就不說話，直到他的同伴回來；房間里可能有錄音設備。在早期，一些問話官還有些人性，為了生活他們必須做一些不想做的事。有一次，一位問話官在同伴離開房間，給我展示了針對我的指控。有幾份是我信任的人簽名的，我可以想象他們受到的壓力。

這只是一個漫長過程的第一階段。囚犯數量巨大，而合格的問話官却很少；但每天都有更多的人接受蘇聯的培訓。至少，我有時間做好準備。有一次，當理髮師在給我刮胡子時，他低聲對我說薩賓娜很好，並繼續教會工作時。我感到非常欣慰和鼓舞。我曾擔心她被捕，以致我們的兒子米海挨餓或必須依靠鄰居的施舍。這好消息給我內裏的力量，於是我就好好的按照問話官的喜好，給他們大量的精神糧食。至於有關教會的機密，或閑事，我就盡量少說。一位朋友曾經出國歐美。如果這種小事給共產黨曉得，就可以導致他的家人被捕，並令他本人慘遭痛打。

於是問話持續了一月又一月。共產黨為了把共產主義培植在一個人的心中，首先必需叫那人確信

自己犯了罪。只有在人完全降服，相信自己完全在黨方的無限權力之下，方才可能成為死心塌地的共產黨員。

現在的羅馬尼亞，人人都提到四種自動化“auto”：第一種是自我批判(auto-criticism，也稱自控書)，就是定期在工廠或辦公室裏完成的；第二和第三是自動車(auto-mobile)把你帶往見秘密警察，要你寫自傳(auto-biography。也稱為自控書)，最後便是autopsy(解剖屍體，就是屍檢，意即處決。)

15

知道酷刑即將來臨，我決定自殺，免得傷害了別人。我沒有任何道德的顧慮：對基督徒，死亡意味着回歸基督。我會向主耶穌解釋，祂肯定明白。如果聖厄休拉(Ursula)因自殺而被封為聖徒，她堅持不容洗劫她修道院的野蠻人強暴她，那麼我保護朋友的責任也比我的生命更重要。

但我如何才能自殺？警衛定期檢查囚犯，也檢查牢房，找出一切可能致命的東西：玻璃片、一根繩子、一片剃須刀片。一天早上，在醫生查房時，我說我不能記得審訊人員要求的所有細節，因為我已經好幾個星期難以入眠了。醫生就每晚給我一片安眠藥，每次都有一名警衛盯着我的嘴，以確保我吞下了藥。其實我把藥丸藏在舌下，等他離開後才把它拿出來。但我該把這獎品藏在

哪里？不能在我的身上，因為我的隨時可能被暴打或搜查。它也不能藏在我的被褥，它必須每天搖晃和折疊。但帕特拉的被褥還在。我就撕開那被褥的幾根稻草杆，每天在里面藏一顆藥丸。

到月底我已經積蓄了三十塊。它們是對我一種安慰，叫我不必懼怕自己在酷刑下崩潰，但每逢想到它們，我就感到一陣黑暗。那時是夏天。我聽到外面世界傳來熟悉的聲音。一個女孩在唱歌。一輛機車在軌道上占壓而過。母親們喊着自己的兒子：“斯威！艾米！馬緹！”羽毛狀的草種子輕輕地飄進來，落在我的水泥地板上。我問上帝祂在做甚麼。為甚麼我必須結束自己的生命？我不是一直努力服侍祂嗎？一天傍晚，我透過狹窄的窗戶抬頭望出去，看到第一顆星星出現在漸漸黑暗的天空，我想神在數十億光年之前，已經安排這顆星星，讓它的光線發出，開始了似乎無用的漫長路程，專為給此刻此地的我一點安慰。

第二天早上，獄卒進來，一言不發地拿起帕特拉的被褥，帶走了。起初我很沮喪。然後我笑了，心中感到寬鬆了。神既然不讓我自殺，那麼祂就必須給我力量，承受前面的痛苦。

16

有人告訴我，秘密警察是極有耐心的。但現在他們自覺該有一些成果了。他們的首席調查

官杜上校 (Colonel Dulgheru) 從來沒有失敗過。他坐在辦公桌前，一動不動，充滿威脅。他那雙纤细的手攤開在身前。“你一直在玩弄我們，”他說。

戰前，杜上校曾在蘇聯大使館工作。然後，在法西斯統治下，他與德伊並其他被監禁的共產黨人一起被拘留。他們注意到他的毅力、智慧和殘酷。於是如今就給他在這裡，掌握生死大權。

他立刻開始詢問我，有關一名紅軍士兵因走私聖經到俄羅斯而被捕的情事。到目前為止，問話官似乎對我在俄羅斯人中的工作一無所知。但儘管那位被捕的士兵沒有出賣我，黨方還是發現我們曾經見過面。現在，我比以往更需要衡量每一個供詞、因為我實在已經在布加勒為這名士兵施洗，又安排他加入我們的宣道活動。

杜上校的問題一直持續不斷。他覺得自己聞到了某種重要的氣味。在接下來的幾周里，我已經被各種手段折騰得疲憊不堪。他們把牢房里的床移走了，我只能靠在椅子上，每晚睡一個小時。門上的窺探孔每分鐘都會發出兩次金屬咔哒聲，守衛的眼睛就會出現。經常當我打瞌睡時，那守衛就進來把我踢醒。最後我失去了所有的時間觀念。有一次我醒來看到牢房門半開着。走廊里傳來輕柔的音樂：是幻覺嗎？然後聲音變得扭曲，變成了一個女人的聲音，正在抽泣。她開始尖叫，是我的妻子！

“請不要再打我，我受不了！”

然後傳來鞭打肉體的聲音。尖叫聲令人毛骨悚然。我全身的每一塊肌肉都因恐懼而繃緊。慢慢

地，尖叫声开始消失，轉為呻吟。但現在是一個陌生人的聲音。然後一切都沉靜了。我全身顫抖，大汗淋漓，感覺疲憊不堪。後來我才知道，聲音都是來自錄音機，但每個聽到尖叫的囚犯，都肯定受害者正是他的妻子或情人。

杜上校是一個外表文雅的惡獸，他模仿了他在大使館時期交往的蘇聯眾外交官的禮儀。“我很遺憾的下令施行酷刑，”他告訴我。他在監獄里是獨一無二的。他可以隨手寫一張便條，或打發一位傳信者，就能頒布命令。他經常在晚上獨自來到我的牢房繼續審訊。他詢問我與英國聖公會傳教團的聯系。一場關鍵會議拖了幾個小時。他對我閃爍其辭的回答越來越惱怒。凌晨一時，我們都筋疲力盡了。

“你知道嗎，”他說，“我現在就可以下令把你當作反革命分子處決？”

我說：“上校，我給你一個實驗的機會。你說你可立時槍斃我。我知道你做得到。現在且按手在我的心口。如果它比平時增速，表明我害怕，你便知道沒有神。如果它依然慢慢的跳動，仿佛說，‘如今我正在前往天堂，’你便曉得有神，有永生！”

杜上校馬上拳擊我的臉，又立刻後悔自己失控。

“你這傻瓜，喬治斯庫，”他說。“你難道看不到，你完全在我的權下嗎？你的救主不能打開監獄的門！你永遠不會看到威敏斯主教了！”

我說：“祂的名字是耶穌基督，如果祂願意，祂能釋放我，也能給我見見威敏斯主教。”

杜上校恨恨的盯著我，幾乎喘不過氣來。然後喊道：“好吧，明天你就去見布林少校。（Major Brinzaru）”

我一直在期待這個。布林少校是上校的助手。他掌管着一個存放棍棒、警棍和鞭子的房間。其他審訊者都使用他的名作為威脅。當時有名的俄羅斯詩人沃茲（Voznesensky）寫道：“在這前所未聞的苦難日子里，一個沒有心肝的人真是幸運。”布林少校正是這樣的人。他像大猩猩一樣肌肉發達、毛茸茸的，他向我介绍了他的一系列武器。“你喜歡甚麼嗎？”他問，“在這裏我們很民主。”

他展示了他自己最喜歡的，一根长长的黑色橡膠警棍。“閱讀标签。”上面刻有“MADE IN USA”（美國制造）。

“我們負責打人，”布林少校說，“但你們的美國朋友制造這些工具。”然後他把我送回牢房去考慮。

警衛告訴我說，布林少校在戰前曾為一位著名政治家工作，這家人把他當作是自己的家庭成員。共產黨接管政權後，他晉升為秘密警察。當時有一名年輕囚犯被帶到他面前。這就是那位政治家的兒子，由於試圖發起一場愛國運動而被捕。布林少校告訴他說，“當你還是個嬰兒的時候，我曾經把你抱在膝蓋上。”然後他就折磨這少男，親手殺了他。

奇怪的是，布林少校没有立刻毆打我。每晚巡視時，他會在窺視孔觀察我一會兒。“嗨，喬治斯庫？耶穌今晚在做甚麼？”

我說：“祂在為你祈禱。”他没有回答就走開了。

第二天他又回來了。在他的監督下，獄卒吩咐我面向牆壁站立，雙手舉過頭頂，指尖剛好碰到牆壁。“就讓他留在那里吧，”布林少校在離開前告訴了警衛。

于是，我的酷刑终于開始了，這是所有秘密警察監獄中常見的酷刑：一轮沉闷的侮辱和痛苦。首先，我站了幾個小時，很久之後我的手臂已經失去了所有知覺，肿胀的雙腿也開始顫抖。然後他們讓我倒在地板上，给了我一片面包皮，喝了一口水，然後又叫我站起來。一名警衛輪替另一名警衛。有時，兩三個人會一起玩，強迫我作出可笑或淫穢的姿勢，這樣的持續了幾天幾夜，中間有短暫的休息。我總是面對牆壁。

為了打發時間，我想起了《聖經》中提到的許多牆。《以賽亞書》寫道：神說以色列的罪孽就如牆壁，把自己與神隔開。同樣，教會的失誤也導致我今日的光景，令我在牆後！然而我也想起詩篇的一句話，“我与主一同跳過高牆。”我也可以跨過這堵牆，進入与上帝相交的屬靈世界。我想起迦南回來的猶太探子，報告說這些城市很大，有堅固的高牆——但就如耶利哥的城市倒塌一樣，我面前的城牆也必倒塌。當痛苦襲來時

，我默念《雅歌》中的一句話：“我的良人就像一只羚羊，或小鹿；站在我們的牆後。”我想象耶穌站在我的牆後，給我力量。我記得，只要摩西在山上举起雙手，以色列軍隊就得勝；也許我們的苦難也有助於神的子民贏得戰鬥。

布林少校時不時過來詢問我，是否願意合作。有一次，當我倒在地板上時，他說：“站起來。我們已經決定讓你參見威敏斯主教了。現在就開始走。”

“走吧，”警衛命令道。我試圖穿鞋，但腳太腫了。“走，快點，繼續走，我會在外面看着。”

牢房周圍有十二步：走四步，面對牆；轉左二步，又是牆；再左四步，又是牆，再左兩步。我穿着破爛的袜子在囚室裏團團轉。窺視孔打開了，“快點。”守衛喊道。我的頭開始旋轉。“快一點——你要挨打？”我痛苦地撞到牆上。我的眼睛因汗水而刺痛。一輪又一輪，一輪又一輪。窺視孔又打開，“站住，轉身。走！”反方向一圈又一圈。“快點。”我跌跌撞撞，又爬了起來。“繼續移動。”當我最後摔倒時，警衛進來了，當我掙扎着站起來時，他用棍子打了我的肘部。疼痛太難受了，我又摔倒。“站起來。走！這裏不是休息站。這裏是訓練圈。”

幾乎每個人都必須經過這種“manege”（訓練圈）。幾個小時後，你才能喝到一杯水或吃任何東西。干渴驅走了饑餓。它比刺進雙腳的熱刀

還要猛烈。最糟糕的是，在允許休息幾分鐘後，或者晚上在地板上昏迷幾個小時後，又得重新開始行走。僵硬的關節、破裂的肌肉、撕裂的腳無法支撐身體的重量。你貼在牆壁，守衛大聲喊叫。當你無法再站立時，就用四肢爬動。

我不知道我在訓練圈度過了多少個日夜。當我移動時，我開始為警衛祈禱。我又想起《雅歌》，它說基督的新娘為她的新郎而跳的神聖舞蹈。我對自己說，“我會優雅地移動，仿佛這是對耶穌的神聖之愛的舞蹈。”有一段時間我覺得我確實做到了。如果一個人樂意做他必須做的一切，那麼他只會做他樂意做的事——於是最艱難的考驗，因為是自愿的，就會變得容易多了。當我繞着牢房轉時，似乎一切都圍着我轉。我再也無法區分一堵牆和另一堵牆，或者牆和門。就像在神聖的愛中，一個人不再區分善人和惡人。他擁抱每一個。

17

當警衛給我戴上黑眼罩，把我帶到一個新的拷問室時，我幾乎已經一個月沒有睡覺了。這是一間寬敞、空蕩蕩的房間。一張桌子後面坐着三四個人影，由於反光鏡投射在我臉上的眩光，我只能隱約看到他們。我光着雙腳站在他們面前，腳很痛，手也戴着手銬，身上只穿着一件破爛的

襯衫。他們又問老問題。我就給老答案。這次審判官中有一名女性。有一次她威脅說，“如果你不好好回答，我們就會把你放在拖拉架上。”三百年前英國使用的逼供機器，如今也成了共產黨的刑具之一。我便回答：“在聖保羅寫給以弗所人的書信中寫道，我們必須努力長成基督的身量。如果你把我放在拖拉架上，就幫助實現了我的目的。”那女人大力擊打桌子，在耀眼的反光鏡後面，他們正在討論。有時，立刻的回答就如反擊一拳一樣有效。但他們並沒有把我放在拖拉架上；相反的，他們把我送回巴斯蒂（Bastinado）的審問室。

這是另一間牢房。他們用頭罩蓋著我的頭，令我蹲下，雙臂抱住膝蓋。一根金屬棒插在肘部和膝蓋之間，並置于支架之間，於是我的頭部轉下，腳部在上。一人扶著我的頭，另一人擊打我的腳底。這種打擊就如爆炸。有些棒打落在我的大腿和脊柱底部。有幾次我暈了過去，他們就用冷水蘇醒我。每次他們都說，只要我供出一個他們所要的名字，酷刑就中止。當他們把我放下時，我只能被抬回囚室。

每次前往這間刑房，我總是戴著漆黑的眼罩，不讓我曉得監獄的底細。有時在拷打時，眼罩還蒙著眼睛。當你可以看見棒子落下時，你可以收縮肌肉，預備承擔。但眼睛被蒙著，不知道打擊從何處來，何時來，你的懼怕就加倍。

我也經過別的酷刑。通常有四五個人同時對我使用靴子和棍棒，而我則在地板上痛苦地打滾。在他們摘下我的眼罩後，布林少校尼有一條尼龍鞭，它呼嘯着穿過空氣，撕裂了我的肉。只三擊，我就失去了知覺。有一次，我的喉嚨被一把刀架住了。“說話，”布林少校說，“說，不然你就死。”壓住我的兩個人握得更緊了。只見刀身起落數次，我暈了過去。我醒來時發現胸口沾滿了血。我也受過水刑。他們把水灌進我的喉嚨，直到胃脹。然後兩個守衛站在我的肚子上踐踏。我又和兩只混種狼狗一起呆了好幾個小時，這種猛犬是牧羊犬與野狼的雜交，只要我稍微一動，它們就會跳起來。它們被訓練不會咬人，但它們的咆哮以及距離喉嚨一英寸的獠牙的咬合聲，叫你不動。你身旁放著一些麵包，但你不敢伸手拿。我也試過熱鐵的蓋印。

最後我簽署了他們為我設計的所有“自白書”：我既是通奸者又是同性戀者；我賣掉了教堂的鐘，把錢私藏了——儘管我們的教會沒有大鈴鐘；我又承認我在《世界基督教協進會》工作的掩護下，一直從事間諜活動，意圖推翻共產黨；我和其他人滲透黨組織並洩露了共黨的祕密。

布林少校讀完這疊供詞後說道：“一切都很好，喬治斯庫——但是你向誰傳遞祕密？”

於是我就寫出詳細的名單和地址。布林興高采烈地帶著走了：這肯定會給他帶來獎金和晉升。幾天後，他回來了，給我另一輪毆打。因為黨方已經查過這些人的名字，發現他們要麼是早已

逃往西方的人，要麼是已經去世的人，要麼就是短暫訪問後離開我國的外國人。但至少這段時間，讓我恢復了一點體力。

比肉體折磨本身更糟糕的是等待。你躺在那里，聽着別人的尖叫聲和哭泣聲，你又曉得下一個小時，就輪到你。但上帝幫助我絕不供出一句傷害他人的話。我很容易就失去了知覺。但他們卻要我活命。因為每個人都是將來某些信息的來源。因此在酷刑過程中總會有一名醫生在場，以確保受害者不會太早逃往另一個世界。這是地獄的形象，其中的折磨是永恆的，你又死不了。

在痛苦中，記住聖經是很困難的。儘管如此，我總是試圖記住，耶穌本可以作為國王來到世上，但他選擇了作為罪犯，被鞭打。羅馬的鞭打是可怕的，我每受一鞭，就想起主耶穌也曉得這種痛苦，於是這成了一種快樂。

嘲笑和羞辱同樣難以忍受。耶穌常說他會被鞭打、嘲笑，被釘。我曾認為，與鞭打和釘十字架相比，嘲笑算不得甚麼。如今才知道一個人可以被迫張開嘴，別人就往你口中吐痰和小便。而這些人則大笑和譏諷。

叫人難以置信的是，正如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官員認為燒死異教徒是一項神聖的職責，許多共產黨員也相信自己作的是正當的。杜上校堅信自己的“使命”。他常說，“如果人們隱瞞保護社會利益所需的信息，他們就該受到虐待，這符合社會的切身利益。”很久以後，當他看到我已經崩潰了，因神經疲憊而哭泣時，他帶着幾近憐憫

的語氣說道：“你為甚麼不屈服呢？這一切都是那麼徒勞。你只是肉體，最終會破碎。”

但我有相反的證據：如果我只有肉體，我永遠無法抵抗。但身體只是靈魂的暫時居所。共產黨人，以為一個人會做任何事情來避免自己肉身的滅絕。他們錯了。基督徒知道，死亡不是生命的終結，而是生命的成全；它不是滅絕，而是永恆的開始。

18

我已經在卡利街監獄渡過了七個月。如今是十月，冬天已經來臨了。這一年是嚴寒。我們正在饑餓和虐待中，接下來的幾個月就是冬天。望着窗外的雨夾雪落在灰色的監獄院子里，我全身發抖，但我的精神並不低落。我想，在監獄里，我能通過耐心的愛為上帝做的事都是微不足道的。但生活中，美好的事總是顯得微小。

一天晚上，守衛端來一盤美味的炖牛肉，配上四片面包。還沒等我吃，守衛就回來，叫我收拾東西，跟着他到其他犯人排隊的地方。在那里，我還渴想着失去的炖牛肉。但其實那只是眾多的故意的玩弄之一。該晚卡車把我們帶到內政部，這是一座深受游客欽佩的宏偉建築。沒有人意識到它下面就是一座巨大的、迷宮般的監獄，並數百名無助的囚犯。

我的牢房在地下深處。一顆沒有外罩的灯泡從天花板上照在光禿禿的四堵牆上，這裏有一張鐵床，其上有三塊木板和一個稻草床褥。渾濁的空氣通過牆上高處的管道進入。我發現這裏沒有馬桶，意識到我必須等待警衛帶我去廁所。這是最糟糕的處境。有時他們會讓你等幾個小時，嘲笑你的恳求。男人和女人一樣，因為害怕加劇痛苦而不敢吃喝。我自己就曾經在盤子上大便，以後因為沒有清洗的水，也就用來盛食物。

這裏絕對是寂靜無聲——這是刻意的。警衛們穿着毡底鞋，在钥匙找到鎖之前你可以聽到他們的手放在門上的聲音。有時，囚犯不斷地敲門或尖叫的聲音會在走廊里回響。小牢房只允許我向每個方向移動三步，所以我躺下來盯着灯泡。整個晚上它一直亮著。因為我睡不着，所以我祈禱。外面的世界對我來說已經不復存在了。過去我習慣的所有聲音，就如街道上的風雨聲，石地板上的鋼靴釘，蒼蠅的嗡嗡聲，並人聲，都消失了。我的心似乎也要在這死氣沉沉的寂靜中停止跳動了。

19

接下來的兩年里，我一直被單獨監禁在這個牢房里。沒有讀物，也沒有寫作的工具，我只有自己的思想陪伴。我不是一個沉思型的人，我鮮

少體會過安靜。果然我有上帝；但我真的事奉上帝嗎——還是正在從事一門行業？

人們要求牧師成為智慧、純潔、愛心和誠實的典范。但牧師也只是人，總會有人的不足。因此，他們開始或多或少作出一些偽裝，保持愛心的形象。時間久了，他們自己也難以分辨，自己的行為有幾份是真，幾份是假。

我記得薩沃（Savonarola）在獄中對《詩篇》第五十一篇所作的富有洞察力的評論。當時他的骨頭有嚴重折裂，只能用左手簽署自控書。他說基督徒有兩種：一種是真信神。另一種也同樣真實地“信自己信神”。只有在危機時刻，你才能通過他們的行為來認識他們是前者或是後者。我相信上帝嗎？現在考驗來了。我獨自一人。沒有薪水可賺，也沒有意見可考慮。神給我的只是痛苦——我還會繼續愛他嗎？

我記得我最喜歡的一本書，《帕特里克》The Pateric，講述了一些四世紀的聖徒，他們在迫害時期建立了沙漠修道院。這書有四百頁，但我第一次拿起它時，就不吃、不喝、不睡，直到讀完它。基督教書籍就像美酒——越陳舊越好。《帕特里克》中有一段話，一位弟兄問他的長輩：“神父，甚麼是沉默？”答案是：“我的孩子，沉默就是獨自在房子裏，敬畏神，保護心靈避開思想的火箭。這種安靜產生美善。靜默而無思，天堂之梯！當一個人只想到首要的事物，只與耶穌基督說話！一個保持靜默的人，就是那心中說，‘主呀，我的心已經準備好稱贊你了！’”

過去我曾詫異一個人如何能通過沉默的生活來讚美上帝。起初，我急切地禱告求得釋放。我問：

“經上說，人獨居不好，為甚麼我獨處呢？”但日子一天天過去，已經幾周了，我唯一的訪客仍然是警衛，他帶來了黑面包和稀湯，却一句話也不說。

希臘人有句俗話，“衆神穿着軟鞋行走”：換句話說，他們相信我們無法察覺到神靈的來臨。也許在這種沉默中我與神更近了。也許這也會讓我成為一個更好的牧師，因為我注意到最好的傳道人常是內心沉靜的，如基督一般。當嘴巴經常張開時，即使是為了說好話，靈魂也會失去熱量，就像房門打開了，溫暖就流失一樣。

我漸漸了解，沉默之樹上挂着和平的果實。我開始認識到真自我，確保它屬於基督。我發現即使在這裡，我的思想和感覺也轉向神，我可以夜復一夜地祈禱、靈性操練和讚美。現在我知道自己不是演戲，而是真信。

20

我制定了接下來兩年遵循的慣例。我整夜沒睡。當晚上十點鐘聲响起時，我就開始了我的計劃。有時我很悲傷，有時很高興，但夜晚對於我要做的事情總是不够長。

我以禱告開始，禱告中常常流下感激的淚水。祈禱就像無線電信號一樣，在夜間聽得更清楚：正是這個時候，進行屬靈的真實戰爭。接下來，便是講道，就如在教堂里的證道。我以“親愛的弟兄姐妹”開始，以“

阿門。”結束。我使用耳語，是守衛不能聽見的。我無需擔心主教或教長對我的講章怎麼想，會眾會如何說，或間諜會如何報告。我不是向空氣講道。每一次講道，神與眾天使都聽到，還有過去與今日的聖徒。我感到“會眾”中也有那些帶領我信主的，我的教友，無論是依然活著的，或是已經過世的；還有我的家人和朋友。他們就是聖經所說的“云彩般的見證人”。這正是信經中的“聖徒相通。”

每天晚上我都和我的妻子和兒子說話。我記得他們身上一切美好的事物。有時我的思绪會越過監獄的圍牆傳到薩賓娜那里。她在她的聖經中記下了當時的一句：“今天我見到了理查。我躺在床上，醒着，他靠過來對我說話。”那時我集中了所有的力量，向她傳達了愛的信息。我們每天用幾分鐘彼此思念，得到了豐厚的回報；許多婚姻被監獄摧毀，而我們的婚姻却更加牢固。

想到我的家人，也會給我帶來痛苦。薩賓娜不可避免地，必須承受巨大的壓力。當局會試圖迫使她辦理離婚手續。如果她拒絕，又繼續教會的工作，他們幾乎肯定會逮捕她。那時，十歲的米海就孤單無依。我臉朝下躺在床上，擁抱床褥就像擁抱着我兒子一樣。有一次我跳起來，用拳頭猛擊鐵門，大喊：“把我的孩子還給我！”警衛跑進來按住我，同時給我注射了一針，使我昏迷了幾個小時。當我醒來時，我想我可能要瘋了。我知道許多人都這樣開始失常的。

這給我想起基督的母親，她站在十字架下，卻沒有抱怨。這給了我勇氣。我想知道，我們把她

的沉默解釋為深沉的悲傷，是否正確？她肯定也會感到高興？因為曉得這苦難是將給眾人好處。

由于那天是逾越節，根據猶太的儀式，她那天晚上一定唱詩讚美神。於是我也必須感謝上帝讓我的小兒子經歷苦難。我還有一個渺茫的希望，就是，即使薩賓娜被捕，我們還有忠心的朋友，肯定會關照米海。

其中一種鍛煉，就是想象我將自己的一生都交給基督：我的過去、現在、與將來；並我的家庭、我的教會、我的情感、我秘密的思想和我的每一個肢體。我向基督承認我過去所有的罪，並看到祂用手將它們擦掉。我常常哭泣。

在最初的日子里，我花了很多時間省察自己的靈魂。那是一個錯誤。愛、善和美都是害羞的受造物，當它們知道自己被觀察時，它們就隱藏了。當我兒子五歲的時候，他給我上了一課。當時我責備他說：“耶穌有一本很大的練習本，其中一頁寫着你的名字。今天早上祂必須寫下你如何违背了媽媽。昨天你和另一個男孩打架，又說那是他的錯。”米海想了想，問道：“爸爸，耶穌只寫我們的壞事，不也寫好事嗎？”

我的腦海里常常浮現出我的兒子。我很高興記得他是如何教我神學的。當我讀到哥林多後書時，他問道：“經上說要省察自己，看我們有信心沒有，也要自己試驗。我該如何省察？”

我回答說：“便是捶胸自問：‘心啊，你愛神嗎？’”我就用力拍自己的胸口。

“不是這樣的，”米海說。“有一次，火車站的技工給我試用他的小錘。他說，‘只需輕輕敲

，不是重擊，免得輪子破裂了。’所以我也不必太大力敲打自己呀？”

現在我知道，當我問自己，“你愛耶穌嗎？”只要聽見心里安靜地說一聲“是的，”就夠了。

每天晚上，我都會花一個小時的時間思考我的主要對手，比如杜上校。我想象自己在他的地位，我會如何。於是我想到他的許多苦衷，於是我就更能愛他，並其他折磨我的人。然後我又從他的角度思考我的錯誤，就對自己產生了新的認識。

我又想象自己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或一位百萬富翁、或是中國皇帝，或是天主教的教皇。我就考慮如何利用那種權力。我又夢想如果我有翅膀或隱形衣服，生活將會如何。還有，如果人的靈魂是一種無形的力量、能自由飛翔，又能改變世界，生命將會如何。這些都是幻想，但很能打發時間。一位忙碌的建築師不會浪費時間思想如何使用不存在的建築材料（譬如沒有重量的石頭、或有彈性的玻璃）。屬靈的冥想，也像建築，是為了實在的利益。這種幻想給我看到，敵對派在靈裏也能合一。如今我明白為何基督可以包含萬有。祂可以同時是猶大的獅子，也是神的羔羊。

我在空蕩的牢房里也不乏樂趣。我給自己講笑話，並創造新笑話。我用監獄面包制成棋子，對自己下棋：黑的對弈不那麼黑的。棋盤用牆粉畫出。我把心思分成兩半，黑方並不曉得灰方的下

一步棋，反之亦然。於是這兩年來我總是得勝，一局也未曾輸過。自覺是天下無敵了。

我發現快樂就如習慣，就像一張折疊的紙總是傾向原來的折疊一樣。“要常常喜樂”是神的命令。約翰衛斯理曾經說過：“我未曾悲傷超過一刻鐘（十五分鐘）。”我不能對自己說同樣的話，但我學會了在最糟糕的情況下也高興。

21

共產黨認為，幸福來自于物質的滿足；但我獨自一人在牢房里，又冷又餓，衣衫襤褸，每晚却都高興地跳舞。這個想法是來自我童年時曾經看過旋轉的托鉢僧。這些穆斯林僧侶旋轉時的優雅動作、呼喊他們的“真主”。後來我發現許多其他信徒——猶太人、五旬節派、早期基督徒、聖經中的人物，如大衛和米利暗、在塞維利亞大教堂慶祝復活節的祭壇男孩，還有今天的信徒——也為上帝跳舞。人在接近神時的感受，僅靠言語永遠不足以表達。有時我內心的喜悅那麼強烈，以致若不發泄就會爆炸。我記得耶穌的話：“當人們因人子的緣故而憎恨你們，排斥你們，辱罵你們，並以你們的名為惡時，你們就有福了。應當歡喜跳躍！”我告訴自己：“這條命令我只

執行了一半。我心中歡樂，但這不夠，我還必須跳躍。”

當警衛從窺探孔觀察，看到我在牢房里跳來跳去。他受到的指令必然是馬上分散將要發瘋之犯人的注意力：因為他馬上到守衛室帶來一些食物：一大塊面包、一些奶酪和糖。

當我拿起這些食物時，我想起了《路加福音》說：“在那一天你們要歡欣雀躍——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這是一塊很大的面包：超過一周的口糧。

從那時起，我很少一個晚上不跳舞，儘管我不再獲得報酬。我創作歌曲，輕聲地唱給自己聽，並隨着自己的音樂跳舞。守衛們已經習慣了。我沒有打破沉默，他們在這些地下牢房里看習各種奇怪的境況。後來我和朋友談起在監獄里跳舞時，他們問：“為了甚麼？有甚麼用？”這不是用處的問題。這是一種歡樂的表現，就像大衛的舞蹈。這是在耶和華的祭壇前獻上的神聖祭物。如果守衛們以為我瘋了，我也不介意，因為我在基督里發現了一種我以前不知道的美。

有時我看到異象。有一次，當我跳舞時，我似乎聽到有人叫我的名字——不是“理查”，而是另一個我不能透露的名字。我知道那人正在叫我，而且是使用我的新名。不知道為甚麼，我曉得叫我的誰：“這是天使長加百列。”然後牢房里就充滿了光芒。我沒有聽到更多的話，但明白我正在與耶穌並眾聖徒一起建造一座橋樑。這是一

座用淚水、祈禱和自我犧牲的橋樑，讓罪人能夠跨過去，與蒙福的人同在。我發現我們的橋樑必須是一座即使是善良最微弱的人也可以使用的橋樑。耶穌應許，在最後的審判中，那些給饑餓的人吃飽、給赤身露體的人穿衣的人，將坐在他右邊，而作惡的人將被扔到外面的黑暗里。可是，每個人都有時助人，有時沒有：身體是一個，心思却常常變動。我發現我必須愛人現今的樣子，而不是他們應成為的樣子。

另一個晚上，我意識到一大羣天使在黑暗中慢慢地向我的床移動。當他們走近時，他們唱起了一首愛之歌，就如羅密歐肯定向茱莉亞唱的。我不敢相信警衛們沒有聽到這奇妙的情歌。

長期獨處的囚犯常常會出現這樣的幻象。當然，這種現象有自然的解釋。但這並不會使它們的價值失效。靈魂利用身體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些異象維持了我的生命。這就足夠證實它們不完全是無意義的。

22

有一天晚上，我聽到床邊的牆壁有輕微的敲擊聲。

一名新囚犯來到了隔壁牢房，並向我發出信號。我回答了。很快我意識到我的鄰居正在傳達一個簡單的代碼：A：單擊一次； B：擊兩次； C：

擊三次，諸如此類。“你是谁？”這是他傳遞的第一條消息。

“一位牧師，”我回答道。

從這種困難的開始，我們開發了自己的系統：點擊一下表示字母表的前五個字母，隨後的點擊兩次，表示這一組的第二個字母，依此類推。因此，B 是單擊一次，然後暫停，然後再擊兩次；F 是先擊兩次，然後再擊一次。但這種代碼對於我的新鄰居來說也不夠完善。他懂得摩斯電碼（Morse code），並把這些字母一一傳給我，直到我全部學會。

然後他傳送了他的名字。

“神祝福你。”我費力地回答。“你是基督徒嗎？”

一分鐘之後，他才回答：“我不能說是。”

原來他是一名無線電工程師，正在等待死刑的指控。如今五十二歲，身體不好。幾年前，他與一個不信者結婚，放棄了自己的信仰，如今正在大大憂愁。整個晚上，我都隔着牆向他講述基督的憐憫，同時開始熟練摩斯電碼。

沒過多久，他給我這個信息：“我想懺悔。”

這是一個間隔許多沉默的告白。

“我七歲時.....踢一個男孩.....因為他是猶太人。他詛咒我.....愿你的母親.....在去世時.....不能見到你.....果然後來媽媽快要死時.....我正要動身去看她...就被警察帶走了。”

當他道出心中的重担後，他說他感覺比多年來輕省了。我們成為莫斯密碼的朋友，就像其他人成為

筆友一樣。我教他聖經的經文，但我們也互相傳送輕鬆的玩笑，並進行國際象棋對弈。我每天都會向他發送有關基督的信息，用密碼傳道。當警衛發現了，就把我轉移到另一間牢房。我就開始和新鄰居進行這種交流。過了一些日子，我們中間許多人學了這些代碼。囚犯經常被轉移到新的牢房。我不止一次被告密者出賣，所以我只單純傳達經節和基督的話：我還不願意為政治的爭論而受苦。

單獨監禁使我們許多人想起埋藏多年的過去經歷。那些我們刻意遺忘的背叛與撒謊，都重新回到了腦海。就如我們遺棄的母親、父親、或很久以前的女朋友，曾經被你誹謗或欺騙的人都會來到你的牢房。我聽到的許多摩斯電碼的懺悔都是這樣開始的：“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當我在學校的時候……”過去的回憶就像無情的惡狗，使你不得安息。但是，當所有其他通往天堂的大門都關閉時，《卡巴拉》告訴我們說，還有一道門依然開着：就是淚門。

我們囚犯正是經過這道門。

23

一天早上，一位鄰居用莫斯碼告訴我說，這是耶穌受難日。我在廁所里發現了一顆釘子，就帶回來，在我牢室的牆上寫了“耶穌”二字，好給後來的囚犯打氣。守衛很生氣。“你是要嘗嘗僵屍廂！”他說。

他就帶我到一個嵌在牆壁裏的櫥櫃前，那櫥櫃的高度剛好可以站立一個人。它有二十英寸見方，有

幾個小氣孔，還有一個可以將食物推入的洞口。門衛把我推了進去，並關上了門。門內鋒利的尖端刺痛了我的背。我猛地向前冲，胸部又被第二組尖刺插入。我顿时慌了。我强迫自己保持绝对静止。然後，我在黑暗中小心翼翼地移動，發現櫥櫃的四面都布满了鋼刺。只有筆直地站着，才能避免被刺穿。這就是僵屍廂。

很快的，我的腿就開始酸痛。一個小時後，每一塊肌肉似乎都發痛了。我的脚仍然因馬紐刑法而疼痛肿胀。我最终倒下，被尖刺插著，他們就讓我出去短暫休息，然後再令我進入這箱子。我試圖思想基督的苦難，但我自己的苦難却太強烈了。我想想起米海很小的時候，曾經問：“爸爸，我該怎麼辦？我很無聊。”我說：“就思想上帝吧。”他回答說：“我為甚麼要考虑祂？我的頭很小，祂的頭却很大，所以理當是祂想及我。”

於是我就告訴自己說，“不必想及神。甚麼也不必想。”

在那令人窒息的黑暗中，我想起阿多斯山上的僧侶有一種禱告，稱為脈搏禱告。每一次心跳，代表每一個字：“主耶穌基督，神之子，憐憫我！”於是就可以不间断的继续下去。

印度瑜伽術士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一個咒語，清除頭腦中的思想。阿多斯的僧侶們也用類似的心靈祈禱。他們的每一次心跳，都是一句短語：“耶穌基督，上帝之子，憐憫我。”我知道基督憐憫，但這話不怕多說，也不怕重复。（就像我每天對妻子這樣說。）於是我也重複對主說：“耶穌，我靈魂的新郎，我愛你。”我按照同樣的旋律重複。一顆愛之心的安靜跳動，就如最美妙的音樂，可以傳到遠方。起初我好像聽見魔鬼的嘲笑，“你愛祂，祂

卻讓你受苦。如果祂是全能的，為甚麼不救你脫離僵屍廂？”我繼續安靜的說，“耶穌，我靈魂的新郎，我愛你。”在短時間內，這些字詞的意義就開始模糊，然後完全消失了。我就不再有任何思想了。

後來我經常在心情不好的時候練習這種不思想的禱告。耶穌在《馬太福音》中說：“你們不思想的時候，人子就來了。”這是我對祂的經歷。不要思想——基督就會來，讓你大吃一驚。但祂的光是那麼明亮，以致令人難以忍受。有時我會扭轉這個過程，逃避它，重回自己的思想中。

24

我在僵屍廂里待了兩天。聽說有些人在裏面待了一周或更久。但醫生警告獄方說，我的情況危險，已經是生死的邊界。長期監禁和缺乏陽光，食物和新鮮空氣，我的頭髮不再生長。理髮師已經不需要給我刮胡子。我的指甲蒼白而柔軟，就像一株生長在黑暗中的植物。

幻覺開始占據我的腦海。在消沉的時刻，我盯着我的錫杯裏的水，嘗試令自己曉得我還在世上，而不是在沒有水的地獄。當我還看時，那杯子却變成了頭盔。我看到一張巨大的桌子上擺着美味的菜肴，一直延伸到牢房之外。我的妻子從遠處走近。

她端着一個盘子，里面堆滿了冒烟的香腸，但我對她說，“就這一點兒嗎？太少了。” 有時，我的牢房會擴展成一個寬敞的圖書館，一書架又一架的皮革裝訂書籍一直延伸到黑暗中：著名的小說、詩歌、傳記、宗教和科學著作。他們高聳在我之上。其他時候，成千上萬的面孔熱切地轉向我：我被一大羣人包圍，等待我發言。有人大聲提問，就有聲音隨即回應。歡呼聲和反喝彩聲此起彼伏。眾人的面孔就如海洋一樣廣大無限。

我也夢見自己向囚禁我的人進行報復，於是心靈不安。我又夢見色情的幻想。這是一個未曾經歷其中的人難以了解的地獄。

在我入獄時才三十九歲，身體健康，精力充沛，現在我的肺結核復發，激起性欲。我夢想着同時與幾個女人、各個種族的女孩進行性行為，然後是各種變態。

為了擺脫這種幻覺，我將它們視為敵對的入侵者，就像我體內的結核病細菌一樣。因此，我並沒有因為他們的入侵而責怪自己，而是因抵制了它們而自豪。一旦我不再將它們視為自己的過失，而是敵人，我就可以計劃毀滅它們。如果我們冷靜地考慮邪惡思想的後果，理性就可以抑制邪惡思想。我沒有試圖將它們趕出去，因為知道它們不久就從側門溜進來。相反，我讓它們留下，同時計算出如果我屈服於它們，我將會付出怎樣的代價。所有認識我的人必承擔痛苦。我的妻子將不得不與我離婚（

因為我有了婚外情)；我兒子的未來就毀了。我的教友也會失去信心。然後，在眾人鄙視下，我仍然必須為我所造成的傷害向上帝負責。就如醫生有時會使用一種病毒對抗另一種病毒，我們也可以如此。驕傲之魔可以對付色鬼（因為怕丟臉）；吝惜之魔最痛恨一切花錢的罪惡。

25

有一天，我們的廁所堵塞了，獄卒就把我帶到了警衛用的廁所。洗臉盆上方挂著一面鏡子，鏡子里有一隻瘋子的眼睛盯著我。那是一隻布滿血絲，充滿恐懼和懷疑的眼睛。我坐牢已經兩年，已經不能認出自己了。

鏡子中的我，皮膚就如黃色的羊皮紙。眼窩是深灰色，頭髮是肮脏的白色。最近受傷的紅色疤痕覆蓋在骨瘦如柴的前額一側。我的嘴角顫抖。我驚恐地看著那個可怕的老人，然後不由自主的發出一陣笑聲。這就是過去人人愛戴和欽佩的英俊年輕傳道人。如果我的會友們能看到如今的我就好了。我仿佛第一次明白，我們身上真正美好的東西都是隱藏的。我提醒自己，我還會變得更丑——成為一具骷髏，一個空颅骨。發現了這個，我就更渴望屬靈的生命，裏面的真生命。我希望這真正的內在之人可以成長。

這廁所里有一張撕破的報紙，這是我被捕後第一次看到報紙。其中報道格羅扎總理決心消滅富人的消息，這叫我感到有趣；正當世界各國努力消除貧困（就是減少窮困人）時，我國政府却立志要消滅富人。我試找了帕特拉的名字，看看他有沒有復職，但在格羅扎講話時，他不在出席的部長中。

在押送回牢房的路上，我聽到一個女人在哭泣，又瘋狂地喊叫。她的尖叫聲似乎是從我們下面的監獄里傳來的。這尖叫突然停了。

幾天後有新囚犯被關進我隔壁的牢房。我敲打“你是誰？”立即就收到了回復。他就是米沙拉奇（Ion Michalache）。他曾是戰前多個政府的成員，也是偉大政治領袖馬紐（Iuliu Maniu）的同事。當共黨開始抓人時，米沙加入了一羣人，試圖逃往西方。一九四七年 10 月，他在機場被捕，並被判處無期徒刑。米沙已經六十多歲了。他如今極其絕望。他告訴我，他一生都在努力幫助他的同胞，而這就是他的回報。

我回答說，“當你樂意所發生的一切事物，那麼所發生的，就只是你愿意發生的，”我說，“放棄一切，就是和平之道。”

他回應道：“沒有自由就沒有和平。”

我回答說：“在一個暴政的國家，監獄是榮耀之地。”

他說神令他失望。

我回答，“上帝絕不會叫任何人失望。。。只是人叫人失望。。。如果我們找尋神，就必能尋見。。。監獄可以幫助我們尋找祂。”他說他會再嘗試。

兩天後，米沙告訴我，我們聽到的那個哭聲的女人是前總理吉古爾（Ion Gigurtu）的妻子。她的哭聲突然停止，意味他們給她注射了藥物。過後我再敲擊牆壁時，卻沒有回應。米沙已經被帶走了。

26

不久之後，我的審訊又開始了。這時的審訊官是格雷中尉（Lieutenant Grecu）。這是一個強壯的年輕人，聰明而自信。黨方已經給他灌輸一個信念：他正在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他問我有關於《挪威宣道會》的飢荒救濟金。他問我是否仍然否認這些資金是用在間諜活動。

我說：“我可以理解你懷疑英國人和美國人在我國花錢從事間諜活動，但是挪威或瑞典對這種活動有甚麼興趣？”

“因為這兩國，”他說，“都是帝國主義的工具。”

“但挪威以民主精神而聞名，而瑞典已經擁有社會主義政府四十年了。”

“胡說，”他說。“他們和其他西方國家同是法西斯主義者。”

在我們的下次再相見時，格雷說他已經檢查過並發現我說的對。對於一個共產黨來說，這是一個慷慨的承認。

他跟著詢問俄語福音書的分發情況。我暗示聖經公會的一位名叫埃米爾的董事可能是幕後人。當他問我為甚麼多次訪問雅西城（這城便是這福音工作的中心之一）時，我說我是收到了該城大主教的邀請。

第二天一早，我又被叫去。格雷坐在辦公桌前。

“你的故事完全是謊言，”他喊道，“黨方已經查明埃米爾在你被捕之前已經死了；他們也檢查了你前往雅西的日期，當時查士丁大主教不太可能在當地。”

他把椅子往後推。“我受够了。這是一些文件。我們知道你曾經用密碼與其他囚犯交流，包括米沙。現在我們要知道他們對你說了甚麼。我們還想了解你所有其他違反黨紀律的細節。老實的寫。不然……”

他用警棍在桌子大力猛擊。“你有半個小時，”他說完就離開了房間。

我坐下來寫。標題必須是“聲明”。開始時我有些不習慣。我已經兩年沒有拿筆了。我在聲明一開始就坦率地承認自己違反了規則：我通過敲牆傳達聖經經文和福音信息，

我也曾囤積藥丸企圖自殺，又用一塊錫制成一把刀，又用面包和粉塊筆制作棋子棋盤。我也曾經與其他犯人交流，但不知他們的名字（我沒有提到，通過摩斯碼，我收到了懺悔，甚至帶人信主。）我又寫道：“我從未說過反對共產黨的話。我是基督的門徒，基督吩咐我們愛敵人。我理解共產黨，並為他們的信主祈禱。我希望他們會成為我的兄弟。我無法談及別人給我的信息，因為神的牧師絕不能指控任何人。我的使命是保護，不是指控。”

格雷准時回來，揮舞着警棍。“我已經對你們的一些獄友作了熱身運動。”他說。

他拿起我的《聲明》開始讀，過了一會兒，他把警棍放到一邊。讀完後，他一臉困擾地說：“喬治斯庫先生（他以前從未叫過我“先生”），你為甚麼說你愛我？我知道這是你們基督教的命令之一，但我不相信有人能遵守它。我不能愛一個折磨我的人。尤其是那些單獨關押我，叫我挨餓多年的。”

我說：“這不是遵守戒命的問題。當我成為一名基督徒時，就如獲得了重生，有了充滿愛的新品格。就如噴泉只能噴出清水，一顆愛心只能湧出愛。”

那天，我們花了兩個小時談論基督教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當我說馬克思的第一部著作是《約翰福音》的注釋時，格雷感到驚訝；他也不知道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前言中寫道，基督教——尤其是新教（複原宗）形

式——是“一種最理想的宗教，能更新一個被罪惡糟蹋了的生命。”由于我的生命已經被罪破壞了，於是我成為新教派的基督徒只是按照馬克思的建議行事。

這次談話後，格雷幾乎每天都叫我到他的辦公室一兩個小時。他已經確認了這些引述屬實，並且詫異為何他的老師從未提及它們。顯然，馬克思並不像他想象的那樣敵視宗教。

我強調了基督教早期的革命精神。格雷說：“我從小就是一個無神論者，我永遠不會成為其他人。”我告訴他：“無神論對於基督徒來說是一個神聖的名詞。當我們的祖先因為信仰而被扔給野獸時，羅馬皇帝尼祿（Nero）和卡利古拉（Caligula）稱他們為無神論者。所以如果有人自稱是無神論者，我們就肅然起敬。格雷微笑，于是我繼續說道：“中尉，我的一位祖先是十七世紀的一位拉比。他的傳記作者寫及他如何遇見一位無神論者。他說：“我好羨慕你，兄弟。你的靈性肯定比我強。當我看到一個人陷入困境時，就說：“上帝會幫助他”，於是就繼續行我的路。你不信上帝，意即你必須承擔這個重担，扮演神的角色，幫助你遇到的每個人。

“我們基督徒並不反對共產黨的神思想。我們只是反對共產黨的錯誤類型之無神論。因為無神論也有兩種：第一種說：‘因為沒有上帝，所以我就可以任意為惡。’第二種則說：‘由於沒有上帝，我就必須做上帝會做的一切善事。’

“正是因為耶穌作神的一切工，人們就開始問，這人是神嗎？祂作神的工！祂表現得好像所有的責任都是祂的。於是人們才發現祂是神。中尉，如果你能成為這樣的無神論者，愛每一個人，為每一個人服務，人們就會發現你是神子；而你也會發現你裏面的神性。”

我的論點可能會令一些人感到震驚。但聖保羅告訴我們，我們對猶太人就成為猶太人，對希臘人就成為希臘人，好得著他們。對格雷我就必須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說他所能明白的語言。他開始思想，並愛耶穌。兩周後，這名穿着黃褐色制服，衣領上挂着藍色秘警肩章的中尉，就向一個破布囚犯承認基督為主。我們就成了兄弟。

從那時開始，他一邊口頭上為黨服務，一邊勇敢地幫助犯人渡過困難和危險。然後有一天，他失蹤了，沒有人知道發生了甚麼。我小心翼翼地詢問了警衛，他們認為他已經被捕了。要隱藏真心的轉變並不容易。

27

我在秘密警察中遇到了其他秘密信徒，其中一些人仍在警界中，同時暗中服侍教會。不要說一個人不能同時折磨和祈禱。耶穌告訴我們，有一個稅吏（這是古羅馬的一些猶太人，奉承壓迫者，欺

負自己的同胞），到聖殿認罪禱告。然後主耶穌說他回家時，已經稱得上是義人了。然而，福音書並沒有說他立即放棄了他的漢奸工作。神鑒察人心，並在一個真實的禱告中看到未來之改變的應許。

在共产国家，這種兩面人更是普遍。

我坐牢第二年，就遇到一個這樣的分裂之靈魂。他和我關在一起的時候，雙手被反鎖在背後，所以我必須喂他、照顧他。

這位迪奧（Dionisiu）是年輕的雕塑家，在這個人人都必須討好斯大林才能生存的世界里，他對未來還充滿了憧憬。最後在饑餓的邊緣，他為了吃飯，就為秘密警察效勞，包括折磨囚犯，但同時他也冒着巨大的風險警告他們提防告密者。後來迪奧意識到自己受到懷疑，決定逃出羅馬尼亞。可是將要成功時，他內心深處又有一種沖動，迫使他返回自首。迪奧一生都在兩個相反的催動力中，來回拉扯。極權國家產生了許多這樣的靈魂。

一連十個晚上，從天黑到早晨，我教迪奧聖經。他的罪感終於清除了，基督進入了他的心。在他被轉移別處之前，他說：“如果我年輕時，小鎮上的十五位神父的一位，停下來跟我說話，我早就找到耶穌了。”

在格雷中尉的離開後，審訊並沒有停止，但上帝給我一種恩賜，讓我能忘記所有我可能傷害之人的名字。雖然在獄中我寫了三百首诗，共有十萬字，出獄時也都能寫了；還有二十多年後的今天，當年我在獄中的經歷却還能清楚記得，仿佛昨天一般；但在我受問話時，大腦卻能一片空白。於是黨方嘗試一種新方法。

醫生說我的肺結核惡化了，（當時我的咳嗽幾乎是連續不斷的，）就開了一種新藥，一種黃色膠囊，說是可以給我充滿愉快夢境的長睡。當我醒來時，他們又加一劑。我昏睡了好幾天，其間只有當警衛送來飯菜時才叫醒我。那飯菜變得清淡又有營養。

我對過後繼續的審訊，已經不能清楚記得了。但我知道那種藥物並沒有導致我出賣朋友，因為後來我上法庭時，還是孤身一人。並沒有黨方刻意大事渲染又爆破一宗《世界基督教協進會》的“間諜網”事件。這種藥物曾被用于紅衣主教敏斯（Mindszenty），特羅斯基派，並許多其他人士。它會削弱受害者的意志，直到受害者陷入自責的謔妄狀態。後來，我聽說受這藥物影響的人敲打牢房門，要求見政治官員，以便對自己提出新的指控。這種藥物還能產生長期效果。幾個

月前服用的人後來向我承認他們犯了許多“罪行”，就是他們完全不可能犯下的。也許我體內的結核病抵消了這些藥物的作用。或者是他們使用的劑量太高。無論如何，帝的恩典讓我不至於出賣朋友。

29

服藥後，我的身體更加虛弱，有一天我似乎完全崩潰了。我必需用盡氣力，才能從床上爬起來。但我的頭腦仍然會清醒一陣子。我有時甚至擔心它的清晰度。

聖安東尼、馬丁路德和許多其他普通人都見過魔鬼，這並不是神話。我小時也見過牠一次。那時牠對我呲牙而笑。這是半個世紀以來我第一次說及牠。現在，我獨自一人待在牢房里，又感到牠的同在。天又黑又冷，牠在嘲笑我。聖經提到“豺狼跳舞的地方”，監獄就成了這樣的地方。我日夜都聽到牠的嘲諷，“耶穌在哪里？你的救主無法拯救你。你被騙了，你也欺騙了別人。祂不是彌賽亞——你跟錯了人。”

我大聲喊道：“那麼，誰才是真彌賽亞呢？”答案很明確，但重復是太褻瀆了。我曾寫過書籍和文章證明基督是彌賽亞，但現在我無法想出

任何一個論點。那個令偉大的挪威福音傳教士汉斯（Nyls Hauge）在監獄里動搖，又使施洗約翰在地牢里對耶穌產生懷疑的魔鬼，如今正在大力搖撼我。我完全沒有任何抵抗的工具，只有挨打的份。我的喜悦和平静消失了。以前，我一直感到基督離我很近，減輕我的痛苦，照亮我的黑暗，但現在我感到完全被拋棄了。

在那段絕望的日子里，我慢慢地寫下了一首长诗，對那些沒有經歷過類似身體和精神狀態的人，可能難以接受這樣的詩。但它卻是我的救贖。借著言語、節奏和咒語，我打敗了撒旦。這裏是它的沒有節奏的翻譯，只提及原文（羅馬尼亞語）的含義：

從小我就經常去寺廟和教堂。神在這些地方獲得榮耀。不同的祭師都向你熱情地唱歌和熏香。他們聲稱有權利愛你。但隨着我的成長，我看到世界是那麼悲哀（神造的世界！），我對自己說：“祂肯定有一顆鐵石心腸。否則祂應該會為我們減輕重擔。”生病的孩子在醫院發燒，憂傷的父母為他們祈禱。天堂卻聾了。即使我們的祈禱很長，我們所愛的人依然死亡。無辜者被扔在火爐裏，活活燒死，天堂却沉

默。它讓這種事發生。神還會驚訝信徒懷疑祂的存在嗎？

我怎麼能愛一位創造有害細菌和吃人老虎的主宰？只因為一個人吃了一棵樹上的果子，祂就折磨所有的人？這樣的神叫我怎麼能愛祂？我的處境比約伯更糟；我没有妻子、孩子，也没有朋友來探望，監獄里没有阳光，缺少空氣，這種暴力統治叫人難以忍受。

他們會用我的床板制作我的棺材。如今我還躺在這床上，試圖了解為何我的思绪奔向你，為甚麼我寫的文字都轉向你？為甚麼我的靈魂里有這種熱愛，為甚麼我的歌只歸你？我深知我被拒绝了，很快我就會腐烂在坟墓里。《歌中之歌》的新娘問，她愛你是否是“愛得正確”時，她並沒有愛。愛有它自己的理由。愛不屬於理智的人。一個愛人，就是經歷千百次考驗，也不會停止愛。不論是刀山火海，或是滔天大浪把她淹沒，她還是會親吻傷害她之愛人的手。如果她找不到她問題的答案，她會自信地等待。有一天，阳光會照亮幽暗，一切都會清明。

末大拉的許多罪孽獲得寬恕，這只增加她炽熱的愛。但她在你說出寬恕話之前，

已經為你淋了香水，多多流淚。如果你後來沒有說寬恕的話，她仍然會坐下來因愛你而哭泣，雖然她還在罪中。她在你流血之前已經愛你。

我也不問，愛你是否正確。我愛你不是為了希望得拯救。就算我永遠滅亡，我也愛你。如果你拒絕降世為人，你就會成為我遙遠的夢想。如果你不說話，我依然一樣愛你（雖然心中干渴，因為缺少你的話。）即使你臨陣猶豫，逃離十架，以致我沒能得救，我一樣愛你。

即使我在你身上發現了罪孽，我也會用我的愛來掩蓋它。現在我敢說狂話，讓所有人都知道我的愛。現在我將觸動未曾觸動的琴弦，用新的音樂來榮耀你。如果先知們預言的是另一個救主，我會離開他們，而不是你。讓他們拿出一千個證據，說你不是基督；我依然愛你。如果我搖籤，發現你是一個騙子，我會為你哭泣而祈禱，雖然我不能跟從謊言，但這不會減少我對你的愛。撒母耳為了掃羅，終生哀哭與嚴格禁食。所以即使我知道你是喪失了，我的愛也會堅持。如果是你，而不是撒旦，錯誤地起來反抗天國，以致失去可愛的翅膀，從高天墜落，不再有回頭的希望，

我依然希望天父會原諒你，讓你终于可以回歸天父，同行在天堂的黃金道上。

如果你是一個神話，我會離開現實，活在你的神話中。如果他們證明你不存在，你就會從我的愛中得到生命。我的愛是瘋狂的，沒有目的的，正如你的愛一樣。主耶穌，請在這裡找到一些快樂。更多我無法給你了。

當我完成這首詩時，我不再感到撒旦的臨近。牠已經走了。在寂靜中，我感受到了基督的吻。當祂親嘴時，每個人都安靜。安靜和歡樂又回來了。

第二章

經過近三年的單獨監禁，我已經瀕臨死亡。我經常吐血，連杜上校都有些驚慌。

“我們不是納粹。我們不是殺人犯，”他說，“我們要你們活着——並且受苦。”

他們傳召了一位專科醫生。為了避免感染，醫生通過牢房門上的窺視孔做了診斷，隨後命令將我轉移到監獄醫院。於是獄卒們把我從內政部的地下牢房抬了上來，在院子里我又看到了月光和星星。躺在救護車上時，我瞥見了熟悉的布城（Bucharest）。我們正朝我家的方向駛去，我一度以為自己正在被帶回家等死。然而當我們快抵家門時，救護車卻轉彎，開始上坡去，抵達市郊的一座小山頂。我就知道這是瓦卡雷（Vacaresti）修道院，這是布加勒最大的修道院之一，在上個世紀，當時的政府把它改為監獄。精美的教堂和禮拜堂變成了儲藏室。僧侶密室之間的牆壁已被拆除，使它們成為容納多人的大囚房。但他們還保留一些小密室，作為單獨囚室。如今我便是關在其中一間。

在警衛把我從救護車上抬出來之前，他們用一張床單裹住了我的頭。然後二名警員夾著我的雙

臂，把我半拖半抬，走過庭院，爬上樓梯，沿着陽台走下去。當床單被移除後，我發現自己獨自一人在一間小牢房里。我聽到一名警官在外面的陽台上對一名警衛說：“除了醫生，任何人都不能見這個人。即使醫生來了，你也必須在場監視。”我的存在必須保密。

那名警衛是一個頭髮花白的小個子男人，他對這些預防措施感到好奇。警官一走，他就問我做了甚麼。我說：“我是一名牧師，是神的孩子。”

他俯身低聲對我說：“讚美主。我是耶穌的軍兵之一。”他的意思是，他是《上主之軍》的秘密成員，這是一個從東正教教會分支出來的復興運動。儘管受到共產黨人和東正教祭師們的迫害，該運動還是在村庄中迅速蔓延，信徒達到數十萬。

這名守衛名叫達奇（Tachici）。我們交換了聖經經文，他盡其所能地幫助了我——以前，曾有獄警因給囚犯一粒蘋果或一支香烟，就被判十二年徒刑。我太虛弱了，無法下床，常常躺在自己的汗物中。早上的一小段時間里，我還可以清晰思考；過後就神志不清，翻來覆去。我睡得很少。但在這裏，至少也有一扇小窗，透過它我可以看到天空。早上，我被一種奇怪的聲音吵醒了——原來是鳥啼！我已經很久沒有聽到鳥鳴了。

我告訴達奇：“當馬丁路德在樹林里散步時，常向鳥兒舉帽行禮說：‘各位神學家早安！你們

醒來唱歌，但我這個老糊塗，卻不懂得依靠天父，倒是天天為每一件事擔心。’ ”

窗戶露出了草地和院子的一角，通常是空的。有時，穿着白大褂的醫生匆匆走過，甚至不敢抬頭。他們必須“本着階級鬭爭的精神”行醫。當囚犯們被放出去作體操時，我能聽到他們說話。過去我在單獨囚室，有時會渴望聽到人的聲音，但現在却感到厭煩。我發現人們談的，幾乎都是廢話。他們想的，也盡是瑣碎事。

一天早上，一位老人的聲音從隔壁牢房傳過來：“我是萊昂特（Leonte Filipescu）。你是谁？”

我認出這就是羅馬尼亞的社會主義先鋒，才華橫溢。黨方用盡他的好處後，就把他拋棄了。“戰勝你的疾病，”他喊道，“不要屈服！兩周後我們就自由了。”

“你怎麼知道？”我問。

“美國人如今正在把共產黨人趕回朝鮮。他們兩周後就會到這裡。”

我說：“但即使他們沒有遇到任何反對，他們也需要兩周以上才能到達羅馬尼亞？”

“廢話！距離對他們來說不算甚麼。他們有超音噴氣機。”

我沒有爭論，我發現囚犯們活在幻想中，幻想越精妙複雜，越是給力。今天的粥是不是稠了一點？這意味美國的最後通牒嚇壞了俄羅斯，所以我們的待遇正在改善。有人被獄警打倒了？這意

味着共產黨知道自己的時日無多，正在利用他們最後的光陰。人們精神抖擻地從外面體操回來，報告說：“米迦勒國王（King Michael）已宣布他將于下個月復位！”

沒有人可以想象自己將在監獄里度過十年或二十年。一個月後，萊昂特轉移到另一家監獄醫院，後來我們在那里再次見面。當他離開隔壁房時，他仍然抱著早釋的希望。取代他的是法西斯鐵衛隊的領導人拉杜（Radu Mironovici），他自稱是虔誠的基督徒，但對猶太人充滿了仇恨。

有一天，我請警衛達奇扶我坐起來，然後我問拉杜說，“當你在東正教教堂領受聖餐時，面包和酒是否轉化為耶穌基督的身體和血？”他說是。

我繼續說：“你知道耶穌是猶太人。如果酒變成了祂的血，那麼就是猶太人的血了，是嗎？”

無奈之下，他承認了。我接着說：“耶穌說，吃祂身體、喝祂血的人就有永生。因此，為了獲得永生，你必須在你的雅利安人（Aryan）的血液中注入幾滴猶太血液。那麼你又怎能恨猶太人？”

他沒有答案。我懇求他明白，跟從耶穌，又恨猶太人，是荒謬的；就如一個共產黨反猶一樣荒謬。因為共產黨追隨的就是猶太人馬克思。拉杜後來被轉移到一個遙遠的牢房，但他告訴達奇說：“我生命中虛假的一部分已經消失了。我是一名基督徒，但太驕傲了，跟不了基督。”

2

我還在發高烧、惡心頭暈時，獄警卻來，蒙上我的眼睛，帶我沿着走廊走。當眼罩摘下時，我發現自己在一間大房里，窗戶上有鐵柵欄。四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坐在桌子後面，面對着我。有人告訴我，這是法院，他們就是法官。

“已經有一名律師為你辯護，”法院主席說。
“他已經放棄了你傳喚證人的權利，你可以坐下了。”——警衛扶我在椅子上，同時給我注射藥物以穩定我的精神。當惡心和頭暈過去後，檢察官站了起來，說我在羅馬尼亞犯的罪，就如南斯拉夫的鐵托（Josef Broz Tito）一樣，都是錯誤的主義。我當時還以為自己神志不清，不能聽得清楚。在我剛被捕的那年，鐵托元帥正是國際共產黨的大紅人，被公認為英雄。我不知道他後來被指控為叛徒。檢察官繼續對我的罪行進行漫長的陳述：說我通過挪威與瑞典教會宣道會，並《世界基督教協進會》，進行間諜活動，傳播帝國主義，滲透到黨內，目的是摧毀共黨。當他的聲音繼續時，我感覺自己開始從椅子上滑下，審訊暫停，他們又給我再加上一針。

辯護律師已經盡力而為，但做不了甚麼。

“對於這些指控，你有甚麼要說的嗎？”主席問。他的聲音似乎很來自遠方。只有一個念頭進入我的不清晰的大腦。

“我愛上帝，”我說。

然後我聽到了判詞：二十年的苦役。這審判只用了十分鐘。當我離開時，他們又把我的眼睛蒙住。

3

兩天後，達奇低聲對我說：“你要走了。上帝与你同在。”另一個警衛跟在後面，他們把我抬到了大門。我又看到了布城的景色。這是我最後一次看到它，下一次再見是六年之後。他們把五十磅重的鐵鏈，用鐵錘固定在我的腳踝上。然後抬我上一輛卡車，車里已經有四十個男女。所有人，甚至病人，都枷上這種鎖鏈。在我附近，一個少女開始哭泣。我試圖安慰她。

“你不記得我了？”她抽泣着。

我仔細看了看，但不能辨認。

“我是你教會的成員，”她說。自從我被捕後，貧困使她開始偷竊。她告訴我，現在她必須服刑三個月。

“我很羞愧。我曾在你的教會，現在你是烈士，而我卻成了小偷。”

“我也是一個罪人，蒙上帝的恩典得救，”我說，“信基督，你的罪就馬上清除，一干二淨！”

她吻了我的手，應許說她出獄後，馬上就通知我家人。但我曉得她感到我活不了多久。

在鐵路的支線，我們被裝進一輛專門運送囚犯的火車廂裏。窗戶又小又不透明。當我們緩慢地穿過平原進入喀爾巴山麓（Carpathian）時，我們發現我們所有人都患有結核病，於是肯定正在前往奧克納監獄（Tirgul-0cna），那所監獄有結核病的療養院。大約四百年來，囚犯一直在這所監獄的鹽礦工作，三十年前，一位著名的醫生羅曼（Romanscanu）在當地建立了一所結核病療養院，捐贈給國家。在共產黨接管之前，這所肺癆院名聞全國。

經過一天一夜，頻密停頓的行程，我們才抵達200英里外的奧克納鎮（Tirgul-0cna）火車站。該鎮有三萬居民。我與另外六個也不能行走的犯人，一起被塞進一輛手推車的後座。其他的犯人就拖着我們的卡車，到市郊的一所大建築物，警衛在一旁監視。當我被抬入時，我看到了一張熟悉的面孔：阿迪醫生。他曾是一名法西斯黨，後來信主，成了我全家的朋友。他趕緊過來給我檢查。

“我自己也是一名囚犯，”他說，“但他們讓我執行醫務。這裏沒有護士，只有我一名醫生，所以我們必須盡力彼此照顧。”

他量了我的體溫並做了檢查。我看到他的眼睛濕潤了。

“我不隱瞞你，”他回答道。“我們做不了甚麼。您大約還能活兩周。嘗試吃他們給你的東西，儘管這並不好。否則……”他碰碰我的肩膀就走開了。

過了幾天，與我同坐手推車的六人中，兩個死了。先前我聽到其中一個人沙聲向阿迪醫生懇求，“醫生，我發誓我好多了。燒退了。今天我只咳了一次血。別讓他們把我送去四號房。”

我問那位送粥的人，四號房是甚麼。他小心翼翼地放下盤子，回答道：“當他們知道你没有希望時，就送你去那里。”

我試着吃粥，但吃不下去。有人用勺子喂我。但食物不能下咽。阿迪醫生說：“我很抱歉，但他們堅持這麼做。你得去四號房。”在那里，我又與手推車的同伴們會合了。

4

我大概看來已經死了。囚犯們經過我的床腳時，都會在自己的胸前畫十字。我經常是昏迷的。如果我呻吟，其他人就會把我翻過來，或給我水喝。阿迪醫生很無奈。

“如果我們能獲得一些現代藥物就好了，”他說。據稱這是美國新藥，稱為鏈霉素，對結核病有奇效。但當阿迪醫生向上級要求時，黨方說這純是“帝國主義的宣傳”。

在接下來的兩周，和我一起進來的四個人都相繼死去。有時我在譫妄中，不確定自己是死是活。晚上我睡得很短，常被劇烈的痛苦驚醒。我身上的十幾個瘡口流膿；我的胸部也因此而腫脹。我每天都吐血，這種疾病也影響了我的脊椎。為了減輕疼痛，獄友平均每晚將我翻身四十次。靈魂與身體聯系的紐帶，已經是最微弱了，我已經到了物質世界的邊緣。我問我的守護天使說：“你是甚麼守護呀？如果你不能保守我免除痛苦，至少也要保守我脫離不合聖徒的褻瀆思想吧？”在千分之一秒的閃爍中，我看到了他：他似乎有許多手臂，像印度神明克里希納（Krisnan）一樣，我同時聽到他的聲音：“我不能為你做我該做的一切。我也是一個中途返回的迷失者。”

早上，我想起東正教神秘主義者談到“黑暗天使”，他們得以歸回服侍神。但我發現，無論一個人的回歸是多麼深刻，都不能完全塗抹過去。那時我不曉得聖經，或是基督教的信條。那時我的大腦不能操作，於是不能判斷這異象的價值。但這異象卻給當時艱苦中的我，一些解釋，於是就給我極大的幫助。

我渡過了第一次危機。阿迪醫生的憐憫開始變成驚訝。我沒有藥物，但清早的一個小時，高燒

稍微減低，我的頭腦也開始清醒一些。我可以開始打量周圍的環境和同伴。

5

這間房子有十二張床，都排的緊密，房間里有幾張小床頭櫃。它位於一樓。大窗戶打開，我們可以看到囚犯在菜地里干活。再外邊就是在高牆和鐵絲網。

這是一個安靜的地方，沒有警鐘，也沒有大聲喊叫的獄卒——事實上，這裏幾乎沒有警衛。由於擔心感染；獄卒們都回避病人。於是奧克納監獄是遠程管理的。因這緣故，它就成為羅馬尼亞較自由的監獄之一。囚犯們沒有獲得任何供應。他們穿着被捕時的衣服。多年後，各人就必需利用任何到手的破布，補了再補。

普通罪犯把食物送到政治犯地區的門口，然後政客們把食物運到各個牢房。那些能走路的人自己去桶里取口糧；其他不能走的，就由他人送到床頭。每頓飯都有水煮的卷心菜、幾粒豆或一碗玉米或大麥熬成的稀粥。

身體狀況還好的囚犯在大樓周圍耕種。其余的人則躺在木板床上，闲聊着打發時間。但在四號房——這裏被稱為“死房”，因為還沒有人活着離開它——氣氛則完全不同。

當我在這四号房的期間，几乎每一位同囚的室友後來都死了，他們的床位由新人取代。但令人驚訝的是，這些過世的人中，沒有一個到死還是無神論。不論是法西斯分子、共產黨、聖人、殺人犯、小偷、牧師、富有的地主和最貧窮的農民，在臨終前都開始尋求與神和好。

雖然早些時候，這些人還經常彼此激烈爭吵，彼此踐踏，然而却沒有一人，在還沒有與神并與人和好之前就死去。

住在這死房時間最久的院長告訴我說，他屢次看到有人進來時，極為頑固不信；但在死亡臨近時，他們的不信就崩潰了。

常言道：“一只貓過橋，並不意味橋身堅固。必須有火車通過，才能證實。”

因此，一個人坐在安樂椅上，與妻子共享點心時，自稱為無神論，並不證明無神論可靠。真信念必須能承受巨大的壓力，無神論從來就不能。

6

老萊昂特常向我們背誦莎士比亞的片段，或告訴我們有關他的自傳，給我們歡樂。他第一次因政治煽動而被捕是在1907年。後來共產黨的秘密警察在1948年來逮捕他時，他對他們說，“我

在你們未出世之前，已經為社會主義下牢了。”
秘警們建議他加入共產黨，好共享勝利的果實。

“我告訴這些年輕人說，‘社會主義是一個擁有兩只手臂的活體——左手是和平進行的社會民主主義，右手是武裝革命的共產主義。切斷其中一，社會主義就成了獨臂俠。’他們就笑了。”

萊昂特被判二十年監禁。“一名獄卒告訴我說：‘你會死在獄中。’我回答說：‘我可沒有被判死刑！你們千萬不要殺我！’”

他告訴我們說，他最初是一名鞋匠。自學成才，嚮往生命中的美善。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宗教的定義，以為教會總是站在壓迫一邊，神職人員受了富人給的小利，就許諾窮人在天堂得到回報，叫他們甘心在地上服侍富人。但沒有人知道自己的內心深處。萊昂特否認上帝的存在，其實只是反對他對這神一詞的原始概念。他並不反對愛、正義和永恆。

我就把這個告訴他。

他回答說，“我相信並愛耶穌基督，他是人類中最偉大的，但我不能將他視為上帝。”

這次談話後不久，他的健康就崩潰了。兩周後，在一系列的出血之後，結局到來了。他的最後一句話是“我愛耶穌”。那一周有多人死亡，萊昂特赤身被扔進了其他囚犯挖的公共坟墓里。

當這個消息傳到四号房時，托貝將軍從角落里回應道：“這就是西方的社會主義者，與共產黨結盟的後果。”

伊斯庫教長在胸前畫了十字，說，“至少我們可以感謝神。萊昂特終於歸回神。”

布庫爾軍士長不同意。“不。萊昂特說他不認為基督是神。”

我說：“萊昂特現在已經到了另一個世界。他肯定在那裏看見了真理，因為他愛耶穌。耶穌不會拒絕任何愛祂的人。一個強盜在骷髏山（各各他）向耶穌說了一句好話，耶穌就許諾他天堂。我相信耶穌肯定接納萊昂特的愛，雖然在地上他無法辨別真偽。”

布庫爾不愛任何人，他只崇拜自己特殊的國家理念。他喜歡在他的村庄擔任總督，在那里伸張他獨特的正義。他對眾人說，作為警長，他會如何毆打小偷和乞丐。他也毆打自己的手下——如果他們敢頂嘴。還有，他尤其喜歡毆打猶太人。

“他們身上不會留下任何傷痕，”他自豪地說。“你只要先把鬆散的沙包放在他們的背上。然後才打。這同樣很痛苦，但他們卻不能控訴你，因為沒有傷痕！”

布庫爾無法理解為甚麼他在新政權下被廢黜。他已經準備好打壓反共人士，就如毆打任何人一般。

盡管布庫爾病重，但他拒絕承認這個。一天晚上，阿迪醫生給他做檢查時，他突然喊道：“你為甚麼把我留在這房間？我沒甚麼大問題。我和這房子裏的其他病人不同！”

阿迪醫生亞看了看溫度計，搖頭說，“不是這樣的。你的病況是這裏最糟糕的。你該停止爭論，想想你的靈魂。”

布庫爾勃然大怒。在醫生走開時，他喊道：“你以為你是誰？”然後又說：“我懷疑阿迪有猶太血統。”這就是他字庫裏最惡毒的形容詞。

布庫爾又喜歡與他的臨床夥伴莫伊吵架。莫伊是一個小個子的猶太中年人。

“鐵衛隊曉得如何對付你。”布庫爾說。

可是莫伊卻溫和的回答道，“你知道嗎？我正是因為被當作是鐵衛隊，所以才下牢的！”眾人都大笑。

“真的！”莫伊辯護說。“當鐵衛隊失勢後，凡是擁有鐵衛隊綠色制服的，就是可怕的罪行。我想我們猶太人在鐵衛隊手下吃盡苦頭，如今應該撈回一筆了。我只要用賤價就能從商店買下剩餘的綠色制服，染成藍色，就可以出售了。當我的屋子充滿了綠色制服之後，警察就來檢查。他們不聽解釋。於是我就成為納粹分子，銀鐐入獄。”

他們是一對奇怪的搭檔：身材魁梧、好欺負的布庫爾和安靜、具有敏銳諷刺感的小莫伊。兩人中，布庫爾常處下風。儘管他自詡為一名好戰的基督徒，但他的一生都是與上帝的爭吵。他去過教堂，但那里沒有人引導過他。他從未見過真正的神父。他村里的神職人員並不是甚麼宗教師，而是禮儀大師。現在他不明白自己為甚麼受苦，又瀕臨死亡，也不曉得信仰是甚麼。

當他越來越虛弱時，我一次又一次地告訴他，“你感到自己沒有希望了。但信心可以用兩個詞表達，‘雖然’和‘但是’。約伯說，‘雖然主殺了我，但我仍要信靠他。’聖經多次出現這樣的形容。為的是給我們在最黑暗的時刻，也可以有盼望。”

布庫爾很高興我對他感興趣。但他仍然沒有對自己過去的殘忍表現出悔意，直到有一天他意識到阿迪醫生是對的。“我快要死了，”他驚恐的說，“我是為了祖國而死。”

他靜靜地躺着。昏迷幾小時後，醒來時他就說：“我想在你們面前懺悔。我罪孽深重，我不能在死的時候想起它們。”他的聲音令眾人異常沉靜。他告訴我們，他如何殺了數十名猶太人——不是按照命令行事，而是因為他知道自己不會受懲罰。他曾謀殺了幾名婦女；有一次，他射殺了一名十二歲的男孩。他像老虎一樣嗜血。

在說完這些後，他喃喃地說，“如今魏恩波先生必然恨我了。

我回答說：“不。你如今自己恨惡這個殺人魔。你正在辱罵它，拒絕它。你不再是那個殺人犯了。人是可以重生的。”

第二天早上，他依然微弱的抓住生命。“昨天我還沒有說明一切，”他說，“我缺乏勇氣。”

他說他曾經向母親抱著的孩子開槍，當他的彈藥用完後，他就用棍棒打死她們。他的暴行似乎沒有盡頭，但當最後完結後，他就昏睡了。他的呼吸變得沙啞而不規律，胸口急速起伏，好像無法呼吸到足夠的空氣。我們都沉默了。他雙手在脏兮兮的毯子上握緊又鬆開，然後緊緊抱住脖子上的小十字架。他的喉嚨里發出痛苦的嘎嘎聲，呼吸就停止了。

莫伊用袖子擦了擦眼睛，然後向走廊里的一名囚犯喊道。很快，兩個人來抬走布庫爾的屍體：清晨的陽光從敞開的窗戶傾瀉進來，落在他的臉上。但現在，那雙血丝的眼睛閉上了，嘴角的殘酷線條也放鬆了。他死後的面容顯示出一種他生前從未體驗過的平靜。

7

四 号房充滿了仁慈和人性。其他囚室的犯人經常來和我們一起過夜，幫助臨終的人。

復活節那天，一位朋友來探望前鐵衛隊成員加芬庫（Valeriu Gafencu）。他帶來了一份用紙包着的禮物。“這是走私貨，”他說，“打開來看。”

加芬庫打開紙，露出兩塊閃閃發光的白色結晶——冰糖。我們已經很多年沒有見過糖了。我們消瘦的身體渴望它。所有的目光都注視加芬庫和他手中的獎品。可是加芬庫却慢慢地把糖又包起來。

“我現在還不需要吃它，”他說。“今天可能會有比我更困難的人。但謝謝你。”他小心翼翼地將禮物放在床邊。

幾天後，我的發燒越來越高，身體也越是虛弱。冰糖就從一張床上傳到另一張床上，直到落在我身旁。

加芬庫說：“這是給你的禮物。”我感謝了他，但沒有動它，以防第二天有人更需要它。當我的危機過去後，我把它給了索特里，他是兩名希臘共黨的老大，他的病情嚴重。

於是兩年來，四號房里的糖從一人傳到另一人，有兩次又回到了我的床頭。每次，患者都有力量抵抗，無需吃糖。

索特里和他的朋友格拉夫喜歡吹噓他們在希臘內戰初期的戰果。他們曾經襲擊了阿多斯山的修道院，搶劫了他們能攜帶的一切，砸碎了他們留下的東西。阿多斯山禁止女性參觀，兩千名僧侶中的許多人已經很多年沒有見過女性了。“我們

帶着一羣女游擊隊員同行，”索特里說。“你該看看那些老男孩們如何蜂擁而來。”

特里斯還可以說笑。當他還有盼望可以活著出去時，他可以吹捧自己的無神論。但當死亡臨近時，他就開始求神。只有一位神父的呢喃，許諾天堂的應許，才能讓他安靜。然後他也找到了放棄這兩塊糖的巨大道德力量。

他的屍體由一名經常進來幫助我們的囚犯處理，準備埋葬。本房的人都稱他為教授，他名叫波普(Popp)。他那稍駝的背、學者般的形象很少沒有伴隨著一位正在向他學習歷史，法語等科目的學子。

我問他沒有書寫的材料，怎能授課。他說：“我們用一塊肥皂擦桌面，然後用尖物劃字。”當我欽佩他的堅持時，波普天真的藍眼睛閃閃發光。他說，“我曾經以為，教書是我的生計。在監獄里，我才了解到，我教書是因為我愛我的學生。”

“那麼你正如神父所說，有一種使命吧？”

“正是，”他回答道，“在這里我們看到了我們的價值。”

當我問他是否是基督徒時，他看起來很不安。“牧師，我經歷了太多的失望。例如，在我上一所監獄，奧克勒，裏面的教堂變成了儲藏室。黨方要求人拆掉尖塔上的十字架。沒有人愿意幹……最後是一位神父自願去上去拆。”

我承認說，不是每個聖職人員都有一顆祭司的心，也不是所有自稱基督徒的人都是真基督徒。“一個去理髮店剃須的人，或是一位向裁縫訂做衣服的人，都不是門徒，只是顧客。所以，一個來到救主面前，只為得救的人，是救主的顧客，不是門徒。門徒是一個對基督說：“我渴望做你的工。從一地到另一地，消除恐懼；帶來喜樂、真理、安慰和永恒的生命”。

波普笑了。“但是那些在最後一刻才成為門徒的呢？我必須說，看到這麼多堅定的無神論者最終變成信徒，令我驚訝。”

我說，我們的思維並不總是在同一個車擋運作。“天才有時也會講笑，或者與妻子爭吵，但我們不會照著他那時的笑話，評判他為一個傻瓜。我們也該在我們的思想的緊急關頭如何表現，評估它的能耐。當在一個人面臨死亡，他裏面的人正在掙扎求生時，他的選擇才算數。那時他的無神論總是倒臺。”

“你想為甚麼像布庫爾中士這樣的人，會公開承認自己的罪？”他問。

我說：“我曾經住在鐵路附近，白天我並不察覺火車的經過，因為城里很吵。但到了晚上，我就清楚地聽到火車在遠處傳來的汽笛聲。生活的喧囂可以叫我們聽不到良心的聲音。但在監獄的寂靜中，人們就開始聽到未曾聽過的內心聲音。”

伊斯库院长一直在静静地聽。如今他插話道：“在我上一所艾乌德（Aiud）監獄，有一個殺人犯被單獨監禁。他在夜里不斷醒來，大聲喊道：“隔壁的是誰？為甚麼他不停止敲牆呢？”

“有甚麼好奇怪？”波普問道。

“為甚麼，隔壁牢房是空的呀。”

莫伊說，“在我上一個監獄有一位曾經謀殺一位拉比的鐵衛隊。他肯定那拉比一直坐在他的肩膀上，不斷的挖他的肉。”

8

由于我没有力氣洗澡，波普教授就接下了這個任務。我問，他所住的牢房有沒有淋浴室。

“當然有，”他說。“在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我們擁有最新的設備，只是沒有水。我們的淋浴間已經干涸多年了。”他挺直了腰，繼續說：

“你聽過一位共產黨和一名資本家在地獄相見的故事嗎？他們看到兩道門。一個寫著“資本主義地獄”，另一個則是“共產地獄。”盡管這二人是階級敵人，但此刻他們卻一起商議，哪一個比較好。那位共產黨說，‘同志，我們到共產部門去。在那里，每逢有煤，就不會有火種。有火

種就不會有煤。即使他們有煤又有火種，火爐也會整個崩裂。’ ”

聽見的人都笑了。教授繼續給我洗澡。農民阿里斯（Aistar）說：“最早的共產主義者是亞當和夏娃。”

“為甚麼？”波普問。

“因為他們沒有衣服，沒有房子，連蘋果也必須二人共享一粒——而依然以為自己正在樂園。”

笑話和故事對坐牢的我們非常重要。

人們整天躺着，只想着自己的痛苦，任何能幫助他們忘記自己憂愁的，就是一種恩慈。我經常連續講幾個小時，盡管我病了，而且餓得頭暈目眩。一個故事就像一塊面包，可以維持一個人的生命。當波普催促我保存體力時，我說我還有足夠的氣力，可以在那天早上講多一件軼事。

“《塔木德》（Talmud）告訴我們，一位拉比走在街上，聽到先知以利亞的聲音說：‘你雖禁食祈禱，但還不配天堂的高位。因為那種尊榮只留給更好的人，就如馬路對面的二人。’ ”拉比趕忙追上那二人問：‘兩位先生，你們樂施好善嗎？’

“他倆笑了。‘不，我們自己就是乞丐。’

“‘那麼你們經常祈禱嗎？’

“‘不。我們都是無知的人。我們不知道如何祈禱。’

“‘那麼請告訴我，你們做甚麼。’

“‘我們說笑。當人們悲傷時，我們就使他們發笑。’”

波普看來驚訝。“你是說，那些叫人發笑的，可能比禁食的在天堂更有尊榮？”

“這就是《塔木德》的教義，這是一本猶太智慧書。但我們也可以在《聖經》詩篇第二篇讀到，上帝也發笑。”

波普幫我穿好衣服，說道：“祂在這裡不會覺得有甚麼好笑的——但果然有神嗎？牧師，為甚麼祂不救助我們？”

我回答道，“一位牧師到一位遭喪的家。他看到那位母親正在試圖安慰她哭泣的女兒。這女兒問，‘牧師，你說神有慈愛的雙手。如今祂的手在哪裏？’牧師回答道，‘就在你的肩頭上。你媽媽的手便是。’”

“基督在多種方式中與我們同在。我們可以在基督徒醫生身上看到祂，他們受到毆打和羞辱，卻仍然繼續幫助我們。瓦卡雷的一些官方醫生因為企圖私下帶藥品進去，就受判十年監禁。

“其次是，基督也在那些努力減輕他人重担的神父和牧師身上，也在所有嘗試給他人食物、衣服和扶助的基督徒身上。第三，基督也在那些教導我們有關上帝的人中，還有在講故事的人中。祂不單是在那些服務你的人中，也在那些你可以服務的人中。

“耶穌告訴我們，在最後的審判中，上帝將把善人和惡人左右分開。祂將對右邊的說：‘來吧，進入自創世以來就為你們準備好的國度。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我是一個陌生人時，你收留了我；我赤身露體，你給我穿；我病了，你來看我；我在監獄里，你來找我。這些義人會問：‘主啊，我們甚麼時候做了這些？’基督就回答：‘當你對我弟兄中最小的一個這樣行，就是向我行了。’”

9

加芬庫的整個成年生活都在監獄度過，但就像好些剛認識基督的鐵衛隊員，他們無法做足夠的事情來彌補自己的錯誤。加芬庫每天都以身作則，將自己微薄的口糧中的一部分拿出來幫助我們當中最弱的人。他已經完全放棄反猶主義了，當他的一些老戰友到四號房探望時，他說，“我希望看到我們羅馬尼亞完全由猶太人統治。”他的戰友們都驚呆了。

“是的。”加芬庫平靜地說。“總理、議員、公務員——所有人。只要一個條件。他們必須是像古代猶太統治者，如約瑟、摩西、但以理、聖彼得、聖保羅和主耶穌基督。因為如果我們再有一些像安娜這樣的猶太人，那麼羅馬尼亞就完蛋了。”

加芬庫十九歲時就入獄了。他的青春已經過去了，他還沒有認識過一個女孩。當別人談論性時，他問：“性是甚麼樣的？”

有一天他告訴我，“我的父親被俄羅斯人從比薩（Bessarabia）驅逐出境。我們從來沒有足夠的食物。我在學校遭到毆打，然後因為逃學，參加鐵衛隊而入獄。我從未見過一個善良、誠實、有愛心的人。我對自己說：‘基督不過是一個傳說。今日世界沒有這樣的人，我也不信過去曾經有。’但我在監獄里呆了幾個月後，我不得不承認自己錯了。我遇到了病人，他們樂意獻出了自己的一點口糧（面包皮。）我曾和一位主教住在一間牢房里，他是如此善良，以致你覺得觸摸他的長袍就能獲得治愈。”

加芬庫在四號房已經一年了，在這段時間里他一直無法仰臥，因為太疼痛了。他須要人不斷地扶持着。每一天，他對身體的控制力都在進一步惡化。他常常在床上大小便，等待他人清理。有時晚上必須等幾個小時。體格較壯的外面病人必須為我們這些不能行動的人洗衣服、枕套，有時一天二十件。他們必須在院子里破冰才能到達冰凍的水。我自己的衣物在膿血中總是硬邦邦的，但當我試圖阻止一個朋友洗它們時，他卻生氣了。

那位朋友也曾是一名鐵衛，如今把幫助他人作為自己的基督徒責任。加芬庫從不抱怨。他一動不動地坐在床上，有時會稍微移動一下頭，表示

同意或感谢。當得知他性命不久時，他的朋友們都聚集在他的床邊，眼中含淚。他的遺言是“上帝的靈十分妒忌，要得著我們。”

當他走後，其他人跪下來祈禱。我說：“耶穌告訴我們，一顆種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不能結果實。人也這樣。我們的肉身必須死去，才能獲得更新。加芬庫的內心已經充滿基督的靈，如今必然結果。”

一位神父為他祈禱後，同伴們就用床单包裹他的遗体，送往太平間。在晚上，外面的犯人們把他埋葬在一個普通的坟墓里。加芬庫的傳奇就是“兩块冰糖。”

10

不斷涌入奧克納監獄的新人，給我們帶來外界的消息。有時，我們感到自己在監獄里的情况，似乎不會比外面差。“自由羅馬尼亞的快樂工人和農民”的工資空前低迷。當局已經宣布每天只須工作八小時，但你可能需要十二小時才能完成你的‘正常積業’，然後還要‘志愿’加班，或參與馬克思主義的講座。於是家庭生活就全無時間了。無論如何，每個公寓里，都住著兩家或多家人。

罷工是非法的。我們的一位新來者，一位名叫鮑里（Boris Matei）的老工會成員告訴我說：“

四十年前，我為了爭取八小時工作制，被舊政府抓入獄。如今新政府（共產）上臺，我必須在監獄里工作十四個小時。”他的罪行是給德伊同志（共產頭子）寫了一封匿名信，代表他的工友抗議他們的惡劣條件，並聲稱在任何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都有權拒絕勞動。於是秘密警察擁入他的機車倉庫，采集了一萬名員工的筆迹樣本。經過數周的調查，鮑里被指控試圖煽動罷工，被判十五年徒刑。

儘管如此，他的馬克思主義信仰依然沒有動搖。鮑里完全不同情那些與他一起被坐牢的異議人士，包括共濟會、扶輪社、神學士、通靈論者。他也無法同情那些因獨立觀點而被關押的詩人和小說家。他以為這些人該知道，最好不要追求客觀的真理。

鮑里認為，列寧在他的書中，強調在生活中必須尋找一種觀點，而且堅持這一種觀點。

“這就是黨的路線吧？”我說，“但是這種說法顛倒了所有哲學概念。如果我從床上看牢房，我只能看到窗戶。如果我從你坐的地方看，我就會看到門。如果我往下看，便只見地板，看不到天花板。每個觀點其實就是一個盲點，因為它使你不能看到其他的觀點。只有當我們放棄所有“觀點”，並接受我們對整體的直覺時，我們才能找到真理。聖保羅說‘愛相信一切’——不僅僅是這一派或那一派的信條。”

但谈到宗教，鲍里就生氣。他說，“没有上帝，没有靈魂。只有物質存在。我不信你能證明事實並非如此。”

我說他的論點肯定是來自共產主義教科書。我曾在那本教科書中看到了接吻的定義：“接吻是兩對嘴唇的結合，於是有微生物和二氧化碳的相互傳播。”他聽了笑了，但我堅持說：“這不是開玩笑的事。共產主義一次又一次地违背人類精神，試圖把人壓縮在馬克思主義的狹小紧身衣中。難怪親吻的愛與渴望、在你的哲學中没有地位。當人缺乏了精神，也會影响物質。共產主義奪去了工人們的心，使人無心工作。於是共產國的產品，品質差勁，成了國際的笑話。”

鲍里說：“我知道有這樣一句話：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不是人為安息日而設。在我們共產黨看來，所有人的存在都是為了國家利益。個人自由和私有財產的喪失，是走向完美的第一步。”

我想即使是狗，也會為自己口中銜著的骨頭，與任何人打鬥。但如果十五年的刑期不能治愈鲍里的幻想，那麼爭論就不太可能改變他。

而我還有一種不愉快的想法：會不會他也是最新的線人之一？

打小報告就像傳染病一樣，四處蔓延。你可能會因談論上帝，或大聲祈禱，而被出賣；即使學習外語或教授外語，也可能有麻煩。通常，這些告密者是一位親密的朋友——甚至在殘酷的压力下，也可能是兒子、父親、妻子、丈夫。事實上

，對監獄外的“自由”人，被人指控的危險，比我們這些已經入獄的人更可怕，也更令人恐懼（就如貧困，對富人肯定比對已經貧困的人，更具恐嚇力。）而四号房比羅馬尼亞任何監獄享有更多的言論自由。因為在這裏，人人都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

11

在1917年11月，就是“震驚世界的十天”俄國革命周年紀念日上，波普教授乘著鮑里不在牢房的時候，講了一件軼事。

“在共產主義勝利一周年的紀念日，新統治者們在莫斯科郊外的森林里舉行了一場狩獵。後來他們在火邊休息，列寧問：‘同志們，可以說說，你們以為甚麼才是人生第一樂趣？’

“‘戰爭，’托洛斯基（Trotsky）回答道。

“‘女人，’季諾維（Zinoviev）說。

“加米涅夫（Kamenev）說：‘演講——叫讓一大羣人着迷在你的魔力下。’

“斯大林一如既往地沉默寡言，但列寧堅持他也發表意見：‘告訴我們你的選擇。’

“斯大林終於說：‘你們都不知道甚麼是真快樂。真快樂就是恨一個人，同時多年來假裝他是

你的最好朋友。直到一天他信任地把頭靠在你的胸前，那時你就用利刃插入他的後背。世上沒有比這更大的快樂了。”

房裏許久無人說話。雖然那時我們也聽聞一些有關斯大林的冷酷，但只在他死後，他的同事們才透露他如何杀害自己的同事們，包括列寧。

第三章

好一段時間，人們一直在焦急地談論蘇瓦(Suceava)監獄和皮特(Piteshi)監獄實行的新制度，就是“囚犯教育囚犯”。這種制度不用書本，只用拳頭。導師們通常是前鐵衛成員。黨方把他們組成《篤信共產的囚犯協會》，簡稱《共囚會》(PCC)。據說成立這會的，就是杜卡(Turcanu)，利未(Levitkii)並福瑪(Formagiu)。他們的行為似乎像野蠻人。

我們擔心奧克納監獄也會引入這種制度，但鮑里對此嗤之以鼻。他不信他以前的左派同伙們會允許暴行。

他說：“他們知道‘恐怖永遠無法改變人的思想’。這就是社會民主黨思想家卡爾(Karl Kautsky)在俄國革命之初所寫的。”

我說：“是的。我記得當時擔任陸軍部長的托洛斯基(Trotsky)回答說：‘卡爾先生，你不知道我們將會採取怎樣的手段。’可悲的是，托洛斯基自己的思想，不久後也被俄羅斯的恐怖主義‘有效清除’了。”

教長嘆了口氣，說，“我擔心，如果沒有上帝的奇迹，長期無情的恐怖和酷刑可能會粉碎任何人的抵抗。”

“我不信奇迹，”鮑里說，“沒有奇迹我也能過得很好，謝謝。目前還沒甚麼可以改變我的信念。”

在“再教育”領導人福瑪短暫探訪並指示啓用該系統後，監獄的氣氛變得更加糟糕。直到目前，儘管囚犯們有時也會被獄卒折磨了大半天，但獄警們遲早也要去吃飯或睡覺。現在有共囚會成員搬進來和我們同住。他們有權隨意毆打、欺凌，還手持橡皮棍。他們是當局精心挑選最暴力的囚犯。我們無處可逃：每五十名囚犯中就有十到二十名共囚會成員，而且他們的人數還在增長。那些願意變成共產黨的，必須也“勸服”他人入黨，表明自己的誠意。

殘酷的暴力不時夾雜着更加精緻的殘忍行爲，並在醫療監督下確保囚犯不會死亡。醫生本身往往也是共囚會成員。我認識一位圖爾庫（Turcu）的醫生，在“檢查”一名獄友後，他會叫停，給該囚犯注射以增加他的抵抗力，然後繼續折磨。

一股瘋狂的浪潮席卷了監獄。結核病患者被脫光衣服，躺在石頭地板上，並用許多桶冰水淋濕。他們又把豬泔水倒在饑餓多日的囚犯面前。囚犯們雙手被綁在背後，扒在地上舔食。無論多麼卑鄙的羞辱，都無法幸免。在許多監獄里，人們被迫吞吃糞便和喝尿液。罪犯還被迫在公開進行性變態。我沒想到會有如此下流的嘲弄。

那些堅持信仰的人最是受苦。基督徒被綁在十字架上四天。每天他們都把十字架傾倒，放在地上，眾囚犯必需在被釘者的臉上和身上排便。然後受刑者連同十架又重新豎立。一位被帶進四號

房的天主教神父告訴我們，在皮特監獄，星期天，他就被推入廁所的糞坑，用大便給人頒發聖體。

“你服從了嗎？”我問。

他把臉埋在雙手里哭泣。“我受苦比基督還多，”他說。

這些事情是在布城命令下，在監獄管理部門的鼓勵下完成的。當局安排杜卡、福瑪等專家從一個監獄到另一個監獄，招募囚犯加入共囚會，確保這種運動不會失溫。黨的領導人，甚至來自中央委員會的官員，如康斯（Constantine Doncea）和內政部副部長馬林（Marin Jianu），也來參觀這種行動。曾經與馬林共事過的鮑里冲破警衛進行抗議，但如果馬林認出了他的前同事，這時他也不承認。他只說：“當一只豬毆打另一只豬時，我們不會干預。”實際上，黨方已經與共囚會劃清界限，但允許他們繼續酷刑。馬林說：“把他帶走。”鮑里就被毆打，直到他求饒。

這位昔日的工會鬥士徹底崩潰了。獄方安排囚犯，日夜不斷的羞辱和折磨他，直到他的精神幾乎失常。他爬過去親吻那些折磨他之人的手。

他說：“謝謝你們，同志們。你們給我看到了亮光。”然後他開始狂熱地讚嘆共產主義的美好和快樂，以及他過去的錯誤。在經歷了這樣的崩潰之後，他的自尊就要求他徹底轉變；不然他在自己眼中就會顯得可笑了。鮑里加入共囚會，而第一個挨他警棍的就是阿迪醫生。

這種從俄羅斯引進的再教育制度帶來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效果。受害者們透露了他們在數月的嚴酷審訊中保守的秘密。他們開始控訴自己的朋友、妻子、父母。於是又有數以千計的人被捕。

2

在這期間，有六名來自鉛礦的病人被帶到奧克納監獄。以後又有囚犯加入了他們的行列，當那些犯人曉得鉛礦的犯人有些是神父時，就向這些神父懺悔，從而贏得神父們的信任。鉛礦的犯人坦然談及他們秘密的宗教和政治活動。當他們被轉移到一個更大的牢房接受再教育時，才曉得他們一直在與奸細交談。

其中一人被抬進四號房，滿身是傷痕和血跡。他告訴我們說，負責的再教育的是一個身材魁梧的年輕人，總是微笑，常常會問：“疼嗎？很抱歉。讓我們嘗試一些新的東西吧。你喜歡這個道具嗎？”

這受害人說：“如果我抓到那個人，我會活活剝他的皮。”

“沒錯，”老農巴達說，“再加上鹽和胡椒！”巴達每天祈禱是：“奉聖父、聖子和聖靈的名，神必消滅共產黨，讓他們受苦，折磨他們，可惡的豬！”

“為甚麼這樣說？”我問他，“這不是基督徒的做法呀？”

他揮動拳頭向天呼求。“我這麼說是因為，神不許任何不詛咒這些混蛋的人進入天堂！”

許多人也像巴達。他們一心堅持活下去，目的只有一個：希望有机会能折磨他們的施虐者。他們相信有地獄，好煎熬共產黨。

“我們決不能屈服于仇恨，”我說，“像鮑里這樣的人，是因為遭受可怕的压力才崩潰的。”

但鮑里現在成了四号房的一個傷痛。由于他曾經攻擊阿迪醫生，獄中人人都恨透了他。由於監獄飲食惡劣，阿迪醫生的背部和肩膀上長滿了疼痛的疔子，那一阵子鮑里就專門擊打醫生的背部。囚犯們會為阿迪獻出生命，因為阿迪正在為他們獻出生命。在阿迪被打後，他也必須躺在四号房。這時有人來說有一個重病的犯人請求見醫生。

教長說：“醫生病得太重了，不能動。”

阿迪問：“是誰？”

那人回答道：“鮑里。”

阿迪痛就苦地從床上爬起來，跟那人走出房間。沒有人敢說甚麼。

3

以色列教長有時會談到他在運河奴役營的經歷，那里有數千人死于虐待和饑餓。這條運河主要是俄羅斯怂恿下開始修建的——因為這能更有效地消耗羅馬尼亞的財力。同時，這偉大工程也有助於提高共產黨的威望。當時的黨方那麼熱衷於這個計劃，以至當一羣工程師警告說，河水不足於同時提供灌溉，又提供運河的航行水位時，他們就被視為“經濟破壞者，”被拉去槍斃。羅馬尼亞為該計劃投入了大量資源，1949年至1953年間，超過20萬名政治犯和刑事犯參與了該工程。

院長被送到阿爾巴奴役營。這裏有一萬二千名囚犯住在鐵絲刺網後面的簡陋營房，每人每天必須徒手搬動八立方米的泥土。在看守的毆打下，他們推着獨輪車爬上陡坡。冬季氣溫是攝氏零下二十五度，送往營地的水，都在桶中結冰了。疾病盛行。許多囚犯為了提早結束自己的性命，故意闖入集中營周圍的禁區，希望被槍殺。

最殘暴的罪犯就充當各營隊的頭目。每隊大約有一百名囚犯。當局按照各隊的工作積效，給各頭目個人的報酬，包括食物或香煙。基督徒歸入“牧師隊”，在那里，任何人畫出十字形的標志（這是東正教教徒的習慣），就遭毆打。奴役營沒有休息日，沒有聖誕節，沒有復活節。

然而，以色列教長說，在阿爾巴營他看見可貴的事。一位年輕的天主教神父克里斯惹上一位黨

奸細的不滿。那奸細是一名前東正教神父。這細作問克里斯：“你為甚麼經常閉上眼睛？是在祈禱嗎？我挑戰你說實話：你還信上帝嗎？”

回答“是”意味着鞭打。

克里斯神父想了想，就回答道：“安德烈，我知道你正在試探我，就如過去的法利賽人試探耶穌一樣。但耶穌回答真情，我也告訴你真相。是的，我相信上帝。”

“那麼，你也相信教皇嗎？”安德烈又問。

克里斯回答說：“我也相信教皇。”安德烈趕緊去找政治官員，政治官員走過來，馬上吩咐克里斯站出來。克里斯很瘦弱，疲憊不堪，衣衫襤褸，瑟瑟發抖。那位軍官卻是吃得飽足，穿着大衣，戴着俄羅斯毛皮帽。

“我聽說你相信上帝？”他說。

克里斯神父就開口回答。在那一刻，人們就明白為甚麼登山寶訓寫道，耶穌就“開口教訓他們”——這是一件奇事，因為沒有人閉嘴說話。現在克里斯開口，人都知道，這是決定的時刻。基督徒們都留心聽。

克里斯說：“當我被任命為神父時，我知道史上有數以千計的牧者為他們的信仰舍命。每當我走向祭壇時，我便向神承諾，‘現在我穿着美麗的長袍侍奉你，但即使他們把我關進監獄，我仍然會侍奉你。所以，中尉，監獄並不是反對宗教的理由。我相信上帝。’”

接下來的寂靜只有風聲打破。那位政治官似乎說不出話來。最後他說：“你相信教皇嗎？”

答案是，“自從聖彼得以來，就一直有一位教皇。直到耶穌再來，還是有一位教皇。如今的教皇不與共產主義妥協，他的承繼者也不會。是的，我相信教皇。”

院長結束他的故事說：“我感到難以原諒我的東正教兄弟，就是那告密者。我雖然不是羅馬的追隨者，但那一刻我幾乎要喊叫，教皇萬歲！（Viua il Papa!）”

“克里斯神父怎麼了？”有人問道。

“他被關在釘箱里一個星期，然後挨打。當他仍然拒絕否認信仰時，他就被帶走了。我們再也沒有見過他了。”

4

在再教育制度下，每天都有新的受害者。人們感到，除非有甚麼行動，否則我們要麼就是被殺，要麼就是向共產黨投降（成為共產黨）。有傳言說共黨囚犯正在酝酿某種抗議。這種囚犯是我們中間最大膽的：獄警們不那麼粗暴對待他們，因為這些今天入獄的，昨天還在掌權，明天又可能會復位。

基督徒們彼此爭論該如何做：如果發生騷亂，我們應該加入嗎？或者是“讓他們打我們的另一邊臉”？幾名囚犯爭辯說，我們不該參與任何爭鬥。

我說：“人們常把耶穌描绘成‘溫順’的，但其實耶穌也是一名戰士。祂用鞭子將商人趕出聖殿，並為祂的第一批追隨者提供了《舊約》的指南，包括其中的火熱行動。”

於是我們決定與叛變的囚犯合作。由於我們中間有很多告密者，還有反猶人士和猶太人之間的猜疑、農民和地主的不和、東正教和天主教徒之間的矛盾，於是沒有事情能以保持秘密。

但大家一致認為，一有機會就會同時採取一些行動。在奧克納小鎮，唯一的消遣是每周在距離監獄僅一箭之遙的體育場舉行的足球賽。在五月一日，我們得知下午五時將在體育場舉行一場勞動節比賽，全鎮的人都會到場。這正是我們示威的機會。信號就是打破一只玻璃窗的聲音。

比賽開始後不久，某處就傳來微弱的玻璃破碎聲，整個監獄頓時陷入混亂。四面八方的窗口都被擊破了。盤子和杯子被扔到下面的庭院上。有人砸椅子。在一片喧鬧聲中，有人開始呼喊：“救救我們！救命！”從高窗俯瞰體育場，人們喊道，“我們在這裡遭受折磨！你的父親、兄弟、兒子都被謀殺了！”

比賽中止了。人羣站了起來，很快就有數百人聚集在牆下的路上。里面，一名囚犯割傷了手腕

，看守正試圖用棍棒重建秩序。街上的人羣很快就被揮舞着槍托的部隊驅散了。剩下的任務就是恢復監獄秩序並清點傷亡人數。其中包括鮑里，他在試圖從看守腳下救出另一名囚犯時被撞倒並受重傷。阿迪醫生必需再次照顧他。我們發送了問候的消息，但沒有回復。後來才知道當局已經把他送去另一所監獄了。

起義的消息迅速傳遍全國。當局沒有馬上進行報復，只是加強監獄的監管。凡被懷疑是主謀的，都被轉移到其他監獄。由於其他監獄缺乏醫療設備，許多被轉移的人不久都死了。

5

在擁擠的四號房，以色列教長每天咳嗽的時間更長了。他的身體因多年的饑餓和在運河中的暴露，生出可怕的膿瘡。我們躺着看他死去。有時他認不出前來幫助他的朋友。當他清醒時，他會花幾個小時低聲祈禱，並且總是給人安慰的話。

運河上的其他幸存者也被送到奧克納監獄。他們講述的恐怖故事，讓我想起以色列在埃及的奴役，這裏的囚犯還必須讚揚壓迫者。黨方迫使獄中一位著名的作曲家寫歌，稱頌斯大林。於是各營隊就一路歌頌壓迫者，排操前往運河去。

有一次，當一名囚犯倒地，醫生宣布他死亡時，阿爾巴指揮官阿本上校（Colonel Albon）喊道：“懶蟲！”他踢了屍體一脚。“叫他工作去！”

我的床位于院長和年輕的瓦西之間，瓦西是運河的另一種受害者。他是一名普通法罪犯，受命帶領“牧師隊”。他不斷地命令神父們不停工作，直到他們累倒。由于某種原因，阿本上校不喜歡瓦西，就殘酷待他，幾乎把他害死了。他的肺結核已到晚期。瓦西並不是一個天生邪惡的年輕人。他有一張粗糙的方臉，深色的卷發低垂到額頭，使他看起來有點像一頭小公牛。相貌堅強而無知，他太喜歡尋找他認為是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以至無法安定下來，從事一份穩定的工作。他的生活艱難。

他告訴我們，“一旦你們進入這些營地，你們就會不惜一切代價要離開。營長承諾，如果我照他的吩咐，就會得自由。”他想要好衣服，想要一個可以帶去跳舞的女孩。黨方讓他選擇加入受酷刑者或施酷刑者的行列。

“他們把我們這一羣人帶到一個特殊的營地，就是訓練秘密警察的地方，”他說。“他們命令我們射殺貓狗，然後用鋼刺殺死幸存的。我說，‘這種事我干不了。’教練就說，‘那麼我們就必需這樣對付你。’”

瓦西現在為自己感到難過。他一再告訴我，他在運河所做的種種可怕事。他沒有放過修道院長

以色古。他顯然快要死了，我試圖給他一點安慰；但他無法休息。一天晚上，他因呼吸困難而醒來。“牧師，我要走了，”他說。“請為我祈禱！”他又昏睡過去，又醒過來，喊着：“我相信上帝！”然後開始哭泣。

黎明時分，以色古教長叫了兩位囚犯來，吩咐他們說：“把我抬出去。”

他們說：“你病得太重了，不能移動。”整個房間都騷動起來。“甚麼事？”有聲音說，“讓我們來幫忙！”

“你不能這樣，”以色古說。“扶我出去。”

他們把他抱起來。“帶我到瓦西的床邊，”他說。

院長坐在折磨他的年輕人旁邊，輕輕地將一只手放在他的手臂上。“不要怕，”他安慰道。“你還年輕，你幾乎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他用布擦去男孩額頭上的汗水。“我全心全意地寬恕你，其他基督徒也會寬恕。如果我們寬恕，基督比我們好，祂更會寬恕。天堂里也有你的地方。”他聆聽了瓦西的忏悔，也給了他聖餐。然後才讓同伴們把他抬回自己的床上。

當晚，以色古教長和瓦西雙雙去世。我相信他們正在攜手走向天堂。

第

第二天，阿迪醫生告訴我，我應該是患有氣胸，必須進行一個簡單的手術，只需將一根空心針插入胸部，讓空氣進入就行了。這不怎樣痛，然後我就睡着了。當我醒來時，我很高興地發現波普教授坐在我的床邊。他已經在吉拉瓦監獄關押了幾個月，在再教育制度下也受了很多苦。我們聊了幾個小時。

教授告訴我，吉拉瓦發生過很多自殺事件。其他監獄也是如此。在盖拉（Gherla）監獄和皮特甚（Piteshi）監獄，不斷有囚犯跳樓自殺，直到當局必須用鐵絲覆蓋天井，才能阻止他們。另有人用玻璃割腕，或上吊，或喝清潔液。一位可憐的東正教老神父曾多次從最上層的床鋪摔到地板上，好幾次死不了，直到最後頭骨破裂，才能去世。

“他曾受過酷刑，”教授說。“他擔心如果再教育者再次對他下手，他可能會崩潰並背叛自己的信仰。他是一個非常正直的人。曾有一位囚犯向他認罪，說自己曾經為共產黨效勞。這老神父就禁止他領受聖餐，為期十五年！”

其中一些自殺者是名人，比如戰前羅馬尼亞政界的一位偉大人物布拉蒂（George Bratianu），他悄悄地餓死了，在缺少彼此關懷的囚犯們中，沒有引起注意。另一位是自由黨領導人羅斯庫。他在錫盖特（Sighet）監獄自殺：他曾經說，我國的共產黨不像俄羅斯共產黨那樣可恥。但在共黨

利用他為傀儡宗教部長一陣子後，就把他監禁，指控他是一個反革命分子。

“再教育”運動在許多監獄引起了騷亂，而奧克納的叛亂氣氛仍在醞釀之中，這時又發生了兩起不同的事件，改變了局勢。

在一次監獄視察中，人人憎惡的一位秘警上校塞皮努（Sepeanu）在巡視時發現菜地周圍有一道新柵欄。“你為甚麼要建造這個？”他問司令官。“把木頭這樣使用，實在是浪費了。這些木頭用來棒打反革命份子才好！”他說了就大笑。

這故事很快在監獄里流傳開來，人人激憤。一位前少校喊道：“必須做點甚麼！”於是就決定他自己就是最適合的人選。塞皮努走後，少校就對獄卒說，他有重要消息，必需直接告訴首都大官。

當局就派遣特別官員前來。少校告訴他說：“正如你所知，我因為處決俄羅斯囚犯，所以服刑二十年。但是，作為一位旅長，我無需親自動手。你知道行刑的人是誰？這人當時是一名中尉，名叫塞皮努。如今他成了共產黨秘警的上校。”

塞皮努上校因此被捕，判處二十年徒刑。在審判期間，他透露了再教育運動在監獄造成的後果。

第二起事件涉及另一名秘密警察韋斯上校。他曾是安娜和其他政府高官的朋友。後來他失寵並被送進監獄。在皮特甚監獄，他落在共囚會殘酷的領導人杜卡（Turcanu）的手中。一名幫助杜卡折

磨韦斯的人後來告訴我說，“當杜卡折磨韋斯時，韋斯在一小時內暈倒了三次。我們用冷水澆醒他。他終於說：“好吧，別再折磨我了。我會把隱瞞的一切都說出來，看看你的老板受不受得了。”杜卡相信自己終於獲得絕大的機密，肯定能叫自己獲得釋放。他對韋斯說：“如果你撒謊，我就殺了你。”韋斯說，“我有些事要披露，但不是對你。這事非同小可，涉及高层的叛徒。”

韋斯就被送往布城醫院數周，那時他已經很虛弱，幾乎性命不保。他在那里見到黨的中委成員，就是安娜，盧卡，與喬治集團的政敵。韋斯告訴他們說，這三位全能的部長請他為他們制造假護照，以備匆忙之間，可以逃離羅馬尼亞。他們也已經轉移了大量資金到瑞士銀行。這一信息立即傳給該黨秘書長德伊，他正在密謀對付包克集團。

韋斯上校對再教育有很多話要說，並展示了他自己身上可怕的傷疤。高官們都吃了一驚。他們知道自己隨時可能面臨同樣的苦頭。沒有人曉得黨成員的命運會如何逆轉，今天的黨領袖，可能就是明天的籠中鳥。於是黨方開始調查。領導再教育的人都被帶到秘密警察總部受酷刑。其中包括杜卡。他被判死刑。

反對派利用再教育丑聞，對付內政部長喬治。後來這也成為1952年政治清洗的重要因素。自共產黨接管以來，統治羅馬尼亞的三巨頭政府最終

被推翻。卢卡和安娜就成了國家通貨膨脹，並集體農場失敗的替罪羊。

7

許多來四号房幫助我們的外部囚犯都是農民，他們反抗土地被沒收，所以下牢。羅馬尼亞監獄滿了這樣的人。有數千人被拉去槍斃。

他們講述了令人痛心的故事。他們的屋子財產被沒收，根據1949年的“土改”法，他們得不到任何補償。一夜之間他們就變成無家可歸的流浪漢，他們奮起反抗。落入他們手中的官倉庫員就被槍殺，毆打或用汽油活活燒死。但這一切都是徒勞的。農民缺乏組織，他們的叛亂發生在不同的時間和地區，政府可以輕鬆地逐個鎮壓他們。

一位老牧人吉卡（Ghica）告訴我說，“秘密警察向我展示了兩支生鏽的步槍，說是在我的谷倉里挖出來的。如果我加入集體農場，就可以免受審判。我同意了。但是當他們來拉走我的牲畜時，我失去了理智，試圖阻止他們。他們毆打我，逮捕我，把我關在這裡十五年。於是我甚麼都丟了：土地、羊、妻子、和孩子。”

幾乎每個農民都是按照這個方程式下獄。

另一位農夫講述他的經驗。他懇求至少可以保留羊脖子上的鈴鐺。官員們笑了，就讓他采下鈴鐺。他把鈴鐺拿回家，用繩子連接，整晚不時地

搖鈴。天一亮，他就穿過村子，跑到黨部，將書記刺死。

那一年，入獄的鄉下人減少了。德伊在保留黨的領導地位的同時，在 1952 年出任總理。他放慢集體化進程，贏得民衆的支持。盧卡、安娜和喬治都被免職。隨着他們的倒台，以及隨後的黨內清洗，德吉完全控制了大權。我們希望監獄條件會更加人道。但莫斯科還沒有發生變化。一切政策的改變都必需來自莫斯科。

冬天來了，伴隨着大雪。屋頂上挂着厚厚的冰柱，窗玻璃上掛滿了白霜。外面的寒冷讓你喘不過氣來。到了十二月，積雪已經六英尺深了。人們說這是百年來最冷的冬天。囚室沒有暖氣，但到目前為止，我們每人都有兩三條毯子，因為每次四號房有人死了，我們都會拿走他的床單。然後在獄方檢查時，各人又只剩下一條毯子。整個冬天我們都穿着衣服睡覺。我們常常沒有麵包。胡蘿卜湯是用爛得不能賣的胡蘿蔔煮的，而且更稀薄了。

在平安夜，監獄里的話題變得嚴肅了。很少人爭吵，沒有人說髒話，笑聲也少。每個人都想到自己所愛的人。我們感到一種與其餘世人相連的感覺。這感覺是平日不能感到的。外面的人們離開我們那麼遙遠。

我談到基督，但我的手脚冰冷如鐵，牙齒打戰，胃里冰冷的饑餓感似乎蔓延到全身，直到只剩下心還活着。當我無法再繼續下去時，年輕的農

民阿里斯就繼續。他從未上過學。然而，他描述耶穌誕生的場景，就好像這一切就發生在他的谷倉里。聽眾們都眼中含淚。

監獄里的某個角落，有人開始唱歌。起初他的聲音很平靜，幾乎無法穿透我對妻子和兒子的思念。但漸漸地，它在清新的空氣中奇妙地廣傳，直到它响彻走廊，每個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

當他唱完了，我們都很安靜。守衛們縮在自己宿舍的火爐邊，整晚都沒有出來。我們開始講故事。有人要求我也說一個。我想起方才的歌聲，就告訴他們一個古老的猶太傳說：

以色列王掃羅把牧童大衛帶回王宮（大衛剛戰勝歌利亞。）大衛愛音樂，他很高興看到宮殿里挺立着一架非常美麗的豎琴。掃羅說：“我花了很多錢買了這件樂器，但我被騙了。我所有的琴師都試過了，但它只會發出怪聲。”

大衛拿起它來嘗試，就奏出美妙的音樂，以至于每個人都感動了。豎琴似乎在笑、在唱歌、在哭泣。掃羅問，“怎麼我的樂師們都不能使用這把琴，唯有你能？”

這個未來的國王大衛回答說：“在我之前，每個人都試圖用這琴演奏自己的歌曲。但我讓這琴唱它自己的歌。我想起這琴曾是一棵年輕的樹，鳥兒在它的枝桠上歌唱，它的綠葉在陽光下自由搖動。後來它長大了，有

人來砍它；你聽到它在我手指下哭泣。我便向它解釋說，這不是結束。雖然作為一棵樹，它當時的確受傷以致於死，但也是新生命的開始，它最好的一部分木料被制成一只豎琴，歌唱神的榮耀；因此你又聽見它在我手指下歡呼。

“弥赛亞來時，許多人也嘗試用祂的琴唱各人自己的歌，於是總是不對調。我們必須在祂的琴上，唱祂的歌，祂的生命、愛、喜樂、苦難、死亡和復活。唯有這樣，這音樂才是真實的。”

我們在奧克納監獄的那個聖誕，就聽到了這樣一首歌。

8

阿里斯在二月去世。我們需要挖開厚厚的積雪，然後敲破冰封的地面，把他埋在監獄的院子里，與二十來位四号房過世的同伴們比鄰，就如修道院長伊斯、加芬庫、布庫爾等。他的床就給了阿弗朗（Avram Radonovici）使用。阿弗朗曾是布城的音樂評論家，熟悉巴赫、貝多芬和莫扎特樂譜。他可以一個人哼唱幾個小時，也十分動聽。但他帶來了一件更珍貴的禮物。由于結核病影

响了他的脊柱，他進來時，軀體包著石膏。我們看到他將一只手伸進石膏外壳的胸口底下，掏出一本破烂的小書。我們已經多年沒有看過任何書了。阿弗朗躺在那里静静地翻着書頁，直到他意識到有幾雙熱切的眼睛盯着他。

“你的書，”我說，“那是甚麼書？你在哪里得到它？”

“是約翰福音，”阿弗朗微笑道。“當警察來抓我時，我及時把它藏在石膏里。”

“你看着我，就像乞丐看着一個人享用美餐一樣。你想借用一下嗎？”

我把這本小書拿在手里，就如一只活鳥。對我來說，沒有甚麼救命藥比這更珍貴了。我曾經背誦過很多經文，並在神學院里教授聖經，但現在却每天都在遺忘更多的金句。雖然缺少聖經也有一種特殊的好處：當我們閱讀神過去對先知和聖徒所說的話時，就常忘了聆聽祂今日對我們說的話。

這福音書從一人傳到另一人。每個人都難以釋手。我想監獄對於知識分子更為艱難：工廠工人和農民在監獄發現另一種羣體，是他們過去未曾曉得的。但對讀書人，坐牢就像一條魚被扔在沙灘上。

許多人背誦了整本福音書，我們每天都討論它；但我們必須小心哪些囚犯可以進入我們的小圈子，因為怕奸細。阿弗朗那本破烂的福音書幫助許多人歸向基督，其中包括波普教授，過去他通

過許多基督徒，開始接近信仰。約翰福音就給他完成最後的一段路，但還有一個障礙。

“我又嘗試祈禱，”教授說，“但除了背誦我小時候學到的東正教公式，和向全能者求恩之外，我沒甚麼可說的。”

我給他講了一位牧師的故事：

一位年輕的准牧師到一位臨終的老人床邊，準備在扶手椅上坐下時，老人卻說：“請不要坐在那里。”於是准牧師拉了一張凳子過來，聽老人的忏悔，並給了他聖餐。

老人這時稍為清醒，就說：“我且告訴你那张扶手椅的故事。五十年前，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一位老牧師問我是否有禱告。我回答說：‘不。我可以向空氣祈禱嗎？如果我大聲喊叫，樓上的人也聽不到，高天上的神怎麼能聽見我的聲音？’那位老牧師溫和地回答說：‘那就不要嘗試祈禱了。早上只安靜地坐着，在你面前放一把椅子。想象坐著的是耶穌基督，就像他坐在巴勒斯坦的許多家庭一樣。你要告訴他甚麼？’我說‘老實說，我會對祂說我不信祂。’‘也是好，’牧師說，‘至少這是你的真實想法。你可以更進一步挑戰祂：如果祂存在，讓祂就證明這個。或者，如果你不喜歡上帝管理世界的方式，為甚麼不告訴祂？你不會是第一個抱怨的人。大衛王和約伯也曾告訴上帝說

，他們認為祂不公正。也許你想要一些東西？便準確地告訴祂那是甚麼。如果你收到了，請感謝祂。所有這些交流都是在祈禱的範圍內。不要背誦禱告詞！說出你內心真正的想法。’

“這垂死的人繼續說，‘我不信基督，但我相信那老牧師。為了取悅他，我就坐在那張扶手椅前，假裝基督就在那里。一連幾天，這都只是一場遊戲。然後我知道祂真的與我同在。我和一個真正的耶穌談論真實的事。我尋求指導並得到答案。祈禱變成了對話。牧師，五十年過去了，我每天都與那張椅子上的耶穌交談。

“當那老人去世時，這准牧師也在場。老人向他那無形朋友，就是坐在扶手椅上的那位，伸手道別。”

教授問：“你就是這樣祈禱的嗎？”

我說：“正是。我想象耶穌就站在我身邊，就如你在我身邊一樣。在拿撒勒和伯利恆遇見耶穌的人，並沒有向祂背誦祈禱文。他們說出自己心里的話。”

波普說：“那麼為甚麼兩千多年前在巴勒斯坦與祂交談的，許多卻沒有跟隨祂？”

我說：“因為人們最討厭的，就是有人干擾了他們的習慣。幾個世紀以來，猶太人都在祈禱彌

賽亞的到來，而猶太人的最高議會，禱告聲音尤其大。但當基督（既是彌賽亞）來時，這些人却嘲笑祂，向祂吐唾沫，把祂送往死地。因為他們最不想要的，就是有人擾亂了他們的舒適生活。如今許多人也是這樣。連多數基督徒也是。”

波普教授成了一名基督徒。他告訴我說：“當我第一次見到你時，就感到你有甚麼東西可以給我。”這種直覺在監獄里並不罕見。當外界與我們的視野隔絕時，我們就有一種新的感官。這是一種無需肉眼的透視。

我們變得非常親密。有時他會靜靜地坐在我身邊，說出我內心的想法。朋友之間、夫妻之間應該如此，但卻很少如此。

9

冰柱在三月融化了，積雪成片地貼在牆上。

光禿禿的樹上長出了花蕾，我們聽到鳥兒在唱歌。雖然我們手凍傷了、腳裹着破布、臉也凍僵，但我們感覺到生命又開始了。

有一宗令人震撼的消息，在整個監獄傳播。一名囚犯在被送往鎮上的醫院時，看到一名婦女一邊擦地板一邊哭泣。“怎麼了？”他問。那婦人回答說，“我們的父親斯大林死了，這是報紙的

頭條新聞。”我們眾囚犯都沒有流淚。每個人倒興奮地猜測着這意味着甚麼。

波普說：“如果斯大林死了，斯大林主義也就死了；獨裁者死後，他的獨裁政權就無法生存。”

“但共產主義在列寧死後仍然存在呀，”有人回答。

幾天後，我們聽到火車鳴笛和鐘聲响起。這是羅馬尼亞紀念在莫斯科舉行的斯大林葬禮。監獄里回蕩着笑聲和咒罵聲。獄卒們表情嚴肅，官長們都緊張。沒有人知道接下來會發生甚麼。

經過數周的不確定性後，法律部的一位高級官員抵達，我們曉得他是被派來調查監獄的情況。當他從一個牢房到另一個牢房詢問時，卻無人敢回答他。許多人想，這又是一種欺騙手法。當他到達四號房時，我說：“我有話要說，但除非你答應聽我說完，否則我不會開始。”

“這就是我來這裡的目的，”這位官員禮貌地說。

我說：“檢察官，你有一位出名的同行，名叫本丟·彼拉多（Pontius Pilate）。當時人們要求他審判一個他知道是無辜的人。他對自己說：‘沒關係，難道我必須為一個猶太木匠，丟了自己的事業嗎？’

“儘管兩千年過去了，這種违背公理的行為却没有被人遺忘。在世界各地的每一所教堂，你都

會聽到眾人念道：‘耶穌在本丟彼拉多手下遇難。’

四号房的眾囚犯都為我担心。

我說：“看你的良心，你就會發現我們是受害者。即使黨方以為我們有罪，該受處罰，但這裏簡直等同慢性的死刑。在你寫報告之前，看看我們的食物、缺乏暖氣，缺乏簡單藥物、污垢和疾病。問獄卒有關我們野蛮刑法。不要像彼拉多那樣洗手不理耶穌。”

檢察官阴沉地看了我一眼，一言不發地轉身離開了。他聽取我的發言的消息傳遍了監獄，鼓勵其他人發言。在他離開之前，我們得知司令辦公室里傳出了憤怒的聲音。那天晚些時候，警衛們變得非常有禮貌，幾乎帶着歉意。一周後，司令官就被解除職務。

隨着監獄生活的改善，我開始每天下床走幾步。阿迪醫生帶了官方醫生來看我。阿迪說：“我們無法弄清楚你的情況。你的肺部已經破碎，脊椎受到影響；我無法給你打石膏，也無法做任何手術。你的情況沒有好轉，但也沒有惡化，所以我們要把你從四号房搬出去。”

我在那里的朋友都很高興。因為我在那兒兩年半，卻還能活着離開這死房，這給他們看到希望。

“牧師你怎能辦到？”一個人開玩笑地問道。
“你這老殘的身體怎麼不聽從醫生的吩咐死去？”

我說：“如果你要真正的答案，我想你最終可以在醫學字典裏找到。但是在二戰期間，我得到了一個很好的教訓。我遇到了一些去過俄羅斯的我國共產黨員。我問他們，當時的蘇聯為何會放鬆對宗教的打壓。一位黨員說，“你告訴我們吧。”我回答說，我想這是由於英美的壓力，因為她們曾幫助俄羅斯戰鬥。那位官員笑了。他說，“作為一名共產黨，這就是我要給的回答。但如果我是一名基督徒，我就會說這是神垂聽祈禱。”我沉默了，因為他說的對。聖經也說一頭驢曾經斥責一位愚昧的先知。所以我現在必須告訴你們真像，我得以存活，是神聽了禱告！”

我知道很多人為我祈禱，包括我遇到的囚犯和我的教會成員。多年後我才知道世界各地都有人這樣祈禱。

第四章

四号房就像一座祭壇，人們在其中，為自己的信仰被融化，受改變。我很慶幸自己還活着，但離開它卻是一種降級。我又回到充滿爭吵、虛榮和自負的一般監獄中。在這裏，許多人都很計

較自己的地位，名份，階級，頭銜，令人可笑又可悲。這裏有諸位“閣下”互祝美好的未來；餓到半死的將軍們彼此詢問健康狀況。他們談論將會重新獲得過去的美好時光。

我給一位上等階級，東卡先生，一根繩子，好牽住他的褲子，免於掉落（繩子在監獄是珍品。）第二天當我與他說話時，他並不理睬，因為我忘了稱他為“准將。”

東卡就如許多人，會為一根香煙幹任何事。如果沒有辦法找到香煙，他就找烟頭。香烟的唯一來源是警衛，但法規指明，警衛不得給囚犯香煙。整夜這些警衛都在抽烟，把烟蒂扔到滿地都是。早晨牢房打開時，犯人的班長和告密者們最先出來，因此他們得以在院子里收集烟蒂。但有時，其他囚犯也會找到一枚，他的朋友們就圍過來，輪流吸上一口。

在一個早晨，“准將”東卡側身靠近一名懶洋洋地抽烟的年輕警衛，緊迫地問：

“守衛！你要甚麼我都給，只要你送我那根香煙。”

守衛笑了。“准將，你有甚麼可以提供？”

東卡一無所有。但他他試圖吹噓。

“我有身居高位的朋友。你給我的每一種好處都會有回報。”

“高位的朋友，嗯？那麼准將也是一名共產黨了，是嗎？”

“我是一名忠誠的羅馬尼亞人，中士。”

“如果准將真的是一名忠誠的羅馬尼亞共產黨，我可能會給你這支香烟。”

東卡猶豫了一下，偷偷地環顧四周。守衛開始移動，似乎要走開了。

“不，等等。當然，我是一名忠誠的羅馬尼亞共產黨人。”

警衛示意他的同伴們過來分享娛樂。

“准將，看來你應該會跳俄羅斯舞吧？就給我們跳一場！好像北俄大熊！”他誘惑地遞出了香烟。

於是東卡張開了雙臂，嘴唇上吐出一些泡沫，開始從一只腳跳到另一只腳。警衛們笑到滾在地上。那守衛把香煙丟下。東卡就在囚犯們的腳下急忙尋找。

在獄方把東卡轉移他處後，他的床位就給了一位新人，斯達將軍。就如修行的習慣不能創造一位修士，軍隊的肩章也不能創造一名真軍官。但斯達却是一位天生的將領，與東卡正好相反。雖然他個子矮小，但他的人格卻叫我們每個人都變成侏儒。他勇敢又有恩慈。他喜歡稱呼全體同房的囚犯們為“男子漢們！”

斯達將軍是一位赤足將軍。他已經把自己的軍鞋送了給人。我就與他共用我的，我們輪流隔日出去運動。他進來不久，第一次獄方容許家人送來食物包裹就到了。其中一包是斯達將軍的。他

在眾目睽睽下，打開包裹。眾人吃了一驚。裏面有鹹豬肉，火烤的香腸，葡萄干蛋糕，和巧克力。他的太太必然耗費巨大為他買了這種東西！可是斯達雖然已經挨餓八年，吃的只是一丁點面包皮，卻把這些珍品又包起來，交給我說，“牧師，做做好事，把這些平分給大家。”

2

在排除一切對手之後，德伊就是我們的獨裁者。他坦白承認過去的重大錯誤，包括運河計劃。在勞動了三年，花費數百萬英鎊，喪失幾千條性命，只挖了五公里。原訂的計劃是四十公里。當局如今指控主要的工程師和運河管理層，說他們吞吃國家財產。三人被判死刑，其中兩個直接處決。三十人被判刑十五年或終身監禁。新的一輪評估，發現這個計劃行不通。多瑙河的水不足以維持運河的航運與澆灌農田。這正是開工之前，首兩批工程師們的警告（那些工程師都因此被槍斃。）

這便是共產主義統治的頭十年里，羅馬尼亞的主要“建設”工程。

運河沿途的勞改營如今用來收納爆滿的監獄囚犯。可是這依然不足容納源源不絕的新囚犯。

當我們正在討論運河工程的慘敗時，波普教授把我拉到一邊。他說：“自從我回到奧克納以來，我一直對你隱瞞了一些事。阿迪醫生認為，你當時的健康情況可能受不了這個消息：你妻子被送去了運河奴役營。”

波普從不同的囚犯拼湊出這個事實。薩賓娜比我晚兩年被捕。當局沒有對她提出具體指控。她曾領導我們教會的婦女，拒絕按照黨方給予的路線傳教。在阿爾巴奴役營（Poarta Alba），薩賓娜被調到一隊用獨輪車運土的婦女小組。凡不達標的，當晚就沒有面包。這羣人包括愛國女學生和妓女、上流社會婦女和因信仰而受苦的婦女。在四公里集中營，指揮官哥莫（Kormos）後來因強姦三十名女囚犯而被判處苦役：罪名是“損害政權的威信”。

阿爾巴營由臭名昭著的阿本（Albon）上校管理。為了生存，薩賓娜像動物一樣吃草。囚犯們把老鼠、蛇、狗等動物都吃掉了。一些吃過狗肉的人都說狗肉很好吃。但當我問他們是否願意再吃時，他們都搖頭。薩賓娜又小又弱，所以守衛們最喜歡把她扔進冰冷的多瑙河里，然後再把她撈出來。但她卻沒有死。這運河計劃的失敗救了她一命。過後她被送到養豬的國營農場。那兒又是另一個噩夢，艱苦的工作也幾乎令她喪生。

教授說，瓦卡雷監獄的一名囚犯曾在那里的醫院里與薩賓娜交談過。

“她病得很重，”波普說，“但她會活下去。她知道你存活。她周圍的婦女們談到了一位已經垂死，依然在牆後講道的牧師。她們告訴你妻子說，自從1950年，她們就聽不到你的聲音了，相信你已經去世了。但她依然堅信你還活着，儘管所有證據都是相反的。”

這消息幾乎令我崩潰了。那一刻，我願意做任何事情來聯系薩賓娜。我試圖祈禱，但一股陰郁襲上我的心頭。一連幾天我沒有跟任何人說話。一天，我在監獄的院子里，看到警衛室旁邊有一位非常神聖的老神父，他的白胡子在寒風中飄揚。他剛剛抵達，守衛們就把他留在那里。有幾位警員在周圍徘徊。

“這老神父在這裡做甚麼？”其中一個問道。

“他是來聽取囚犯懺悔的，”另一個笑道。

這位神父蘇羅（Suroianu）果然不久就這麼做了。他身上有一種神聖的光環，叫你想要把自己的一切都說出來。我也向他坦白透露了我的絕望感，並我以前未承認過的罪。原來罪惡的根源不常在懺悔室裏揭露，卻向某些特定的人。但我越是指責自己，蘇羅神父就越發用愛的目光看我，毫無輕蔑。我不信認罪是一種聖禮，但這時的我卻是真的在懺悔。

其實蘇羅比我們任何人受到更殘酷的打擊。他的癱腿的女兒失去了丈夫（丈夫被當局關在我們的奧克納監獄。）另一個女兒和丈夫被判二十年。他的一個兒子死在監獄里。第二個兒子，蘇羅

曾指望會成為神父，卻反而指控父親。由于父母的“反黨活動”，他的孫子們被學校開除或被工廠解雇。然而蘇羅整天都在給眾人打氣，鼓舞各人。

他從來不會用“早上好”來跟人打招呼，而是用聖經中的“喜樂！”他告訴我，“當你不能微笑的那天，就不要開店。微笑只需要臉上十七塊肌肉，皺眉卻需要四十三塊！”

我問他，“你遭遇了這麼多不幸，怎麼可能高興呢？”

“為甚麼？不這樣做就是一項重罪呀，”他說。“我們總是有充分的理由感到高興。天上有一位神。祂也在我心中。今早我吃了一塊面包，多麼美味！你看，現在陽光明媚。這裡有很多人愛我。你不歡喜快樂的一天，就是錯過了的一天，我的孩子。你再也不能重渡那一天了。”

3

我也很高興，因為我終於可以實現我一直懷抱的期望——成為一名監獄牧師。通常一位牧者需要敲响教堂鐘聲，等人們上教堂，才能傳講信息；但在這裡，我的教友們都住在“教堂”裏，與我同在。他們必須時刻聽道，就算是不太情願。

一天晚上，年輕的拉薩（Lazar Stancu）打斷了我，他是一位流利的語言學家，他唯一的罪過就是為一家外國通訊社工作。他說，

“夠了，不要再談基督教了。畢竟還有其他有趣的宗教。”

“嗯，”我說，“我對孔子和佛教也頗有心得。”然後我講了一個鮮為人知的《新約》寓言。

當拉薩稱讚這教訓的美麗又新穎時，我便說這其實也是基督的教訓。“你為甚麼看外教勝於自己的宗教（基督教）？”我問，“是像羅馬尼亞的諺語，說他家的母雞總是火雞？”

拉薩回答道，“蕭伯納曾說，人們在童年時期就接受了少量的基督教教育，以至他們很少能真正明白基督教。”

一天傍晚，一名新進牢房的年輕囚犯突然跳起來喊道：“住手，住手！”其他人驚訝地看着他，他猛地倒在床上。我走到他身邊。他有一張精緻而敏感的臉，但下巴和脖子都受了傷，纏着馬虎的繃帶。他含淚的眼睛看了我一眼，又掉頭不看我。我想我當時只會讓他更加不高興，所以就沒有堅持跟他說話。

阿迪醫生告訴我，說他名叫約瑟夫。“是個好孩子，”醫生說，“但他的面部潰瘍將給他留下終生的疤痕。他又是一個骨結核患者。”阿迪向我講述了約瑟夫的往事。四年前，約瑟夫只有十四歲，他在試圖前往德國姐姐家時被捕。秘密警察使用惡狗監視他。他只要輕微移動，這種警犬

就會跳了起來咬住他的喉嚨。他被嚇壞了。他的喉部與下巴都受了傷。至今他依然不停地述說在邊境上的凶狗。然後他又被懷疑是某些國家的線人，於是被帶到布城酷刑。過後就被送往運河，挨餓並感染了結核病。

我看着約瑟夫在我們中間坐下來。他有着與生俱來的誠實和開放，是苦難還沒有腐蝕的。有時，他忘記了自己的煩惱，把烏黑的頭髮拋在腦後，對一些古老的監獄笑話哈哈大笑。但他更常把手放在受傷的臉上。這臉疼痛：但更糟糕的是，他想到自己將永遠失去英俊了。

我確信我能幫助他，所以我等待時機。

4

斯大林剛去世的幾個月，我國監獄特別寬松，容許囚犯的家屬，可以每月一次給獄中人送包裹。我們熱切地期待這些包裹。在给家人的明信片上，我寫道，除了食物之外，我還要香烟和“菲隆醫生的舊衣”。

儘管我不喜歡吸煙，但我總是要求容許一個囚犯的最高香煙配額，好分發給這裏的煙民。但結果卻不好。那些我沒有分發的，就會怨恨；那些我給予的，就懷疑我给别人更多。

我要求菲隆醫生的衣服，令我的家人大感困惑。那醫生是小個子，我卻是身材高大。我希望家人能意識到我真正的希望，是鏈霉素。阿迪告訴我，社會主義醫學如今承認這種十年前在美國發見的藥物，具有一定的價值。如果我收到這藥物，阿迪醫生就能治療我；但我們卻不能在明信片上提及它，或索取它。

在那一刻，即使是簡單的阿司匹林也會受到歡迎。那時我正遭受我們每個人的牙痛。由於缺乏食物，牙齒很快就腐爛。不然就是被打斷。有時我的腳踝上纏着五十磅重的鐵鏈，叫我無法走幾步來緩解疼痛。疼痛最厲害的一段時間，我正在奧克納監獄。一顆上顎的牙叫我一整天都痛苦不堪；日落時分，疼痛轉移到下頷。我們沒有牙醫，也沒有緩解的希望。據說巴斯卡（Paskal）用數學問題來對抗牙痛，我便嘗試寫講章；但疼痛肯定比較適合用數學對抗，而不是寫作，因為寫出來的都是絕望的講章。我又嘗試寫詩，但寫出的都是悲痛欲絕的詩。

我試圖與約瑟夫交談，好忘掉痛苦。一天晚上，我坐在他旁邊，問他為何聽到我說話時就生氣。

他說：“我恨上帝。如果你不停止，我就叫警衛。”然後他又開始流淚。

但這男孩本性的善良總是占上風，一兩天後，他就告訴我，他希望與他在德國的姐姐團聚，然後前往美國親戚的家。

“那麼，你必須開始學習英語了，”我說。

“我很想學，但是這裡誰來教我呢？”

我說我可以。

他欣喜若狂，事實證明他是一個聰明而認真的學生，儘管我們沒有書、紙或鉛筆。

我告訴他說，我讀過好些英語文學，就讓他記住聖經的許多段落。

5

約瑟夫並不是唯一威脅要舉報我的囚犯，真正的危險是隱藏的線人。這些人常常利用愛國主義來達到他們的目的，尤其是對年輕人。

在羅馬尼亞山區反共多年的游擊隊，啓發了許多年輕人組建自己的反共團體。許多十七，十八歲的男女因此被逮捕，關進監獄：甚至有一個十四歲的男孩也在我們當中。他們喜歡聽一位名叫阿爾米（Armeanu）的前情報上校講述關於我們的國王斯蒂芬大帝（Stephen the Great）和其他反抗外國統治的愛國英雄的故事。

斯塔將軍以前認識阿爾米，他告訴我不要相信這人，並建議我們密切留意他。

那天晚些時候，我慢慢走過，阿爾米正在和一位名叫提比的年輕游擊隊員交談。“他們逮捕了

我，”提比說，“但其他人仍在繼續戰鬥……”當我再次走過時，我聽到他說他的女朋友在游擊隊中。阿爾米看到我在附近，就拍拍那少年的肩膀，走開了。

過後我請約瑟夫去聽。阿爾米對約瑟夫沒有戒心。幾天後的晚上，約瑟夫聽到了一些談話的片段。

“跟我說說你的心上人吧，提比。我敢打賭她一定很漂亮。她叫甚麼名字？……瑪麗亞——她從哪里來的？... 是的，我知道那個地方。事實上，我和一個叫塞利內的家庭很相熟，他們有一個同名的女兒……啊，你的瑪麗亞是庫扎小姐。她的父親呢？陸軍上尉，是嗎？不會是二十二團吧？哦，第十五團。是的是的。”

收到這份報告後，我同意阿爾米很可能是一名特工，瑪麗亞將在幾天內被捕。斯塔將軍想立即與阿爾米對質，但我說我們並沒有切實的證據。後來我發現阿爾米獨自一人時，就開始與他交談。他問我為甚麼進監獄，我看到了一個急需的機會。

“因為間諜活動，”我說，並補充說我知道我可以與像他這樣的民族主義者坦誠交談。“我的被捕並不重要。我只是組織中的一個小齒輪。”我進一步暗示，並允許他哄騙我的“聯系人”的

姓名和地址。他沒有掩飾自己狡猾的勝利表情：他認為他已經獲得可以確保他獲釋的信息。

第二天牢房一打開，斯塔就看到阿爾米正在與警衛低聲說話。隨後，阿爾米就被傳喚進行“醫療檢查”——這是諮詢線人的常見借口。然後我就被政治官員叫去。在那位官員想象自己的肩膀上已經多了一顆星，因為他並沒有試圖保護阿爾米，而是立即要求了解我提到的那個偉大的國際間諜網絡的全部實情。

“中尉，”我回答道，“如果你把我昨天給阿爾米的信息轉給布城，只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所以我建議你不要這樣做。你只會傷害自己。”

“你是甚麼意思？”他問。

我說：“這一切都是我發明的故事。我只是想證實我對阿爾米的懷疑。”

那位警官難以置信地盯着我好一分鐘。然後，令我鬆了一口氣的是，他開始大笑。

我回去告訴斯塔，他帶着平靜的憤怒對阿爾米說：“勇敢的人在你的指揮下犧牲，如今你自己倒成為叛徒。”

阿爾米試圖扯謊掩蓋，但從那天起他就被眾人拋棄。多年後，我聽說他死在監獄里。他所有的背叛只給他帶來恥辱。

不久後我收到一份包裹，裏面有一百克鏈霉素。我的暗示成功了。想到我過去在四號房的同伴們，我就請斯塔將軍把它送給那兒最需要的病人。

“那是蘇塔（Sultaniuc），”他厭惡地說。
“那個家伙是個徹頭徹尾的鐵衛法西斯分子。他其實已經快要死了，儘管他不承認。最好你自己用……很好，如果你堅持的話。”

斯特很快就回來了。“蘇塔想知道藥品是從哪裏來的，當我告訴他這是你的時，他說他不會接受鐵衛隊敵人的任何贈品。像這樣的狂熱分子是沒辦法的。”

但我想也許另有辦法。斯塔離開後，我請約瑟夫充當中間人，沒有人會懷疑他。

“告訴蘇塔，將軍搞錯了。只說這是格拉（Graniveru）的禮物。格拉也是鐵衛隊成員，我聽說他最近收到了一些藥品。”

約瑟夫也不成功。“蘇塔不信格拉會給他任何東西。他說除非你發誓說這不是你的。”

“我當然可以發誓。”我說，“我已經給了他藥物，當然也可以一拼送他一個誓言。”

當我收到鏈霉素時，阿迪醫生正在別處忙着。後來他聽到這個，就說不出話來。就連斯塔也對我的發假誓感到困惑。他說：“我以為你們神職

人員總是堅持全部真相，除了真相，甚麼也不說？”

我回答說：“這也是事實。鏈霉素不是我的，而是上帝的。從我收到它的那一刻起，我就把它獻給了上帝。”

斯塔很快就有了一個例子，看到堅持“全部真相”的後果。

有兩名新囚犯，因為彼此指控，就關進我們的牢房。一個是天主教的主教，他想給羅馬教廷知道他的教會正在大受迫害。第二個是一名律師，他將主教的秘密信件交給了教宗大使，當時布城還有梵蒂岡的辦事處。當律師交上信件，出來時就被捕了。他否認送信，於是警方把那位主教帶來，與律師對質。主教說：“我不能撒謊。是的，我確實給律師一封信。”兩人都受到酷刑，最終一起被送往奧克納監獄。他們無休止地爭論誰是誰非。主教期望我的支持，但我無法提供。我說：“如果一個人拒絕說謊，那很好，但他應該把危險的信息握在自己手中。如果他決定讓別人也一同冒險，就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保護那位朋友了。”

主教抗議道：“這整件事給我帶來了很大的悲傷，但我怎能撒謊？”

我回答說，“如果我們善待我們的敵人，我們更應該幫助我們的朋友。如果我的女主人花了一整天的時間準備一頓燒焦了的晚餐，我仍然覺得有必要稱讚她：這不是謊言，這是禮貌與同情。

當這裡的同胞們問，‘美國人幾時來到？’我告訴他們說，‘肯定不會很久了。’恐怕這不是事實，但也不是謊言。這是一句給人打氣的話。”

主教不服氣。我繼續說道。“如果你真的樣樣事情都講求絕對的真實，那麼所有的藝術都成了謊言。浮士德並沒有真正與魔鬼簽約，那只是一個騙子（歌德）在扯謊。漢勒根本不存在——那只是莎士比亞吹的牛皮。最簡單的笑話（我希望你會喜歡笑話，）許多也是捏造的。”

“那可能是，”主教回答道，“但是，當你受到審訊時，魏恩波牧師，你不覺得自己必須說實話嗎？這有關我們的個人信譽呀？”

“我當然無需說實話。我會毫不猶豫地說出我腦海中出現的第一句話，只要它能誤導那些試圖誘捕我朋友的人。你真的希望我會向這些共黨提供攻擊教會的情報嗎？我是神的牧師！”

後來當我們獨處時，約瑟夫問我：“那麼甚麼才是謊言？”

“謊言是一句意圖傷人的話。你不認為你向蘇塔傳達的假發誓是謊言，對嗎？”

“哦，不。”約瑟夫微笑着說道，“那是一種愛的行動。”

7

約瑟夫正在改變。他的怨恨得到了緩解，有一天英語課結束後我問他：“你為甚麼說你恨上帝？”

“為甚麼？”他重復道。“你先告訴我為甚麼上帝創造了結核桿菌。”他覺得這樣就可以結束談話了。

“我可以解釋，”我說，“只要你肯聽。”

“如果你能解釋，我會聽一整夜！”

我警告他，他的話必須算數。我說這問題是所有人類痛苦和邪惡的根源。約瑟夫不是唯一發出這問題的人。為甚麼仁慈的神會容許這些痛苦發生。也許所有坐牢的人都會這樣問。這問題的答案不只是一個，而是幾個。

“首先，我們常以為不愉快的事，就是壞事。狼為甚麼不好？因為它吃羊，這讓我很不高興。其實狼對羊並沒有任何道義的責任，倒是我們有這責任。我們飼養它、喂養它、給它喝水，當它完全信任我們時，我們就割斷它的喉嚨。這才是可惡。然而卻沒有人責怪我們。”

約瑟夫坐在那兒看着我，一言不發。

“桿菌也是如此。一種桿菌可以給面团發酵；另一種則損害了一個孩子的肺部。這兩種細菌都不知道它的作用，但我喜歡其中一種，譴責另一種。所以事物本身並無善惡之分；我們是根據它們對我們是否方便來標記它們。我們只是宇宙的

微小居民，却希望宇宙中的大小事物都符合我們的好處。”

牢房里很黑，十分安靜，所以我繼續說下去。“其次，”我說，“我們所謂的壞事往往只是未完成的好事。”

“我需要一些證明？”約瑟夫補充道。

我說：“四千年前有一個與你同名的人，被長兄們出賣，作為奴隸，在埃及遭受了許多苦。然後他升為宰相，救了埃及，也救了他的兄弟們脫離饑荒。所以，就如約瑟一樣，你決不知道目前發生的，是好是壞。當畫家開始作畫時，你只見到他塗上模糊的顏色。畫中人需要時間才能出現。每個人都欣賞《蒙娜麗莎》，但達文西（Leonardo）用了四十年才完工。”

“但是躺在監獄里的人，”約瑟夫說，“可能永遠也看不到甚麼美好的結果了。”

“但其中也有人能看到。如果德伊同志未曾坐過牢，他能在羅馬尼亞掌權嗎？”

“那麼死在牢中的人呢？”

“拉撒路死于貧病，”我說，“但耶穌告訴我們，天使隨後就帶他進入永恆的幸福中。我們每個人都在死後獲得回報。只有在看到死後的報應，我們才能完全理解。”

約瑟夫答應思考這個。

有一種方法可以快速治好牙痛，就是一個好消息。一天我收到一封信，叫我好似登上天堂。裏面說薩賓娜已經出獄了。雖然她仍然不許跨出布城，但遲些我兒子卻可以來看望我。這封信就此結束：這是黨方審查允許的所有信息。

我最後一次見到米海是在九歲的時候，現在他十五歲了。我無法想象我兒子如今會是怎樣的模樣。我們一直以來，都是那麼親密。我開始為這會面，日夜擔心。那大日終於到了，獄卒帶我進入一個大廳，我必須坐在一個包廂里。裏面只有一個裝有鐵柵欄的小窗，外面的訪客只能看到我臉的一部分。警衛叫道：“米海·魏恩波。”米海就走過來，在我面前坐下。他臉色蒼白，瘦弱，臉頰凹陷，還長出了小胡子。

米海的第一句話就是：“媽媽說，即使你死在監獄，也不要悲傷，因為我們會在天堂相見。”

充滿安慰的第一句話！我不知道是該笑還是該哭。我振作起來。“她怎麼樣？家里有吃的嗎？”

“媽媽已經康復了，”米海回答。“我們有食物。我們的爸爸非常富有。”

被指派聽我們講話的警衛咧嘴笑了。他們以為我妻子已經再婚。米海對每個問題都用一句金句回應，因此在我們被允許的幾分鐘內，我只聽到

很少的家庭消息。但在我們的時間耗盡之前，米海告訴我說，他帶來的包裹留在警衛站。

我在第二天就收到了包裹，超出了我每月的許可分量，因為米海同時寄給“理查·魏恩波”，又寄另一份給我在監獄里的假名，喬治斯庫。但不久之後，獄方又回復過去的限制，禁止探訪，包裹，信件。

9

在稍微輕鬆的時光結束之前，一名警衛將一個籃子拖進牢房，里面裝着床單和毛巾——這些都是我們難以想象的奢侈品。每個人都得到一份。

“他們算錯了人數，這裏有一條多餘的毛巾。”裁縫埃米（Emil）說。“我們把它剪成衣服吧。我可以輕易用這些東西造成一些溫暖的襯衫。”

律師伊恩（Ion Madgearu）不安地說。“這是竊取國家財產。”

“誰曉得呢？這裏沒有記錄。”

“我是政治犯，不是罪犯。”

“你真是個笨蛋。”雙方各執一詞，爭論十分激烈。約瑟夫請我做一個表決。

我說：“這些國家財產，其實都是我們的。黨方從我們竊取的這些。如今我們當然有權拿回一

丁點。我們欠我們家人一筆債，就是盡我們所能的挨過寒冬。這就像早上獄警半睡半醒地進來問，今天這牢房里有多少人時，我們都會試圖夸大我們的人數，好得到多一點面包一樣。那也是完全合法的。”

伊恩說，“我還是寧願遵守法律。”

“但是法律總是不公平的。”我回答道。“法律吩咐一位百萬富翁不要偷竊，它對你我也說同樣的話。富翁完全無需偷盜，但我們急需糧食衣服。耶穌也寬恕大衛吃了聖殿裏的陳設餅。因為當時大衛非常饑餓。”

伊恩最終也不再爭辯。但後來他告訴我，他有一個特殊的原因。

“我曾經是一名檢察官，在我任職期間，我已經將數百人送進監獄。我想，無論我說甚麼都沒區別；黨方都會把他們送進監獄。後來我因為一些錯誤而成為替罪羊，自己也被判了十五年徒刑。當時我驚呆了。他們送我去瓦萊亞監獄（Valea Nistrului）的鉛礦。在那里，一名基督徒囚犯主動與我交朋友，也把他的食物分給我，並保護我免受看守的傷害。我覺得我們以前見過，就問他為甚麼進監獄。‘哦，’他說，‘我幫助了一個像你一樣落難的人。他來到我的農場尋求食物和住所。後來他因為是游擊隊員，所以被捕；我也被判二十年。’

“我說，‘可耻的審判，’這位基督徒好奇地看了我一眼。突然我記起了。我正是他案件的檢

察官。他從來沒有責備我。但他以德報怨的榜樣，叫我決定成了基督徒。”

10

約瑟夫邊唱邊試穿埃米為他做的襯衫。它果然合身，雖然看來有些奇特，但約瑟夫只要有一些溫暖的衣物貼在身上，就很滿足了，即使這是國家財產。

“現在每個人都會偷東西了，”他高興地說。

斯塔說：“如今年輕的一代，都把不誠實當是一種理所當然的事了。這十年來，我國已經變成了賊國。小偷，騙子和小告密者到處都是。農民從他們曾經擁有的土地上偷竊；理髮師偷竊自己店里的剃須刀（因為如今他的理髮店已經屬於國家的了）。然後他們必須撒謊掩盖。牧師，你有沒有準確的納稅呢？”我承認沒有。我也不覺得拒絕把教友的錢交給共黨，有甚麼不妥。

“接下來，偷竊將成為學校課程的一部分。”斯塔說。約瑟夫插嘴說，“我在學校甚麼也沒聽。老師說比薩拉（Bessarabia）一直是俄羅斯的一部分時，可是大家都知道比薩拉是蘇聯從我們這裡偷去的。”

“好小子，”將軍說。

“我也希望你也不要接受他們的反對宗教言論，約瑟夫，”我補充道，並告訴他我認識的一位教授必須定期講授無神論。可是當他獨自在房間里時，卻畫十字，請求上帝的寬恕，然後才出去告訴學生們說上帝不存在。

“嗯，當然，”約瑟夫說，“他們會監視他。”他無法想象一個自由的世界，就是一個人不必防備告密者的世界。

話題轉向了一位名叫吉瓦（Jivoïn）的告密者。他是一名南斯拉夫共產黨。當南斯拉夫抗戰失利後，他逃到羅馬尼亞，就被羅共逮捕下牢（當然是指他抗戰不力，偷懶）。如今他力圖討好當局，每逢獄卒對我們稍微寬鬆，他就向當局舉報，給獄卒們麻煩。

約瑟夫說，“我們中間有些人決定一起把他壓倒，揍他一頓，獄卒們不會給我們太多處罰。”

我說，“且等一等。我有一個更妥當的方法。”

因為獄室裏的每個人都不與吉瓦交好，當我與他談及他的家鄉時，他很是開心。不久他就開始談及克羅亞的笑話，與塞爾比亞的箴言，又提及莫奈特尼格的美麗風景，歌曲與舞蹈。我不斷鼓勵他，他越發興高采烈。

“你們的新國歌如何？”我問。

“嘿，了不得——你沒有聽過嗎？”

“沒有呀！”

他馬上開始唱。外面的守衛起初並不覺察這是一首鐵托歌，直到副歌才叫他們猛然發現。吉瓦馬上被架走，去面對一個滿臉怒容的政治官。

“那就是他的下場了。”約瑟夫說。我們都笑了。

在吉瓦事件後不久，一位前鐵衛隊成員，史特萊隊長（Captain Stelea），從走廊另一端的牢房搬到了我們這裏。他遺憾與上一個牢房的一位老戰友分開了。

“他叫甚麼名字？”斯塔將軍問道。

“伊萬克林（Ion Coliu,）”史特萊回答道，“我到達奧克納監獄的第二天晚上，就碰到他。我們聊起了過去的美好時光。”斯塔問史特萊是否有告訴伊萬克林，有關他在審訊和酷刑中隱瞞的秘密。”

“是的，一切，”史特萊說。“他是最親密的朋友。我願意把我的生命押在他身上。”

當斯塔告訴史特萊說，伊萬克林是奧克納監牢臭名昭著的奸細時，他簡直不敢相信。我被要求證實。史特萊像一名被炮彈震蕩的士兵，呆呆的坐在床上幾個小時。然後他跳起來，開始歇斯底里地對我們發怒，直到警衛把他帶走。

每個監獄都會為那些精神崩潰的人預留一個房間。他們被關在那里，任由他們發狂、在地板上大小便、互相打鬥，有時甚至是致命的。食物只

是從小洞口推進去，任憑他們搶奪。沒有警衛願意冒着生命危險去理會他們。

11

約瑟夫的刑期只剩幾周。他已經為未來做好了規劃。他說，“我在德國的姐姐將為我辦理前往美國的許可證。我學成英語後，就要學一門手藝。”

但他還是憎恨自己的破臉。一天晚上，我告訴他海倫（Helen Keller）雖然雙目失明、又聾又啞，却成為美國最受尊敬的女士。我描述她如何自學成為一名優秀的鋼琴家，僅靠牙齒叨着一根木頭，觸及鋼琴，作為聆聽工具；以及她的工作如何為成千上萬的盲人帶來盲文。

“她在一本著名的書中寫道，雖然她從未見過星空，但她心中有充滿星星的天堂。這就是為甚麼她能給人看見神創造的美麗。就是擁有眼睛的我們也不能看到的。

我告訴約瑟夫，海倫來自一個富裕的家庭。如果她像其他女孩一樣“幸運”地擁有的所有的感官，她可能會在瑣屑事上浪費了自己的生命。正是因為遭受世人所謂的“悲劇（眼睛失明）”，才達到非常的成就。

约瑟夫若有所思地說，“海倫肯定是人類绝无仅有的极少数之一。”

“不，像她這樣的人還有很多。俄羅斯作家奧斯特（Ostrovsky）雙目失明、癱瘓，而且非常貧窮，他只能在包裝紙上寫小說。但今天這些包裝紙小說已享譽世界。偉大的人往往都是病人；席勒（Schiller）、蕭邦（Chopin）和濟慈（Keats）都像我們一樣患有結核病。波德萊爾（Baudelaire）、海涅（Heine）和我們自己的詩人埃米（Eminescu）都患有梅毒。科學家告訴我們，此類疾病的微生物會興奮我們的神經細胞，從而提高我們的意識，儘管它們最終可能導致瘋狂或死亡。結核病可能會使壞人變得更糟，但好人卻會變得更好。他們看到自己的生命即將耗盡，就希望善用剩下的時光。”

约瑟夫常在四號房幫忙。我說：“你沒有注意到一些肺結核患者的平靜、溫和與清醒？”

他的眼睛亮了起來：“確實如此，這多麼奇怪。”

我說：“幾千年來，人們都認為真菌有害。直到二十五年前，弗萊明爵士（Sir Alexander Fleming）發現一種真菌，青黴素（盤尼西林），可以治愈許多疾病。目前我們還不曉得如何利用肺癆的結核細菌。但在我們能克服這種不治之症後，我們就可能為孩子接種一小劑量的結核病菌，增強他們的智力？”

“神造天地，還有你的生命，並如此多的美麗事物，约瑟夫。你的痛苦也是有意義的，就像耶穌的痛苦一樣，正因為祂死在十架，我們才能得救。”

约瑟夫穿着他的新襯衫，但依然瑟瑟發抖，這件襯衫已經磨損了。我拿出親戚送來的羊毛夾克，撕開里面的一層，說留着自用，就把外面的夾克送給他，一定要他收下。他就用雙臂抱住他狹窄的胸膛，表示有多溫暖。

约瑟夫在那天開始轉變。在我們的課程中，我經常和他談論耶穌。但他仍然不肯承諾救主。他還需要一些最後的催動，幫助他跨越懷疑，抵達信仰。

那一刻就在分發面包的時候。這些面包成排放桌子上。每份的重量應該是三安士半，但有些大一些，有些小一些。囚犯們常為了搶先而爭鬥。囚犯們又會互相詢問：剩下的哪一塊才是最大的？然後，在聽從意見後，他們又懷疑自己是被誤導了，友誼就因一口面包而丟失。在這一天，一位名叫特萊斯（Trailescu）的囚犯試圖欺騙我。约瑟夫看在眼里。

我對特萊斯說：“也拿去我的一份吧。我知道你有多餓。”他耸耸肩，就把面包塞進嘴里了。那天晚上，我們坐下來將新約經文翻譯成英文，约瑟夫說：“我們現在幾乎已經讀完耶穌說的每一句話，但我仍然想知道祂是怎樣的一個人。”

我說：“當我在四号房時，有一位牧師會放棄他的一切：他的一點面包、他的藥、他身上的外套。我有時也會捐出這些，雖然我自己也需要。但在其他時候，當人們饑餓、生病和有需要時，我卻沉默不動；我不够關心。我所說的那牧師却真的像基督。你覺得只要摸到他的手，就能痊愈。有一天，他正在与一小羣囚犯交談，其中一個人問他，耶穌是甚麼樣的？這牧師簡單而谦逊地回答：“耶穌就像我。”那個經常得到牧師善意的囚犯就微笑回答說：“如果基督像你一樣，那麼我就愛他。”

“約瑟夫，很少有人會說出這樣的話。但對我來說，這就是成為一名基督徒的意義。相信祂並不難；變得像祂才是最棒的事。”

約瑟夫的眼里涌出了淚水。“牧師，如果耶穌像你一樣，那麼我也愛祂，”他說。

那一刻，他的眼神里充滿了純真与平靜，我知道我成功了，雖然約瑟夫給我的評價肯定過高了。

我們又继续英語課。我告訴他，耶穌如何回答那些要求看見神迹，才考慮相信祂的猶太人。他們說：“我們的祖先們，看到天上掉下的面包，就是摩西為他們行的。”耶穌回答說：“我就是生命的面包。到我這里來的人，永遠不餓也不渴。你們的祖先吃了摩西給的天糧，還是死了，因為那不是真正的天糧。我才是天上賜下的食物，人吃了就永遠不死。”

约瑟夫在次日，就對我說：“我最想成為一名基督徒。”我用锡杯里的一點水給他施洗，說：“奉父、子、聖靈的名”。他所有的痛苦都離開了。

在他出獄的那天，他含着淚水擁抱了我。他說：“你幫助了我，就好像你是我自己的父親一樣。現在我可以與神同行。”

多年後，我們再次見面時，他仍然是一名基督徒。他的傷疤仍然存在，但現在他卻很高興擁有那些傷痕了。

12

不久後，我們的監獄管理層就渡過斯大林去世的恐懼。西伯利亞奴役營發生了嚴重的囚犯騷動，黨方決心不示弱。他們恢復舊有的壓制；又加上新的。儘管醫生抗議，黨方還是把窗戶都關上，而且還加上一層漆。晚上當警衛不注意的時候，我們只能把窗戶打開一英寸。在夏天，炎熱和惡臭令人窒息。

在監牢外面，教會的苦難也在增加。我們從最近被捕的東正教牧師那里聽說，查士丁主教已經完全成為黨的工具。

他最可耻的行動，是對付維羅修女（Mother Veronica）。維羅是一位在羅馬尼亞廣受尊敬的

修女。幾年前，維羅還是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農家女孩時，聲稱自己看見聖母出現在田野，要求她在當地建造一座修道院。經過數度的顯現後，捐款紛至沓來，修道院很快建成。兩百名年輕女孩戴上了面纱，成了該院的修女。在接下來的幾年，這地就成了朝聖中心，類似法国的卢爾德（Lourdes）。在共產黨接管後，聖母將會拯救羅馬尼亞的傳說，就獲得新的意義。

有一天，查士丁乘坐一輛豪華轎車抵達，將修道院教堂的神父們逐出教會。然後，作為教會的領袖，他建議修女們說，她們放棄今世的享受，為渺茫的來世準備，實在愚笨。為何不現在就出去享受今生的快樂。修女們不理睬他，也拒絕離開修道院。於是在查士丁尼訪問後不久，秘密警察就進行了突襲。他們暴力對付不聽指示的修女，強行關閉修道院。

整個羅馬尼亞都震驚了：連黨方也暫時感到忧虑。維羅修女在秘密監獄中受到巨大壓力，被迫承認她的看見聖母只是一種幻覺。出獄後，她結婚生子。羅馬尼亞的卢爾德神話就此結束。

對信徒的另一個打擊是針對彼得拉（Petrache Lupu）。他是奧爾特城（Oltenia）的“牧羊聖人”。許多年前，當他看守羊羣時，遇到一位老人，自稱是上帝，宣稱必須建造更多教堂，給窮人更多的經濟援助。儘管彼得拉是一位遺傳性梅毒患者，說話口吃，但人們依然相信他的故事。成千上萬的人來看望他。戰爭爆發時，政府空運他

到前線去鼓舞士氣，士兵們竟相親吻他的手。他從一個戰區到另一個戰區，告訴軍士們說，上帝希望他們殺死更多的俄羅斯人。當他被共產黨逮捕下牢後，彼得拉問其他的囚犯，牛仔（美國人）幾時會來營救他們。

“為甚麼要等牛仔？”他們問。“你的那位老夫子上帝肯定會來釋放你吧？”

彼得拉咯咯笑道：“祂很想這麼做，可惜祂沒有槍！”

這些東正教神父們也悲傷的提及另一個行神跡的僧侶博卡（Arsene Boca）。他的隨從們說，他們無需向他認罪，因為他一眼就曉得他們的過失。博卡在牢中過了一段日子後，就放棄他的僧侶習慣，娶了妻子，就如其他人一樣的生活了。

黨方對宗教的打擊只是砍掉了迷信的枝條，讓真正的信仰比以前更加健全。但人性有一個弱點。當宗教的迷信突然被砍去後，取代它的常是另一種迷信，就是無神論的迷信。從前羅馬尼亞人過度崇拜聖人聖像，如今崇拜屠夫斯大林。這後來的魔鬼比先前的更可怕。

有一天，波普教授宣布來了一批新囚犯，其中一個被打得很慘。這人正要找我。我就和波普一起去見他。

原來那人就是鮑里。自從再教育結束，這位老工會成員已經被關押在好幾所監獄。這裏的守衛們把他拋在地上。他已經昏迷了。牢房里沒有人，因為都出去體操了。在波普抵達之前，沒有人給鮑里任何幫助。當我們把他放到一張木板床上時，他呻吟着醒來。凝結的血將肮脏的襯衫粘在背上。我們慢慢地、痛苦地把它浸濕，露出了布滿丑陋傷痕的背部。如果是弱一點的人，肯不定活不了。這就是鮑里與《再教育計劃》合作的獎賞。

囚犯們回來，開始魚貫而入。他們用仇恨和蔑視的目光看着鮑里。

“我是該死的，”波普和我給他清理傷口時，這老硬漢說。

“你也知道自己該死？”有人問。

鮑里斯抓住了我的手臂。“我遇到了一個你認識的人。帕特拉叫我傳一條信息給你。”

鮑里說，前共產主義正義部長帕特拉（Lucretiu Patrascanu）已被處決，他在1948年曾與我同在卡利監獄（Calea Rahova）。斯大林去世後動蕩的一年里，黨的領導人就如我們的警衛們一樣，個個擔心自己可能下臺。他們認為被監

禁的帕特拉是一個擁有廣范追隨者的人，他隨時可能複出，領導一場自由化運動，並對他們進行報復。於是他們先發制人，處死帕特拉。當時帕特拉已經入獄六年。

鮑里曾短暫與帕特拉在一起。他說，帕特拉為共產主義的上臺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去世前却被同黨們酷刑。當他說牢房很冷時，他們就給他厚衣，戴上了鐵鏈（叫他不能脫衣）。“還冷嗎？”他們問，然後加熱牢房，直到帕特拉全身是汗，乞求關掉蒸汽。他們就急速冷卻，直到零下。帕特拉交替被烤和受凍，由於他依然死不了，最後只好拉去槍殺。

鮑里說：“他告訴我，如果你再次見到魏恩波，請告訴他說，他講的對。”

阿迪醫生來給鮑里做檢查。不久就把他送去四號房。

我盡所能的在“死亡室”里陪同鮑里，幾天後他似乎正在好轉。雖然他的自尊心不允許他承認，但他其實是很高興能回到友善的氛圍中。

他向鄰床——耶和華見證人——點了點頭。“老洛松在為我祈禱。他禱告的分量，已經很夠我們二人了。”他提高聲音說：“洛松，你已經把我們的一切需要都告訴了上帝，不是嗎？”

“當然，”老家伙說，“我還為全室的人祈福。”

“我注意到，神似乎未曾回應你？”鮑里說。
“也許祂在扯你的後腿？或給你考驗，就如約伯？”

當時我正在給鮑里清洗，他抓住了我的手，說，“這是牧師神父必須解釋的事情，不是嗎？年復一年，人們都在祈禱自由，祈求家人的消息，求得一頓像樣的飯。他們得到了甚麼？”洛松試圖說話，但鮑里繼續說，“我曾在羅馬尼亞最糟糕的監獄吉拉瓦。在那裏，我的同伴們祈禱說，‘神啊，如果你愛我們，請給我們一些沒有蠕蟲的食物。’”

“那些食物有改進嗎？”洛松問。

“不，情況更糟了。為甚麼神不幫忙？”

我說：“你提出了一個重大的問題。但請問，醫生給你看病時，不是常常要給你帶來痛苦嗎？”

“想一想在科學實驗中死亡的動物。如果一只實驗中的狗，知道它的痛苦可能會拯救數百萬高等生物的生命，也許它就會很甘心地接受痛苦，甚至死亡。同樣的，我們的苦難也可能有益於後代。耶穌承受痛苦，因為知道這會拯救人類。”

洛松介入說，“每天，世界各地的人都呼求‘我們的天父’，祈求神國降臨，但神國却没有到來。但我想我知道它的緣故。這是因為那些祈禱的人並不真的希望神的國，而是鐵衛隊重新掌權，或者美國人到來，或者米迦勒國王復辟。他們只是希望自己目前的痛苦獲得開解。”

我看到鮑里正在認真聽。

洛松繼續說，“正是，其實我們心中最不喜歡的，便是天國，雖然我們可以輕易獲得它。只要出少許氣力就行。

“在我的村子里，教友們曾經為窮人舉辦祈禱會。所有的農民都來了，只少了一位富有的農民。正當我們各人都想，自己是多麼虔誠時，那位缺席者的兒子卻帶來四大袋麥子。他把麥子放在教堂門口，說：‘我父親已經把他的禱告送來了。’那個缺席者正在採取實際行動，實現神的國。”

我說：“鮑里，這就是給你的答案。《聖經》承諾猶太人將從天涯海角回來，並在巴勒斯坦重獲自己的國土；但如果像赫茨（Herzl）與魏斯曼（Weizmann）這樣盡心竭力的人沒有出現，這個預言可能再過一千年也不會實現。”

附近的其他人，在這個死亡室里，面容憔悴的問我祈禱的意義，以及祈禱可能怎樣幫助他們。我便說我的想法：“許多人將上帝當作一個富翁，是人人求助的對象。但監獄給我們認識到，我們必須尋求一種更純正的宗教。我們的禱告便是默想，接納與愛。

“每天都有數百萬人呼求天父。但既然我們是神的孩子，孩子也分担父親的職務，於是眾人的祈求也是對我的祈求。

“於是，當眾人說，‘愿人都尊你的名’時，我便當尊神的名為聖。‘愿你的國降臨’，我就

必須為結束世界大部分地區的邪惡統治而奮鬥。

‘愿你的旨意成就’，就是指好人的心意成就，不是壞人的欲望。‘宽恕我們的罪’，我就必須宽恕眾人的罪。‘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所以我必須盡力避免絆倒人，不叫他人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邪惡’，所以我必須盡力救人脫離罪惡。”

此後，洛松和我就成了朋友。他是一個有趣的人，一個農民，雖然他是耶和華見證人，卻帶有純淨的良好判斷力。我發現是這教派選擇了他，而不是他特意去選這教派。由于對東正教的幻想破灭，並且遇到生活的危機，他就接受了他遇到的第一個其他選擇。許多來自大教派的人，都是這樣脫離母會，加入各小派的。如果洛松當時碰到我國認可的教派，就如浸信會或安息日會，他就無需坐二十年監獄（證人會在羅馬尼亞是屬於非法組織。）

有一天，當我和他談話時，他問我：“你知道我為甚麼來這里嗎？”他說這不僅是因為他身為一個證人會成員。“許多年前我犯了一宗嚴重的性犯罪。我悔改了，請求上帝讓我受苦贖罪。我如今還在贖罪中。”

洛松如今正在垂死中，聽不了另一個教理。

但我試圖安慰他：“即使是聖徒也很難克制性的沖動，”我說，“耶穌知道這一點。祂已經為我們贖罪了，你不用再自己贖罪。”

“但我還是忘不了。”他回答。

幾天後，我走進房間，發現洛松的床空着。他是在夜間去世的。

15

這人離開這個世界時，仍然受年輕時的錯誤困擾。但這並不稀奇。在監獄，男人沒有發泄的渠道，很快就有色情夢。囚犯們坐着凝視著空白，日夜想到，都是性幻想。我的獄友試圖挑引我談及尷尬的問題。

已婚的男人最是困難。我們這裏至少有一半人，在下獄之後就失去妻子。要麼是她們已經與別人同居，要麼就是她們要求離婚。她們與被判刑的“反革命”丈夫離婚，只是一種簡單手續。她們受到巨大的壓力，逼使她們離婚。

一位稱為弗里穆（Frimu）的囚犯正在等待上訴結果。當他被叫到司令部辦公室時，他欣喜若狂——“我告訴你們，我肯定獲得釋放了！那時。。”他就在自己的一根手指上响亮的吻了一聲。不久之後，他氣憤憤的回來，說不出話來。有人問出了甚麼事。“甚麼事？”他勃然大怒，“那女人跟我離婚了。她與國家劇院的一位導演結婚。當我出獄時，他們有的瞧的了。那時上帝也難救他們了。”

弗里穆是一個中年男子，在牢房里被稱為“大情人”，他經常吹噓他年輕漂亮的妻子；現在他卻開始咒罵女性，談種種的復仇。

我說，“如果坐牢的是我們的妻子，我們卻自由在外面，我們中有多少人會保持忠誠？”

弗里姆喊道：“你不必給我們教訓！”

我說，“我對你的壞消息感到抱歉，但是你還能指望甚麼？你總是談論你引誘過的女孩和占有你朋友的妻子，又說你出獄後打算將要征服的女人。有你這樣的男人四處溜達，我們怎能希望有純潔的女人？”

一位大教堂的牧正諾瓦，平時總是害羞不說話的，現在卻開口了。“丈夫並不總是該受責備的，”他說。“我總是讓我的妻子高興。我以為我做到了。可是在我第一次坐牢回家時，開門的是一個陌生人。我妻子隨後出來說，‘我現在和他結婚了——所以請走吧。’我試圖和她說話，但她大聲咆哮：‘我的麻煩已經夠了。我不想家中有一個反革命分子！’”

於是我必須在火車站的候車室里度過了第一晚。

“你是個傻瓜，”弗里穆說。

飛行員彼得問，“第二天晚上怎麼樣？”牧正漲紅了臉，轉身走開。

農夫厄密（Emil）說及他第一次期滿出獄時的經歷：

“當我走到半路，離開家還有整排店鋪那麼遠時，我的狗就聞到了我的氣味。它把鐵鏈從柵欄扯下來，沖過來迎接我。我彎下腰，她就跳起來舔我的臉。然後，我走進我的房子，發現妻子和另一個男人在床上。”

“牧師，他們中的哪一個是畜生？”

16

共產黨竭力腐蝕道德，但即使沒有他們的影響，從我們周圍的談話來看，基督徒是否真的聽從聖經有關於性的教訓？

幾位基督徒囚犯就嘗試進行一項調查：“你是否常常遵從經上的吩咐，在思想，言語，行為上，都保持貞潔；婚後又對伴侶忠心？”

三百位基督徒囚犯中，只有兩人回答是。一位是神聖的老神父蘇羅，另一位是十五歲的男孩。

斯塔將軍說：“教會似乎必須重新思考了。一支不聽從命令的軍隊，絕不能上戰場。”

新聞記者士旦說，“一個牧者宣揚沒人實踐的教訓，只會貶低自己的價值。”

牧正說：“這可能是一項吃力不討好的任務，但我們牧者總不能違背聖經。”

我說：“當然，我們不能向罪惡妥協，但我們也需要更明白罪人。在古代，女人都戴着面紗，衣着朴素。你必須是一個惡行高手，才能勾引到一個女孩。如今，她們的衣服是為了挑撥男人而設計的，而且犯罪的機會無處不在。

“也想想耶穌如何處理那位通奸的女人。當時眾男人沒有一個敢自稱無罪。於是每個人都離開了。沒有人能拋第一塊石頭（這證明每個人心中都有淫念。）耶穌怎麼處理？祂就讓他們走了。對那行淫的婦人，耶穌也讓她回家，只給她一句勸告。”

“罪必須受到譴責，但罪人卻必須得到理解和愛。”

諾瓦牧正表示擔心。“年輕人有那麼多犯罪的機會：他們需要指引。”

“是的，”我說，“但我們也必須教導，性是上帝賜予人的美麗禮物。我們必須說出全部真相，免受淫穢的污染。神造兩性也帶有神性。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書籍《摩納瓦法論》說得很好：女人是一座祭壇，男人在其上，為他的後裔向神獻上祭品。”

天主教記者士旦打了哈欠說，“這一切都相當崇高。但我們大多數人都用平淡的眼光看女性。她是一個可以被利用的東西；給人快感的工具，或有吸引力的裝飾品，或是一個僕人，負責清潔

和做饭，甚至是一個偶像，令我們甘心為之服務。但幾乎沒有人把她當作與自己相等，即使在性事上也如此。”

“最重要的是選擇一個能讓你快樂的伴侶，”牧正說。

“或者反之也是正確，”我說。“我認識的最幸福的一個男人，選了村里一個平凡的姑娘，因為他想這姑娘沒有機會找到其他的對象可以結婚。”

“多麼浪漫啊，”士旦笑道。“婚姻只是一份契約。當我的父母找到一個好女孩，又帶有足夠的嫁妝，交易就完成了。我們相當滿意，夫妻各行其是。”

“那麼你們其實完全沒有結婚。”

“我們的婚禮是在教堂里舉行的！”士旦說。

“我的意思是，我認為為了物質利益而舉行的婚姻在上帝看來是無效的，即使教皇本人祝福也無益。”

士旦笑了。“那麼，世界上就充滿了無效的婚姻。許多男孩把自己賣給有錢的女孩，就像貧窮的女孩被賣給有錢的男人一樣。為漂亮的外表而婚娶，不是更不實際嗎？美容很不耐久呀？”

我回答說，我教會有一個年輕女子，被父母壓迫，嫁給一個富有的男人。經過多年的不快樂的生活之後，她愛上了為她制衣服的裁縫，就與他同住。許多常去教堂的人都排斥她。當然，與人

同居是有罪的，但我試圖理解她。我知道她的第一次婚姻是被壓迫的。繼續那種婚姻是更大的罪。於是目前的工作是把已經破碎的婚姻重新安排，進行再婚程序。我請求會眾不要倉促地評判她。教會的規則認為她的第一次婚姻是無效的。

“那女子流着淚來感謝我。我說教會名冊與神的名冊不同。上帝理解你為何會投入另一個男人懷抱。就算眾人都不能同意，上帝一樣愛你。她就摟住我的脖子並親吻我，就在那時我的妻子進來了。”

眾囚犯哄堂大笑。士旦問：“那你怎麼向妻子解釋？”

“我沒有解釋，因為無可解釋，”我說。“那婦人與那位裁縫快樂的生活了許多年。當裁縫死後，我才告訴太太那天發生了甚麼事。”

17

許多人以為監獄可能使人發生同性戀，但我們沒有看到這種說法的證據。也許這是因為我們的疾病、疲憊和過度擁擠。

波普教授強烈譴責一兩宗可疑的事件。

我說同性戀無疑是一種罪。但我們應該嘗試了解這些不快樂的人，原諒他們的過錯，就像我們對待人類其他的過錯一樣，並力圖治愈。許多偉

人都是同性戀——亞歷山大、哈德良、柏拉圖，還有列奧納多；他們的作品中表現出了深厚的基督教情感，還有被稱為“基督之前的基督徒”的蘇格拉底。又有米開朗基羅，並我們這個時代的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和國際紅十字會的創始人安德烈·杜南。

“是的，我知道他們的榮譽名單，”波普說，“但是他們中的很多都在劇院等場合將私人的事變成公開。既然社會譴責這種行為，他們至少應該收斂一點。”

一位拉比介入了討論，他引用猶大智慧書《塔木德》（Talmud）的一句話：“如果一個拉比克制不了自己的欲望，至少也要戴上面紗，到另一城去幹，然後才回來宣講法律。”

這裏的大多數囚犯，雖然食物極其不足，但還是把性的需求視為與食物相等。在最後的審判中，人們將會因為沒有給饑餓的人食物而受責備；但我們會不會也因沒有滿足伴侶的性需求而受罰呢？

當然，正如存在社會和經濟不公正一樣，也有性要求的虧欠。它是人類痛苦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每一條法律，甚至神聖的法律，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公正的因素。法律對富人和窮人、性欲不足和性欲過多、無知者和知識分子，制定了相同的規則。

我想婚姻是一個榮譽的問題，它是一種責任。但愛只是一種情感，所有的情感都會改變：年紀

大了，感情就平淡下來。這是自然的傾向。因此感情不能保證幸福的婚姻。人必須有一種意志力：決定對你的伴侶忠誠，決定讓他人快樂。

由於人類顯然不可能滿足每個人的性需求，因此我們也談及貞操作為替代方案。天主教規定神職人員必需獨身。

我說：“如果強制獨身，一位禁欲不成的神父，信心就可能破滅。”

“缺乏性滿足可以成為一種巨大動力，”教授說。“斯賓（Spinoza）、康德（Kant）、笛卡爾（Descartes）、牛頓或貝多芬似乎都不曉得性事。”

教授說的不錯。但我想單身是神給少數人特殊的恩賜。

18

幾個星期以來，波普和我輪流照顧鮑里，他躺在四號房，咳嗽得很厲害。阿迪醫生說：“如果他能進食，可能還能維持十天。我的探訪並沒有真正幫助他。他看到我依然內疚。我怕我的到來只會加重他的痛苦。”

我問是否可以讓鮑里搬到我的牢房里，便於照顧。阿迪就安排鮑里到我身邊的床，我照顧他度過了生命的最後一周。他在我們眼前逐漸衰殘

。頭髮只剩幾根，臉頰凹陷，皮膚變灰，大汗淋漓。我日復一日地用海绵擦拭他。

“很快就會結束了，”他喘着氣說。“一位神父曾對我說，‘你會在地獄里腐爛。’就這樣吧！”

“是甚麼使他這樣說？”我問。

“我因為身上疼痛，就咒罵上帝。他說我將永遠受懲罰。”

牧師瓦倫丁（Valentin）說：“人們詛咒共產黨，但最終共產黨還有可能會釋放他們。如果地獄是無盡的，那麼上帝不是比我們的秘密警察更壞嗎？”

鮑里驚訝地睜開了眼睛。“你的意思是你不相信有不滅之火？”

“《聖經》果然提及永遠的地獄。但地獄是甚麼？杜托斯基（Dostoevsky）說它是良心的一種狀態，而他還是一個東正教信徒。在《卡拉馬兄弟》（Brothers Karamazov）中，他提及地獄，說，‘我相信這是一種痛苦，就是沒有辦法愛他人。’”

“我想我不會介意那種地獄吧，”鮑里說。

我說，“也許你還不知道生活在沒有愛的地方，會是怎樣的。當壞人只有壞人陪伴時，想象那光景。據說，希特勒下地獄時，到處張望，直到他找到墨索里尼（Mussolini）。‘老友，這裡怎樣？’希特勒問。墨索里尼回答說，‘不算太糟，’

但有很多強迫勞動。’說罷就開始抽泣。‘來吧，老英雄，’希特勒說。‘讓我們面對最壞的情況。’墨索里尼說，‘你看，我們的督工來了，斯大林！’”

鮑里笑了。“我當然不願意在下面見到我的前老板安娜·保克。”他躺着思考。“那個說我要永遠被燒的天主教神父是個好人，他從來沒有傷害任何人，但他仍然認為，神為了報復（我的咒詛），肯定要永遠折磨我。他比他所信的神更好。”

瓦倫丁牧師說：“我毫不懷疑那些在地獄里的人會覺得這是一種無限的懲罰：就像監獄對我們就如無止境一樣。但是我們看到，在這裏，人們也開始愛上帝，也發現自己錯了。所以我相信地獄也會有進步。在拉撒路的比喻中，富人在地獄里，內心開始改變。他曾是自私自利的人；如今卻開始想到兄弟的安危。於是在地獄中還有向善的可能，這就是一種希望。”

鮑里軟弱地向同伴們喊道：“好消息，孩子們。瓦倫丁牧師說我們畢竟不會永遠被燒烤。”眾人都笑了。雷利，斯達等人也來了。

斯塔將軍並沒有笑。“我在學校和教堂得到的教導是，上帝將會永遠懲罰那些死時依然未曾悔改的人，”他說。“這是公認的教條。”

我用這些話結束了討論：“你果然在理智上接受這些教條，但不在你心里。我們看到我們周圍

的人，在大痛苦中咒罵上帝，否認祂的存在，他們肯定將會為此受審判。但當你看到一個陌生人面臨生命危險時，你肯定是第一個跑去幫助他的。如果基督徒真的相信他們的鄰居將會在地獄里永遠受折磨，他們肯定會不斷催促鄰居們悔改。基督徒沒有這樣做，就是因為他們心中不信這個！雖然他們在腦袋上承認地獄是真的。”

19

鮑里的舊有偏見一一消失，但他非但没有變得開朗，反而沮喪。“我覺得自己浪費了生命，”他說，“我曾自以為聰明。在過去的五十年里，我欺騙了很多人。如果你的上帝存在，祂肯定不會要我住在天堂。所以我必然要下去找那頭老母猪安娜，我現在真的很害怕。”

他經常在睡不着的時候，要求我和他說話。

“當我去世後，誰會為我祈禱？”他問道。他想路德宗是禁止為死者祈禱的。我說路德的意思，只是不想讓人們以為，無論他們犯了多大的罪，只要付錢給牧師，請他代禱，就可以叫死者脫離地獄了。

瓦倫汀牧師說：“我們為每天都在死去的獄友祈禱。當一個靈魂離開身體後，我們就中止為他禱告，不是愛的行為。我們何必因為天主教徒和

新教徒在四百年前為公禱的爭執，就停止這種祈禱？”

“這對去世的人有幫助嗎？”

“當然有用。”瓦倫丁牧師說。“在神面前，人都是活的。於是死去的人，其實依然活着。如果他們還活着，祈禱就有益。”

“如果我是你，我不會把禱告浪費在一個像我這樣的人的身上。”鮑裏笑道，然後又激烈地咳了一輪。

瓦倫丁說：“我確信你也做了很多好事。當然有很多比你更糟糕的人。但我為最糟糕的人祈禱——斯大林、希特勒、希姆萊（Himmler）、貝利亞（Beria）。”

“你祈禱甚麼？”他的聲音越來越弱。

“我說，‘神哪，請原諒那些大惡人和罪犯，在最壞的人中，也請原諒我。’”

那天晚上，瓦倫丁，我，並鮑里一起坐了很久。房間里很安靜，我們可以聽到隔壁牢房弗里姆吹噓的聲音。他們正在為他的性趣聞爆笑。

幾個小時以來，鮑里甚麼也沒說。我以為他睡着了。突然他低聲問道：“那會是甚麼樣子？”

“甚麼？”我問他。

“神的審判。祂是否坐在高高的寶座上，當眾靈魂來到祂面前時，祂就說：“這個下地獄去；這個往天堂；這個下去！這個上來！這個。。。？我無法想象那個形象。”

我就告訴他我心目中的情景。

“我想上帝坐在宝座上，祂身後有一塊巨大的帷幕，我們都來到祂面前。然後上帝用右手做了一個手勢，從帷幕後面來了許多活物。一個比一個更美：它們如此輝煌，以至于我們都不能正視它們。這些輝煌的超人類，各個都站在我們各人的後面。我們就問：‘站在我後面的美麗活物是誰？’上帝回答說，‘那就是你，如果你聽從了我的話，你就會成為這樣的人。’我們聽了，就大大懊悔，逃到永遠的地獄，因為不敢看自己失去的機會。”

“悔恨，”鮑里低聲說。

夜間他發生出血；然後他陷入昏迷。他靜靜地躺着，眼睛盯着天花板。他的脈搏微弱，但在我的手指下仍然還繼續跳動。突然他把手抽回，半坐起身。他發出了一聲仿佛要將靈魂從身體撕裂的呼喊——“上帝啊，寬恕我！”

周圍的一些囚犯被驚醒了，憤怒地嘀咕着，然後倒頭又睡了。

天亮時，我開始清洗屍體，準備下葬，就在這時，有人通知了另一間牢房里的東正教主教。他過來開始喪事儀式。我繼續清洗。主教時不時地打斷自己，對我發出嘶嘶聲，“站起來。尊重一點。”但我沒有抬頭。儀式結束後，主教再次斥責我。

我說：“上周這個人快要死的時候，你在哪里？當他想要水的時候，你有没有給他喝水？為甚麼你最後才來——舉行一個毫無意義的儀式？”

20

在1955年春天，出現了政治解凍的明顯迹象。好些監獄長官因“破壞經濟”而被捕。其中也有被送來奧克納監獄。於是當局必需轉移這裏的囚犯，讓出床位。在六月初，我也必須搬遷到另一個監獄。

阿迪醫生說：“你不適合移動，但我們無能為力。你必需照顧好自己。如果你能得到鏈霉素，不要再給人了。”我向朋友們道別。“我們會再次見面的：我知道，”波普教授說。

我聽到守衛喊我的名字，就加入了院子里的一排人。我們是一羣相貌奇怪的人，剃着光頭，穿着补丁的衣服，各人手里都抓着一捆破布，這是他所有的一切。有些人幾乎無法行走。刑期較長的人被命令向前一步，坐在地上，就有鐵匠上來用腳鐐扣鎖腳踝。一位政治官站在鐵匠旁邊。輪到我的時候，那軍官露出不愉快的笑容，

“瓦斯利，對於戴上腳鐐，你肯定有話要說？”

我側身躺著，抬起頭回答道：“是的，中尉。我可以用一首歌回答。”

他雙手交叉在背後說道：“哦，拜托。我們都想聽聽你的歌聲。”

我唱起了黨歌的開場白：“斷鏈留在我們身後……”鐵匠的錘子又敲了幾下就完成了任務，在不安的沉默中我補充道：“你們唱斷鏈留在我們身後——但這個政權比其他任何政權捆鎖更多的人。”

中尉還沒有想到如何回答，警衛室里就傳來一聲喊叫，宣布火車抵達。我們被趕進車廂，在那里躺了幾個小時，然後火車才開始嘎吱嘎吱地穿過鄉村。透過小窗戶上的洞，我們瞥見了林地和山脈。那是一個溫暖而美麗的夏日。

第五章

從布城向西穿越平原的旅程大約有兩百英里，但沿途停頓的次數太多，幾乎花了兩天兩夜，才抵達人人懼怕的百年監獄：克拉監獄(Craiova Prison)。

他們在鋪着石板的庭院里，把我們的鐵鏈打斷。然後在行走在黑暗通道中時，一路毆打我們。他們把我們三五成羣地塞進走廊兩旁的牢房里。里面傳來大聲的抗議：“這裡沒有地方了。我們已經快要窒息了。”守衛們強行擠人，就像地鐵人潮一樣。

我感到脊椎被大力一推，整個人就向前撞去，門在我身後平然關上。牢房里充滿了令人作嘔的惡臭。起初我甚麼也看不見。我摸了摸，就觸及一個人大汗淋漓的身體。慢慢地，當我習慣了昏暗光線後（只一粒低瓦特燈泡），我看到一層層的床鋪，一直疊到天花板。每一張床都擠滿了喘氣的人。有些囚犯半裸着，坐在地板上，或者靠在牆上。這裏太擁擠，只要你一移動，就會弄醒他人，這就引起咒罵，驚動眾人。

接下來的兩個月里，我只有一次走出這牢房，就是提馬桶去臭氣熏天的粪池。

我告訴眾囚犯說，我是一名牧師，並做了簡短的祈禱。有一些人咒罵我，但許多人靜靜地聽着。然後有人在一個黑暗的上層床鋪叫我的名字。

“我認得你的聲音，”他說。“多年前我曾聽過你在異教代表大會上的演講。”

當我問他的名字時，他回答說：“我們明天再談。”

漫長的夜晚在凌晨五點結束。起床聲號是一名警衛用一根鐵棒敲擊一段懸垂的鐵軌。

原來昨晚說話的那人，是一個回教師。他是個小個子，頭上纏着一塊布，他下來和我握手。

“幸好昨天是在晚上。我才能認出你的聲音，”他那雙充滿血絲的眼睛看着我說。“要不然我真的不能認出你。我可以看到，黨方已經對你的抗議進行了報復。你多瘦啊。”他是一位名叫納

西 (Nassim) 的回教師，曾代表穆斯林小團體出席 1945 年的異教大會。

在克拉監獄，我們的友誼在吃第一頓飯時就開始了。油膩的湯在抵達牢房之前就散發出難聞的氣味。腐爛的卷心菜絲和未洗的內臟（動物的腸子）漂浮在浮渣中。但進食是一種責任，我把自己的一碗喝光了。

“你怎麼能辦得到？”納西問，他的胃已經開始作嘔。

“這是基督徒的秘密，”我說。“我想起聖保羅的話：‘與喜樂的人要同樂。’然後我就想起美國的朋友們現在吃著烤雞，於是就喝第一口湯。接下來，我想到英國的朋友們可能正在吃烤牛肉，味道鮮美，就喝第二口。因此，通過許多友好國家，我與那些快樂的人同樂，就把湯喝完，就得以存活。”

在炎熱、悶熱的夜晚，納西和我共用一張床鋪。我很幸運不必躺在地上。

“你一動不動地躺著，”納西說。我們周圍的其他人都在咳嗽、坐立不安。“你在想甚麼？聖保羅現在有沒有幫助你？”

我回答說：“是的，現在我為西方人感到高興，想到他們舒適的家、他們擁有的書籍、他們可以計劃的假期、他們聽到的音樂、他們對妻子和孩子的愛。我又記得《羅馬書》的這節經文，它下一段是：‘與哭泣的人同哭。’我確信在西方有成千上萬的人記得我們，並正在為我們祈禱。”

2

監獄里的人都感到必須肯定自己。他們喜歡爭論。他們常為了一句話，就火冒三丈。當他們發現有人不會回嘴反駁時，他們就更加折磨他。在克拉監獄，我面臨的困難幾乎是無法克服的。當我講道時，我必須與呻吟聲和假裝打呼嚕聲競爭。囚犯們感到非常無聊。他們沒有內在的資源。他們渴望得到熟悉的消遣。我發現布道很快就變成了討論，然後變成了爭吵。但若有人講故事，尤其是犯罪的故事，就一定會有聽眾。于是我給他們講了我自己發明的驚悚故事，其中基督教信息扮演了核心但不起眼的角色。

我最受歡迎的故事，是一個名叫皮帕的強盜，羅馬尼亞每個人都知道他的名字。我描述了我母親還是一位少女時，如何在法庭上見過他，並且從未忘記過他那張野蠻的、被追捕之神情的臉。

皮帕的父母很富有。當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他們就去世了。小皮帕由一位監護人照顧。那監護人騙走了他的財產。後來皮帕在一家旅館打工，店主答應幫他存錢，等他服完兵役回來後，全數交還。皮帕同意了。當他從脫役回來時，店主卻否認過去的合約。這少年在憤怒中就刺死了店主。

皮帕成為一名亡命之徒，並從他的山中藏身處發動了一系列襲擊——全都針對旅館。多年來，他一共殺死了三十六名旅店老板（此時聽眾們都發出驚訝聲。）他並不缺乏同伴。他和另外兩個歹徒，穿着偷來的最好的衣服，來到一個村庄，說服了三位少女和他們一起吃飯。他們在酒里下了藥，然後把昏迷的少女們帶到了他們的洞穴里。

這些都是事實。但在我的版本中，女孩們醒來時，以一千零一夜的方式給他們講故事，與綁架她們的人保持一定的距離。這浪漫的故事以最漂亮的女孩講述福音故事並贏得不法之徒歸向基督而告終。

同樣廣受好評的還有迪林杰（Dillinger）的史詩般的敘述，他從饑餓的窮困潦倒的人，變成美國臭名昭著的黑幫頭子，這是我的許多聽眾所熟悉的模式。悲慘的童年和社會的不公，常是犯罪生涯的前奏，迪林杰的犯罪生涯是從搶劫電影院收銀員的幾美元開始的。我說，當我們了解皮帕和迪林杰是如何變成現在這樣時，我們就可以憐憫他們；憐憫產生愛，人類之間的愛便是基督教的最高目標。我們譴責人類，但我們却很少提供可能使他們免于犯罪的愛。

我可以一天講二十四小時，依然不會耗盡對故事的需求。很快的，我發現自己在借用帶有基督教觀點的經典作品：陀思妥（Dostoevsky）的《

罪与罚》、托爾斯泰 (Tolstoy) 的《复活》，都是分集講述的。

“牧師，”一位名叫拉迪 (Radion) 的護林員說，“我聽過很多犯罪故事，但沒有一個像你的，最後都是罪犯、受害者和警察一起去教堂。”

眾囚犯都笑了，但還是繼續聽。他們也常常講述自己的故事。他們的總是滑稽的，不然就是悲慘的，或兩者合併。拉迪像他以前照料的樹木一樣高瘦。他的生活曾是平靜的。直到一天，他和兩個朋友在森林里漫步，回頭看到森林正在燃燒。

“當我們到達下一個村庄時，警察就逮捕我們，指我們放火，”他說。“他們毆打我們，直到我們承認縱火，目的是為了破壞當地的集體農場。但在我們的審判中，真正的罪魁出現了，我們就被判無罪。

“別以為我們就可以回家，”他低聲說。“他們又把我們帶回警局，說：‘現在就承認你們還做了甚麼。’在酷刑下，我們承認了一個完全捏造的破壞陰謀。我會說任何話來停止那種痛苦！”他們每人被判十五年徒刑。

在克拉監獄還有很多類似的故事。不久之後，我們就徹底彼此了解。監牢裏的氣氛高度緊張。沒有人能夠忍受不同的意見，一切分寸感或邏輯都消失了。

當我重述漢姆生 (Knut Hamsun) 的小說《饑餓》時，這些人的眼睛都亮了。當大家散去吃晚飯

時，一位名叫海格(Herghelegiu)的囚犯告訴我他有多麼感動。我建議他給納西一點面包，因為納西擔心腸湯裏可能含有猪油，這是《古兰經》禁止的。但如果海格的心靈受感動，他的胃口顯然沒有受感。他沒有接納我的建議。

知識分子是言語的囚徒。如果有人談及一種美國的科學發現，就會被譏諷為美國的宣傳者。如果有人談及一位現代的俄羅斯作家，他就會被斥為“國家資助的共產宣傳家”。天主教徒拒絕猶太哲學家的智慧，雖然還沒有聽過那是怎樣的言論。猶太人對基督教的思想，也知之甚少。

有一次我描述了一本我在漫長的夜晚思考的宗教課題。聽眾馬上進行判決。“充斥着路德宗的想法，”一位東正教徒喊道。“很容易看出你是新教徒，”另一位說。幾天後，在與同二人談話時，我大量引用了“偉大的羅馬尼亞作家”奈耶(Naie Ionescu)的《真理問題》。這二人的反應非常好。於是我決定，如果我想要讀者們公平地思考我的觀點，最好匿名出版，因為這兩本書其實是同一本。

一位名叫亞歷山大的學生在背誦自己的一些詩歌時，無人理睬。我悄悄地建議他讀另一首詩，並宣布它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於是他繼續朗誦自己的新詩。“太棒了，”眾人齊聲說。我在末了公布了亞歷山大的秘密（就是他方才朗誦的，純是他自己的創作。）我告訴眾人不要被名聲嚇倒，而要公正地做出判斷。莎士比亞和拜倫——

僅以英國詩人為例——其實常在他們的作品中頌揚卑劣的思想。

當一位英國文學學者稱頌莎士比亞思想的高貴時，我回答說，當莎士比亞寫作時，宗教改革和清教主義的問題正在激烈爭鬥；然而，一個只讀過莎士比亞戲劇的歷史學家甚至不會意識到基督教已經到達了英國。

“在他所有的戲劇中，沒有一個基督教角色，”我說，“可能唯一的例外只是可憐的科迪（Cordelia）。其他的出名主角扮演甚麼呢？克勞（Claudius）殺死了他的對手。女王嫁給了殺她丈夫的凶手。漢勒（Hamlet）夢想着復仇，他不會也不能原諒。波叻（Polonius）是一個陰謀家。奧菲莉（Ophelia）唯一的解脫就是瘋狂。奧賽羅（Othello）是一名職業殺手。苔絲（Desdemona）只是對她的公牛扮演母牛的角色。伊阿古是一個欺詐人的怪物，不理會自己的行為會不會傷害人……莎士比亞是一位大詩人，又深諳人的心理，但他完全不曉得神，也不曉得真美德。”

那位學者說：“或許真的沒有所謂的真美德，或基督徒的品格？”

我告訴他，我知道他只剛來監獄幾周；當他過多一些時日，他就會明白更多一點。他會看到我所經歷過的一些美好光景：那些在最後一刻懺悔的罪人，那些寬恕凶手的聖徒，就像我們至終希望在得到寬恕一樣。

我也引用了莎士比亞的一些詩句，顯示這位名家本當可以成為怎樣出色的基督徒作者：

他們說臨終之人的舌頭，就如深沉的和音，
引人注意，

他們的言語稀少，絕不白說。

因為那痛苦呼吸的人，吐露的是真理。

如果把這種文字形容耶穌在十架上的話，是多麼合宜。

關於服從上帝的旨意，小納西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他經常提醒我們，《古蘭經》的每一章都以“以仁慈、充滿憐憫的安拉之名”開始，他試圖把“服從”成為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納西每天跪在地上五次，朝向麥加。當人們取笑他時，我告訴他們說，“當華人要面包，德國人要brot，英國人要bread時，他們其實都是要求同樣的東西。格奧是一名天主教徒，所以他用一種方式畫了十字符號。東正教信徒卡羅爾也畫十字，只是先右後左。浸信會信徒伊恩則緊握雙手。那麼納西朝東禱告，有何不對？我們朝見神的方式各有不同，但祂透過我們的愛，洞察我們的內心。

納西在肮脏和混亂的牢房裏鋪位崇拜。他談到他的信仰，說穆斯林相信天使加百利向先知傳信

，他的熱情瞬間改變了那個陰沉的地方。令我驚訝的是，他談到耶穌時充滿了愛。“對我來說，耶穌是一位最神聖、最智慧的先知，他說的是上帝自己的語言。但在我們看來，他不可能是神的兒子。我希望我沒有冒犯你。”

“絕對沒有，”我回答道。“事實上，我同意你的看法。”

“作為一名基督教牧師，你怎能這麼說？”

“我可以這麼說，因為一個孩子是男女結合的結果。在這種意義上，沒有基督徒相信耶穌是這樣生出來的。我們稱祂為神子，是另一種意思。祂之為聖子，因為祂帶有上帝的印記，就像一個人總有他父親的特征。祂是聖子，因為祂充滿了愛和真理。”

“這樣說我也接受。”納西回答。我告訴他，耶穌不會拒絕任何愛祂的人，即使一個人不知道他所愛之人的真實頭銜。

3

我們牢房里的囚犯來了又走。唯一不變的就是空氣。納西在我們中間只有一小段時間，就被迁移了。

每次有人離開，就有新人接替他們的位置。新加入者中有卡萊將軍（General Galescu），他曾

任軍事正義部長，他希望上次的大戰，能再打一次。他承認，大多數的戰爭都發生在“閨房（女人的臥室）”裏，而他最美好的時光，就是在戰爭期間：“有那麼多漂亮的女間諜——如果她們對我好的話，我總是試圖放過她們。”

當卡萊不是談女人時，就是談食物。一天晚上，他宣布：“今天是我的生日：我邀請大家共進晚餐。”由於他年輕時在巴黎度過了許多快樂的慶祝會——“我們將在馬克西餐廳吃飯。請做我的客人。”在一兩個小時的時間里，他不惜費用地用酒店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佳肴來款待我們。

“酒店領班。”他喊道。“你推荐甚麼？馬賽魚浸泡在濃郁的藏紅花醬中？一開始就是這道菜，會不會太重了？那麼就來一碟鵝肝，配來自佩里戈的鬆露，並熱烤面包，新鮮的諾曼底牛油。這一切都太簡單了。然後鴨醬橙子——你喜歡鴨子，不是嗎，牧師，或者紅酒公雞；還有，對於納西，必須是插著火焰劍的燒鵝！”

每道菜都附有一份葡萄酒單。將軍輕聲點了最好的勃艮第和霍克，再加上一大瓶香檳。他又點了一杯金色的伊金城堡酒和陳年白蘭地；然後選擇了名牌雪茄：亨利·克萊牌子、羅密歐與朱麗葉。這歡樂的款待還沒有停止，門就打開，盛有腐爛牛肚和卷心菜湯的桶就送了進來。

在談論食物時，就像在色情白日夢中一樣，想象力盡情發揮。比卡萊更簡單的靈魂發明了香蕉炸雞、草莓醬土豆和許多其他幸好我忘記了的菜

單。事實上，克拉監獄的食物是我所遇到最糟糕的，只有一個令人難忘的例外。這完全是一個驚喜。一天警衛送來一大罐熱氣騰騰的洋葱湯，然後又送來真正的炖牛肉和新鲜胡蘿卜。里面有雪白的土豆泥，每人獲得兩卷白面包。還有一大籃蘋果。我們幾乎期望可以獲得一支芬芳的雪茄！

這意味着甚麼？囚犯們總是在日常生活中最琐碎的改變中看到重大意義，我們都希望看到新的奇迹。下午，卡萊將軍興奮地叫我們到窗前：“女人！該死的，她們要走了！”我們擠在那個有鐵柵欄的小窗，看到五六名衣着考究的女士由司令官領出了大門。後來，一名咧着嘴笑的警衛告訴我們，她們是來自西方的“民主女性”代表團，逗留了一小時才離開。她們對我們監獄的食物大感滿意。

接下來一周的食物比以前更糟。後來我們聽說，參觀者對羅馬尼亞模範監獄的親眼所見，在英國、美國和法國流傳。

4

那些時候，我們見過幾次這種導游服務。當俄羅斯領導層易手時，共產集團對西方的態度常有短暫的解凍，過後再凍結。而這一次，在斯

大林的继任者们暗自斗争后，元帅布爾加寧（Bulganin）出任部长會議主席。

卡萊說，這位前戰爭部长的上台意味着“美國人終於必須開戰了。”他的觀點得到了大量監獄謠言的支持。有消息说，艾森豪總統“親口”說：“我只要扣上我制服上的最後一顆扣子，東歐的俘虏就會重獲自由！”

卡萊的夢想是，一旦紅軍被擊潰，國王就必復位。農民和地主也是這樣想。原因很簡單：“當國王在時，我有我的田地和牲畜。現在他走了，我就失去了一切。”

在羅馬尼亞的前朝國慶日的那天，牢房中許多人都參加了一項儀式，其中包括為國王、王后和太后的祈禱。就連黨方的線人也感到，不干涉為妙。我們中間有一位是左派的共和黨人，校長康斯坦。他總是反對君主制度，但林務員拉迪安卻說，“排場和榮耀對你可能是無需的。但這些對於一個國王卻是理所當然的。因為他無需與誰爭鬥。他与政治家不同，政客必須通過戰爭建立自己的聲譽，總是以我們為代價。但國王卻給我們平安生活。所以我擁護國王！”

拉迪安也擊敗了喜歡嘲笑宗教的卡萊將軍。

將軍說：“如果耶穌真的能把水變酒，為甚麼不開一間酒廊，為自己創造財富？”

拉迪安回答道，“如今已經沒有人證明救主有或沒有把水變為酒。但我可以向你證實，耶穌能把酒變成家私。這是我親眼目睹的。”

“那麼奇妙？”將軍問。

“正是，”拉迪安說。“在我悔改之前，我把賺到的每一塊錢，都用來買酒。我太太連坐的椅子也沒有。當耶穌進入我心後，我們就有錢買家具了。”

那年春天帶來了消息，這次是官方的。它結束了卡萊將軍的戰爭遊戲。俄羅斯人承諾將會從奧地利撤軍，“冷戰十年後，東方與西方的第一次峰會”計劃在日內瓦舉行。很快，人人都說“和平共處”了。左翼校長康斯對此充滿了興趣。“為甚麼西方不應該與東方的共產主義和諧相處？”他問道。

我說：“我不是政治家，但我知道至少教會不能與無神論和解。”

“那麼你討厭無神論者嗎？”康斯問。

“遠非如此，”我回答道。“當然，我討厭無神論，但我愛無神論者；就如我討厭盲目，但愛盲人一樣。由於無神論是精神的盲目，因此我必須與之鬭爭。”

康斯假裝驚恐的說，“牧師，你說爭鬥？要打架了？我還以為基督徒總是轉過另一邊臉？聖法蘭西不是救了一只狼脫離獵人的手嗎？他說，‘不要殺死狼兄弟，它也是上帝造的。’”

“我深深地敬佩聖法蘭西，”我回答道，“但如果我不射殺狼哥哥，它就會吃掉羊妹妹。我殺狼的職責，是受到愛的啓發。耶穌告訴我們要愛我們的敵人，但當別無選擇時，祂自己也使用武力。上帝每天奪走千萬人的生命：祂的本性之一是給人死亡，就如祂給人生命一樣。”

剛來到克拉監獄的工程師格洛（Glodeanu）說，他聽到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廣播，說西方列強不該再試圖干涉共產集團的內政。

我反對道：“如果我在船上敲一個洞，然後對你說，‘別干涉——我打的這個洞是在我一邊，’你會同意嗎？當然不。你會說，‘你在你那兒打洞，可是它最終也會淹死我。’”

“共產黨，”我繼續說，“占領了整個國家，並用仇恨毒害年輕人。他們企圖推翻全世界的。這不是內部事務。”

“這是國際土匪行為，”卡萊說。康斯叫道，“將軍，西方不可能總是正確的，”他說，“斯大林也不是完全邪惡的。他曾說，人類就是我們最寶貴的資本。”

卡萊哼哼道：“這就是我們被關起來的原因。”但康斯堅持認為，在共產主義統治下，工業與文化都取得了不可否認的進步。

“你不能否認這一點。”他說。

我回答說：“古代到埃及的游客會對法老的金字塔感到驚訝，但上帝並不欣賞它們。它們是奴

隶的作品，上帝倒關心那些奴隸。在今天的俄羅斯和衛星國，當局強迫百姓建造你所說的工廠和學校。我們的學校現在教的是甚麼？教導仇恨西方。”

康斯說：“共產黨人說他們的計劃，是放眼未來。這可能會犧牲目前的一兩代人，但我們正在為人類未來的福祉奠定基础。”

我說：“為了讓後代幸福，人們必須做好自己。但是共產黨領導人却不斷地互相指責。蘇聯最有權勢的共產頭領們，每一個都被他們的黨內對手謀殺了。有哪一位共產黨能高興？他們不曉得自己會不會成為下一個受害者。”

“他們也有好的一面，”康斯反對道。“沒有人是完全壞的，共產黨人還保留着上帝的形象。”

我同意。“希特勒也有好的一面。起初，他改善了大多數德國人的命運，使他的國家成為歐洲的第一強國。他為德國贏得了世界，却摧毀了德國的靈魂，甚至是在德國戰敗之前，他已經破壞了她的靈魂。共產主義的成功也是通過犧牲人類最重要的本質，即是每個人的自由意志。”

“世界需要和平，”康斯說。“你的選擇是甚麼？原子戰爭？”

“核戰爭不是一項選擇；沒有人要那個。世界有嚴重的毒癮問題，但我們不會效仿希特勒，將毒癮者送進毒氣室。但我們依然不能與販毒團伙‘和平共處。’即使我們要奮鬥五十年，也必須

找到解決辦法。我們如何能夠與那些無法自己和平相處的人們謀求和平？他們的領導人想要的只是權力。共產黨人想做的就是在下一次發動攻擊之前，軟化我們的懷疑。”

我無法給康斯任何印象，因為他堅信蘇聯自吹的形象。由於他正在我的下層床，於是我就彎下身子，拔起他用來枕頭的小包。他的頭撞到牆上。他很憤怒。

“你為甚麼不能和我和平共處呢？”我問道，“我已經準備好成為朋友了，現在我已經偷了你的枕頭包裹。”但在話題轉向其他事情之前，我必須先歸還他的寶貴枕頭包。

康斯是迷信共產主義的受害者，共產主義是我們最大的危險。在列寧和斯大林學派中，受過訓練的黨員將善意視為可以榨取利益的弱點。於是為了他們的好處，我們必須先擊敗他們。愛不是萬靈丹。共產黨統治者是國際罪犯，罪犯只有被打敗了，才會悔改；那時他才能被帶到基督面前。

我肯定西方的要麼就是摧毀共產主義，要麼就是被共產主義摧毀。

5

為了在東方與西方首腦會議之前，展示共產的好處，當局就停止了我們監獄中一些最無人道的暴行。過去在薩爾（Salcia），當局對犯人的懲罰，包括吊起囚犯腳後跟，以及將婦女浸泡在冰水中幾個小時。如今那所監獄全體職員被捕。官方證據顯示，在“大隊長”之間的競賽中，有 58 人死亡。當時各隊長正在比賽，看那一隊能把最多的囚犯累死；事實上，轉移到克拉監獄的幸存者說，當時累死的至少有八百人。

為了表現司法正義，黨方把薩爾監獄的職員們判了長期徒刑，這次清洗也震撼了其他的監獄。獄方不再毆打囚犯。衛兵變得小心翼翼。當吉拉瓦（Jilava）指揮官格奧（Gheorghiu）上校提問，誰有所投訴時，有人把一盤麥糊拋向他，那名罪犯得到的處罰不過是單獨監禁一天而已。

然而，這改革是短暫的。不久又開始毆打和侮辱了。大約一年後，當西方各國已經遺忘這些監獄的暴行後，薩爾大屠殺的凶手們不單獲得復職，而且還得到晉升。只有那些成為他們酷刑工具的普通罪犯，仍然關在獄里。

在這次監獄大變動中，我多次被遷移。一系列噩夢般的旅程合為一個。我只要閉上眼睛，就能看到一羣沒剃胡須的光頭囚犯在火車上顛簸。我們總是戴着五十磅重的鐵鏈，這些枷鎖割破我們的衣服，在腳上磨出傷口。我們營養不良，需要幾個月的才能痊愈。

有一次，我們在夜間停下來，一聲哀号打破了沉默：“我被搶劫了。”

我坐起來，發現小丹，一個來自布城的小騙子，從一個趴着的人移動到另一個趴着的人，把每個人都搖醒。人人都罵他，但他繼續嚎叫，“我藏了五百元，現在都不見了。這是我所有的財產！”

為了讓他平靜下來，我說：“我的朋友，我希望你不會懷疑牧師偷竊，但如果你懷疑，你可以對我進行全身搜查。”

其他人為了平息這場風波，也讓小丹搜查他們，但是甚麼也沒找到。火車終於開動了，我們一個接一個地睡着了。黎明時分，我被一場新的、更嚴重的騷亂吵醒。其他十八名囚犯也都失劫了。

“我們中間肯定有小偷，”小丹哭道。

幾天後，在我們的下一站——一度臭名昭著的艾巴監獄，我向一名因盜竊罪服刑一年的男子講述了這個故事。他哈哈大笑，說道：“我認識小丹很久了。他只是想知道你們每個人把值得偷的東西藏在什麼地方。”

艾巴監獄有很多“小丹”，在這監獄，“政治犯”和普通罪犯關在一起。有一次，一羣人在玩自制的骰子，我打瞌睡，突然醒來，發現一名囚犯正在解開我的一只鞋帶。另一只鞋已經被他脫掉了。

“你拿我的鞋子做甚麼？”我問道。

“我剛剛通過骰子贏得了它們，”他咧嘴一笑，當我不交出它們時，他很生氣。

盜賊的世界是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我發現他們喜歡談論自己的經歷，而且風險越大越好。他們在刺激和危險中茁壯成長，就像其他男人喜歡喝酒、賭博或女人一樣。我一直對他們的專業精神感到好奇。

一天晚上，當大多數囚犯都在外面時，門突然打開，看守扔了一個扒手，大家都稱其為“手指”。他在地板上打滾，喘着粗氣，呻吟着。我把一塊抹布浸在水里，用海绵擦去他腫脹的嘴里的血迹。看來他是從廚房偷東西的。

“你不是一個壞人，牧師，”手指說。“下一次我有好收穫時，我不會忘記你。”

我說我希望他能找到一種不會帶來如此後果的生活方式。他笑了。“他們打我是在浪費時間，”他說。“我熱愛我的工作。我永遠不會放棄它。”

我用手臂摟住他的肩膀，告訴他：“謝謝你。你給了我一個很好的教訓。”

“你甚麼意思？”手指問道。

“如果毆打不能令你放棄你的職業，我為甚麼不能像你一樣？為贏得靈魂，我該精心思考。我越聽你的故事，就學到更多東西。”

他痛苦地笑了笑，“你在開玩笑，牧師。”

“真的，”我說。“例如，你在晚上工作，如果你第一晚失敗了，你會在第二晚再試。所以我，作為一名牧師，應該整夜祈禱，如果我没有得到我想要的，也不該放棄。你偷別人的東西，但小偷之間也有誠實：我們基督徒彼此之間也應該團結一致。你們這些小偷，不怕懲罰；我們也不該在苦難面前退縮。正如你冒着一切風險，我們也該如此，因為知道可以贏得天堂。”

艾巴監獄便是我妻子經歷過的運河奴役營。我知道她如今在布城。我不斷在想著她。我們住在一系列長屋里，每間小屋住着五十個人。我們周圍有許多廢棄的營房，還有莎賓娜一定熟悉的菜田。幾周後，當我又搬遷時，這種帶著忧郁的安慰也離開了我。

“手指”來對我說再會。和他一起來的還有一位名叫卡拉波（Calapod）的同事，這人是一名出名的強盜，曾令整個郊區恐懼。他拍着我的背，喊道：“這就是那喜歡與盜賊的聖牧師！”

“卡拉波先生，”我說，“耶穌並不介意將自己比作小偷。祂應許說，‘我會在夜間像小偷一樣來。’正如那些被你搶走的人永遠不知道你幾時會來一樣，有一天晚上，耶穌會來討你的靈魂，你却還沒有準備好。”

6

在 克拉監獄和艾巴監獄的潮湿寒冷中度過了幾周後，我的肺結核又全面復發了。我到下一個監獄，就是位于特兰西山脉（Transylvanian mountains）的盖拉監獄（Gherla）時，立即被關進了一排稱為“醫院”的牢房。我們的醫生，一位名叫瑪麗娜（Marina）的年輕女子，告訴我盖拉是她的第一個醫務區。其他病人說，當她初到的第一天，當她從一個牢房到另一個牢房時，她的臉色變得蒼白。她所受的訓練並沒有給她心理的預備。這裏的肮脏、饑餓、缺乏簡單的藥品和設備、粗心與殘忍，是她未曾料到的。他們以為她會暈倒了，但她卻還能堅持，直到檢查完最後一個囚犯。

瑪麗娜是一個身高、脆弱的女孩，金色的頭髮衬托出一張疲憊的臉。但她有巨大的勇氣。檢查後，她告訴我：“你需要營養的食物和充足的新鮮空氣。”

我忍不住笑了，“但是你不知道我們在哪里嗎，瑪麗娜醫生？”

她的眼里涌出淚水。“我還能說甚麼？這是在醫學院學到的。”

幾天後，高級官員來盖拉訪問。瑪麗娜醫生在我們牢房外的画廊里，緊張的對他們說：“同志們，這些人沒有被判死刑。國家付錢給我讓他們活下去，就像付錢給你們，確保他們關押穩妥

一樣。我只要求一些必須的條件，讓我能做我的工作。”

一個男人的聲音粗暴地說：“意思是你站在這些亡命之徒一邊？”

“督察同志，對你來說，他們可能是亡命之徒，”她回答道，“但對我來說，他們是病人。”

情況並沒有好轉，但我們得到一個消息，勝過藥房里所有的藥物。在日內瓦首腦會議之前，獄方允許親屬探訪。

我們都異常興奮，神經緊張。某一時刻，一個人會欣喜若狂；另一會兒，他又幾乎要哭了。有些人已經十年或十二年沒有家人的消息了，而我八年沒有見到莎賓娜。

這一天終於到來了。守衛呼叫我的名字，帶我進一個大廳，站在一張桌子後面。大約二十碼外，我看到妻子坐在另一張桌子後面。指揮官和他的手下站在我們背後的牆邊，就如主持一場網球比賽。

我凝視着莎賓娜，在我看來，在她受苦的歲月里，她獲得一種我未曾見過的平靜與美麗。她雙手合十地站在那里，微笑着。

我抓着桌子喊道：“你在家還好嗎？”

即使我自己，也感到我的聲音聽來生疏。她回答說：“是的，我們都很好，感謝上帝。”

司令官插話道：“這裡不能談上帝。”

“我媽媽還活着嗎？”我問。

“讚美上帝，她還活着。”

“我已經告訴過你，不許提上帝。”

然後莎賓娜問道：“你的健康怎麼樣？”

“我在監獄醫院——”

指揮官說：“你不可以透露你在監獄里的位置。”

我又嘗試說：“關於我的審判，還有上訴的希望嗎？”

指揮官又說：“你不准討論你的審判。”

就這樣，直到我說：“回家吧，莎賓娜，親愛的。他們不讓我們說話。”

我妻子帶來了一籃子食物和衣服，但她連一粒蘋果也不能給我。當他們把我帶走時，我回頭看，見到她在武裝警衛的護送下穿過大廳另一端的門。指揮官點燃了一根新香烟，他的思想飛到別的事物去了。

那天晚上，瑪麗娜醫生停在我的床腳，一臉關切。“哦，親愛的，”她說。“我還以為你妻子的來訪會給你很多好處。”

幾周以來，瑪麗娜醫生和我成了朋友。她告訴我，她沒有受過任何有關宗教的教育，但認為自己是無神論者。“這些年頭，大家不都是這樣嗎？”

有一天，我和瑪麗娜以及另一名基督徒囚犯一起在她施手術的小房間，我提到那天是五旬節。

“那是甚麼？”她問。一名執勤的警衛正在檢查文件，我等他帶着他想要的卡片離開，然後才回答：“今天是神賜律法的日子。幾千年前，在這節日，神給了我們十誡。”

我聽到警衛回來的脚步聲，就大聲補充道：“醫生，我咳嗽的時候這裡很疼。”

警衛把卡片放回檔案里，又走開。我繼續說道：“五旬節也是聖靈降臨到使徒們身上的日子。”

看守的脚步聲又餉了，我連忙說：“晚上我的背疼得厉害。”

瑪麗娜醫生咬着嘴唇不讓自己笑出來。我繼續我被打斷的布道，而她則拍着我的胸口，叫我咳嗽，並盯着我的喉咙，直到最後她突然大笑起來。“停下來，”她喘着氣，用手帕捂住嘴，警衛冷漠的臉再次出現在門口。“稍後再說。”

在接下來的幾周里，我告訴她福音的故事，當我和盖拉監獄的其他信徒引領瑪麗娜醫生歸主後，她冒着更大的風險來幫助我們。多年後，在另一所監獄，我聽說她死于影响心脏的风湿热。她肯定是工作過度了。

我又被帶回瓦卡監獄。就是我在內政部牢房里單獨監禁一個月後，送去的監獄醫院。這裏比以往更加擁擠。結核病患者和其他病人必須共用房間，互相感染。

兩名拷問我的秘密警察問，現在我對共產主義有何看法。“我該怎麼說呢？”我回答。“我只能從監獄裏看共產主義。”

他們笑了，其中一個說：“現在你可以從一位貴賓那里了解多一點。前財政部長盧卡（Vasile Luca）就在你的牢房里。”

1953年3月，盧部長就因貨幣丑聞被解職。德伊正在打壓安娜保克集團。盧卡和內政部長喬治（Theohari Georgescu）一起被開除黨籍。現在這三人都在不同的監獄里，與他們統治五年期間關押的受害者們，一同坐牢。在盧卡掌權的日子，奉承他的人多，愛他的少。現在，獄卒和囚犯都趁機蔑視他。盧卡獨自坐在我們牢房的角落里，咬着手指的關節，自言自語——他又老又病，樣貌已經不像過去常出現在報上的那人了。

一個基督徒，無論遭遇甚麼困難，都知道他是為了信仰，走基督受苦之路，他們有末後的希望；但盧卡為共產主義奮鬥了一生，卻毫無希望。如果反共人士（民族主義者）奪取了政權，或者美國人來了，盧卡和他的戰友將是頭一批上吊的。而目前他們卻被自己的同志們處罰。兩頭都是死路。當我們見面時，盧卡已經接近崩潰的邊緣。

他告訴我，在被拉下臺後，他在酷刑下承認了最荒謬的指控。軍事法庭判處他死罪，隨後減為無期徒刑。

“他們知道我活不了多久，”他咳嗽着說。

他習慣對黨內的敵人大發雷霆。有一天，當他吃不了我們牢房里的發臭湯糊時，我把我的面包遞給了他。他如飢似渴地接過它。

“你為甚麼這麼做？”他問。

“我了解到在監獄中禁食的價值。”

“那是甚麼？”

我說：“首先，它表明精神是身體的主人。其次，這就讓我免了與人的爭吵。第三，如果一個基督徒在監獄里不禁食，他還有甚麼可以送給人的？”

盧卡咽下面包，承認說，自從被捕以來，給他幫助的都是基督徒。但他的內心的苦毒又發作了。

“然而，我認識的惡棍牧師太多了。作為黨中委的一員，我對宗教的管控非常嚴格。我的部門對全國的每一位牧師都存有檔案——包括你的檔案。我詫異羅馬尼亞是否有一位神父不會在天黑後敲我的後門（行賄求助）。真的是一羣好兄弟啊。”

盧卡對世界的怨恨不允許他承認任何人的善良。他背誦出無神論者常提的，有關教會迫害科學的曆史。我讓他想起許多基督徒科學家——從牛

頓、開普勒 (Kepler) 到巴甫洛夫 (Pavlov) 和麻醉劑的發現者辛普森 (Sir James Simpson) 爵士。

盧卡輕蔑道：“他們只是順應了當時的習慣，所以上教堂！”

我說：“你知道發現微生物和疫苗的巴斯德 (Louis Pasteur) 的宣言嗎？‘Je crois comme une charbonniere le plus que je progresse en science.’ 他像煤礦工人一樣相信，就像上世紀的女煤礦工人一樣。這位杰出的科學家保留了最簡單工人的信仰。”

盧卡憤怒地說：“教會迫害的科學家呢？像伽利略，他被抓送去監獄。佐丹奴 (Giordano Bruno) 被燒死了……”他停了下來。

我說：“於是你在兩千多年里只能找到兩起案件。以任何人類標準來看，這都是教會的勝利。比較一下過去這十年來共產黨的暴行。僅在羅馬尼亞，就有數千無辜者被槍殺、折磨。你自己也是被偽證和威脅、還有黨方賄賂獲得的虛假口供陷害的。你認為在共產掌權的各國，會有多少誤判？”

但盧卡對宗教封閉了自己的思想。

一天晚上，我談到最後的晚餐，以及耶穌對猶大說的話：“你要做的事，快去做吧。”

過了一會兒，盧卡對我說：“沒有甚麼能讓我相信上帝，但如果我相信上帝，我唯一的祈禱就是‘你要做的，快做吧！’”

他的病情恶化。他吐血，發燒時額頭上冒出冷汗。

就在那時，我被轉移到另一所監獄，在我離開之前，他許諾會為自己的靈魂思考。我不知他將會如何，但當一個人開始與自己辯論時，他找到真理的機會就很小了。悔改常是瞬時出現的。神的信息刺痛人心，從內心深處立刻出現一些新的、具有治愈作用的東西。

那時我遇到了很多像卢卡的人，並經常與朋友討論當共產主義垮台時，我們該如何對待共產黨的頭目和他們的隨從。基督徒都同意寬恕敵人。可是依然分為兩派：一派認為寬恕應該完全，另一派則認為寬恕也有限度。耶穌告訴彼得，寬恕“不是七次，而是七十個七次”。而共產黨人早已大大越過七十七次了。

我的觀點是，在對每個人進行了個別的辨別後，明白各人行惡的緣故，就將各人放在他們不再能作惡的地方，不帶有任何報復心理。共產黨人已經花了大量的時間精力，彼此懲罰。有傳言說斯大林毒殺了列寧，又用冰鎬殺了托洛斯基。赫魯曉夫憎恨斯大林，以至于毀掉了斯大林的名譽，並盜竊了他的坟墓。卢卡、喬治、安娜鮑克等人都是他們殘酷制度的受害者。

我的下一個旅程是走公路，乘坐一輛貼有“國家食品”標籤的卡車：囚犯保安車上經常貼有這樣的標志，以隱藏不斷移動的囚犯人數，也許也擔心囚犯被人營救。當時與我同車的有兩位囚犯。其中一人是前鐵衛隊首領，被判二十年徒刑。另一名是一名小偷，已入獄六個月，預計很快就會被釋放。

“我不會再看到這些了，”鐵衛隊長搖晃着鎖鏈，很高興地說。然後，他背對着我，告訴小偷說，官方已經同意在大國首腦會議之前，要釋放所有的“政客”。小偷就說，他想要的只是一份正當的工作，可是卻沒有人給他。

那位鐵衛隊長表示同情。然後，他抓住鄰居的袖子，說：“我有一個好主意！為甚麼我們不能互相幫助？既然俄羅斯人已經讓步，美國人將在一個月之內到達這裡。我在高層有些有影響力的朋友。假設我們交換了身份——在下一站，你回答我的名字，我回答你的名字。一旦我用你的名字出獄，我就為美國的接管做準備。你用我的名字，不久就會當作政治犯獲得釋放。其餘的由我來辦——你的未來肯定有保障！”

小偷很高興。我還沒來得及干預，面包車就抵達監獄，兩人回應對方的名，被帶到不同的所在。十天後，隊長被釋放了。小偷眼睜睜地看着幾周、幾個月過去了，卻沒有美國人的消息。面對履行他人的長刑，他告訴了司令官真相。於是那

名鐵衛被追捕回來。但這小偷卻也被判二十年，罪名是幫助法西斯罪犯逃跑。

這新監獄名為吉拉瓦(Jilava)，意為“潮濕地”。進入其中時，卡車沿着陡峭的坡道駛下，我們就落在地下潮濕的黑暗中。吉拉瓦最深處，達三十多英尺。它原是一座堡壘，周圍有戰壕，不知情的人可以在上面走過而不知道它的存在。羊羣在上面吃草，我們感覺被活埋在數千噸的泥土下。吉拉瓦可以容納 500 名士兵，但現在它卻關押了 2000 名囚犯，這些牢房和隧道也有加以擴大的，成為給囚犯們體操的庭院。在某些地方，有水順着牆壁流淌，牆壁上沾滿了大片綠色的苔蘚。

我旁邊鋪位上的波佩上校(Popescu)是敖德薩的前警察局長，他說，當他到達時，情況要糟糕得多。一百個人擠在我們的小牢房里，窗戶用木板封住，有些人窒息而死。

波佩又說，戰後他在一個山洞里藏了十二年，避開俄羅斯人。他睡在稻草上，吃的東西，是外面的朋友從一個小洞塞進去的食物。但最終，秘密警察找到了他。在這狹小的空間里蹲了這麼久，他的雙腿已經開始麻痺。出來幾個月後他才能行走。

從波佩粗俗的談話中可以明顯看出，宗教多年來一直不在他的思想中。我問他怎樣渡過孤獨的山洞。

“我構思了一本小說，”他說。“如果我把它寫下來，可以長達五千頁。但沒有人敢發表。”

我問為甚麼。波佩就背誦其中的一段，我就明白了。我從來沒有聽過如此淫穢的洪流。

幸運的是，走廊里的一聲喊叫宣布我們開飯了。我拿著自己的那碗腐爛胡蘿卜湯，到一位鄰居的鋪位上，我們坐下來聊了一會兒。他是一位年輕的無線電員，曾為一個愛國團體向西方傳輸信息，他提到他是通過摩爾斯電碼，認識主耶穌的。

“事情發生在五，六年前。我在內政部的牢房里受到審訊，當我在那里時，隔壁一位不知名的牧師通過牆壁向我敲擊聖經經文。”

當他告訴我他牢房的位置時，我說，“我就是那個牧師。”

在他的幫助下，我們逐漸建立了一個基督徒核心，在整個監獄中傳播神的道。但有一個人却是人人都撇棄的。沒有人愿意与格奧（Gheorge Bajenaru）有任何關係。格奧是一位東正教主教的兒子，被稱為“羅馬尼亞最邪惡的神父”。他通過偽造父親的簽名來獲得榮譽和學位。後來又盜用他妻子的校長名義盜用一所學校的資金。當妻子自殺以掩蓋他的罪行時，格奧完全沒有任何悔意。他甚至為了錢而告發自己的父親。然後他假扮成難民跑去西方。在那里他很快就被任命為主教，控制着所有羅馬尼亞東正教流亡者。他從

他們和《世界基督教協進會》那里獲得了資金。與此同時，共產黨人則在等候時機。

格奧是一個世俗而傲慢的人，身體魁偉如公牛。但現在他卻消瘦了。他告訴我發生了甚麼事。他前往奧地利參加一位富有的羅馬尼亞人的婚禮，並在那里住了幾天。一天晚上，他從一家法國區的餐館出來時，聽到身後有腳步聲。四個大漢向他撲來。他感覺有一支針刺進了他的腿。

“我在蘇聯區醒來。牆上有一面鏡子，但我不認識鏡中的人。我的黑胡子不見了。他們把我的頭髮剪短，染成紅色。我被飛往莫斯科的盧比監獄（Lubianka prison）。拷問官們以為我是英美間諜界的關鍵人物。他們想知道《世界基督教協進會》在鐵幕後的陰謀，以及羅馬尼亞流亡西方者的秘密計劃。我甚麼也說不出，因為我只是在享受人生。可是俄羅斯人不信我。“好吧，主教，”他們說，“我們必須用手術激發您的記憶。”

格奧舉起雙手，顯示他的指甲，幾乎全部都被拔除了。“他們逐一拔掉，”他說。“醫生穿着白衣服。兩位護士也是。他們有一切醫生的道具，只是沒有麻醉劑。”

格奧被酷刑數周。當俄羅斯人確定他根本沒有任何秘密可以提供時，他已經快要瘋狂了。俄人就把他移交給布城的秘密警察。在那裏他們又開始折磨他。

在吉拉瓦，黨方對他的審訊仍在繼續，當他審問完畢回到我們的牢房時，囚犯們指責他告密。事實上，他只希望為自己的所作的贖罪。苦難淨化了他。但其他人却拒絕相信，儘管格奧在很多方面都表現出了他的改變。有一次，他舉行公開禮拜儀式，大聲為國王和王室祈禱時，有人告訴守衛。他和我以及其他一些神職人員一起被送到“黑屋”。

我們被趕下一段陡峭的台階，來到堡壘深處一個沒有窗戶的地下房間，這可能是一個廢棄的彈藥庫：因為外面的炮彈肯定不能穿透到這裡。水從房頂滴下來，把地面浸濕。即使在夏天，這裏也冷得刺骨。當時在黑暗中有人說：“我們必須不斷行走。”於是我們形成一隊，開始不斷的兜圈步行，在黏糊糊的地板上滑倒，又起來再走，幾個小時後，我們精疲力竭，摔得遍體鱗傷。

我們很幸運。有人說過去有些人被脫光衣服趕下去。又曾有十八人在黑屋里存活兩天。為了避免凍死，他們在黑暗中形成了一條人蛇。每個人都緊緊抓住前面的人取暖，他們緩慢地繞圈子，從頭到腳都沾滿了污穢。經常有一個人倒下，但其他人總是把他從汗水中拉上來，強迫他繼續前進。

格奧繼續為國王祈禱。他最後一次被傳喚受審，回來時平靜地說，他已被判死刑。格奧終於達謙卑。我注意到，謙卑的人犯了大罪後，往往比靈性高尚的基督徒更能抵抗迫害。生活在羅馬戰

車比賽時代的聖克里斯頓（St John Chrysostom）曾說：“如果一輛由正義和驕傲的馬匹牽引的車與一輛由罪孽和謙卑牽引的車較量，我相信第二輛車將會先抵達天堂”。

波佩上校建議格奧上訴。格奧回答說：“我不承認這些法官。我只服從上帝和國王。”

在他被轉移到死囚室後，波佩承認說，“也許我們對他的批判也是錯的。”

我們已經四個月沒有聽到他的消息了。然後他回到我們的牢房，他的死刑改為無期徒刑。儘管他性格完全改變了，但大多數犯人還是拒絕他。當黨方建議他為秘密警察效勞，就可以釋放時，他回答說：“當最後一個牧師也獲釋了，我才會離開監獄。”

格奧被轉移到另一間牢房，在那里他遭到囚犯的拳打腳踢。他曾兩次試圖自殺。後來他被轉移到另一所監獄，並在那里去世。

9

我在吉拉瓦時，第一次被處決是阿爾諾兩兄弟（Arnautoiu），他們作為游擊隊員在森林里生活了多年，直到一名婦女探望他們的藏身處。這女人被士兵跟踪，那兩兄弟就被抓獲。

處決是在嚴肅的儀式下進行的。黎明時分，走廊里站滿了警衛，數百名囚犯在牢房里透過裂縫觀看指揮官帶領一小隊人進入院子。首先走來的是兩名高級軍官。然後，兄弟倆帶着鎖鏈，兩側都有警衛。一名醫生尾隨其後。更多的警衛跟在後面，手里拿着機關槍。當這二人的鎖鏈被打斷後，他們的頭被套上麻袋，然後被推進車里，車開到不遠的郊外。在那里，一位僧子手向他們的後腦勺近距離射擊。我們聽到了槍擊聲。

那位僧子手是一位名叫尼塔（Nita）的吉普賽人，他每次都獲得500里尔（羅馬尼亞幣，lei）的獎金。他是我們這裡最有禮貌的看守：囚犯們稱他為“吉拉瓦黑天使”

“我總是在他們的行刑日之前，在牢房里給他們最後一支烟，”他告訴我們。“我試圖讓他們保持勇氣，這並不像你想象的那麼難，因為他們每個人都相信自己會在最後一刻獲救。”

奇怪的是，這確實發生在一個十九歲的年輕人魯格（Lugojanu）身上。他的父親是前朝政府部長，在監獄被酷刑致死。那少男就在一些朋友協助下，對軍警進行了一系列的襲擊。其中一名參與突擊的人在被捕後吐露實話，因此魯格與其餘八人都被判處死刑。

頭兩個人被帶到院子里處死，然後是第二對。其他人聽到鎖鏈被拆除的聲音。他們聽到警衛過來接下一對。其中一位後來告訴我，“我感到非常平靜。我看到了基督，祂對我說溫柔的話。我

有信心我會被緩刑。”當他的牢房的門打開了，却是指揮官本身。原來從布城傳來指令，吩咐其餘的死刑犯都獲減刑。在監獄里，我多次看到這種神秘的力量在最後時刻支撐着人們。

黑天使的禮貌是他個人對這份丑惡工作的道歉。但其他獄卒卻沒有這種感動。

吉拉瓦監獄是一個中站。囚犯們常在這裏遇見過去的仇人。許多囚犯都是過去的警員。共產黨時常利用前警官訓練秘密警察。然後，在用盡他們的好處後，學生們就逮捕他們的教官，因為他們曾是反共分子。最終沒有一個舊政權的官員能夠逃脫被清算的厄運。

但有一天，他們心中的仇恨找到了一個新的發泄焦點。

那人是從另一個牢房被扔進我們牢房的一個囚犯。這人傷痕累累，衣衫襤褸肮髒，下巴鬆垮，驚恐地看着我們。一聲怒吼响起：“阿爾本！”阿爾本上校曾經是艾巴監獄的指揮官，他曾將數千人逼死。現在阿爾本成了運河失敗的替罪羊。我們記得阿爾本如何迎接新來的囚犯：“教授、醫生、律師、牧師和所有的聰明人——在這里，我們不需要大腦；我們只需要雙手，你們的高貴的手。作為報酬，你們會獲得呼吸的空氣。別以為你們將會獲釋，除非你們死了——或者是他們停止運河工程，把我關起來！”

現在，這位無所不能的阿爾本就像一只被催眠的兔子一樣盯着我們。一名囚犯抓住他的衣領，

把他拉了起來。另一個人把他轉了過來。第三個人踢了他的下體。阿爾本在猛烈的打擊下倒地，歇斯底里地尖叫着。

我試圖救他，但那些人却轉向我：“那麼，你也站在這凶手一邊？”

阿爾本在嘲笑聲中掙扎着站起來，全身是血和灰塵。他雙手捂住臉，在走向門口的途中再次摔倒，被床鋪的尖角嚴重割傷。襯衫被粗暴地從他的背上撕了下來。最後，他倒在了地上，一動不動。

阿爾本在一個又一個牢房中遭受折磨，直到最後他被轉移到瑪里監獄（Ocnele-Mari prison），就是專門容納失寵之前官員的監獄。

幾天後，我認出了另一張熟悉的面孔，杜上校（Dulgheru）。他曾是秘密警察的首席檢察官。他曾在卡利單獨監禁牢房，審問我一個星期。我馬上警告他有關阿爾本的命運。他試圖不讓人認出他，但總有人很快就發現他。

他告訴我，他被指控是前朝政府的警察細作。當共產黨要坑害一名同志時，常用這種指控。他描述了他被捕的情況。當時他帶着三名下屬，前往牢房審問一名囚犯。他們禮貌地打開牢房門，讓他進去，就在他身後關上了門。杜爾發現自己被鎖在一間空牢房里。他打門要出去。他的手下卻大笑。他聽到其中一個人說：“這一次你便是籠中鳥。”

當杜爾的身份在吉拉瓦被發現時，他遭到囚犯的野蛮襲擊，以致必需被轉移到馬里監獄去。那所黨方的監獄很快也爆滿了。

他離開後不久，我被帶到布城接受審訊。在秘密警察總部，一位身穿制服的上校提出的問題，似乎是為了解我對政權的態度，而不是為了聽我的回答。他沒有告訴我他見我的真正目的。

監獄里人滿為患，“秘密”囚犯共用牢房。我和一個身材魁梧、悶悶不樂的人關在一起，他原來是首席“再教育者”圖爾（Vasile Turcanu）。他被判死刑。過去黨方曾給他殺人的准證。如今黨方不立刻殺他，是為了在需要轉移國民視線時，才宣布處決他。

圖爾提及他的前老板、可怕的安娜鮑克（Ana Pauker）。他說，她也遭受酷刑。他們首先把她與被她逮捕的法西斯婦女們同牢，然後再把她關押在精神完全錯亂的婦女囚室中。圖爾也提及1953年清算時，內政部長喬治（Teohari Georgescu）被捕的情況。

喬治自己的三名保鏢拿着左輪手槍進來時，他正坐在辦公室里的一排電話機前。他們命令喬治起立，轉向他自己的金邊肖像，脫下褲子給他們搜索。

我在秘密警察總部期間，聽到的最令人吃驚消息是，在蘇聯，斯大林被他的繼任者赫魯曉夫（Khrushchev）譴責為殺人犯和暴君。還有，新總理赫魯曉夫于1953年聖誕節前夕處決了貝利亞（

Beria) 和他的六名得力助手，以及數千名較小的蘇聯頭目。羅馬尼亞也開始詆毀斯大林。羅馬尼亞新獨裁者德吉正在推行一項更受歡迎的政策。德吉自己也喜歡過好日子，他的性情比安娜包克圈子里的人好的多。

10

我帶回吉拉瓦監獄的消息，令牢房哗然。每個人都為斯大林失神座（逝世又蒙羞）感到高興。各人都希望這能加速他們自己的釋放。

但波佩說，“我了解共產黨。他們會譴責強盜，但不會償還被搶劫的人。”

“無論如何，斯大林已經完了，”另一名囚犯說。

“愿他燒在地獄中。”第二個喊道。在歡笑聲和嘲笑聲中，兩名囚犯一起跳着華爾茲舞蹈，尖聲喊着“喬叔叔（斯大林小名）”的猥褻言論。只有獄卒們沉默不語。斯大林的失勢可能危及他們。

波佩對我喊道：“你看起來不太高興，牧師？”

我說：“我不能對任何仇恨感到快樂。我們不知道斯大林的命運。他可能在最後一刻得救，就如十架上的強盜一樣。”

這是一個不受歡迎的言論。在斯大林犯下這麼多罪行之後，怎麼會有人這麼想呢？

“也許他就像一個富翁，一生只做了一件好事，最後却上了天堂。”我便告訴他們這個故事：

“曾有一個靠剝削窮人而發財的富翁，滿心憎恨他鄉裏的牧師，僅僅是因為那牧師為人善良。當他們在街上相遇時，這富翁總是向牧師的臉上吐口水，而牧師卻不回避，心想，這可憐的富人大概沒有別的樂趣了。然而，這位名叫博德的富翁每年都會去一次教堂，總是在耶穌受難日。當他聽到受難的故事時，兩滴眼淚就會從他肥胖的臉頰上滾落下來。他偷偷地把它們擦掉，然後在奉獻袋開始流傳之前，就起身回家。

“在一個受難節，一大羣會衆等待禮拜開始。牧師卻沒有出現，博德也沒有來。一個小時過去了，終於有人看向祭壇後面。牧師躺在地板上，平靜地呼吸，閉着眼睛，臉上洋溢着幸福的表情。人們意識到他正在受聖靈的感動。原來那天早上，博德已經去世，並在接受審判。當魔鬼將他所有的惡行都放在天平上時，他的守護天使除了他每年流下的兩滴眼淚之外，沒有甚麼可以放在另一邊的。然而，這些眼淚的重量却與所有惡行的總和一樣重。於是怎麼辦？博德開始出汗，全身顫抖。就在這時，上帝移開了視線，財主就從天平上偷偷取去一些惡行。天平就向博德這邊傾斜。但上帝卻是可以看到背後的。祂悲傷地對財主說：‘從來沒有人敢在審判日欺騙我。’祂環顧

四周，問：‘有誰要位這人說話？’天使們都沉默。

“上帝說，‘這裏不是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我們不能在沒有辯護律師的情況下定一個人的罪。’但連富人的守護天使也不敢為博德辯護。他只說，‘博德的鎮上有一位牧師，為人非常好。或者他願意為博德說話？’於是牧師被傳召到天堂，他的身體就留在教堂的講臺地面。當博德看到這牧師，就是他經常羞辱的，他想自己完蛋了。可是那牧師卻說，‘天父，我們中間誰更好？是你還是我？如果我比你更好，請你從寶座下來，由我取代，因為我每天都讓博德向我吐口水，一點也不難。如果我能原諒他，你不能嗎？’

“‘我的第二個請求是，耶穌為人的罪死在十架，雖然在我們不幸的羅馬尼亞，我們可能為同一件罪行重複受罰，但如果您叫博德為他的罪再次受苦，卻不正確，耶穌不是已經代他受罰了嗎？’

“‘第三，這是一個實際問題。如果他去了天堂，與您何損？如果天堂太小。你可以加大它。如果您不想在善良的人中引入邪惡，那就為這些迷失的靈魂創造另一個天堂——也給他們一點幸福吧。’

“他的論點很得神的喜悅，於是神立即向博德喊道：‘現在去天堂吧。’財主趕緊走了。神轉向牧師說：‘你在這裏呆一會兒，和我談談。’

“‘谢谢你，’牧師說，‘但是我還沒有進行晨禱，大家都在等着我。我必須回去告訴人提防罪惡。但我也會告訴他們說，你已經履行了你的任務，真的寬恕了我們所有人，包括最糟的。如果你開始根據我們的罪來審判我們，我們一個也難逃。’”

牢房里默默地聽着這個故事。“那麼，”波佩問，“你會在上帝面前為斯大林辯護嗎？”

“谁知道斯大林是否沒有為他的罪孽哭泣呢？”我說。“心理學家說，一個人犯下的罪行越嚴重，他所該承擔的責任就越少。像希特勒這樣的人，屠殺了數百萬，像斯大林，殺了千萬，包括自己的戰友——這樣的人都是不正常的，我們不能用我們的標準來評判他們。”

波佩上校說：“我在這個牢房里從你那里聽到了很多基督教教義，但這是最好的——也是最難行的。”

11

在一九五六年春天，一些燕子在牢房屋頂靠近窗戶的高處築巢。有一天，一陣叭叭喳喳的聲音宣布雞蛋已經孵化了。一個囚犯站在另一個囚犯的肩膀上，向鳥巢里張望。“有四只，”他喊

道。鳥爸媽似乎從未休息過。它們轉移了我們的思路。我們不再猜測自己的釋放日，轉而去計算這對父母鳥進出巢穴喂雛的次數——每天 250 次！一位老鄉人說：“小鳥在第二十天就會飛了。”其他人都笑了。“你們且看著，”他說。第二十天甚麼也沒發生。在第二十天，幼鳥們在叽叽喳喳的叫聲和扑騰的聲音中飛走了。我們都很高興。

“上帝已經算定小鳥的日子，也安排了它們每一只的行程，”我說。“祂也已經為我們的行程作了妥當的安排！”

幾周過去了，譴責斯大林的聲音果然帶來另一次“解凍”。我想這種情況不會持續太久，但許多囚犯卻真的獲釋放了。我會不會也成為幸運兒之一？但想到這個，我只感到悲傷：當局如果現在放我走，有甚麼用？我兒子已經長大了，幾乎記不起父親了。莎賓娜也習慣了她的獨立生活。我們的教會肯定已經有別的牧者，就是一些比較不惹麻煩的牧者。

一天清早，一聲呼叫打斷了我的思緒：“上庭審訊！馬上去！”

又必須面對欺凌、恐怖和許多問話了。這些問話都必須給與適當的錯誤答案！我開始收拾東西，獄卒大聲喊道：“快點，快點，車在等著。”我和他匆匆穿過走廊，穿過院子。我們爬上台階，打開一扇又一扇的鋼門。然後我就到了監獄的高牆之外。

我看不見汽車，只有一個書記遞給我一張紙條。我拿了看。這是一份法庭的指令，宣布根據1956年6月12日的特赦，我獲得了自由。

我呆呆地看着它，說道：“可我只服了八年半，我的刑期是二十年。”

“你得立刻離開。這來自最高法院。”

“我還有將近十二年的服役時間。”

“別爭論。出去。”

“但是看看我。”我的破烂衬衫沾滿了灰尘，成了灰色。我的裤子上釘滿了不同顏色的补丁。我的靴子好像是從卓別林那里借來的。“我會被第一個碰到我的警察逮捕的。”

“這裡沒有你的衣服。快走。”

書記轉身返回監獄。大門呼然關上，裏面上扣了。監獄圍牆外看不到一個人影。我终于獨自一人，置身于一個空蕩蕩的夏日世界里。温暖的六月天如此安靜，我能聽到昆虫的嗡嗡聲。一條长长的白色道路在令人驚嘆的深綠色樹下延伸。在栗樹林的樹蔭下，奶牛正在吃草。多麼安靜啊。

我大聲喊道，以便守衛能在牆後聽到：“上帝啊，幫助我不要因為獲得自由而高興！你和我同在監獄，也一樣值得高興！”

從吉拉瓦到布城有三英里。我背起行囊，開始行這條田野之路。那行囊只是一堆發臭的破布，但在監獄，它們是如此珍貴，以至于我從未想過拋棄它們。很快我就離開了路面，走在深深的草

丛中，摸着沿途樹木的粗糙树皮。有時我停下來凝視一朵花或一片含苞待放的葉子。有兩個人影向我走來，是一對鄉村老夫婦。他們拦住我，好奇地問：“你是從那裏出來的？（他指向監獄）”那人拿出了一枚列伊（leu），一種價值一便士左右的硬幣，交给了我。我看着手上的硬幣，不禁笑了起來。以前沒有人給過我一列伊。

“把你的地址給我，這樣我就可以還錢給你。”我說。

“不，不。您只收下。”

他催促我，用“您”，就像人們對待孩子和乞丐一樣。

我繼續提著包裹行走。另一個女人擋住了我。“你是那裏出來的？（她又指向監獄）”她希望得到幾個月前被捕的吉拉瓦村牧師的消息。我沒有見過他，但說我自己也是一名牧師。我們坐在路邊的牆上聊天。我很高興遇到一個想談及基督的人。當我上路時，她也拿出了一枚列伊：“車費。”

“但我已經有一列伊了。”

“那就看在我們主的份上，收下它吧。”

我繼續往前走，直到到達市郊的一個車站。人們圍在我周圍，他們一看便曉得我從哪里來。他們詢問了兄弟、父親、堂兄弟姐妹，幾乎每個人都有親友入獄。當我登上公車時，他們不讓我付錢。有幾個人站起來讓座。在羅馬尼亞，被釋放

的囚犯絕不會被人遺棄，而是備受尊敬的。我膝蓋上放着包袱坐着，車剛啓動，就聽見外面喊道：“停！停車！”我的心都快停止了。公車猛然停下，前面有一個民兵的摩托車擋路。肯定出了差錯，他是來抓我回去的。但是公車司機卻回頭喊道：“他說有人站在車門的梯級上。”

我坐在一位女士旁邊，她提着一大籃新鮮草莓。我難以置信地看着那些草莓。

“今年你還沒有吃過草莓嗎？”她問。

“八年沒有吃過了，”我回答道。

她說，“快拿一些，”然後把成熟的草莓裝滿我的手。我像個孩子一樣，飢腸轆轆地把它們吞了下去。

最後，我到達了自己的前門，猶豫了一會兒。他們沒有料到我會回來，而我又脏又破，看上去很可怕。然後我打開了門。大廳里有幾個年輕人，其中一個年輕人盯着我好一會兒，然後喊道：“爸爸！”那是我的兒子米海。我九歲時離開了他：現在他十八歲了。

然後莎賓娜從廚房跑來。她那精致的臉龐消瘦了一些，但頭髮依然是黑色的；我想：“她比以前更漂亮了。”我的眼睛模糊了。當她用雙臂搂住我時，我努力說：“我必須告訴你一件事。不要以為我只是從痛苦走向幸福。我是從與監獄與主同在，過來家中與主同在。兩樣都好。”後來，我輕聲唱了一首多年前在監獄里為她創作的小歌。

不久米海過來說外面擠滿訪客，他們都說，除非看到我，不然就不走。我們教會的成員一直在給布城各地打電話；門鈴响個不停。老朋友帶來了新朋友。見過我的人必須離開，以便給新人站立的地方。每次我被介紹給一位女士時，我都必須穿着那條用繩子拉着的可笑褲子，起立鞠躬。當所有人離開後，已近午夜，莎賓娜催我吃點東西，但我不覺饑餓。我說：“今天我們已經足夠幸福了。讓我們把明天定為感恩的禁食日，晚飯前先吃聖餐吧。”

我轉向米海。在不久前到我家來訪的三客人，其中一位是大學的哲學教授（我之前未見過他）。該晚告訴我說，是我的兒子帶領他們信主的。我卻還擔心，沒有了父母陪伴，恐怕米海會迷失方向！我找不到言語來形容我的快樂。

米海說道：“父親，您經歷了這麼多，我想知道您從這些痛苦中學到甚麼。”

我用手臂摟着他說：“米海，我幾乎已經忘了聖經。但有四件事一直在我的腦海里。第一，有神。第二，基督是救主。第三，有永生。第四，愛就是最好的道路。”

兒子說：“這就是我想知道的。”後來他告訴我，他也決定成為一名牧師。

那天晚上，我躺在干淨柔軟的床上，一夜沒睡。我坐起來，打開聖經。我想打開《但以理書》，這是最喜歡的書，但我卻不能翻到那卷書。因為我的目光被聖約翰書信中的一句話所吸引：

“我最喜樂的莫過于聽到我的孩子們遵行真理。
”我正是有這種喜樂。我走進兒子的房間，讓自己確信他真的在那里。在監獄里，我經常夢見這樣的情景，結果總是在牢房里醒來。

過了兩周我才可以正常睡覺。那時我已經在最好的醫院接受治療。那是陽光最充足的病房。作為一名前囚犯，每個人都想幫助我——不論是街上、店里，到處都是——訪客又開始涌來醫院了。

第六章

現在我自由了，我內心深處渴望安靜和休息。但共產主義正在各地破壞教會。我渴望的平靜是逃避現實，也危害我的靈魂。

我又回到貧困的家中，但比許多人幸運。由于妻子不肯与我離婚，她就找不到工作。她必須生活在極度貧困中，靠補補女式長襪並靠朋友善意的施舍。她說，如果没有米海，他們幾乎活不了。

十三歲時，米海獲准探望在運河上被強迫勞動三年的母親。失去雙親，靠救濟生活，他感到痛苦。“我借錢去奴役營，”他告訴我。“我們會見時，相隔遙遠。母親穿着囚服，又脏又瘦。她半哭了，必須大聲喊才能讓我聽到。她說：“米海，信耶穌，向神忠心。”我回答說：“媽媽，如果您在這種地方，仍然相信，那麼我也肯定相信。”

當我太太獲釋回家時，發現米海已經成了一名鋼琴調音師：他的聽覺非常好，從十一歲就能夠獨立調音。很快他就賺到了足夠的錢來幫助母親並供自己上學。生活雖苦，但至少還有飯吃。

米海與黨的矛盾很早就開始了。有一次他成了模範生，可以佩戴紅色領帶。但他拒絕佩戴，因為這種紅領帶是“壓迫者的象徵”。學校就把他開除。但當事情平息後，校方又悄悄重新接納他。他的老師只是給黨方口頭的服務。十四歲時，他再次被開除，因為他說他自己讀過《聖經》，又說教科書中對宗教的攻擊是錯誤的。於是他唯有嘗試在夜校繼續學業。

米海是一名基督徒，不愛共產主義。但是，一只在烏鴉家族附近築巢的歌鳥，最終也會走調。米海在學校與外邊，聽到的幾乎都是黨的聲音。我出獄回來的第二天，就必需糾正他說，他以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正在挨餓，是一大錯誤。他和同伴們還以為這是真的。一個女孩告訴我，她在學校為美國數百萬挨餓的孩子哭泣。

即使是最優秀的年輕人也顯得困惑和迷失方向。他們不僅讀不到偉大的基督徒作家的著作，也買不到柏拉圖、康德、叔本華（Schopenhuaer）和愛因斯坦等思想家的作品。米海的朋友們說，他們的父母告訴他們的是一套，他們的教授們告訴他們的又是另一套，他們就常尋求我的建議。

克盧日大學（Cluj university）的一位年輕神學學生在寫論文《路德教會禮拜歌曲的歷史》。

他尋求我幫助。我建議他先改變論文的題目。我們不該思想歷史瑣事，因為明天他們就可能會因為信仰而面對死亡。

“那我該學甚麼？”他問道。

“如何樂意犧牲和殉難，”我回答。

我告訴他一些我在監獄里親眼所見的事。很快的，他就帶着他的朋友們來聽。他們都面臨着同樣的問題。我問了他們的學習情況。其中一人說：

“我們的神學教授說，上帝給人三個啓示：第一是摩西，第二是基督，第三是馬克思。”

“你的牧師對此有何看法？”

“他講得越多，似乎說的就越少。”

我們會談的結果，是我到克卢日的大教堂去傳道。學生們想讀我的書，但我所有的作品都被禁了。在我去之前，我想起一個承諾。在監獄中我曾答應上主之軍（類似救世軍的基督教派）的一人，說可以嘗試會見黨方的關鍵人物查士丁主教（Patriarch Justinian）。我想他可能幫助這一派基督徒免受當局格外的打壓。查士丁對教會已經造成巨大的傷害；但他仍然能做一些好事。

我在他教廷後面的空地上會見他。也許他選擇在花園里見我，是因為那里沒有竊聽器，也遠離偷聽的職員。我說：“你是教長，我可以想象你的重大責任。人們來找你要求職位或養老金，你還必須到處講道或唱歌——所以我想我該給你唱

一首歌。這是上主之軍的歌；是我在監獄學到的。”我唱了這首歌，並請他為這些善良而簡單的人做點事情：“他們不能僅僅因為屬於某個教派就永遠坐在監獄里。”他同意會嘗試，我們聊了好久。

我試圖呼喚他歸回上帝，說：“即使在客西馬尼園，耶穌也稱猶大為‘朋友’。祂為猶大打開了拯救之路。”我想播下一顆種子，給他的心得以改變。他靜靜地聽着，甚至可以說的謙卑的聆聽。但他說他無力援護教會，因為黨方安排了雅西（Iasi）的主教莫伊（Justin Moisescu）作為他的左右手。如果他走得太遠，或者辭職，莫伊就會取代他成為教長，情況就更糟。查士丁對我一直保持着某種尊重。儘管他分裂的心不喜歡他的手所做的事，但他的舉棋不定，最終總是屈服黨的要求。

後來我聽說他在聖公大會中提出了“上主之軍”的事，遭到了莫伊主教的反對。莫伊已經成為《世界基督教協進會》的東正教代表。接下來，查士丁又被宗教事務部的譴責，說不該接待我。這肯定是他的秘書向黨方作了報告（查士丁自己也必須向黨報告他秘書的舉動一樣。）他同意會見上主之軍的代表，但當他們到達時，他却粗魯地拒絕了他們。“是魏恩波叫你們來嗎？這是他該回到監獄的時候了！”

我答應在羅馬尼亞古老的大學城發表一系列演講的消息，立刻就被報告給了當局，並說我的真實意圖是打着講說基督教的幌子攻擊馬克思主義，煽動學生。在這起案件中，熱心的告密者是一位浸信會牧師，他當面告訴我，他做了甚麼。

這並不奇怪。獲釋後，我見過許多神父、牧師，甚至主教，向黨方（異教部）投報。通常，這些報告只涉及他們自己的會眾，而這些神職人員會對這種行為感到羞愧。他們會說，他們的告密不是為了自己的安全，而是為了挽救自己的教堂免于關閉。每個城鎮都有來自異教部的秘密警察代表，他們定期向神父們詢問其會眾的行為；除了政治之外，他們還想知道哪些教區成員經常領受聖餐，哪些教友努力宣教，人們在認罪求恩時，承認了甚麼罪？拒絕回答此類問題的牧師神父就被當局解雇。如果沒有合適的代替者，黨方就關閉該所教堂。因此目前羅馬尼亞有四種牧者：在監獄里的、在壓力下舉報並試圖隱瞞一些事情的；那些按照指示行事的；以及那些已經習慣了通報信息的。

不全心與黨方合作的官方牧師（第二類）是罕見的。他們很快就會失去傳教執照。叛徒（第三，第四類）就得以升官發財。我那位的浸

信會同事就是其中之一。他的警告立即得到了一位名叫鲁戈（Rugojanu）的官方間諜的跟進。

異教部的員工，也有冷熱之分。一些員工偷懶，另一些則利用權力向神職人員索取“保護費”，但鲁戈是一名狂热分子，他從一個教堂到另一個教堂，不絕地嗅出“反革命分子”。他決定親自來聽我的講座。

在去克卢（Cluj）的路上，我決定，如果我不想讓我的講道執照突然被取消，就要採取謹慎的策略。我決定首先對基督教和共產主義的教義進行比較。我在非常尊重共產政權的情況下慢慢述說。學生們卻可以看到我的真正含義，而告密者卻無法對我提出明確的指控。

在克卢的第一晚，有五十名學生來聽。由於達爾文和他的進化論在神學的閱讀清單上總是排名首榜，所以我首先處理這理論。我說，新羅馬尼亞先進的社會主義，拒絕一切卑鄙的資本主義思想；英國資產階級達爾文爵士卻是個例外，不是很奇怪嗎？達爾文有沒有排斥基督教？沒有呀！他倒將自己的許多財產都捐給宣教事業。

鲁戈在長凳上弓着背，全神貫注地看着我，所以我直接看着他，繼續說道：“醫生的兒子想成為一名醫生，作曲家的兒子想成為音樂家，畫家的兒子想成為畫家。如果你相信自己是上帝創造的，那麼你就會努力變得像上帝一樣；如果你寧

愿相信自己來自猿類，那麼你就有可能變成野獸。”

我從星期一開始上課。周二，觀眾人數增加了一倍。到了周末，一千多張臉抬頭看着我；幾乎是整所大學。我知道他們中的許多人雖然渴望聽到真理，但卻擔心接受真理的後果，所以我告訴他們一位牧師給我的建議，這位牧師為信仰而死在法西斯分子手中。他曾說：

“當你把自己的身體獻給那些毆打和嘲笑你的人時，你就是將自己獻給了神，如同獻祭。耶穌知道自己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日子臨近了，就說：‘我的時候到了。’祂的時候是受苦的時候，這是祂從天父那里得到的囑咐。為救人而受苦就是祂的喜樂。我們也該把苦難視為上帝給我們的一項使命。聖保羅在《羅馬書》中寫道：‘我的弟兄們，我以上帝的憐憫懇求你們，將自己獻上：作為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12：1）”

當我望向沉默的年輕會眾時，我感到仿佛回到了戰爭期間的布城教堂。那一天鐵衛隊的惡霸帶着槍，靜悄悄地潛進來。如今我們也受到同樣的威脅。

我繼續說：“不要被苦難的突然來到，叫你措手不及。經常默想它。讓基督和他聖徒的美德成為你自己的。我所說的那位牧師，為信仰而死的老師，給了我一份止痛茶配方。我也傳給你們。”

我告訴他們說，基督教初期有一位醫生，被皇帝監禁。幾年後，他的家人終於獲准探望他，起初他們見到他，就開始哭泣。他的衣服已經是破布，食物是每天一片面包和一杯水。然後他的妻子開始驚訝，問道：“你的氣色怎麼這麼好？就如是初婚的日子？”醫生微笑着回答說，他已經找到了治愈一切煩惱的良藥，就是一種包含七種草藥的茶。家人問那是甚麼？他說，

“第一種草藥是知足：滿意自己所擁有的。當我啃着面包皮，穿著破衣瑟瑟發抖時，我就想到，如果皇帝把我赤身扔進地牢，又不給我一點食物，那是更糟的了。

“第二種藥草是常識。不論我喜歡或憂愁，我還是在監獄中，於是何必憂愁？

“第三是記得過去的罪。試試計算它的數量。如果每一項都需要罰一天，那麼我該呆在監獄多少個人生？於是你便曉得自己真的撿了便宜。

“第四是想到基督樂意為我們承受的痛苦。如果地球上唯一能夠選擇自己命運的人，選擇了痛苦，那麼祂一定是看到了痛苦的巨大好處。我們開始留意到，當我們安靜與喜樂地承受痛苦時，它的確能救人。

“第五種藥草，是認識到苦難是天父賜給我們的。它可以淨化我們，適合進入天堂。

“第六是，我們認識到任何苦難都不會傷害我們。如果肉體的快樂就是一切，那麼痛苦和監獄就會毀滅一個人；但如果生活之目的是真理，那

麼監獄就毫無能力摧毀它。監獄不能阻止我愛人；鐵棍不能排除信仰。如果我的生活是真理組成的，那麼我就能在任何地方都平靜安穩了。

“最後一劑藥草是希望。生命之輪可能會讓皇帝的廚師入獄，但它仍在繼續轉動。遲些它可能會帶同一個廚師復位，重返皇宮。也可能叫一個囚犯作君王的父（如舊約的約瑟。）”

我停頓了一下。擁擠的教堂里一片寂靜。

“從那時開始，我就喝了好多桶這種茶，”我說，“我可以推薦給大家，它真的不錯。”

我說完後，魯戈就站了起來，頭也不回地走出大教堂。我從講壇上走下來，觀眾圍在我周圍。在外面，學生們鼓掌、歡呼，並試圖握住我的手。我給莎賓娜打了電話，她同意我的做法，儘管她也知道隨後的報復。

第二天，我的主教召見我。他告訴我魯戈在製造麻煩。在他還講述時，魯戈本人大步踏進房間。“啊，是你！”他喊道。“你還想找甚麼借口？好一大堆煽動的言論！我把每個字都記下來了！”

我問他甚麼事情讓他特別不高興。他說是我談及的每一件事，尤其是那道止痛茶。

“但是我的那枚可憐茶出了甚麼問題呀？”我問，“你是不喜歡其中的哪一種藥草？”

“你告訴他們生命的巨輪總是在轉動。但在共產革命成功後，輪子就不再轉動了！朋友！共產主義將永遠長存。”仇恨把他的臉也扭曲了。

“我沒有提到共產主義，”我回答道，“我只是說，生命之輪不斷轉動。比如，我曾在監獄，現在我自由了。我曾生病，現在好多了。我曾失去教區，現在又有了……”

“不，不，你的意思是共產主義將會垮台，他們都知道這一點。”

魯戈召集教會領袖到克盧城的主教宮來會議。他譴責我攻擊政府，毒害年輕人的思想。“你們可以肯定他再也不能講道了，”魯戈喊道，他使自己大大發怒。最後他喊道：“魏恩波完蛋了，魏恩波完蛋了，魏恩波完蛋了！”他拿起外套和帽子，大步走出大樓。

距離門一百碼遠的地方，一輛汽車為了避開一只狗，突然轉向，飛向人行道，將魯戈撞到牆上，把他整个人壓扁。他當場就死了。

魯戈的故事傳遍了全國。在那些年頭，上帝經常顯現出祂的奇事。

當局吊銷了我的牧師執照，但卻不能阻止我傳教。只是如今我必須秘密工作。監獄里的老朋友來訪，尋求建議和幫助。這裏便隱藏一種危機。因為其中有些其實是在試圖煽動我發表反共言論——他們已經變成了告密者。這些不幸的人對獲釋抱有過高的期望。當他們發現自己的家庭破裂後，他們轉而追求性快感，徒勞試圖把握自己失

去的青春。這通常會超出他們的財力；而賺錢的捷徑就是向黨方提供信息。於是他們出獄後的自由，比入獄更不好了。

我們最有效的防範告密者的方法，是來自秘警的警告。我們有好些信徒在秘警部門任職。有一對夫婦，白天在黨方宣傳部工作，晚上和我們一起祈禱，我們不止一次在一位外出度假的秘警察頭目家里見面，因為他的女佣就是我們的姐妹。或者，我們聚集在地下室、閣樓、公寓、鄉間別墅。我們的儀式和一千九百年前第一批基督徒一樣簡單而美好。我們大聲唱歌。如果有鄰居問起，就答是慶祝生日。一個小家庭可以每年有三十五個生日。有時我們露天聚會。天空是我們的大教堂；鳥兒為我們提供音樂，花香是我們焚香，星星為我們燭光，天使是點燈的侍童，剛剛出獄的烈士的破舊衣服便是最珍貴的牧師袍。

3

當然，我知道我遲早會再次被捕。匈牙利革命後，形勢變得更加困難。赫魯曉夫（Khrushchev）宣布了一項新的七年計劃，“消除殘餘的迷信”。教堂被關閉或改建為共產俱樂部、博物館、或糧店。那些被黨報斥為“黑衲騙子（神父）”的，又被圍捕了數千人。

我祈禱說：“上帝，如果你知道有人在監獄需要我，便讓我回去。”莎賓娜有時會猶豫一會兒，然後她也說“阿門。”此時，她內心充滿喜悅，因為知道我們很快就能更好的事奉基督。我詫異我們對主的母親在十字架前憂傷的形象，是否正確？她不也因為兒子成為世界的救主而滿心喜悅嗎？

在一九五九年正月十五日凌晨一時，他們終於來了。我們的家被翻了個底朝天，搜查一直持續到凌晨五時。我兒子在一個移開的櫥櫃後面發現了一條丟失的皮帶。“人們還說秘密警察毫無益處！”他說，“我一直在尋找這條皮帶呢！”第二天，他就被禁止進入夜校，校方指責他態度驕慢。

當他們把我帶走後，莎賓娜拿起了我的聖經。在一張紙片上，看到我在《希伯來書》中記下的一句話（11:35）：“因著信……有妇人得到自己的死人復活。”我在它下面寫道：“我的太太就是這樣的婦女。”

4

當我們抵達布城警察總部時，天色還黑，街道上覆蓋着冰冷的泥漿。在警衛把我帶到牢房之

前，又是熟悉的入獄流程。在這里，我找到了一個大約三十歲的男人，名叫德拉（Draghici），他是皮特（Piteshi）監獄可怕的再教育領導人之一。每次牢房門打開，他都會跳起來。幾次之後，他說：“對不起，我真的緊張。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要帶我出去槍殺。四年前他們已經給我判了死刑。”

德拉告訴我有關他的人生故事。當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他很崇敬當地的神父，有一天神父說：“你父親是一位鐘表匠——請他修理教堂的鐘，給一個便宜的價格。”德拉就說服他的父親免費做這項工作。隨後，神父向父親索取一張 500 列伊的收據，好向教會領取，自己私吞。德拉冷笑着補充道：“如果沒有這個經歷，我可能成為一名基督徒，並且多年來已經給了教會一大筆錢。”

他的父親是個酒鬼，帶着家里的積蓄離家出走。後來在他十四歲時，為了穿上漂亮的綠色軍服、唱進行曲和女孩們的欽佩，他就加入了鐵衛隊。幾個月後，衛隊被推翻，德拉便入獄。在共黨掌權後，因為他曾經是一名活躍的法西斯分子（參加衛隊），就判他十一年徒刑。服刑七年後，他在皮特監獄聽說：“只要毆打其他的囚犯，你就會被釋放。”

他告訴我，“當時我二十一歲。我不想呆在監獄里，所以我照所吩咐的去做。我相信他們釋放的諾言，現在我卻必須受死刑。”

在我看來，他似乎已經快要死了。他的肺結核已經很嚴重。“我是該死的，”他說。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聽着德拉咳嗽、吐血的聲音。我想：如果上帝現在召喚我並問：“你在地上生活了五十六年，對人類有何感想？”我會回答：“人是罪人，但那罪不全在他們。撒旦和他的墮落天使正在努力使我們像他們一樣糟。”

一連十個晝夜我和德拉談及基督。“你成為罪犯，並不是完全是自願的。”我說，“但你的罪惡感需要得到解脫。耶穌已經承擔了你該受的一切刑罰。在神的國度，一項罪行無需處罰兩次！”

第十天晚上，德拉淚流滿面地向我表白了。我們一起祈禱，他的悔恨和恐懼得到了解除。於是，我對神的祈求，在回獄第一天就得應允。

5

接下來我被帶去布城的天王星監獄（Uranus jail）接受審訊。一名秘密警察少校試圖叫我說出，凡我所認識的“反革命分子”的名字。

我告訴他我很樂意這樣做，包括本國的和蘇聯的。我告訴他，蘇聯內長雅果達（Yagoda）已經殺了數千名反革命人士。最後人們才發現，雅果

達本身才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以後，他的承繼人貝利亞（Beria）又繼續追殺了數以千計的反共派，直到黨方發現，他自己才是反共大頭目，於是拉去槍斃。我又說，到了最後，人們才曉得，真正的反共首領是斯大林，於是趕快把他的遺體從紅場挖出來丟掉。於是我建議他，最好不必從我可憐的小教堂裏尋找反共分子。

這官員就吩咐毆打我，把我關在單獨獄室。我就待在那裏，直到上庭的日子。那審訊也很簡單，只消十分鐘就完事。這是有關十年前的案子。這次我的妻子與兒子也來了。

過後他們就帶我到一所囚室裏等待審訊的判決。我正在其中與人談及基督時，一位官員來報告審訊的結果。我向他道謝，就繼續談論。那判決只是把刑期由二十年改為二十五年（結果我只坐了十四年。不是人說了算。乃是神。）

第七章

我又被轉換監獄。警車里還有其他新判刑的神職人員和我一起。走了一小段路後，我們駛下一個陡峭的坡道，然後停下。我的心也沉了下去，因為意識到我們又回到了吉拉瓦潮濕的地下監獄。現場响起了“把他們趕出去”的喊叫。警車的門就打開了。

一羣揮舞着警棍的獄卒，驅趕我們沿着通道走。他們已經喝醉酒，一看到是神父，就歡呼雀躍。他們把灰色、肮脏的囚服扔向我們。那些換得慢的人，就被撕破衣服。在一片笑聲中，他們剪掉我們的胡須，胡亂剃光我們的頭。我們頭皮流血，半裸着，被趕進一間大牢房。

我們坐在石地上，在二月的寒冷中擠在一起取暖。幾乎同時，一個守衛搖搖晃晃地走了進來，大聲喊道：“所有牧師神父都出去外面。”我們逃了出去，又被警棍亂打一通。我們盡可能用雙臂保護頭部。然後我們又被趕了回來。那些摔倒

的人都被沉重的靴子猛踢。半個小時後，我們又被叫出去。沒人移動，守衛們就沖了進來，胡亂打。他們這樣玩弄我們，直到厭倦了。

我嘗試安慰同伴們。有一人的牙齒被打掉，嘴唇嚴重裂開。當我清理他臉上的血迹時，他說：“我是修道院長米隆（Miron Cristescu）”

我們幾年前在雅西見過面，當時我在等待會見查士丁大主教。米倫在查士丁的辦公室工作，我告訴了他我們的麻煩。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說：“弟兄，基督會再來：我們盼望着它”——這是一個屬神的人該常說的話，但却少有這樣說的。我從未忘記過他。但他剃光了胡子，光了頭，臉上沾滿了血迹和污垢，卻令人難以辨認。

我們坐着瑟瑟發抖，幾個小時過去了。米隆談到了他和其他人如何試圖挽救教會免于成為國家的工具。他們原以為可以激發教長查士丁的善良本性。但德吉顯然沒有選錯人。他安排查士丁到莫斯科訪問。此後，查士丁就欣然與黨方合作，打壓羅馬天主教，希臘天主教，以及他本身的東正教信徒中，凡拒絕合作的人。

“我不應該妥協，”米隆說，“我應該從一開始就抵制。如今我一樣落在牢中。”

我試圖安慰他，但他舉目看着我，回答道：“魏恩波弟兄，我只知道一種悲傷，就是沒有成為聖人。”

如果這是在講壇上說的，那只是一句美麗的詞句；但在那可怕的牢房里，經過慘烈的毆打，這話卻真有意義。

2

幾天後，當我被送往山區去時，米隆也和我一起坐在車隊中。幾個小時後，蓋拉城的監獄出現在我的視野中。在1956年，我曾在這裏逗留了兩個月，我妻子曾到這裏探訪我。這監獄原是瑪麗亞女皇（Empress Maria Theresa）統治時期的建築。從獄室上部的窗，你可以看到那陳舊的絞刑架，現在已經不再使用了，因為共產黨的處決方式是在後腦開槍。我們又看到，監獄的高牆之外，鎮上居民的生活。囚犯們凝視着經過的行人，開始冥想。但到了中午，就沒人敢再觀望。因為那是孩子們放學的時候。孩子們又喊又笑，互相追逐着回家。每個囚犯都想到自己的家小。

大約一萬名囚犯被關進原本可容納二千人的簡陋住所。當局的嚴厲程度與再教育運動最糟糕的時期一樣。去年夏天，蓋拉監獄發生了嚴重的騷亂。囚犯們把自己關在側翼里，抗議當局封閉了窗口，不給他們光線和空氣。警衛沖破了門，一場持續的戰鬥開始了。軍隊也被召來向囚犯開槍。許多囚犯被殺或受傷。作為處罰，食物被削減到饑饉的程度，數百名囚犯被分散到其他監獄。

我們牧師神父們很快就取代了他們的空缺，還有一大羣其他種類的“政治犯”在新一波的逮捕中被捕——地主、軍官、醫生、店主、不愿加入合作社的工匠、反對征地的農民。在經歷兩項災難性的五年計劃後，總理德吉就宣布了一項十六年的計劃，該計劃將持續到 1975 年——“如果到那時還有未被逮捕的人，在外頭去執行它。”一位犯人說。

這裏的牢房是又長又黑暗的、有回聲的營房，每間都有五十到六十個鋪位，但卻收容了八十到一百人。於是許多床位必須二人共用，睡眠困難。除了通宵達旦地排隊上馬桶之外（那只馬桶常常滿溢，）我們中間還有十幾個打呼嚕冠軍讓我們保持清醒。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曲子；如果一人停下，另一個人就會加入到共鳴的合唱中。我們白天也不能休息。警衛會突然來訪，命令我們臉朝下，成排躺在地上，以便他們在叫名字時，輪流踩踏每個人。

守衛經常敲打窗上的鐵柵欄，確保它們沒有被囚犯暗中銼斷了。每天早上，我都幫米隆把馬桶搬到下水道去倒空。有一次，他滑倒並差點翻倒馬桶時，一名警衛把他打倒在地。“你終須到羅茲薩去（Rozsa Sandor），”他喊道。

後來米隆問我這是甚麼意思。我說：“墓地。這是這裏常見的威脅。”

羅茲薩是監獄公墓，從窗戶可以看到墓碑在長滿杂草的場地上。這名稱是上個世紀一名被判處

二十年徒刑的殺人犯。那時他才十九歲。他從囚室的鐵欄窗，看到花園里有一個抱着嬰兒的婦女。他日復一日地看着她們。有神父來為那小女孩施洗。以後這孩子上學了，再後穿着第一次聖餐的禮服，漸漸長成一個美麗的少女。這女孩成了羅茲薩的全部生命；他決定等他自由了，就去娶她。獲釋的日子終於到了。他急忙跑過馬路，發現一場宴會正在舉行——是一場婚宴。呵，這少女竟然想出這樣的方式來接待他！他跑到她面前說：“我無法形容我有多高興，你今天成為我的妻子。”少女驚訝，笑了起來。“這個傻老頭到底想說甚麼？”她問。然後，她握住身邊一個年輕人的手，說道：“這是我的新郎。”羅茲薩盯着這對夫婦。然後，他在憤怒和瘋狂中從桌子上抓起一把刀，將他們倆刺死。於是他被判死刑，埋在監獄墓地里。那墓地就稱為羅茲薩。

“你的結局是羅茲薩。”

這聲喊叫每天都提醒我們說，我們老了。囚犯們永遠不會意識到時間的流逝。他們總是以為自己就是判刑時的年齡。他們夢想着年輕的妻子或心上人，絕不是那位等著他們，年華已逝的憂心婦女。

我在蓋拉監獄度過了六年，監獄大門上的時鐘停了，六年未曾移動一分鐘。

在盖拉監獄，指揮官是個胖胖的、滿面通紅的小尼羅皇帝，名叫班圖（Dorabantu）的少校。他總是在吃東西。在他的審訊過程中，他的手會在抽屜里翻找甚麼，然後竟會掏出一條香腸或一條香蕉，開始享用。

我與他的第一次會面很典型。我正在站立，聆聽着他的仇恨長詩。看來班圖少校不討厭的只有兩件事：食物和他自己的聲音。

“所以，魏恩波，”他喊道，口中噴出許多蛋糕渣，撒滿桌面。“一個和尚，嗯。”

我說我是牧師。

“牧師、神父、修道士——都一樣。磨斫窮人的臉來充實自己的巢穴。我知道！”他一邊滑稽地揮舞着手臂，一邊講述着自己童年的可憐故事。他在羅馬尼亞一所最富有的修道院附牧養父親的羊。當它們誤入教堂的土地時，僧侶們就殘酷地毆打他。

“你見過神父用雙管獵槍向饑餓的孩子開槍嗎，魏恩波？好一幅神聖的畫面。”

班圖還抱怨說，他後來在工廠勞作時，也被剝削。如今他正要回報神職人員和資本家。

最輕微的失守規則就得到二十五鞭，並有一名醫生站在旁邊——因為有人在鞭打下死亡。幾乎每個人都因為某種原因挨了二十五鞭。

我牢房關押的是政治犯，但卻也摻有一些殺人犯和小偷。謀殺是刑事犯。但謀殺俄羅斯人或猶太人，就被當作是政治犯，因為這“顯然意圖針對共產主義。”偷竊是在西方是一般的犯罪。但在這裏，它就被解讀為“破壞經濟”，既是破壞共產國家的經濟，也是針對共產主義，於是當然屬於政治犯。這些刑事犯們都是憤怒的人。他們也是最反對我談及宗教的。特別是那些殺害猶太人的，尤其恨我。因為我是猶太人。我從不隱瞞自己是猶太人，當有人問及時，我就表達對本族人的愛。至於我信基督教，那是我個人的選擇。一次我與一人小聲談福音時，其他人就在我們周圍形成一個威脅性的圈子。

領頭的人咆哮道：“我們叫你安靜。”我站了起來，有人推了我。另一個人向我使勁一腳，我仰面着地。我感到肋骨猛烈被一踢。但當這羣人開始毆打時，一陣警告聲響起。一名警衛看到了這場掙扎，正在呼叫其他獄卒。人羣散開。當牢房門打開時，每個囚犯都在自己的鋪位上。

司令官當時正在走廊徘徊，就走過來。獄卒認出我是被打的人，因為我長得最高，但他無法在半黑暗中認出襲擊者。

“是誰干的，魏恩波？”

我捂着受傷的嘴唇，說我不能告訴他。

“為甚麼不？”

“因為作為一名基督徒，我愛並原諒我的敵人，所以我不能通報他們。”

“你是個白痴，”班圖厉聲說道。

“當然，你說得對。凡不是從心底愛基督的，都是白痴。”

“甚麼？”指揮官怒吼道，“你在罵我白痴嗎？”

“我沒那麼說。我的意思是，我自己未曾達標。”

班圖用手掌拍打額頭，說，“把他帶走。三十鞭。”

然後他搖搖晃晃地走了，咆哮道：“瘋狂的和尚。”

鞭打使我的後背如同在火爐里烤一樣。這鞭打對神經系統的沖擊使我顫抖了好幾天。當我回到牢房時，看守仍在審問囚犯。由於沒有人回答，因此無人受罰。但自從那事之後，每次我講道，就少有人干擾了。

4

監獄的爭吵有時令人好笑，但當事人絕不以為可笑。其中一種發生在每一間囚室，就是開窗問題。靠近窗口的人，要晚上關上；遠離的就要窗口開著。夜裏開窗，外面的寒風就叫我們躺在床上凍僵。關著窗，我們都因為空氣渾濁而頭痛。

從來沒有任何地方的議會，會對這個話題進行如此詳盡的辯論。要開的人說：“新鮮空氣不會傷害任何人。”要關的回答：“每天都有數百萬人死于肺炎。”

這讓我想起了列寧的公理。“如果強大的物質利益決定二乘二應該不是四，那麼它們就不該寫成四。”我們經常在監獄里看到這一點。當我們出去運動時，警衛們感到無聊。“時間到了，大家都進去吧！”他們喊道。我們抱怨道：“我們才剛來十五分鐘！”雙方都認為自己是對的；自身利益甚至決定了我們的時間觀念。

普通罪犯很快就在獄室安定下來，他們在這里幾乎和在外面一樣自在。他們有自己的慣例，有自己的優先順序，還有自己的俚語。他們在走私食物残渣方面非常有頭腦。他們給每一位警衛都起了個別的綽號，並試圖向守衛索求香烟。他們壟斷了大部分的輕鬆工作，把肮脏的工作留給政治犯和真誠的基督徒。

這些刑事犯之間，唯一的爭吵就是關於物質享受。

牢房里不乏歡笑。使徒行傳把“喜樂”稱為上帝存在的見證。如果不是，如何解釋監獄里的歡樂？

有些人特意嘲笑自己的痛苦。布雷少校（Braileanu）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位身材矮小、精神抖擻的前軍官，留着一頭孩子氣的蓬亂頭髮

，他給牢房帶來了一個令人興奮的新謠言，說另一次峰會將於 1959 年春天舉行，會議由蘇聯外交部長葛羅米柯（Gromyko）和西方代表參加。據說將於 5 月 10 日召開。於是囚犯們採用了新的問候方式；他們舉起全部十根手指，表示獲釋放的好日子。

事實上，在會議當天，警衛確實打開了牢房門並叫出了四人，包括布雷少校。我們羨慕地看着他們。但很快我們就聽到了從通道盡頭傳來痛苦的呻吟，那是鞭打的地方。三人遭打而慘叫；但當輪到第四個時，卻是沒有呼叫聲。我們只聽到了落在他背上的二十五鞭。布雷跟其他人回到牢房時，臉色蒼白，無法說話。過了好一陣子後，他才站了起來。“眾位男士，”他說，“我向你們新的敬禮！”他舉起右手的兩根手指，然後是左手的五根手指，示意二十五。（二十五鞭）

在我們中間，講故事和出謎語可以長達數小時。每個人都必須貢獻一個。

加斯頓牧師，一位三十五歲、臉色蒼白的一神派（Unitarian），給了一個謎語：“一個人和他名叫夏娃的太太一同乘搭火車。他們的屋子是紅色的。那人叫甚麼名字？”所有的人都驚奇，如果那人乘搭火車，太太名叫夏娃，住屋是紅色的，那與他的名字有何關係？加斯頓說，“答案是查理。”

“但你如何知道？”

“我認識他多年了，他是我的好朋友。”加斯頓回答。

米隆院長說了一個他發誓是真實的故事。一次本獄的司令沿着囚犯的隊伍，慢慢步行。他依次問每人同樣的問題：“你犯了甚麼罪？”

“甚麼也沒做，長官，但卻要服刑十年。”

班圖繼續向前走。“那你呢？”

“也沒做甚麼，司令官，但被罰二十年。”

“說謊的豬。”班圖憤怒地說。“在我們的人民共和國，沒有人會白得十年監禁的！”

但靠智慧謀生的小偷才是最會講故事的人。一位名叫弗洛（Florescu）的小偷講述了他在布城的一次作業。那時他正在搶劫一家珠寶店。該店在猶太區的街道上：

赫科（Hershcovici）先生是最會接待客人的店主，那天他正在自己的珠寶店裏，接待一對優雅的青年夫婦。“早安，”那男士說，當然，他就是弗洛。“這是我的未婚妻，布城第一美女。”他們闲聊說，她也是本城最富有的少女。“我們是來選戒指的——當然，必須是鑽石戒指。。。哦不，那些太小了。”他們從戒指開始，轉到新娘母親的寶石手表，新娘父親的鱷魚皮套服，然後那少女插嘴道：“哦，親愛的，我們不能忘記主教。他是我的叔叔，所以他不會接受婚禮費用。

可是，你知道他們怎麼說：天堂是不接受白送之服務的。”

“但是，我們應該給主教甚麼禮物呢？”這時，他們倆的目光轉向了一個陳列櫃，里面放着一套完整的鍍金主教長袍。“正是這樣的東西，”弗洛喊道。

“但是，親愛的，”那位少女說，“我們不知道那套衣服是否適合叔叔的身材。”弗洛上下打量着店主。

“赫科先生的身材，正與主教相當。”店主還沒反應過來，這對夫婦就給他穿上了那套金色的長袍，將腰帶系上，又給他戴了一頂閃閃發光的主教法冠。“完美契合！”弗洛說：“再拿著這根權杖。”

說完，這對夫妻就把珠寶扔進鱷魚皮包裏，跑出了商店。赫科震驚得癱瘓了。他拼命跟在後面追，尖叫著：“小偷！擋住他們！救命呀！”所有的猶太商都跑到門口，看到赫科穿著東正教長的全套服飾，在空蕩蕩的街道上跳著走。

“赫科瘋了，”他們喊道。有三人把他按倒在地上。“你們在做甚麼？盜賊逃跑了。”真的，小偷已經轉入小巷，不見影蹤了。

當笑聲平息後，加斯頓牧師問：“但他們最後不是抓住你了嗎？”那小偷卻不再解釋。他反問：“那麼你又怎樣來到這兒？”

“為甚麼不能說呢？”加斯頓說。“這也是一個有趣的故事。我因在聖誕節講述神聖家族下埃及，就判七年徒刑。”

“我會眾中的一名間諜指控我，說我進行煽動性的講道。在我的審判中，檢察官說我對本國當局進行了攻擊。那間諜告訴法庭說，我將希律王的屠殺嬰孩，比作共產黨打壓宗教。

加斯頓後來問審訊員，開除他的真正原因。“‘我做錯了甚麼？’”我問。‘我盡力幫助勞動人士。我又開辦學校和一家合作社，我的教堂總是擠滿了人。’

“那位官員大笑。他說：‘我們想要的神父就像你隔壁教區的神父——一個老酒鬼，他的教堂總是空蕩蕩的。’”

後來，加斯頓對我說，“我小時貧困，因為饑餓而偷竊。有一次我企圖偷雞，警察押著我在村子裏遊街示眾，脖子上掛著小偷的牌子。

“後來我成為一位希臘天主教的神父。當共產上台後，警察來我的家搜查，發現了一本阿德勒（Adler）的個人心理學（Individual Psychology）。

“呀，又是《個人主義》”，於是把那本書帶去做罪證。

幾個月後，當我擦洗我們大牢房的地板時，看守帶來了一名新囚犯，命他一同洗刷。原來這人就是我的老朋友波普教授。他那雙明亮的藍眼睛已經顯得暗淡無光。他看上去病怏怏的，而且很老了。自從 1956 年特赦初期以來，我們就沒有見過面。我的信件也沒有回音。現在波普解釋了原因。“監獄對我更好。它就如逆風，使海鳥高飛。可是在順境中，我就下跌了。過去我們在奧克納監獄裏的生存鬥爭是那麼真實又有意義。但釋放之後，外面的生活就如一場騙局……我不知道是甚麼占據了我。”

像許多其他囚犯一樣，一旦恢復自由，他就開始追求快樂。奇怪的是，那些勇敢地忍受了可怕痛苦的人怎麼會跌倒的？在獲釋後，他們就敗壞了。

波普說：“我離開了妻子。經過監獄的艱苦生活後，我似乎無法控制自己。我渴望食物、美酒、女人。我非常害怕自己已經失去了青春，就試圖證明自己還年輕，於是大大花費，飲酒過度。於是不可避免地入不敷出。我被迫撒謊和欺騙。”

當他尷尬地停頓時，我說我希望他沒有忘記基督。波普笑了一聲，把一塊髒布擰進桶裏。“當時如果我見到你就好——但我正在羅馬尼亞的另一端。我希望能解除心中的罪惡感，就去找最近的牧師，告訴他一切，又說這是共產監獄的後果。

他詳細聽完後，就向黨方報告。於是我就獲得十二年。”

我們擦洗到了房間的盡頭。洗好了，就站在那裏等待室長的批准，他也是囚犯之一，負責看守我們的工作。當他走過來時，一腳踢翻了髒水桶。“再去洗！”他說。當我們又花了一個小時擦洗時，他又再踢翻水桶。最後，他才讓警衛親自來檢查。那警衛的鞋子帶著泥垢，他喊道：“這是甚麼？”然後打了室長的臉。警衛一離開房間，室長就對我們拳打腳踢。波普十分憤怒。我警告他，這是這裏的慣例。“如你所知，沒有比被壓迫者更糟糕的壓迫者了，”我說。“這都是系統的一部分。”為了分散波普對自己困境的注意，我就向他講述了加斯頓的事，並在午餐時給他介紹這位神父。這卻是一個失著。加斯頓臉上閃過一絲震驚，波普則猛地轉過身去。“我們以前見過。”他簡短地說。

加斯頓很快就走開了。波普和我白天剩下的時間都在打掃庭院。要想達到令指揮官滿意的效果，只能用一塊三角形的玻璃刮擦每塊磚：這是一種守衛不太看好的行為。波普對我說，他無法挨過這次的十二年，他的肺結核急促惡化。我試圖通過談論未來的生活來鼓勵他，他靜靜地聽着。但他內心似乎有甚麼東西已經燒毀了。第二天，當警衛侮辱他時，他就開口辱罵黨。警衛野蠻的

毆打他，以致他失去知覺。他被抬到監獄醫院。次日我們聽說他已經死了。

其實波普在第二次下獄不久，外頭已經為他舉行了他的“公民葬禮。”這種做法是不久前才出現的。波普的判決宣布後，當局就召集他的家人、朋友和大學同事，公開埋葬了他的記憶。黨方告訴“哀悼者們”說：“這反革命分子永遠死了。任何人都不得探望他或他的家人，或以任何方式幫助他們。任何人不得進入他的家，或在街上迎接他的。”波普的大女兒帶頭進行了譴責。如果她拒絕，她就會丟掉工作，也無法撫養孩子。波普的學生和同事教授們效仿她的做法，進一步誹謗他的名字。

6

教授的悲劇令我們十分憂鬱。米隆為死者祈禱，加斯顿則坐在床鋪邊緣，雙手捂住耳朵，仿佛要把世界拒之門外。

我坐在他旁邊，因為我想不該讓他這樣孤立，就向其他人談及永生，給眾人寬心，但加斯顿卻不接受。他憤怒地站起來，說道：“作為一神論

者（希臘天主教又名“一神論”），我無法相信一個人死後還存在。”

我回答說：“但我不是在跟先進的一神論者說話；我現在是對你說話。我們不必總是自稱為天主教徒、或猶太人、或更正教徒，或羅馬尼亞人。。讓我們有勇氣做我們自己！”

還有幾個囚犯過來加入我們，所以我繼續說：“人格（一個人的心意和喜好）是神給人的最大禮物，因為只有人格能在身體每年更換細胞時存留。我體內的氧原子和氫原子與其他人的相同；也與外面的自來水（H₂O）一樣。我身體的熱量和你的也相同，分別的只是程度的大小。只有我的思想、我的感受、我的意志才可以說是我自己的。你怎能相信這意志也會與身體一樣毀滅？”

弗洛拉出了一張凳子，挑釁地說：“我只信我所看到的、嘗到的和感覺到的。我們都像我坐的這張板凳一樣，當你我死了，一切都完結了。”

我突然把他身下的凳子踢出一腳，凳子飛出去，弗洛跌坐在地上。他憤怒地爬了起來。“你是甚麼意思？”

我溫和地回答：“我沒有聽到凳子抱怨——你卻說你和凳子相同？”

這次連加斯顿也笑了，我繼續說：“對不起，弗洛；我只是想證明，物質既不會愛或恨。但我們卻會。”

弗洛没有生闷氣太久。很快他就說，如果死者能回來和我們說話，那麼他可能會相信人果然有另一種生命（死後的生命）。

“我確信人類与死者有過接觸，”我回答道，“從牛頓到奧利弗（Sir Oliver Lodge），許多大科學家都相信靈魂的存在。聖經也說，掃羅王召喚撒母耳的靈魂。聖經禁止這樣做，但說這是可能的。”

弗洛的凳子爭議引起他人的注意，我就開始談論死後的生命。對我們這不是一個學術話題，却眼前的處境。這裏每天都有人死去。

“如果上帝創造我們只為今生，”我說，“祂會先給我們老年的智慧，然後才給我們青春的活力。現在却是相反。祂先給我們青春的活力，卻沒有智慧。在我們多年勞苦，積累一些經驗後，已經是一只腳進入坟墓了。如果死後沒有後續，這種經驗不是成了白費？路德說我們地上的生活就如胎中的嬰兒。他說如果胚胎在子宮里能够推理，它就會思考為何會有手脚。它肯定會猜到：必然有另一個世界，一個廣大的，可以行走、奔跑和玩耍的世界。不然幹嘛有手脚和眼睛？我們現在也是。”

我忘了獄卒，提高了聲音向躺在幾層床鋪上的囚犯宣講。

在昏暗的燈光下，我繼續說道：“假設我告訴你，一個一升的瓶子里可以容納十升牛奶。你們

就會笑。那麼，在一個小腦袋裏，怎麼能容納數千年前的洪水故事，又能容納我太太與孩子的今日事，還有神與魔鬼？一件容器必需無限大，才能容納無限大的事物。換句話說，這容器必需是靈。你不受束縛的靈可以遨遊任何時間與空間。你相信這靈必須受限於這短暫的肉體嗎？”

當我談到這些事情時，囚室裏就如教堂一片寂靜，這是從來沒有過的。沒有人打哈欠或坐立不安。囚犯們穿着脏衣服，臉頰凹陷，眼睛因饑餓而睜得大大的，就像干渴的土地得到雨水一樣。它們領受死後生存的想法。

7

第二天起床前，我醒來，看到窗外有一個虛弱的身影，是加斯頓。我把一條毯子蓋在肩上，出去陪同他。他透過柵欄往下看。光線呈灰白色。院子里霧氣繚繞，但我們可以在大門旁邊看到一排黑色的棺材，里裝有過去二十四小時內死亡的囚犯的屍體。這是蓋拉監獄每天都有的，我自問為甚麼加斯頓會在這一天起床觀看：我便想到死者之一是波普。我試圖拉加斯頓回床，但他一動也不動。

在我們的注視下，一名守衛穿過院子，掀開棺材的蓋子，露出里面的陰影。另一個人跟在後面

，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鋼桩。他举起它，沿着一排尸體依次插入每一具尸體。

警衛正在確保没有生命留下。每次鋼鐵插下時，加斯顿都浑身發抖，所以我给他盖上毯子，他继续看着棺材被關上並裝上卡車，運往羅茲萨。

“愿上帝保佑他們的靈魂。”我說。加斯顿没有回答。

一連幾天他都保持沉默。他不要人企圖了解他內心的痛苦。晚上，他會聽別人交換故事；只有一次，他贡献了自己的一份。

“當我被逮捕之前，我走進一家餐館，想吃一顿美食，振奋精神。于是我把大衣挂在角落桌子的炉旁，點了我最喜歡的菜和一瓶好酒。附近的一位顧客一臉担忧地起身，想對我說話，但我揮手示意他走開，“現在不行。”我說，“我們都有自己的煩惱，但我想安靜地用餐。”在吃完後，我為自己的不禮貌感到抱歉，也請他告訴我有關於他的麻煩。

“太遲了，”他說。“炉子已經把你的大衣燒了一個洞。”

人們都笑了——加斯顿陰郁的敘述風格比故事本身更讓他們感到好笑。當我爬進自己的床鋪，我看到他的眼睛閉着。有一次，加斯顿花了幾個小時，告訴我們他如何尊崇基督為最偉大的導師，但不是上帝。又說一神論者信聖經甚麼，不信甚麼。他們給聖經的重新評估，没有给人留下多少可以持守的東西了。他說，他們並不過分關心

永生。但現在他又開始談論波普教授了。有甚麼證據表明我們在那天黎明一起觀看了可怕的場景之後，還留下了甚麼？他說，一個男人只需要四樣東西，就能生存：食物、溫暖、睡眠、女人。

“最後一項可以省去，”他補充道。“我的妻子已經和另一個男人住在一起了。我們的兩個孩子住在公立兒童院。”

“你自己也不相信這一點，”我回答道。“我們住在蓋拉，目前活在最低的生活條件。然而每天你都能聽到人們的歡笑和歌唱。甚麼是他們歌唱呀？他們的身體沒有甚麼可歌唱的；他們的里面有某些東西在歌唱。希臘人稱之為 *psyche*，埃及人稱之為 *kaa*，希伯來人稱之為 *neshama*，我們稱之為靈魂，如果你不相信我們有靈魂，你為甚麼這麼擔心你孩子的成长呢？幾十年後，這一切對他們都將結束；我們要宗教、道德或文明，目的是甚麼？”

加斯顿嘆了口氣。“我現在無法改變了。我的人生已經給燒壞了，就像那件外套。人們曾經警告我，但太晚了。我在上次刮地板後，私自藏了一塊玻璃，打算割腕，但我連這個勇氣都沒有。”

我說：“自殺只證明靈魂足夠強大，也足夠獨立，可以為自己的原因決定殺死自己的身體。即使你自由了，擁有了你想要的一切，還是有可能作同樣的決定（自盡）。我理解你失去妻子和孩

子的感受；但我感覺到有其他東西正在困擾你，令你無法休息。”

加斯顿沉默。

我继续說道：“我認識一個囚犯，為了給和他一起關在監獄里的兒子吃多一點面包，他就把自己餓死了。這就是靈魂的力量。你也擁有內在資源，基督教，可以給你力量。對耶穌談。祂就給你安慰。”

加斯顿在黑暗中說道：“聽起來你好像把祂當作是活的，正和我們在一起。”

“他當然還活着，”我說，“你没聽說過復活嗎？明天我就向你證明這個。”

“你怎麼這麼堅持，”他說，“比共產黨還糟糕。”

“比共產黨還好！”我回答道，教授去世後，第一次我看到他微笑。

8

第二天晚上，當囚犯們談話時，我提醒他們復活節即將到來，這是在蓋拉監獄的第二個復活節。

“如果我們有煮熟的雞蛋，我們會把它們染成紅色，然後按照東正教的習俗把它們敲碎，”我

說。我像獻上復活節彩蛋一樣伸出手說：“基督復活了。”

老農民瓦西立刻喊道：“祂真的復活了。”一眾聲音呼應着傳統的回應。我旁邊的加斯顿低聲說道：“有些人覺得信仰很容易。”“那麼，讓我們來看看吧，”我說。

我轉向其他人，說道，“我們知道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你們有甚麼證據證明他復活了呢？”一陣沉默。瓦西扯他濃密的小胡子。“我是一個簡單的農民，不識字，但我相信這一點，因為我每年都看到大自然是如何復活的。當地上下雪時，很難想象春天田里會結出庄稼。但不久樹木就發芽，空氣變暖，就像去年、前年、再前年一樣。如果世界能夠再次活躍起來，我們的救世主也能。”

“一個合理的答案，”米隆說。

加斯顿懷疑地堅持道。“如今，在每個基督徒的主張都受到挑戰的世界里，我們需要更具體的東西。”

“我同意，”我說，“我們需要最有力的證據，而且它們確實存在。偉大的羅馬帝國歷史學家蒙森（Mommsen）稱復活是史上最充分證明的事實。你相信傳統歷史寫的是事實嗎？”

無人回答。

我問布雷少校：“當您在軍事法庭任職時，您是否考慮了證人的性格以及他的言論？”

“當然，”他回答道，“在證據相互矛盾時，証人的品格便是關鍵所在。”

“所以我們必須考慮古典歷史學家的性格：他們通常是朝臣，是國王的奉承者，他們為了利潤或取悅他們的金主，於是寫歷史。於是我們更該信使徒們的文字。他們只為行善：就如彼得、保羅、馬太、安德烈，都因為宣道而殉道。”

少校說：“但令我難以接受的，是經上提及的奇迹，就像用五條魚喂飽五千人一樣。”

“你所說的奇迹是甚麼？”我問道。“原始部落會驚訝一根小木棒就能着火（火柴）。作家賽珍珠（Pearl Buck）告訴中國偏遠地區的婦女，在她的國家，車子無需馬兒，卻能行動。”她就聽到那些中國婦女們低聲彼此說：“真是個騙子。”

因此，奇迹只是一種高級生物能夠做到的事情，而耶穌便是這樣的一種高級生物。”

加斯頓搖搖頭。“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土著可能會接受這個，但一個理性的人卻不能接受。”

我說：“相信基督從死里復活，正是合理。不然我們就必須相信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教會是建立在一個謊言之上的。

教會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外在攻擊和內在腐敗，卻還能生存。想想耶穌，在他的一生，沒有組織過教會，沒有寫過書，也沒有進行任何計劃。他只有少數貧窮的門徒；其中一個還為了錢出賣他

，而其余的則在危險時逃跑或否認他。他去世時，在十字架上喊着，為何神會離棄他。他的坟墓又被一块大石頭封住。”

“這不是一個充滿希望的開始，”加斯顿承認。

我就問：“那麼你如何解釋它成為世界性的宗教呢？”

“門徒們聚合吧？”加斯顿疑惑的說。

“但甚麼給了他們力量，為傳教和信仰而死呢？”

“我想他們是克服了恐懼。”

“是的，他們也告訴我們他們是如何做到的：第三天基督親自出現並給了他們勇氣。曾被侍女嚇到的彼得，如今站在耶路撒冷，宣稱他和他的弟兄們看見了基督，並與基督交談過。耶穌真的复活了。彼得說他們最好在他再次否認基督之前殺了他。羅馬人就這樣行了。”

我又問，“相信彼得和門徒因為自己編造的謊言而被釘十架，是否合理？彼得在距離空墓五百碼的地方發表了關於复活的第一次布道。他知道事實是不容反駁的。基督的敵人也沒有人試圖否認復活的事實。

“為甚麼大數（Tarsus）的掃羅在去大馬士革的路上，看到基督責備他，就馬上改變信仰？他不正是基督教的大敵嗎？”

“這可能是幻聽和幻視，”布雷說。

“不。保羅很知道甚麼是幻覺。對於像他這樣的人，不可能是幻影。他如此迅速地降服，因為作為撒都該人，他知道一大秘密——坟墓是空的。”

當我們談話時，米隆正在縫補褲子的破洞。他抬起那雙明亮的眼睛看着加斯頓，說：“幾年前，我收到了一張紐約兄弟寄來的明信片，他曾登上過帝國大廈的頂層。他並沒有先調查地基。那棟大廈已經豎立了四十年，足夠證明它的根基牢固。教會也是，它兩千多年來一直不倒，你便曉得它的根基如何了。”

我們的討論對加斯頓產生了影響。漸漸地，他的痛苦減輕了，他的信心也加深了。幾個星期過去了，他的死亡願望逐漸消失，但我覺得他仍然背負着一個內心的重擔。

夏天又來了許多新囚犯。我們被轉移到不同的牢房，一年來我沒有見到加斯頓。

9

幾個月後，我在蓋拉監獄的十幾個牢房里傳道和工作。我經常受到懲罰，正是因為其中一次的懲罰，我再次遇到了加斯頓。

當時我正在和一個朋友下棋。我們用面包片作為棋子。這時班圖指揮官突然闖了進來：“我不許在監獄里賭博！”他喊道。

我說國際象棋是一種技巧，不是碰巧。

班圖挺胸道，“可笑。技巧也不過是機緣！”

他對自己的回答很滿意，大步走開。當他消失後，囚犯們開始模仿他。門又被撞開了。原來班圖一直在門後偷聽。

“魏恩波——你出來。”另外五個人和我一起被命令出去。“這次你們會在頭的另一邊笑！”我們每人鞭二十五次，之後我被轉移到隔離牢房，昏倒的人常被帶到那里康復。在那里，我們看見已經有一人躺在一张床鋪上，臉朝下，正是加斯頓。他也在別的牢房被打，背上布滿了大片血淋淋的傷口。我們試圖用一件浸過水的襯衫來緩解疼痛，當最糟糕的情況過去後，我檢查了裸露的肉上是否有木屑。他的身體就如發燒，劇烈顫抖。起初他無法說話。但他慢慢地、斷斷續續地解釋說，他因講道而受到懲罰。一名他信任的囚犯告發了他。

“這是我該得的，”他說，“我想告訴你一件事……”

我說：“目前你不能說話。”

“我必須說，不然就沒機會了。是關於波普教授。。。出賣他的牧師。。。 ”他停了下來，嘴唇顫抖。

“你不必告訴我，”我開始說。

“我受不了那個壓力！當他死的時候……”他開始抽泣。

我們一起祈禱。他說他無法原諒自己。

“教授沒有原諒我；別人又怎麼能原諒？”

“眾人當然可以原諒你，如果波普知道一切，他也必能原諒。”

加斯顿悲傷地搖搖頭，我繼續說道：“讓我告訴你一個比你糟糕得多的人。它將幫助我們度過這夜。事實上，他是殺害我妻子一家的凶手。我太太原諒了他，他就成了我們最親密的朋友之一。今天我可以說，我妻子親吻的只有兩個男人，就是她的丈夫和謀殺她家人的人。”我便告訴他這故事。

當羅馬尼亞加入德國一邊參戰時，一場大屠殺開始了，數千名猶太人被驅逐或殺害。僅在雅西城（Iasi），一天就有 11,000 名猶太人遭殺。我的妻子也是猶太人，也與我同信基督。戰爭期間我們住在布城，在這裏猶太人沒有被驅逐。但她的父母、兄弟、三個姐妹和其他親戚都被帶到了邊境的德兰（Transnistria）省。那些沒有死在旅程中的猶太人，就在該地餓死，莎賓娜的家人也死在那裏。

我告訴太太那個惡耗，莎賓娜擦掉眼淚，說：“我不再哭了。你該有一個快樂的妻子，米海該有一個快樂的母親，我們的教堂應該有一個勇敢

的僕人。”我不知道她私下是否流淚，但從那天起我再也沒有見過莎賓娜哭泣。

不久以後，我們的房東，一位虔誠的基督徒，悲傷地告訴我，有一個人從前線休假的士兵也住在這間大屋裏。“我在戰前就認識他，”他說，“但有些東西把他變成了一頭野獸。他自誇如何自願消滅特蘭省的猶太人，甚至吹噓說他殺死父母懷里的嬰兒。”

我感到非常難過，決定整夜祈禱。為了避免打擾莎賓娜，她身體不適，可是盡管如此，她肯定會加入我的守夜。於是晚飯後，我悄悄上樓到房東的房間和他一起祈禱。一個身材魁梧的男人正在懶洋洋的坐在扶手椅上。房東介紹他為波里拉（Borila），號稱為特蘭省（Transmistria）屠夫。當他站起來的時候，他的身軀比我還要高，他的身上似乎瀰漫著一股血腥味的恐怖氣息。很快他就講述他在戰爭中的冒險經歷，以及他屠殺的猶太人。

“這是一個可怕的故事，”我說，“但我並不為猶太人擔心——上帝會補償他們所遭受的苦難。我痛苦地問自己，當凶手們站在上帝的審判面前時，他們將會如何。”

房東阻止了這談話惡化，他說我們都是他家的客人，並將談話轉為中立的渠道。奇怪的是，凶手也是一個健談的人，最終我還發現他非常熱愛音樂。他提到，在烏克蘭服役期間，他被當地的民歌迷住了。“我希望能再次聽到他們的聲音，”

他說。我知道其中一些烏克蘭老歌。我看著波裏拉心裏想：“魚進了我的網！”

“如果你想聽其中的一些，”我告訴他，“來我的公寓——我不是鋼琴家，但我可以彈一些烏克蘭旋律。”房東和他的妻子和女兒也陪同我們。我的妻子正在室裏的床上休息。她習慣了我晚上輕柔的彈奏，沒有醒來。我演奏民歌，充滿感情，我看得出來波里拉深受感動。我記得當掃羅王被邪靈折磨時，少年大衛在他面前彈奏豎琴。我停下來，轉向波里拉，對他說：“我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對你說。”

“請講，”他說。

“如果你透過窗簾看過去，你會發現隔壁房間裏有人正在睡覺。那是我的妻子莎賓娜。她的父母、姐妹和十二歲的弟弟與家人一起被殺。你告訴我，你在戈爾塔（Golta）附近殺害了數百名猶太人，他們就是在那裏被帶走的。“看著他的眼睛，我補充道，“你自己也不知道你開槍打死了誰，所以我們可以假設你是殺害她家人的凶手。”

他跳了起來，雙眼冒著火光，一副要掐死我的樣子。

我舉起手說：“現在——讓我們嘗試一個實驗。我會叫醒我的妻子，告訴她你是誰，你做了甚麼。我可以告訴你會發生甚麼。我的妻子決不會說甚麼，却會擁抱你並為你提供家裏最好的晚餐。

“現在，如果莎賓娜和我們一樣都是罪人，也能寬恕和愛你，想象一下耶穌，完美之愛的化身，

會如何寬恕和愛你。只要回到祂的身邊——你的一切都得寬恕。”

波里拉並不是無情的：內心深處，他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內疚和痛苦，他的一切凶惡言詞，不過像螃蟹揮舞爪。只要一擊打中他的弱點，他的防禦就瓦解了。音樂已經打動了他的心，現在給他的，不是他所期待的攻擊，而是寬恕的話。他的反應是驚人的。他跳了起來，雙手撕扯衣領。“天哪，我該怎麼辦，我該怎麼辦？”他哭了。他雙手抱頭，前後搖晃著，大聲抽泣。“我是殺人犯，渾身是血，我該怎麼辦？”他淚流滿面。

我喊道：“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我命令仇恨的魔鬼從你的靈魂滾出去！”

波里拉顫抖著跪倒在地，我們開始大聲祈禱。他不懂祈禱，只是一次又一次地請求寬恕，並說他希望並知道它會被原諒。我們一起跪了一段時間；然後我們站起來擁抱在一起，我說：“我答應做一個實驗，我會遵守諾言的。”

我走進房間，發現妻子還在熟睡。那時她非常虛弱，疲憊不堪。我輕輕地叫醒了她，說道：“這裏有一個男人，你一定要見見。我們相信他謀殺了你的家人，但他已經悔改了，現在他是我們的兄弟了。”

她穿著睡衣走了出來，伸出雙臂擁抱他。然後兩人開始哭泣並一次又一次地親吻對方。我從未見過新娘和新郎像這個凶手和受害者的幸存者那

樣充滿愛意、激情和純潔地接吻。然後，正如我所預料的，莎賓娜去廚房給他送食物。

當她不在的時候，我想到波里拉的罪行是那麼可怕，必需進一步的化解。我就去隔壁房間，把睡着的兩歲兒子米海抱了出來。方才波里拉還向我們吹噓他如何殺害父母懷裏的猶太兒童，現在他感到震驚了；這景象是一種難以忍受的責備。他以為我會指控他。但我說：“你看到他在父親的懷裏睡得多麼安靜嗎？你也像一個剛出生的嬰兒。天父關心你。耶穌基督的血已經叫你潔白如雪了。”

波里拉的快樂是令人感動：那天晚上他和我們在一起，早上醒來時他說：“我已經很久沒有睡得這樣舒服了。”

聖奧古斯丁說：“Anima humana natureiter Christiana est”——人類的靈魂天生就是基督徒。犯罪是違背人的本性的。它是社會壓力或環境的結果。得以擺脫我們的罪過，是多麼令人欣慰的一件事！

那天早上，波里拉想見見我們的猶太朋友，我帶他去了許多信主的猶太人的家中。每一處他都講述他的故事，每一家都接納他，就如接納歸家的浪子一樣。然後，他帶著我給他的一本新約聖經，回去他的軍團。

波里拉後來問，他的部隊已奉命前往線。“我該怎麼辦？我又得開始殺戮了。”

我說：“不，你殺的人已經超過了一名士兵需要殺的數目了。我不是說基督徒不該保衛國家。但就你個人而言，你不該再殺人了。不如讓別人殺你。那個聖經却沒有禁止！”

10

當我講述這個故事時，加斯頓變得安靜了。最後，他微笑著伸出手來握住我的手，開始一個安寧的睡眠。

早上，我們一起被搬回另一間牢房，在裏面的人中我找到了格利（Grigore），他是另一名屠殺猶太人的戰犯，現在已經悔改了。他也認識波里拉。

我告訴加斯頓說，“格利可以告訴你波里拉後來的事。”

格利說，他曾在特蘭省與波里拉一起服役，並參與了暴行。“後來當我們再出發到俄羅斯去時，他完全變了，”他說。“我們無法理解，他拒絕攜帶武器，他不再殺人，而是開始拯救生命。他在槍林彈雨中自願援救傷員，最後他救了自己的軍官。”

加斯頓也得救了。從那天起，他知道了基督教是甚麼。

兩年過去了；面孔來了又去，其他一切都保持不變。監獄使一些人成為聖人，使另一些人成為畜生，要預測誰會成為聖人、誰會成為畜生，卻不容易。但大多數囚犯將繼續在真空中渡過。一小時又一小時的，疲憊躺在床上無所事事。談話成了他們的全部生活。我詫異如果科學的進步，可以取代人們的許多勞作，人們將會如何打發日子？對於性事、或食物，或毒品，影片，只能作有限的創新。許多人腦中除了這些，就沒有別的東西了。

我在蓋拉監獄的第三年，我們的處境有所改善。由於官方無心工作，我們就有更多的言論自由和多幾口的食物。我們不知道將會發生甚麼，也不知道還有一種最大的考驗正在來臨。

第八章

在1962年3月的一個早晨，守衛突然沖進牢房喊道：“所有神父都出去。”衆牧師神父趕快收拾起僅有的物品，盡職地逃進走廊。我沒有動。

我們的監獄來了一位新指揮官，名叫亞歷山。他是一名紀律王。這一措施，無論目的是甚麼，都意味更多麻煩，我卻希望可以不受干擾的繼續傳道。原來整個監獄如今進行重組：“知識分子”關在一間牢房，農民關在另一間，軍人又是一間等。獄卒的無知導致了相當大的混亂。一個名為“聖經學生”的異端派關在作家和教授的牢房裏，雖然他是一個沒上過學的勞工，但對獄官來說，所有的“學生”都是知識分子。

神職人員離開後，一名警衛問我的職業。“一位牧者，”我用柔和的鄉音回答。於是就被安置在一個有牧羊人和農場工人的牢房裏。在羅馬尼亞語，“牧者”便是牧羊人。

我得以避開幾個星期，直到一名線人出賣了我。我被毆打後，被帶到了牧師神父的牢房。我在蓋爾監獄餘下的時間裏，一直逗留在那兒：這是一間好像洞穴一般的囚室，肮髒的灰色水泥牆，昏暗的光線透過兩扇又窄又髒的窗戶照進來。床鋪緊密地排列，四層高。唯一的其他家具是幾張矮凳和一張桌子。這房間的囚犯約有一百人，其中大部分是神職人員，也有一些平信徒。馬桶只有一個，總是有人在排隊如廁。

當我剛加入這牢房時，一個低沉的聲音喊道：“歡迎，歡迎。”原來是老米爾主教 (Bishop Mirza)，東正教的模範，一位大善人。他的黑色套頭衫上滿是破洞。他有一雙悲傷而溫柔的眼睛，一頭白發。

大家都抬起頭來，我向我認識的人打招呼，包括米隆院長 (Abbot Miron)，他的床位就在主教和加斯頓的上面。

那天晚上，在我們這神父囚室的祈禱時間，天主教徒聚集在一個角落，東正教占據另一個角落，一神論者占據第三個角落。耶和華見證人在上層床鋪設有一個巢穴。加爾文主義者在下層定居。一天兩次，我們各自進行自己的儀式。但在這些熱心的崇拜者中，我幾乎找不到兩個不同教派的人一起說“我們天上的父”。

我們的共同苦難，非但不能叫我們彼此了解，反而引發沖突。天主教徒無法原諒東正教領導層與共產政府合作。各派系的每一個觀點都引起爭

論。雖然討論通常是帶著表面的客套，但有時也會爆發脾氣。

在福音派牧師豪普（Haupt）床位幾英尺外，天主教徒每天都舉行彌撒。豪普就低聲念叨著馬丁路德的話。

“那是甚麼？”一位天主教徒問道。

豪普就遵命提高聲音：“我重複了路德的話，就是：‘上帝譴責教皇的彌撒，過於一切妓院、謀殺、盜竊、並通奸。’”

天主教儀式結束後，法澤（Fazekas）神父就說：“親愛的弟兄，你沒聽過這樣一句話嗎：‘人類遭受了三大災難——路西弗的墮落、亞當的墮落和馬丁路德的叛亂？’”

東正教神父安德烈（Andricu）也加上一句：“路德和路西弗”，他說，“其實是同一個人。”於是天主教和東正教暫時成了盟友。但夜幕降臨時，他們卻爭論教皇的權力。

法澤有匈牙利血統，這令他遭到羅馬尼亞天主教同胞的反對。當他大聲向聖母瑪利亞祈禱，稱聖母為“匈牙利的守護神”時，羅馬尼亞的天主教徒普遍不滿。

“聖母不也是羅馬尼亞的守護神嗎？”一位羅馬尼亞東正教神父問道。

“當然不是，她純屬於匈牙利人。”

加斯頓諷刺的問，難道瑪利亞不是巴勒斯坦的守護神嗎？因為離棄本國，作外國的守護神，顯然是賣國行為。

“也許你沒有聽說猶太人謀殺了她的兒子？”法澤說。

米爾主教溫和地微笑著，試圖讓大家平靜下來。“聖母瑪利亞不受任何一個國家的束縛，”他說。“她領導著教會，她是天國女王，她移動羣星，領導天使合唱團。”

我說那麼神就沒有甚麼可以做的了。

其他新教徒也支持我，但他們的態度，我卻不敢領受。“我為何這樣尊敬耶穌的母親呢？”一位新教徒說。“她不能救我。”

法澤神父回答說：“可憐的人。你只尊敬那些能拯救你的人嗎？主的母親唱道：‘萬代人都會稱我為有福的。’我們稱瑪利亞為有福的，是因為她是耶穌的母親，不是因為她能夠施恩。”

這是一個很好的答案，然而，儘管我尊敬聖母瑪利亞，但我依然覺得她的角色被追隨者們夸大了，這種扭曲從古代就開始。當基督徒初次想象天堂時，他們想到東方的宮廷：一個充滿奢華、音樂和芳香的地方。如果有人希望得到蘇丹援助，他就先找一位認識朝廷大臣的朋友，請他聯絡大臣；那位大臣再轉達給蘇丹最喜愛的妃子，這妃子就轉達給丈夫。基督徒就創造了一種類似的靈界的權力機構。普通人先向神父提出請求，神父轉求聖徒，聖徒再求聖母，由聖母求聖子。

但我信仰的基石是，人人可以直接与上帝交流。但與人爭論這個，有時只會引起憤怒。於是我講了一個過去的真实故事。曾有兩位不同宗派的基督徒，一同被當時的政權送上火刑柱。當局問他們，行刑之前有沒有甚麼最後的要求。他們兩人都有，而且是同一個請求：“把我們背靠背綁起來，免得看見對方可惡的嘴臉。”

但有時我也無法隱藏自己的感受。好幾個小時，我都在聽朗赫特神父（Ranghet，一位多米尼加人）坐在下面的床鋪上念經。最後我說：“為甚麼你每天都要向聖母祈求一千次？她是聾子還是冷漠？當我向這牢房的某人請求幫助時，如果他樂意，他就說可以；但我不會天天向他請求。”

兰吉特很生氣。“既然你們路德教徒不信聖父的絕對正確，那麼你們就更沒有理由相信自己的觀點絕對正確了，”他說。“你的觀點有問題，但我的觀點是對的。”然後他又開始重復“萬歲，瑪麗……”，聲音比以前更大。

“你經常提到‘聖父’——你指的是上帝嗎？”

“我問，

“我指的是教皇陛下，”他回答道。

“對我來說，把神的專號歸於人，似乎是褻瀆，”我回答道。“你稱教皇為地球上基督的代表，意即基督的替代者，但我不能接受這樣的替身，就像我不能允許我的妻子接受他人為我的替身一樣。”

“你太過分了，”他喊道。我還以為是他太過分了。就在那天，朗赫特神父說，人的一切奉獻，包括生命、自由和財產，它們的價值，都不如他在祭壇上祝福的酒和餅。我無法接受一位神父，本身還不一定能得救，卻能把一塊面包變成神，人吃了就能罪惡得赦。

當現代主義的複原宗溫加牧師 (Pastor Weingartner) 否認天主教徒說的童女生子時，以為我一定會站在他的一邊。溫加說，他無法接受這種童女生子的反合科學的故事。我回答道：“現在對童貞女生育進行調查已經太晚了，但若說它不合科學，卻也不行。一位名叫勒布 (Loeb) 的美國生物學家已經在低級生物中，不必雄性也能產生後代。一位生物學家能為低級生物做的事，神也必能為人類做到？”

“但宗教史上到處都有處女生子的故事，”溫加說。“這只能是神話。”

我說神話也有其價值。於是引述了一位沙皇時代烏克蘭著名拉比的故事。當時一名猶太人被人提控，他的律師急需拉比霍菲 (Hofez) 的供詞。可是這老拉比卻拒絕宣誓；他說，他不愿意在供詞上提及上帝的名，免得發生差錯時，神的名就受損。檢方說：“沒有宣誓，如何保證他說的是實話？”

辯護律師站了起來說：“法官大人，我可以提一些事，證明我的證人的品格，顯示我們可以接受他的證據嗎？即使為了個人信仰的原因，他不

能用他神的名號作為宣誓。拉比霍菲曾經逐家為窮人募捐。有一天，一個小偷把他撞倒，搶走了裝有捐款的錢包。拉比大吃一驚，他並不是為失財而擔心，而是為那小偷的靈魂。他當時心中馬上決定用自己的積蓄代替這筆捐款，免得小偷的靈魂會受神的大大處罰。他急忙追趕小偷，喊道：“你在上帝面前沒有任何罪！你偷的是我的錢，我送給你。窮人的錢在我家中，絕對安全。你可以安心使用那些錢！”

法官嚴正地看着律師。“你信那故事嗎？”

“不，我不信。”

“為甚麼告訴我們，你自己也不信的故事？”

“法官大人，試想您、我或我們的檢察司有沒有這樣的故事在我們周圍流傳？可能會有傳聞說我們喜歡混女人，或喝酒，或賭博。當然大都是胡說，但與我們的性格不會相差太遠。這位拉比肯定是大聖人，才會有如此美麗的傳說圍繞着他。

“因此我請求法官，無需這拉比的宣誓。凡他說的，就可以當作是真的。

“那法官果然就接納這建議。”

溫加說：“那很有趣；但童女生子，總難令人相信？”

“基督徒相信聖經。”我說。“但即使聖經是神話，也不要嘲笑。神話在人類思想中占有重要

地位。它們往往是衡量一個人是否偉大的標準。
”

“你的意思是，因為人看到耶穌出奇的神聖，於是相信他的出生肯定異於常人？”他說。

“是的。當我自己的兒子很小時，他問我耶穌如何誕生，我就重復馬槽的故事。

“不，”他說，“這不是我要再聽的。爸爸說，‘猫生的必吃老鼠’，如果耶穌像我們一樣出生，祂也必然像我們一樣壞。”

米爾主教一直在聽我們講話。“一個孩子會這樣說話，”他說。

“你說得也是，”溫加牧師承認，“我們必須嘗試彼此理解。”

我說：“在我信主時，我就接受在我眼前的基督教會，不論是那一派（當時我接觸的是路德宗）。重要的是：聽從聖經的真理為唯一的道路。甚麼宗派或儀式都不重要。”

第二天早上，發生了一件叫人欣喜的事。米爾主教說：“昨晚我想到，主禱文告訴我們要說：‘我們在天上的父……寬恕我們的罪’時，耶穌並沒有叫我們向神父認罪，或請求神父的寬恕；耶穌只吩咐我們直接向天父請求。如果我是一個新教徒（更正派基督徒），我便會用這論點。所以我想出于友誼，我便提出這個，報答你昨天為聖母瑪利亞的捍衛。”

主教為我們大家樹立了榜樣。如果我們不能和平相處，我們就落入共產黨的圈套：他們把我們關在一起，剝奪了其他囚犯的屬靈指導，同時讓我們自相紛爭。但除此之外，我想知道黨方的企圖是甚麼？

電工已經在監獄里工作了一段時間，許多牢房里都安裝了揚聲器，每一面牆都有一個。所以肯定會有廣播。加斯顿說：“這不會是輕音樂。”

2

當整所監獄都完成廣播器後，講座就開始了。這看來荒謬。一位傲慢的年輕政治官解釋說，日食即將發生，並向我們保證，無需驚慌，因為社會主義科學已經使我們擺脫迷信。他接着向我們這些打哈欠的教授和醫生們解釋日食的原理。這次日蝕將會在2月15日發生，由于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有責任開闊我們的視野，我們可以在院子里觀看。

温加舉起了手。“請問，如果下雨的話，我們可以在大廳里觀看日食嗎？”

“不行，”講師認真地說，於是又從頭開始解釋日食。

這種講座持續了幾個小時，重複同樣的觀點。在一天結束時，我們已經疲憊不堪，脾氣暴躁。回到獄室時，就發生爭吵。這些通常是安德烈神

父發起的，就是說路德和路西弗同是一人的那位。他的極端主義使他在戰爭期間大力反對俄羅斯，在共產主義勝利後就轉而吹捧共產至上。他曾走遍全國，為黨宣傳，直到他的紅軍戰友認為這位“紅神父”的用處已經耗盡了。他們就逮捕他，並因他前期的反蘇活動，判他十年徒刑。

如今他在獄中，就成為東正教的大力捍衛者。“這是唯一的真宗教！”他吹號說。“其余的盡是廢話！”

有一次我問：“安德烈神父，您受洗時是在東正教教堂嗎？”

“當然。而且是一位主教為我施洗！”他回答。

“你曾在一所東正教學校學習宗教教義？”

“當然，而且是羅馬尼亞最好的一所教會學校！”

“那麼，我可以告訴你，你之所以會成為東正信徒的真正原因。那是因為五十年前，有一名羅馬尼亞東正教男子與一名羅馬尼亞東正教女子發生了性關係。”

安德烈非常憤怒。我說我們大多數人都是如此。我們小時就被塑造，只被教導支持我們父母宗教的論點。但我們卻以為自己是經過詳盡的思考，才相信的。

安德烈抗議道：“我可能是一個簡單的神父，但我除了自己的信仰，還研究過其他的宗教。”

我說我們果然也研究其他的宗教，但都是從我們出生時（家庭背景）的角度來看。我轉向附近的一羣新教徒，問道：“你們有多少人知道路德釘在威丁堡（Wittenburg）教堂門上的九十五條論綱？”他們都點頭。豪普牧師還引用了路德的話：“我只能站在這些信條上，別無選擇。”

我繼續問新教徒們，記不記得教皇訓令中，把路德逐出教會的原因。“利奧十世（Leo X）不是瘋子，”我說，“我們該知道他的理由。”但沒有一人讀過那封偉大的歷史信件。

安德烈神父此時正在與一位拉比爭論，拉比問：“你是否熟悉我們的塔木德（Talmud）？”

安德烈反問：“你可曾讀過我們的新約？”

每個答案都是“未曾讀過”。

為了避免再次發生衝突，我問大家：“你們知道托爾斯泰的故事嗎？當時他向一位拉比逐條解釋自己的信仰：諸如溫柔、謙遜、耐心等等。拉比回答：‘我們無需新約。我們自己也有教導這些。’

“最後，托爾斯泰說，‘耶穌還教我們一件猶太教沒有提及的事。祂吩咐我們愛敵人。’

“拉比說：‘果然那個我們沒有提到。但你們基督徒有做到嗎？’”

隨着持續的監獄講座，我發現，雖然講課可笑，但背後的用意却不簡單。很快的，演講者就把政治放在一邊，轉到人性的渴求，即是弗洛伊德說的本我（id）。他們提醒眾囚犯，說他們失去的一切。他們談論食物、美酒和性，顯然他們更精於談論這些話題，雖然馬克思的理論沒有被忘掉。

一名年輕的政治官員在談及馬克思、列寧和達爾文的引文，談及基督教與科學之間的沖突，最終導致美國悲慘的後果，以致數百萬美國人正在挨餓。

起初，黨方鼓勵我們參與討論，當一位講師說，人死後，身體就變成一小堆的化學物質時，我就問如果是這樣，為甚麼共產黨員會愿意為他們的信仰舍命。對於一個基督徒，犧牲自己是非常劃算的交易。放棄這短暫的生命，贏得永恆，就像一個人下注十元，贏得百萬。但是，共產黨不信人有靈魂，為甚麼舍得放棄自己的地上生命？這短暫的生命，不就是他們的一切了嗎？

那位政治官不能回答。我便給他一個現成的答案：“聖奧古斯丁已說，靈魂的本性，就是基督徒。”

“無神論只是你佩戴在臉上的面具。在你的內心深處——除非一個人練習冥想或祈禱，否則永遠無法達到那裏——你也相信實現一個美好的理想，必有回報。你內心其實相信有神。”

“讓我們看看列寧同志對此有何評論，”講師說道，並從一本翻閱無數次的小冊子中找出一段。那小冊子必然曾經給他許多啓發。他讀道：“即使是對上帝的觀念，也是一種非常可憎的事。一切肮脏行為、暴力，並各種傳染病，都沒有神的觀念那麼可憎與危險。”這講師就笑着問：“各位還有甚麼問題？”

“你有孩子嗎？”我問。

“我有一個女兒在少年先鋒隊。”

“你寧愿她患上可怕的疾病也不愿她相信她的創造者嗎？列寧就是這麼說；癌症比宗教更好。”

政治官員把我叫起來，打了我的臉。這是他唯一的答案。

在這種強制的思想灌輸下，為捍衛自己的信仰而被摑一掌，是微不足道的。但我們監獄的空氣中却弥漫着一股未知的威脅。我們有一種不斷被監視的感覺。那些沉靜的擴音器是做甚麼用的？直到最近，我們還挨餓、挨打、虐待，但沒有人理會我們心中的思想。老司令官班圖——我們從衛兵那里聽說，已經被撤職，因為偽造賬目。班圖曾說：“我們不在乎你們這些土匪在你們的牢房里計劃未來的內閣，大權還在我們的布城政府。”

這些講座說，我國總理德吉（Dej）正要擺脫克里姆林宮（Kremlin）的控制，開始與西方做生意。為此，德吉必須表現出更大的“民主”。羅

馬尼亞關押的大量政治犯讓他感到尷尬，但我們又不能就這樣放出去，免得我們在外面搞“反革命”。我們的頭腦必須先進行“清洗。”

對於我們 1962 年蓋拉監獄的囚犯來說，這是衆多理論之一，但很少人相信。洗腦的結果會如何，我們都不知道。最近加入我們的著名基督教作家拉杜(Radu Ghinda)總結了我們的感受：“如果他們過去十五年還不能改變我們，現在怎麼能？”

當我們正在討論這個問題時，牢房門打開了，更多的新來者進來了。其中有一個身材高大、禿頭的男子，他踉踉跄跄地左右走了幾步，似乎是為了躲避那些注視着的囚犯。

拉杜是第一個認出他的人。“戴亞努(Daianu)！”他喊道。

那人拖着脚步走過去擁抱他的朋友。戴亞努(Nichifor Daianu)在羅馬尼亞是一位人人知曉的人物。他是詩人，大學神秘神學教授、反猶的《全國基督教防衛聯盟》領導人、也是戰時政府宣傳部長。他在法西斯統治下，掌握重權。如今他從艾烏(Aiud)監獄轉送到蓋拉，繼續他的二十五年徒刑。

起初我幾乎認不出他。他的大肚臍已經消失了。他下巴下面的皮膚像火雞一樣垂着。那個風流倜儻的好女人殺手，變成了一個全身顫抖、像蜘蛛一樣的老人。

他的獄友告訴我們在艾烏監獄發生的事。戴亞努一向食量很大，他試圖從廚師們那里再拿一份

麥粥。廚房主管拒絕了。第二天，主管又在場。
“停！”他說，“那人太胖了。讓他等到明天吧。”第二天，輪到戴亞努時，主管說：“告訴我，戴亞努，有沒有神？”廚師把勺子懸在空中。戴亞努咕啞着甚麼。“說吧，讓我們都在聽。”戴亞努就說：“沒有神。”主管說：“大聲點。”戴亞努喊道，“沒有神。”主管點頭，廚師就給他麥粥。戴亞努趕快喝下稀粥。這一幕很叫主管開心。於是連續一周，天天這樣做。這個故事傳遍了羅馬尼亞，後來也傳到了國外。

但戴亞努依然有創作宗教詩歌的天賦。法西斯時代的朋友鼓勵他背誦他在艾爾監獄創作的一些詩句。它們是悲傷和懺悔的歌曲，比他寫過的任何歌曲更美麗。他也像他的朋友拉杜一樣，還是反猶的。他們的弟子中的前鐵衛囚犯走私食物残渣到神父囚室，有時甚至帶來香烟。反猶主義根深蒂固，戴亞努和拉度就成了這主義的犧牲者。

一天晚上，在討論有關洗腦時，拉度嘲笑道：
“巴甫洛夫(Pavlov)在狗的行為模式中，作了手腳。朝鮮共產黨使用了他的一些意見，令美國戰俘叛國。但對受過教育的聰明人，這些方法行不通。我們不是美國軍人！”

“我們也不是狗，”戴亞努說。

無人反對。

溫加牧師告訴我們，他在學心理學時，見過一個性格測試：只要在卡片的中心畫一條線，然後要求人們畫出他們腦海中出現的第一件事。我們使用了一塊塗有肥皂的板和一顆釘子。

一個人畫了一把劍，另一個人畫了一個頭盔，其他人畫了一朵花、一個十字架、一本書、一個幾何圖形。我說：“我需要另一塊板，這對於我要畫的東西來說太小了。”

我們當中的十個人，沒有一個畫出一位真祭師的屬靈光景。

溫加大笑說，“難怪他們不讓我在神學院嘗試這個。也許我們都該學做鞋子。因為我們當中的鞋匠似乎最屬靈。

原來我們都缺少了神秘的思想。而神秘主義便是祭司的核心。

他提到的是鞋匠格魯 (Gelü)，一位精通聖經的異端派。這似乎激怒了戴亞努。

“親愛的朋友，”他說，“如果你談的是如何修鞋，那非常好。但談及聖經則不必。這裡擁有歐洲著名大學的神學士。我們無需你的聖經教導。”

“教授，您說得對，”格魯回答道，“我才是需要指導的。你能告訴我舊約哈巴谷書是關甚麼的嗎？”

“一個非常小的先知，”戴亞努說，“不用理會他。”

“那麼，俄巴底亞書呢？”

俄巴底亞也是鞋匠不需要知道的另一位先知。

“也許你可以告訴我有關哈該？”戴亞努也不能。

房間里沒有一個神學家能夠就這個主題說出三句話。格魯卻能背誦全部內容，叫我們驚訝。

神職人員研究的是有關聖經的書籍，而不是聖經本身。他們以教條和辯證法為基礎，但對正在摧毀他們的共產主義幾乎一無所知。

在1963年，我們得知教皇約翰呼吁與“離散的弟兄”實現和解的消息，很快我們就爭論如何實現這種團結。

“我們為天國而戰，而天國却是我們都沒有的，”我說，“如果我們擁有它，就不會爭吵了。真愛基督的人必然彼此相愛。就像許多被耶穌治癒的盲人一樣，我們討論自己如何恢復視力。一個說，‘這是憑著信。’另一個說，‘祂觸摸我的眼睛。’第三個說，‘祂用混有唾沫的粘土擦我的眼皮。’如果耶穌來到我們中間，祂會說：‘我用不同的方式使你們痊癒了。現在你們不該爭吵，而該感恩與慶幸。’”

歌德說“顏色便是光的痛苦折磨”：穿過稜鏡，光被撕成碎片。我想，我們的分裂就是基督必須承受的痛苦。

牆上的擴音器突然响了。然後，便是“一，二，三，四，試聲，”多次如此。然後就是：“共產主義好。共產主義好。共產主義好。停頓一下，更多噼啪聲。那聲音回來了，音量越來越大，而且有權威：

“共產主義好。

“共產主義好。

“共產主義好。

“共產主義好。”

整個晚上一直持續到第二天——總共十六個小時。很快，我們只能斷斷續續地意識到有這種聲音在背後。這只是錄音廣播，但它們仍然滲透到我們的腦海中。當聲音最終停止時，這些話就在我的腦中响起： 共產主義好。共產主義好。共產主義好。”

溫加表示，這是一個過程漫長的第一階段。“我國統治者們從俄羅斯那里學到這個，俄羅斯從北京學到它。接下來就是公開認罪。在毛澤東統治下，中國人必須在工廠、辦公室和街道上聽課。然後他們必須譴責自己，說出五年前、十年前或二十年前他們如何密謀反共。如果你不招供，他們就以頑固的反共派之罪名，判你入獄；如

果你招供，你就會因承認而入獄。因此，人們試圖承認却又不承認，承認有反共思想，却又否認自己已經付诸行動。人人開始彼此譴責。朋友和家人不再彼此信任。我們正開始如此。”

法澤神父說：“撒旦總是模仿上帝。這是對基督教信仰的嘲弄。”

“這會持續多久？”加斯顿問道。

“直到你相信‘共產主義好’，也許要持續多年，”溫加說。

我們的下一位講師身材豐滿，性格開朗。他愉快地向我們講述德吉的十六年計劃裏，羅馬尼亞美好的發展。那些黨認為配得的人已經在享受天堂似的新羅馬尼亞。他描述了給予忠誠工人的特權、美味的食物、好酒、黑海度假勝地的假期，到處都是穿着比基尼的少女。

“但我忘了！”他笑道。“你們大多數人未曾見過比基尼泳裝。可憐的家伙。讓我解釋：生活中最美好的事物並不局限于頹廢的西方。”

然後他開始生動地描述胸部、腹部和大腿時，他的眼睛閃閃發亮。然後他感性地談到美酒和旅行的樂趣。我從未見過聽眾們臉上露出如此強烈的欲望。囚犯們已經變成了充滿色欲的野獸。他們的人性尊嚴都被講師的言論剝奪了，只剩下貪婪的肉欲。

“門就在那兒。如果您願意，就能打開它。快樂就在外面等待着。扔掉那些使你成為囚犯的反動思想，到我們這邊來吧！學會成為自由人！”

這些談話結束後，當我們回到牢房時，幾乎沒有人說甚麼。現在沒有人想到外面等待着他們的妻子和艰苦的工作。我們最原始的渴望被點燃了。每個人都渴望再品嚐我們多年來錯過的快樂。

已婚的新教牧師和東正教神父，肯定比自幼就過獨身生活的天主教神父，更難面對這種性欲的試探。

過去幾個月，我們的口糧一直很少，並定期稱重，以確保我們的體重四十磅少於正常的體重。現在食物有所改善，但它有一種特殊的味道。我懷疑它存在春藥，監獄里的醫生後來也同意我說的，認為我們的飯菜中添加了刺激性欲的藥物。許多在監獄工作的人員，都由女性代替。包括前來宣讀公告或法庭判決書的職員。她們穿着緊身、惹眼的衣服，還噴着浓浓的香水和濃妝。她們似乎故意在牢房里徘徊。

“你的生命只有一次，”講師每天都會說，“它過得很快。你還剩多少時間？加入我們吧。我們要幫您充分利用它。”

在原始情感被喚起後，我們文明外表就破裂，超我、我們的良知、社會價值觀和道德標準都被沖倒。

講師們稱我們的愛國主義是錯誤的，我們的理想是一個騙局，同時又給我們灌輸共產主義。黨

方稱這種聚會為“批鬥會”。“你們的妻子們現在在做甚麼？”那位快樂的講師問道。“當然，她們正在做你們自己想做的事。”我們精疲力竭，處于集體歇斯底里的邊緣。在沒有聽課時，錄音機就播放——共產主義好。

詩人戴亞努是頭一位投降的。在一次聽課後，他跳起來，開始亂亂說話。他說自己針對國家的罪行。“如今我看見了，看見了！我曾經跟從了一個錯誤的方向。糟蹋了我的生命！”他把自己的地主父母親當作是罪惡的根由。沒有人命令他攻擊宗教，但他卻開始否認的自己的信仰，聖徒，並聖禮。他攻擊“迷信”，又褻瀆神，談個不停。

然後就是金達。他跟從同一個口氣，起身發言。“我曾是一個傻瓜，”他叫道。“我被資本家和基督徒們欺騙了。。。今後我絕不會在踏進教堂，除非是為了向裏面吐痰。”

戴亞努和金達呼籲眾囚犯放棄他們的舊有信仰。他們比我們的講師們更熱忱。這兩人都是有天分的講員，許多人聽了他們對共產主義的喜樂和自由的形容之後，大受感動，以為他們是說心底裏的話。

當金達坐下來後，一位行走也不穩的老人叫道，“你們都曉得我——皇家軍隊的斯里將軍。我如今否認自己的軍階和過去效忠的對象。我對過去與蘇軍作戰感到慚愧。我曾服侍剝削窮人的階級。我真的羞辱了我國。。。 ”

隨後就是前警察首長，他的“認罪文”是，若非警方的阻擾，共產主義勢必一早就在我國掌權了。仿佛沒有人知道羅馬尼亞的共產完全是俄羅斯人強制在我們身上的。

人們輪流起身發言認罪。這是幾個月來饑饉，羞辱，虐待，與洗腦的結果。頭一個崩毀的便是那些生命已經被個人罪惡蠶食的，就如戴亞努和金達。戴亞努傳講苦行，但他卻自己喜好吃喝，追求美色。他叫學生們為神放棄世界，但他自己卻成了希特勒的宣傳家。他說，“愛耶穌，”但他自己卻恨猶太人。他以為自己是一個信徒，但一個人的信仰顯現在他的日常生活上。他的詩歌，雖然很漂亮，卻只表達渴望，不是成就。金達也是，在反猶與基督教訓之間掙扎。這二人都老了。他們已經在監獄挨過十五年，還面對更多。

神父房的其餘人沒有那麼快投降。於是必須面對加倍的折磨。但這種折磨，至少令我們的爭吵可以暫時停下。我們發現自己的一切宗派，其實可以分為二派：第一派是憎恨，其中的人就以教條或儀式為借口，攻擊他人。第二種是愛，在其中的人發現自己在神面前都是一體。有時看來設立一個向牧師神父的宣教會，比任何宣道會更為重要。在囚室裏，如今更常有自我犧牲之靈與前所未有的信心。在這種時刻，我們好像得到天使們的環繞。

至於聖餐，我們需要餅和酒。許多人都樂意獻出自己的一份口糧，作為餅。只是沒有聖物。

“我們便是活著的殉道者，”安德烈神父說。他們就如此把面包奉獻為聖，並一小杯酒，就是從醫院走私進來的。

6

不久，向共產當局“悔改”了的囚犯，就開始上臺，向其餘人演講。他們更有熱情，相信自己可以因此獲得釋放。當戴亞努和金達的墮落消息傳開後，兩名鐵衛隊成員從木工房偷了一只利器，割開自己的靜脈，自殺抗議。

我在囚室的一個角落找到戴亞努和金達。我問：“你們出賣了良心，導致兩個相信你們的人自殺。你們怎麼想？”

金達說，“他們死了，好叫眾人得以存活。”

“一周之前，你們還是人民公敵，”我說。

戴亞努笑道，“我只要能夠出去，管他是誰遭殃！”

眾人那麼憎恨他們倆，以致他們必須遷往別的獄室去。米隆說，“奇怪的是，寫那麼優美之基督徒文章的人，也會那麼輕易變成出賣者。”

或者原因是，戴亞努和金達在文字中稱贊的只是基督賜下的和平，愛，救恩。一個真門徒並不求基督的恩賜，卻是求基督本身。於是就樂意自

我犧牲到底。這二人不是基督的門徒，只是客戶。當共產黨在一旁開了一家更便宜的商店時，他們就往那兒去了。

7

我在1963年又病重了。他們把我送到監獄醫院。我在那裏住了一個星期後，當局就命令每個人到院子裏去。能走動的就扶助不能行的。當局安排了一些囚犯進行一個小時的話劇表演。這是調戲基督教的演出。當司令官四圍的官員鼓掌或大笑時，眾人也跟著笑。

戲劇完畢後，獄長亞歷山提高聲量，問有沒有積極或消極的評語。只是贊同是不夠的，還必須給理由。戴亞努首先發言。金達其次。人們一個接一個上臺，重複針對宗教的口號。在他們回到自己的羣體時，有些含淚的擁抱我說，“我們在這裏，只好說這些東西了！”

當司令呼叫我上臺時，我記得太太在多年前，在異教大會對我說的話：“上去除去基督臉上的羞辱！”

在格拉監獄，許多人都認識我。我曾被關在不同的牢房。數百對眼光都在看著我，似乎在問：“他也會稱贊共產主義嗎？”

亞歷山少校催促道：“上去說話！”他不怕反對的聲音。當一個頑梗的人投降後，黨方的勢力就越發顯大了。他們有的是時間與能耐。

我小心地開始，“今天是主日早晨。我們的太太，母親與孩子們在為我們禱告，在教堂或在家。我們應該也為他們禱告。。。但我們卻在這裏看那種演出。”

當我提及他們的家庭時，眾囚犯的眼睛就發出淚水。我繼續說，“許多人在這裏說話反對耶穌，但你們反對祂的是甚麼呢？你們說到勞動人士，但耶穌不也是一個木匠嗎？你們說，凡不做工的，就不可吃飯。但保羅在寫給帖撒羅尼迦教會的第二封信中，就這樣說了。你們發言反對富人，耶穌不是用鞭子從聖殿趕出錢幣商人嗎？你們要共產主義，但不要忘記，初世紀的基督徒正是團體的生活，凡物共享。你們希望提拔困苦人，瑪利亞的頌詞不正說，神必提拔困苦人，叫穷人高于富人嗎？一切共產主義的好處，都來自基督徒！

“馬克思說，一切的勞動人士必須團結，”我繼續說。“但有些勞動人士是共產黨，另一些是社會主義黨（或稱社會民主派）；還有一些是基督徒。如果我們彼此相輕，如何團結？我絕不藐視一位無神論者。這在共產黨也是真的。因為如果一個共產黨藐視無神論者，他便是分裂了勞動人士。”

我就引述馬克思的資本論（Das Kapital。）他說基督教是重新建立一個被罪破壞的靈魂最好的

宗教。我問有沒有人未曾犯罪。如果有人未曾犯罪得罪神，他肯定有得罪黨方。我給他們許多共產作家的論述。亞歷山在椅子上坐的不安穩，腳尖蹬地，但卻沒有打斷我。

囚犯們也安靜的聽。看見他們受到感動，我也忘了自己的所在地，開始公開傳講基督。我說就如學校總是有考試，工廠總是有品質管理，我們每個人也都將會被審判，首先是自我審判，然後是他人審判，然後是神的審判。我看向司令官說，“你也將受審判，亞歷山少校。”

他也讓這個過去。我就說及耶穌教導的愛，並祂給的永生。結束時眾囚犯突然爆發歡呼。

當我回座時，米隆說：“你把他們一切的努力都毀掉了。”但我曉得不是。加斯頓小聲說，“你沒有聽見眾人歡呼嗎？”我回答道，“他們歡呼自己內心得到的東西，不是歡呼我。”

直到如今，只有幾個神父在洗腦過程中投降。但公開反對的也很少。不過我們的支持者卻有許多，就算他們沒有當面反抗的勇氣或智慧。

這不是容易的爭鬥。由於我的演說，他們就不再允許我留在監牢醫院，卻送我回神父囚室。

政治官員告訴我們說，戴亞努和金達已經自願書寫人民共和國的奇跡，就是他們未曾見過的。黨方為他們提供一切資料，與旅遊的宣傳。這兩人就有機會證實自己的真正改變。幾周之後，他們就獲得了釋放。這對我們這些堅持信仰的人，

是一種巨大的試探。我們唯一不曉得的是，他們也是最後被放的人。

孔亞中尉是政治官。他帶來一份報紙，叫安德烈神父讀出來。

安德烈就大聲讀出頭條新聞：“一個歡笑與歌唱的國家。”這是金達的文章，附帶著他未下監獄之前的歡笑照片。

孔亞中尉說，“我們要你們曉得，每個人都有機會獲得自由與工作，就等你們放棄那些老掉牙的信仰，加入我們的行列，建立新羅馬尼亞！”

果真是歡唱的心？每個人都記得金達是一個骷髏一般的老人。我們也曉得他的家人在悲慘中，他的孩子們不得上學。

戴亞努也貢獻自己的名字美化社會主義的羅馬尼亞。但他們的文章只為西方世界的讀者。為我國帶來經濟和貿易的利益。這種報章雜誌將送往數以千計的海外羅馬尼亞羣體。但在我國本身，沒有人能夠讀到它們。

每個人都對這二人的獲釋感到興奮。許多受折磨多年卻依然堅持的人，如今開始動搖。但投降的人，卻不見得獲得釋放，反而必須證實他們的真心，就是必須自願工作一日十四或十六小時。在回到獄室後，又必須參加更多的訓話班，或上臺訓話。他們必須報告各人的“政治健康溫度表”，就是每個人必須寫及他同伴們對共產主義的態度。標明各人是冷淡，或是半溫，或是熱情擁抱。

當局不可能得到有關於我的好報告。孔亞中尉帶給我兩個消息。第一是我太太下牢了。第二是，那天晚上十時，我將要受去鞭打，因為我對黨方的藐視，以及在話劇日的演說。

莎賓娜下牢的消息對我是極大的打擊。再加上我對將要承受之鞭打的恐懼。我們都害怕這種等待。時間好像停止了，然後又飛一般的過去。我聽見腳步聲來了。可是那些步聲卻越過我的房門，到我的隔壁，帶出某個人。不久我就聽見鞭打和哀號的聲音。該晚却沒有人帶我出去。

第二天早上他們又給我同樣的提醒（將受鞭打）。一連六天，我都在提心吊膽。最後我才被帶出去。那些鞭打就如火燒。當打完後，孔亞中尉叫道：“再給他多打！”以後我起身太慢，他又說：“再加十鞭！”以後我被半提著回去牢房，播音機正在大聲說：

基督教愚蠢。

基督教愚蠢。

基督教愚蠢。

何不放棄？

何不放棄？

何不放棄？

基督教愚蠢。

基督教愚蠢。
基督教愚蠢。
何不放棄？

有時獄卒會在獄室進行鞭打，為的是“小犯規。”

把褲子脫下。
我們就脫下。
躺在地上，面孔朝下。
我們就躺下。
轉身，把腳舉起來。
我們就轉身。

我們嘗試禱告。有時一位神父會說，“我呼叫天父，可是這是怎樣的天父，讓我們的敵人這樣對待我們。”我們就勸他堅持。他就聽了我們，因為我們與他一同受苦。

當守衛們打到厭倦後，他們就抓了兩個囚犯說，“你！打你同伴的臉！”如果那人不能這樣做，他們就說，“如今你的機會過了，”於是吩咐另一人打他。然後就叫被打的還擊。他們彼此對打，直到流血。守衛們就大笑。

一個傍晚，孔亞中尉叫我收拾自己的物件。既然我肯投降，或許到“特別房”一陣子有所幫助。這種特別房有許多傳說。能從那兒回來的人很少。

他們不是死了，就是在洗腦中崩毀（瘋了），被帶往他處去。又有一些投降，加入黨方，於是開始學習向其他人洗腦。

我們走過院子，轉了幾個彎，抵達一排門。他們就把我送進去其中一間房子，上鎖。

我孤獨的在這間白瓷牆壁的房子。天花板反映著強烈的光，房子正在加溫。我雙手被銬，只能仰躺或則躺，全身大汗。窺看孔打開了，獄卒在問：“是不是加熱系統出了問題呀？”我的肚子開始痛。食物肯定又有下藥了。如今的播音機傳來新的信息：

如今沒人信基督了。

如今沒人信基督了。

如今沒人信基督了。

沒人上教堂了。

沒人上教堂了。

放棄吧。

放棄吧。

放棄吧。

如今沒人信基督了。

孔亞在第二天早上來了，打開門時，一陣涼風就隨著進來。我的手銬開解了。我聽從他的吩咐，跟他出去走廊。

他帶我到另一間房子，裏面有幹淨的衣服，又有一張有床單的床，一張鋪著布的桌子，插著鮮花的瓶子。這是太好了。我坐了下來，開始哭泣。當孔亞離開後，我漸漸平息了。我攤開桌子上的報紙。這是我多年監獄生活第一次見到報紙。我試圖看看有沒有美國軍艦的消息。因為近來獄中多人都說，美國第六航母戰鬥羣開入黑海，要求受壓制的東歐諸國舉行公民自由選舉。但沒有找到。那份報紙却在報道古巴的共產黨獨裁者，正在美國的門口挑畔。

第一位到這特異房子來的訪客，便是亞歷山司令。他說我的新環境只是一個樣本。然後就開始攻擊宗教。他說基督不過是使徒們創造的虛構人物，為的是欺騙奴隸，指望天堂的自由。

我就拿起那份報紙，遞給他。“這是黨報。它印著一九六三年七月的日期。意即如今是一千九百六十多年了。那是從何算起？是從一個虛構的人物嗎？你不信有基督。可是你卻接受他是人類文明的創始人。”

亞歷山聳聳肩頭說，“這不過是習慣使用罷了。無甚意義。”

“如果基督未曾降生世界，這種習慣如何產生？”

“一些騙子做的。”

我說：“如果你告訴我，說俄羅斯人已經登陸火星，我不必相信你。但如果我把收音機調到紐約的波道，聽到美國向蘇聯的祝賀，那麼我就知道這一定是真的。同樣，當基督的最大敵人法利賽人在《塔木德》中也承認基督的存在時，我們只能承認基督的存在是一個歷史的事實。法利賽人也提到耶穌的母親，並一些名字。而且，法利賽人還提到基督行的奇跡，更令人印象深刻，雖然他們推說這是巫術。當時許多外教的作家寫及耶穌，更証實他的存在。只有共產黨人否認有耶穌，只因為這不利於共產黨的理論。”

亞歷山德沒有繼續爭論。相反的，他給了我一本書。在坐牢那麼多年後，我能在手上持有一本書，真是太棒了，即使它只是《無神論者指南》。這本書在西方不為人知，在這裏卻是人人必讀本，不然就不能得到任何工作崗位。我手上的這本是精裝本，插圖豐富。它先談宗教的起源，從印度教、佛教、儒教和伊斯蘭教。然後是基督教。其中把天主教形容的很糟糕，但對路德派（信義會）則好得多（因為路德公然反抗教皇）。但共產黨依然同樣指兩者為錯誤。它說科學已經證明這一。它說教會一直在迫害科學。整整一章描述幾個世紀以來，宗教是資本主義的工具；基督勸告你要愛你的敵人，只不過是叫你向剝削者低頭。還有一章專門討論俄羅斯神職人員的腐敗（這本書的原文顯然是俄文）。他們使用許多圖

片，誤導性地表明基督教儀式是建立在異教迷信的基礎上的。最後一章分析了“無神論者宣傳的形式”，末了列出一系列針對宗教的蘇聯法令。讀到這裏我就睡着了。

8

在以後的數周，我在美好的承諾和可怕的威脅之間，輪番交替。一時是鮮花的私人房間，另一時是擴音器的牢房；一時是美味（大概是下了藥的）的飯菜，另一時是饑餓。一天早上，在我送進熱房時，安德烈神父也與我一同受刑。他是前“紅神父”，如今已經悔改了。他氣喘吁吁地坐着，直到再也無法忍受。然後他跳起來，瘋狂地敲門，乞求出去。警衛們只在笑。但肯定有人報告說我們已經到了臨界點，因為不久司令官就出現了。

“太熱了？”亞歷山問道，“還可以再熱一點。這取決於你們。你們都給我帶來了很多麻煩，如果你們如今願意改變，我需要證據。如果我們釋放你們，你們會如何？我要你們寫一篇你們將要傳的信息大綱。”他留下紙筆就出去了。

我們坐下來開始寫。當我完成後，我給安德烈我的講稿，也取過他的來讀。

當我看完時，他無法直視我的眼睛。“這真的沒有甚麼害處，”他辯解說，“每個周日你都可以聽到這樣的講章。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進步方式。”

我說：“不要再欺騙自己了。你知道這種胡說就是背棄信仰。一個神父就算是喪失了信仰，也該保持沉默。我現在不談上帝面前的審判。只想到你的教友、你的朋友並家人。當他們聽到你宣揚這種褻瀆話，他們會怎麼想？不要再被共產黨欺騙。他們從來就沒有遵守承諾。”

我與安德烈辯論了好久。我告訴他，他心中依然知道基督教是真理。最後他說：“把講稿還給我。”他就把它撕成碎片。

9

新系列的“批鬥會”在大廳開始，數百名犯人參加，我們從特別區被送回來參加。現在大部分講課都是由不久前還被洗腦的犯人講的，都是我們的獄友。黨內專家給他們一番培訓後，他們就回來讚揚共產主義。如今他們攻擊我們所有的價值觀和觀念。這些針對宗教的攻擊，多是現代神學，諸如宣揚“上帝已死”學說。他們叫我們“研究你自己的思想家。他們已經證明基督教沒有客觀的真理。”

無論他們如何開始，這些囚犯講師總是首先訴諸“本我”——他們對性的談論比官方講員更粗俗得多——然後談及“自我”，並我們對自由、金錢和一份好待遇的工作之憧憬。

每天持續十到十二個小時：講座、討論、錄音、口號、並下藥的飯菜。

每間牢房都有兩三人每天向獄方投報每個囚犯的“政治心態”；如果你迎合他們，他們多半不給你麻煩。不然，你就得進入特別房。向當局打小報告如感冒一樣蔓延全監獄。

八月二十三日是與俄羅斯停戰的周年紀念日，我們大多數人都願意相信別人告訴我們的一切。亞歷山少校在大廳舉行的一次大型會議上發言。“我們有好消息，”他開始說。

當他宣布集體農場蓬勃發展時，那些農田被奪的農夫們就開始歡呼；當他說貿易開始起飛時，銀行家和商人們就鼓掌。

亞歷山繼續說：“你們中間有些人終於看到共產主義的好處。但還是有些人至今未能明白。這些是蠢材！你們已經在監牢呆了十多年，還在等待美國人來解放你們嗎？我告訴你們，美國人正要來，但不是解放你們。他們來這裏和我們做生意！”

亞歷山用輕蔑的目光掃過我們稻草人一樣的囚徒。繼續說，在總理德吉的領導下，黨方取得西方的投資，在我國建立工廠，核子反應堆等。

“你們真的傻！”他又說。“你們活在自己的幻想中。我們曉得美國人。如果你向他們求，他們不會給你任何好處。但如果你藐視他們，開口攻擊他們，你就會獲得一切你想要的。”

有人開始發笑，其他人就一同加入。不久整個禮堂都是爆笑一片了。在場面失控之前，司令官舉手，會堂就一片寂靜。他說，為了補償我們不能參加“自由日”的慶典，他安排我們至少也能觀看這活動。電視也安裝好了。電視節目以德吉(Gheorghiu-Dej)的演講開始，隨後是許多其他人的演講，談及推翻羅馬尼亞法西斯政權。當然，沒有一個發言者提到1944年8月23日年輕的國王米迦勒，和民族農民政治家馬紐(Julius Maniu)，並共產黨正義部長帕特拉(Patrascanu)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因為國王已經流亡海外，另兩人也已經死在監獄。

我記得在共產主義早期，大多數羅馬尼亞人都試圖回避周年紀念，但現在當游行開始時，我驚訝地看到陣容的龐大。無數的隊伍經過檢閱台：工廠工人、穿着深色衣服和白領的學童。他們經過黨總部，馬克思、列寧和德吉的巨大肖像在微風中的紅旗中飄揚。我們聽到靴子穩健的脚步聲、銅管樂聲、人羣的歡呼聲、“八月二十三日給我們自由！”的呼喊聲。

“過去從來沒有這樣過。”我對身旁的安德烈神父說道。

“你知道這個老故事，”他沙聲回應。“當一位少女初次被侵犯時，她會掙扎；第二次侵犯，她會抗議；第三次她很享受了。”

囚犯們很享受這一切。但這還不足以讓司令官滿意。演出結束後，他說，“我們現在將討論這慶典，依次說八月二十三日對我們的意義。”

囚犯們一個個上臺發言。前士兵、前警察、地主、農民、實業家。每個人結束自己的獻詞時，都會呼喊：“八月二十三日給我們自由！”

輪到我了。亞歷山看着我，眼中閃爍着。

我以當時的眾人的心態開始。

“如果有人特別受惠於八月二十三日的，那就是我了，”我說。“法西斯分子憎恨猶太人，如果希特勒贏得了戰爭，我現在可能已經成為一塊肥皂了。但我還活着，而聖經有句話說：‘一只活着的狗，也勝過死了的獅子。’”

人羣中發出讚同的低語。“但另一方面，我其實在八月二十三日之前就獲自由了，”我繼續說道。“讓我告訴你們，這是怎麼做到的。古代錫拉（Syracuse）的暴君讀了哲學家奴隸艾比克（Epictetus）的書，非常欣賞，以至建議釋放他。但艾比克回答道：“釋放你自己吧。”國王抗議道：“但我是國王。”那哲學家回答說：“一個被欲望捆綁的暴君，便是奴隸。一個統治自己欲望的奴隸，卻是自由人。國王，你救救自己吧！”

大廳里一片安靜。“雖然我在監獄里，”我說，“但我是自由的。耶穌已將我從罪惡和內心的黑暗中釋放出來。我要感謝八月二十三日將我從法西斯主義中解放出來。但對於另一種自由，擺脫一切今世事物，擺脫死亡的自由，我感謝耶穌。”

指揮官站了起來。“把這些廢話告訴加加林，”亞歷山喊道。“他到了太空，卻看不到任何有關上帝的迹象。”他開始大笑，囚犯們也隨著笑。

我回答說：“如果一只蚂蚁在我的鞋底周圍走來走去，它可以說它沒有看到魏恩波的迹象。”

10

我得到的處罰，就是關在特別獄室。一天亞歷山特意來告訴我說，美國總統被暗殺。

“你對此有何感想？”他問。

我說：“我不敢相信。”

他給我看了一份 1963 年 11 月 22 日的報紙，報道了肯尼迪總統遇刺的消息。

我回答說，如果肯尼迪先生是基督徒，他現在肯定幸福在天堂。亞歷山就走出去，關上門。向

囚犯提出這些問題，是觀察他們的思路，這是共產黨的技术之一。

過了一段時間，我和安德烈神父一起關在一間牢房里，警衛進來，把我們蒙上眼睛，戴上手铐，帶了出去：我們想，這可能是帶去處決。警衛說：“在這裡右轉，”然後，“現在左轉。”我們來到了監獄的一個偏遠地方，當眼罩除去後，我們發現自己在一間干净、温暖的办公室里，這是我以前從未見過的。這肯定是控制講座和錄音的獄方辦事處。他們帶走安德烈，我仍然站在門外，和一名警衛獨處。過去當我談到基督時，這名警衛總是默默的聽，絕不干擾。

“我可憐的朋友，”他低聲說道，“你正在面對苦頭。但奉神的名，繼續前行！”

他走開數步，面部木然。但他的話却温暖了我。

當門打開時，我被帶進一間布置舒適的辦公室。一張長桌旁有幾個男人面對着我。中間坐着一個穿着將軍制服的男人。這就是內政部副部長內格里（Negrea），他敏銳的智慧與他強健的吉普賽臉上燃燒的凶猛能量相匹配。政治官員和布城的一些官員坐在他旁邊。

內格里禮貌地說：“我一直在研究你的案子，魏恩波先生。我不理會你的觀點，但我尊重槍口堅定的人。我們共產黨人也是頑固的。我自己也經常入獄，人們企圖改變我的心志，但我依然堅定。”他用鉛筆敲了敲桌子。

“是時候我們必須進行談判了。如果你願意忘掉你所遭受的苦難，我們也願意忘記你對我們所做的一切。我們可以翻開新的一頁，成為朋友。你無需違背你的信仰，卻依然可以與我們合作，互惠互利。”

他翻開面前的一份文件。“我甚至讀過你的講章。你的聖經解釋得很漂亮。但你必須意識到我們生活在一個科學時代。。。”

他是甚麼意思？當內格里開始進行黨的标准科學理論時，我問自己。一位重要的部長會為了向一個囚犯解釋這“科學理論”，老遠跑了兩百英里？

就像多瑙河一樣，蜿蜒穿過平原，最後匯入大海，他的話語也最終結束了。

“我們需要像你這樣的人。我們不要那些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加入我們行列的人，而是因為他們看到了自己過去思維的謬誤。如果你願意幫助我們反對迷信，你就可以立即開始新的生活。你將再次擁有高薪崗位，又有家人的陪同，讓你舒適又安全。你說如何？”

我回答說，我目前已經生活在喜樂中。但至於幫助黨方，我倒有一種方法。

旁邊的政治官員猛地坐直了。內格里問：“你的意思是你會為我們工作？”

“我建議你派我和你最好的馬克思主義講師，到每一個城鎮。我首先要揭露我的無知和這種倒退的基督教的愚蠢；然後你的講師就講解講馬克思主義的真理。人們就能自己辨別是非。”

內格里久久地凝視着我。“你在挑釁我們，魏恩波先生。這就是我喜歡你的地方。這是我們共產黨人過去用來回答當時政府官員的方式。所以我們不必爭論。我會給你一個更好的建議。沒有人勉強你成為無神論的宣傳者。如果你要執着于自己的過時信仰，那就堅持下去吧。雖然我不明白一個有教養的人怎麼能接受這種東西。但要記住，權力在我們手中。共產主義已經征服了世界的三分之一；教會必須與我們達成協議。

“讓我們攤牌談判。坦率地說，我們厭倦了教會領袖做我們要求的一切，有時甚至更多。他們在人民眼中已經徹底成了官方的走狗；他們不再與人民接觸。”

內格里就逐一提及羅馬尼亞剩下的幾位主教。他說，他們都是一羣無能的人，純是應聲蟲。衆人也曉得。

“現在，如果像你這樣的人成為了主教，你就可以堅持你的信仰，同時也忠于政權。你們的聖經說你們必須服從掌權的，因為權力來自上帝，那麼為甚麼不服從我們的權威？”

我甚麼都沒說。內格里請求其他官員暫時離開。他確信我會接受他的提議，並私下告訴我一些事

。

“黨犯了一個錯誤，”他開始說道，“就是攻擊你們的《世界基督教協進會》（世基會）。它最初是一個間諜組織，但參與其中的牧師往往都是無產階級出身；可以這麼說，他們不是這間諜組織的骨干，只是高級僕人。我們不應該反對這些人，而應該把他們爭取到我們一邊。那麼這個理事會將成為我們的工具。”

他靠近桌前。“魏恩波先生，這就是你可以協助的地方。你曾為《世基會》工作。你在國外廣為人知。我們仍然收到很多關於你的詢問。如果你成為主教，你可以幫助我們其他《世基會》盟友為我們建造一座堡壘，不是為無神論，而是為社會主義與世界和平。您肯定也曉得我們反對核彈，反對戰爭，求實現世界大同？您將能夠盡情地崇拜：那個我們不會干涉你。”

我想了一會兒。

“這種合作必須到甚麼程度？過去與你合作的主教必須舉報他們自己的神父。我也必須這樣做嗎？”

內格里笑了。他說：“由於你的職位，你不必承擔任何特殊義務。至於任何有損國家的行為，人人都曉得該舉報。作為主教，你當然也知道。但是讓我們進入正題吧。如你所知，現任羅馬尼亞路德宗主教已經很老了。你馬上就可以成為當選的主教，並羅馬尼亞信義會的領袖。”

當我回答說我需要時間思考時，內格里同意了

。

“在我回去布城批准你的釋放信之前，我們會再見一次。”他說。

過後他們又把我送回隔離牢房。我想起一個要求時間思考的猶太故事：一位拉比面對宗教裁判所。當局要求他否認信仰，他就要求考慮時間。第二天早上，這位拉比說：“我不會皈依天主教會，但我有最後一個請求——在我被燒死在火刑柱之前，請把我的舌頭割掉。對於這種問題，‘不’是唯一的答案。”

但這只是真理的一面。另一方面，我曉得共產國家的官方教會，必須與共黨有某種妥協，才能生存。畢竟，即使向共產當局納稅，基督徒也必須妥協。說教會可以“轉入地下”是很容易的，但地下教會需要掩護。如果沒有這個掩護，數百萬人將沒有地方進行聚會，沒有牧師講道，也沒有牧師能為信徒施洗，或為信徒舉行婚禮，葬禮。這是一個難以想象的局面。如果我只需說幾句話，支持已經生效的集體農場，或所謂的和平運動，就能贏得教會的正常運作，為何不做呢？

還有，我已經很多年沒有見到我的妻子和兒子了：我甚至不知道他們是否還活着。政治官說莎賓娜下獄了；如果我拒絕他們的提議，她和米海會怎麼樣？

我需要來自上面的力量來拒絕，因為這樣做意味着繼續服刑十一年。還有可能犧牲了家人。我自己也大概會死在可怕的折磨下。但在那一刻，我看不見上帝的臉。我失去了信心。我只見到共

產主義的巨大形象。它已經覆蓋世界的好大的部分，並有可能覆蓋另一半；我想象到死亡的危險，被反復毆打的危險、以及累及妻兒饑餓的危險。在那時刻我喝了基督的杯；對我來說，那就是我的客西馬尼園。我像耶穌一樣，臉朝下趴在地上，斷斷續續地哭泣祈禱，請求上帝幫助我克服這可怕的誘惑。

禱告後，我感覺安靜了一些。但我仍然看到在我面前的戴亞努和金達等人，他們傷害了眾人的信心。這樣的人多達數千。如今我也為肉體的軟弱，像這些人一般。

現在我已經成為一個信仰卑鄙的人，並且會因為我肉體的軟弱而像他們一樣被吞沒。我開始仔細回想我曾經爭論過的基督教真理。我重復問自己這些最簡單的問題：愛比恨好嗎？基督有沒有除去壓在我心中的罪孽？祂除去我的疑惑沒有？祂是救主嗎？回答“是”並不困難。當我這樣回答了，就感到一塊大石從我腦海中移開了。

我在床上躺了一個小時，對自己說：“我現在要試着不去想基督。”但我的努力失败了：除了基督，我想不出別的事物。我最後一次想到內格里的提議，我就想到尼布甲尼撒，直到希特勒。尼布甲尼撒給猶太人立了一位猶太王；希特勒把他在東歐諸國設立傀儡。如今我也像一個傀儡。共黨秘警命我為羅馬尼亞路德會主教。我不再是基督神聖教會的主教，而是共黨間諜。

我再次祈禱，終於感到心靈平靜。

第二天守衛又帶我出去了。亞歷山司令和其他人都坐在內格里身邊，當我說我不能接受時，整個問題就從新討論。直到我們談到《世界基督教協進會》時，內格里才再次要求其他人離開。然後他敦促我重新考慮。

我說：“我覺得自己不配當主教；甚至不配當牧師，連做一個簡單的基督徒對我也是太大了。第一批基督徒在被處死之前說，“Christianus sum（我是基督徒）！”我卻沒有這麼做；倒去考慮你的可耻提議！我不能接受它。”

“我們會找到另一個愿意的，”他警告說。

我回答說：“如果你相信你能證明我錯了，請給我你的無神論證據。我有支持我信仰的論據。我只求真理。”

他問我：“你當然知道這對你的未來，意味甚麼？”

“我已經仔細考慮並權衡了每一個危險，我很高興為真理受苦。”

內格里用一種酸溜溜的表情看着我。他意識到自己的時間白花了。他依然維持自己的禮貌，向我點了點頭，關上公文包，站起來走到窗前，向外觀看，警衛拷上我的手扣，就把我帶走。

我在特別獄室呆了很久。我也不能肯定多久了。時間已經把我監獄的日子壓縮成一個巨大的一日。他們加大洗腦的力度，但方式依舊。擴音器現在說：

基督教死了。
基督教死了。
基督教死了。

我清楚記得，一天黨方給囚犯們發出明信片，邀請我們的家人來探監，送包裹。在指定的那天，我被刮了胡子、清洗了，穿上干净衣服。幾個小時過去了。我坐在牢房里，盯着閃閃發光的白色瓷磚，但沒有人來。晚上獄卒換崗。當時我並不知道我的明信片從未寄出。同樣的伎倆也被用在了其他頑固的囚犯身上。擴音器正在廣播：

現在沒人愛你了。
現在沒人愛你了。
現在沒人愛你了。

我開始哭泣。擴音器繼續報道：

他們不再理會你。
他們不再理會你。
他們不再理會你。

我不能忍受這些話，又不能關掉這聲音。

第九章

在一九六四年六月，所有囚犯都聚集在大廳。司令帶著他的軍官們進來了。我們以為又是一種新的“鬥爭運動”。可是亞歷山少校卻宣布，根據政府大赦的條約，幾乎所有的政治犯都得釋放。

我簡直不敢相信。環顧四周，我看到每個人臉上都一片茫然。隨後亞歷山一聲高喊，整個大廳爆發歡呼。如果那句話是：“明天你們都會被槍殺”，他們仍然會歡呼喊道：“正是！我們是該死的！”他們已經變成了機器人。

但這公告卻不是另一個作弄。那年夏天，數以千計的囚犯被釋放。為此，我們必須感謝西方世界的影響，這又是一次解凍，以及——儘管我當時並不知道——我們的總理德吉真的改變了心意。經過多年對共產主義教條的懷疑，他又回到了母親撫養他長大的信仰。德吉是通過家裏的女僕和她的叔叔而信主的，那位叔叔經常向他講述聖經。儘管德吉沒有公開承認基督教，但基督教卻給了他反抗蘇共的勇氣。他不怕蘇共的威脅，與西方建立了新的關係，成了其他東歐共產國的榜樣。不幸的是，幾個月後他就去世了，有人說是蘇聯特工幹的。

輪到我被釋放了。我發現自己是聚集在大廳裏的最後一批囚犯，約有一百人。我們幾乎是蓋拉監獄最後的人了。空蕩蕩的走廊奇異的寂靜。我們的頭髮修剪了，我們得到了破舊但幹淨的衣服。

正當我思想身上這套衣服的原主時，我聽到一個人喊道：“魏恩波兄弟。”他走過來說，他來自錫比烏（Sibiu），所以我猜想他是我們那裏教會的成員。

“我從你兒子那裏聽說了很多關於你的事，”他補充道，“我們同住了一個牢房裏。”

我說：“我的兒子——在監獄裏？不，不；你弄錯了！”

“你的意思是你不知道？”那人繼續說道，“他已經在監獄裏呆了六年了。”

我轉身走開。這個打擊幾乎超出了我的承受力。米海的健康一直不佳。他絕不能承受長期坐牢。

當亞歷山司令出現時，我的思緒仍然凍結在痛苦和震驚中。“那麼，魏恩波，你自由了，打算去哪裏？”

我回答。“我不知道。官方告訴我，我的妻子在監獄，現在我聽說我唯一的兒子也在監獄裏。我沒有其他人了。”

亞歷山聳聳肩。“那孩子呀？那麼你兒子也下牢，你感覺如何？”

“我確信他不是因為盜竊或其他罪行而入獄，如果他是為了基督的緣故而入獄的，那麼我為他感到驕傲。”

“甚麼，”他喊道，“我們花了這麼多錢把你關了好幾年，你卻還以為全家為信仰下獄是光榮的事。”

“我沒有叫你花錢關我呀！”我說。

於是我們分手了。我穿著另一個人的衣服走出監獄，來到蓋拉鎮的街道。汽車呼嘯而過，我緊張了。這個世界看起來是如此令人驚訝，甚至令人恐懼。女人外套的顏色，一束鮮花的顏色，對長期在灰色監獄的人，都是一種驚嚇。收音機裏的音樂從開著的窗戶裏飄進來，感覺就像太甜的咖啡。空氣聞起來那麼乾淨清新。但一想到我的妻子和兒子在監獄，我就感到悲傷。

我乘公共汽車去了附近的克盧日鎮（Cluj），在那裏我有朋友，但他們已經搬走了。在盛夏的酷暑中，我從一棟房子走到另一棟房子，終於找到了他們。他們見到我非常高興，拿出了蛋糕、水果以及家裏所有的好東西。但廚房的桌子上有一個圓形的、美麗的棕色洋蔥，這就是我曾經渴望的。獄中我常渴望有一個洋蔥來消除監獄食物的味道。但現在我不想要那個了。

我給布城的一個鄰居打了電話。接聽的聲音是莎賓娜！

“我是理查，”我說。“我以為你還在監獄呢。”一陣混亂的聲音傳來。米海接過電話。“媽媽

暈倒了——等一下。”更多雜音。然後他說：“她沒事了。我們以為你已經死了！”

米海並沒有入獄。我得到的錯誤消息，只是當局為了測試我的反應，看看洗腦的效果。

我坐火車去布城。當我們駛入車站時，我看到一羣四十多人，抱著滿懷的夏天花朵，我不知道哪一個幸運兒會受到如此熱烈的歡迎。然後，我認出了面孔，於是往窗外揮手致意。當我下火車時，似乎我教堂的所有人都來迎接我，然後我的手臂摟住了我的妻子和兒子。

那天晚上，莎賓娜告訴我，儘管她多年前就已正式得知我的死訊，但她拒絕相信。後來又有陌生人來訪，表示哀悼，自稱是參加過我葬禮的前囚犯。

“我仍然會等他。”她堅持說。

很多年過去了，直到我的來電。對莎賓娜，我就像死裏復活一樣。

當局給我的教區是一個有三十五名成員的教區。異教部警告我說，如果有三十六人，我就會有麻煩。但我有很多話要說，而且有很多人想聽。於是我決定每個星期天開車到鄉下某一個教堂去講道。在當地警察聽說他們所在地區有一位外來的牧師時，我已經離開了。周日警察們都不太想跑動。但這種方法也不能持續。凡幫助過我的牧師，都被當局解雇了。於是對於那些我想服務的人，我是他們的負擔，也是一種危險。

朋友們敦促我嘗試離開羅馬尼亞，以便在西方，為地下的教會發聲。從西方教會領袖的聲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有些人不知道共產治下的宗教迫害；另一些人則不想知道。來自歐洲和美國的主教前來友好訪問，並與迫害我們的人一起宴會。我們問他們為甚麼這樣做。

“作為基督徒，”他們說，“我們必須與人和睦，包括與共產黨人。”那麼，為甚麼他們不與受難的人和睦？為甚麼他們完全不提那些在監獄或酷刑下死去的神父和牧師？也不給受害者家庭留下一點錢？

康德伯雷（Canterbury）大主教於 1965 年來到這裏，獲准布道。他沒有意識到會眾由官員和秘密警察特工組成——每次這種場合都會出現同樣的觀眾。這些黨員也聆聽來訪的拉比和回教師、主教和浸信會的牧師。這些牧師神父回國後，就贊美羅馬尼亞的宗教自由。一位英國神學家甚至寫了一本書，宣稱基督肯定會欽佩共產主義的監獄系統。

當兩位共產作家安德烈·西尼亞夫斯基和尤利·丹尼爾被自己的同志判處監禁時，世界各地的作家提出抗議。但當基督徒因信仰而入獄時，卻沒有西方的基督徒抗議。

我偶爾會在不怕危險的朋友家中私下講道，因此，在我前往西方的秘密談判開始後，有一個陌生人請我去他家，並不叫我感到意外。他給了地

址，但沒有透露姓名。當我打電話時，他獨自一人。他說：“我想為你服務。”我認出他是一名秘密警察特工。

“我的一位官方的朋友說，你的美元已經收到了。也許你想立即離開這個國家。我的朋友很有些擔心。你剛出獄，我們知道你是個男子漢，他們認為，如果你再留在這裏一段時間，或者讓你的家人留下來作為人質，以保證你的良好表現，可能會更好。當然，你將獲得無條件的釋放……”

我沒有給他任何保證。他們有美元，這已經夠了。西方的基督教組織為我支付了大約 10,000 美元的贖金。出售公民可以帶來外匯並有助於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的預算。我國有一個笑話：“如果有人出合理的價錢，我們的總理也可以出售。”猶太人被以每家 2000 美元的價格賣到以色列，德意志少數民族的成員賣往西德，亞美尼亞人賣到亞美尼亞。科學家、醫生和教授每人值 15,000 美元。

接下來，我被公開傳喚到秘密警察總部，一名警官告訴我，“你的護照已經準備好了。你可以隨時出國，那時你要講甚麼都可以，只是不能說我們的壞話。你只傳你的福音。否則你將永遠沉默。我們可以花 1,000 美元雇傭一個歹徒，或者我們也可以把你帶回來，就像我們對付其他的叛徒。我們也能制造金錢醜聞，毀掉你的聲譽：或是桃色新聞。”

於是我就這樣“無條件”的釋放了。

我來到了西方，與其他約六十名男女並兒童一起登上飛機。莎賓娜坐在我旁邊，米海坐在前排，著迷地看著窗外。我在監獄裏度過了十四年，就如雅各為他心愛的拉結幹活的時間：“對雅各來說，這些歲月似乎很短，因為他愛。”這些歲月對我來說也不算太長，因為我愛基督，樂於服侍祂。

我又開始服侍地下教會了。我在挪威遇到了我們過去宣道會的朋友，當我在那裏講道時，坐在前排的一位女士開始哭泣。後來她告訴我，幾年前她讀到了我被捕的消息，從那時起，就一直為我祈禱。“今天我來教堂，不知道誰會講道。當我聽著，意識到是你，就哭了。”

他們給我一套白領黑色的辦公服。但我卻難穿，因為我太瘦了。第一個給我檢查的醫生說：“你就像篩子一樣千瘡百孔。”他檢查我骨折和肺結核的情況。看完之後，他說：“不要問我有關於治療。必須問那個讓你活下來的神，可是我卻不信神。”

我們來到了英國。當我說一個人可以站在英國（特拉法）廣場，罵英國首相（威爾遜）為流氓，也不會有警察逮捕時，米海不信，直到他親眼目睹這一切。我在從牛津到格拉斯哥的教堂和大學裏演講。有一次，一些大學生告訴我，有二十位來自俄羅斯的學生，前來該鎮參觀。這些俄國人接受他們送的俄語聖經。

“他們真的不接受，”一位大學生說。我告訴他們，“只要個別地分發。因為他們都害怕被同伴告發。”果然，每一位俄羅斯年輕人都如約來到男廁所，偷偷地接受了一本聖經。

在意大利，當地人邀請我在主要的浸信會教堂講道。我談到了基督，但當我談及反對共產主義的話時，意大利浸信會的領導人就打斷了我。我問他為甚麼。

“我是一名馬克思主義基督徒，”他說。“我接受馬克思的所有教導，除了無神論。”

我回答說：“那麼，我是一名浸信會教徒，篤信浸信會的一切規章，只除了浸禮。”

但在教堂門口擠住我們的學生們，卻同意那領袖的觀點。他們說，他們都是共產黨員。第二天，我和他們聊了四個小時，談論馬克思主義與基督教的關係。“我們意大利的共產主義不像俄羅斯那種，”他們說。我想起過去我們羅馬尼亞人也這樣說。

在其他歐洲國家，有人告訴我：“共產黨很小，沒有害處，只是個小丑而已。”我們羅馬尼亞人以前也這麼說。世界上到處都有這些等待機會的小政黨。當老虎還小的時候，你可以和它玩耍；當它長大後，它會吞噬你。我遇到了西方教會領袖，他們建議我單單傳揚福音，避免攻擊共產主義——就像布城秘密警察的吩咐。但是一種錯誤就必須稱它為錯誤。耶穌告訴法利賽人，他們是“毒蛇”，為此祂被釘十字架，不是因為祂的

登山寶訓。我譴責共產主義，因為我愛共產黨人。我們可以恨罪，同時愛罪人。基督徒有責任贏得共產黨人的靈魂，如果我們做不到這一點，共產黨就會壓倒西方，把西方的基督教也拔除。

2

在我從監獄出來後，一個星期日，我帶著一羣孩子去布城動物園時，秘密警察特工也在跟蹤，並留在動物園門口，準備在我們離開時再跟蹤。我領著孩子們到了獅子籠，把他們聚集在我身邊，讓我可以小聲說話，我說：“你們信仰的先賢們，就是被扔進猛獸籠子裏，給吞吃掉。他們很樂意為了信耶穌而犧牲。也許有一天，你們也會因為成為基督徒而被監禁並受苦。現在你們必須做出決定，你們是否準備好面對那一天？”

他們眼裏含著淚水，輪流說“是”。這是我在羅馬尼亞的最後一次堅振禮班，我沒有問其他問題。

在華盛頓市政大樓的牆上，有一塊巨大的牌匾，上面刻著精美的銅版《美國憲法》。當你第一眼看到它時，你只能看到憲法上刻的字：然而當你退後一步，就看到華盛頓的臉。這本書也是如此，它述說一個人的坐牢的經歷，和他同伴們的

故事。可是在他們背後卻站着基督耶穌，是祂給我們信心，又給我們征服的力量。

(譯者注：如果讀者有任何疑問，歡迎用
whatsapp 聯絡：+6016-560 8439，多謝。)

